

蓝佩嘉·著

# 跨国灰姑娘

当东南亚帮佣遇上  
台湾新富家庭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国际亚洲学者会议 (ICAS) 社会科学最佳书籍奖 (2006-2007)

美国社会学会性 / 别研究年度杰出书籍奖 (2007)

台湾“中央研究院”年轻学者著作奖 (2007)

台湾“国科会”杰出研究奖 (2008)

这本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呈现了种族、阶级、性别和公民身份等等界限，如何在家务移工的生命中形成。蓝佩嘉经由划界工作的理论透镜，为萌芽发展中的女性迁移研究贡献了极为重要的成果。这是一本杰出的作品。

—— Rhacel Parreñas, 布朗大学美国文明学系教授

我们或许会以为，只要和世界上的其他人接触越多，我们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就越亲密。但是蓝佩嘉指出我们错得有多严重。在某些状况下，台湾的女雇主和她们的菲佣很“亲密”，但在其他时候两方则非常疏远。的确，有时最接近的反而最为遥远。这本脉络清晰、掷地有声的重要著作，便是在讨论这些现象如何发生。

—— Arlie Hochschild, 柏克莱大学社会学系荣誉教授

这是一本独一无二的学术作品，论述圆融、研究透彻、理论扎实，不但具有高度可读性，而且蕴含深度人文关怀。

—— Delia Davin, 英国里兹大学中国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ISBN 978-7-5463-6703-3



9 787546 367033 >

定价：32.00 元

(上架建议：女性—社会学)



蓝佩嘉·著

# 跨国 灰姑娘

当东南亚帮佣遇上  
台湾新富家庭

##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 蓝佩嘉著. —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8

ISBN 978-7-5463-6703-3

I. ①跨… II. ①蓝… III. ①女性—外籍工人—人权的国际保护—研究—台湾省 IV. ①D99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61543 号

## 跨国灰姑娘：当东南亚帮佣遇上台湾新富家庭

---

作 者：蓝佩嘉

出 品：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刘丛星

策 划 人：严搏非

责任编辑：宋 春 孙祎萌

装帧设计：林 涛 秦 嶷

开 本：880mm×1240mm 1/32

印 张：12.5

版 次：2011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 15-18 号底商 A222 号  
邮编：100052

电 话：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http://www.jlpg-bj.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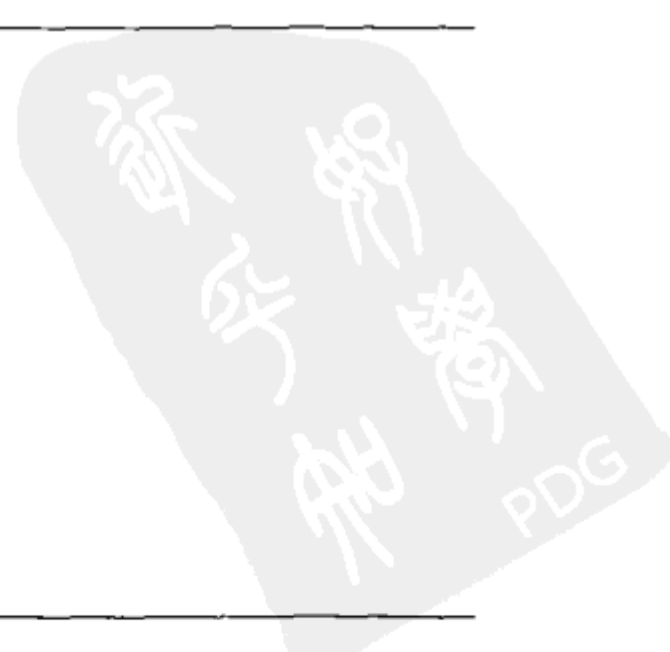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ISBN 978-7-5463-6703-3

定价：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北京汉阅传播  
Beijing Han-read Culture





自序

# 洗衣篮与香水信纸



那是 1999 年一个夏天的午后,天空很蓝,阳光洒了满地。

我刚从台北搬回芝加哥,刚完成一年的田野工作,大隐而世,准备开始和博士论文长期抗战。面对厚厚一沓访问稿以及杂乱的资料,我苦恼着不知如何整理,只好先来清理家居环境,前去街角的投币洗衣店从事家务劳动。我租的廉价公寓位于族群混合、阶级转型的城市北端。这个小区的居民长期以来以非洲裔、拉丁移民为主,市街上漫布着我常去的牙买加小吃店、墨西哥面包店,然而,沿着密歇根湖畔,以吸引年轻雅痞为号召的新大厦,正一栋栋盖起来。

当我扛着一篮脏衣服走在街上,一个中年白人男性从我身边经过,没头没脑的丢了一个问题给我:“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你有认识人可以来当我妈的看护吗?)我瞠目结舌,无法在脑中将这一串英文字转译成为有意义的问题,这位老兄可能以为我听不懂英文吧,看我没反应就转身走开了。

扛着洗衣篮,我站在白花花的阳光下,困惑慢慢蒸发成愤怒。优势族群看见深色皮肤,就以为看见奴隶的脚镣与打工仔的漂泊灵魂。类似的情境早发生在 1965 年的纽约,黑人女性主义诗人安卓劳德(Andre Lorde),推着她的女儿到一家超级市场购物,迎面走来的一个金发小女生,拉着白人妈妈兴奋地说:“Look, mom, a baby maid! (妈妈你看,这里有个小孩女佣耶!)”



我选择研究家务移工这个题目的由来单纯,工作与性别是我的专长领域,移民人权与社会不平等也呼应我政治上的关怀。没有料到的是,我在田野工作与写作论文的过程中,这个主题屡屡和我自己的生活经验交相激荡。坠落美利坚异乡,在他人的注视里,我突然变成一个披戴传统面纱的“第三世界女人”,或是充满异国风情的亚洲女郎。失去母国语言文化的羊水保护,我努力让自己的英文口音“美国化”,以免我的美国学生把“听不懂助教的英文”当作抗议分数太低的借口。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有色女人以及外籍劳工,是非佣在台湾,也是我在美国。人们眼中的美国梦土,在我的求学与工作经验中教会我更多有关核心国的文化霸权或种族歧视的非正式课程。

当然,我不至于天真地忽略我与东南亚移工之间的明显社会差异。我们的平行移民路径,反映出世界体系的多层分化:台湾留学生去欧美核心国取经的同时,台湾资本家从亚洲的边陲进口廉价劳动力。台湾的报章杂志不时对于全球化的生活风格提出浪漫歌颂,像是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台湾人畅谈在上海跟英国朋友一起吃意大利面,眺望苏州河的灿烂霞影。然而,地球村的乌托邦只适用于有经济及文化资源者得以跨国流动的都会新贵,他们享受的豪华五星饭店与异国情调餐厅,实是移民劳工远渡重洋前往的血汗职场。

这本书是几番蜕化过程的产物,结茧的前身是我于2000年在西北大学毕业的博士论文,脱蛹而出的第二回,是2006年由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的英文书:*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跨国灰姑娘:家务移工与台湾新富雇主)。

最后的这一轮蜕化,是返璞归真的母语书写。除了语言上的转换也包括文字与格式的修改。我希望这本书不只是透过学术理论

说服人并能呈现不同人群的生命故事来让读者感同身受。对我个人来说,写这本书不是为了升等或版税,而是为了完成我在过去的两个约定。

我在菲律宾社群中进行田野工作的期间,写了一篇研讨会论文,移工朋友偶然看到了抽印本,兴奋地在教堂里相互传阅。我很怀疑她们是否有仔细阅读其中的内容,只见到她们努力搜寻化名掩饰下的熟悉故事:“啊,这是我、这是我,那是在说你啦!”坦白说,当时的我心情忐忑,不知道自己的诠释与分析,是否適切地再现了她们的经验。

下星期天,我再到教堂去,一个菲律宾朋友把我拉到旁边,递给我厚厚一封信,里面有五页粉红色的香水信纸,工整的字迹写满了她从出生长大、到各个国家帮佣的经验。她握着我的手说:“我看到你的论文后,心里很高兴,我想,原来是有人把我们的经验看成很重要的,所以,我要把我的人生全部写下来,我希望别人知道我的故事。”

当我对学术生涯心生倦怠时,我常常会想起这件事,想起那廉价的香水信纸中承载的宝贵心情,以及手掌交握时不言而喻的约定。我不是信差。尽管我通过大量话语的直接引用,企图让主角发声,然而本书呈现的生命故事必然经过我的撷取与重组。我比较像是翻译者,希望透过书写与诠释,能够让她们们的故事被看见与被了解。但愿能够透过社会学的透镜,映现移工的生命纹理、结构困境,也让台湾雇主与民众看见自己。

我仍然相信,如同二十岁时决定改念社会系的自己所相信的,社会学的分析与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体察社会现实的运作、了解与我们不同的人群的命运,从而提供改变社会现状的可能。但愿这本书的写作,多多少少实现了我和年少自己的另一个约定。



这本书从研究、写作、出版到译写,经历十年岁月。其间承受无数援手,也累积了许多人情债务。我在英文书里致谢过的老师与同侪,这里就不再重复,容我在这里仅感谢台湾的朋友们。

本书的最大功臣是我所访问的众多菲律宾、印尼与台湾女性,尽管我无法在此列出她们的名字。我希望这本书对于她们的经验与处境做出公平适当的诠释,虽然任何文字都无法生动再现这些由泪水、汗水与笑声编织出来的生命故事。移工朋友带给我的不只是研究的资料。田野过程中结识的这些勇敢女性,教导我如何用爱与信心面对人生的试炼,她们热情与坚忍,让我躁动不安的灵魂得以变得温暖和踏实。

田野过程中,我感谢新事劳工中心的韦薇修女与林修女(Sister Ascension)大力相挺。其他的NGO(非政府组织)团体,包括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IWA)(特别感谢吴静如)、希望职工中心、台北圣多福教堂、高雄海星国际服务中心也提供我观察机会与意见交换。本书的版税将捐赠给新事劳工中心与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两个团体。

回台湾进行后续研究的数年间,我得到许多优秀助理的接力协助。张婷菀与谭贞洁在第二阶段的田野工作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罗融在访谈整理与资料汇集上提供莫大帮助,李慈颖是行政庶务上的能干帮手,张蕙兰与张昭雅则负责收集整理新闻资料,最后,郑玉菁协助将英文书翻译为中文初稿,提供我顺畅改写的基石。她们的劳动帮助这本书成形。

书稿的屡次修改过程中,我受惠于许多人的意见,包括曾熾芬、庄雅仲、吴郑重、孙瑞穗、夏传位,以及在《台湾社会季刊》、《台湾社会学》、《台湾社会学刊》投稿发表时的评审与主编。台大社研所的修课学生,我在中研院、清大、高医、东海、世新等学校演讲时的听众们,也都惠予刺激与想法。

我感谢许多朋友协助介绍受访者或者张罗相关资料：蓝佩玲、洪俪倩、陈怡如、王淑津、陈昭如、陈伟智、黄于玲、陈怡伶、沈秀华、马腾、林津如。也要谢谢夏晓鹃在多年前鼓励我朝向此研究主题，陈志柔、汤志杰分享中研院的图书资源。编辑与校对过程，承蒙行人出版社的赖奕璇与周易正的细心处理。

本研究的物质基础有赖以下单位的奖助：美国西北大学、蒋经国基金会、中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博士论文奖学金，中研院东南亚区域研究中心的田野研究补助，以及行政院科学委员会的研究计划补助（91、92、93 年度）。本书的英文版获得国际亚洲学者会议（ICAS）颁发的社会科学最佳书籍奖（2006—2007）、美国社会学会的性/别研究年度杰出书籍奖（2007），我也一并感谢。

我要藉此谢谢两位引我入门的老师：谢国雄领我看见黑手社会学的劳动过程与甜美果实，陈东升勇于打破学术陋规，大力扶持年轻学者。台大社会系的同事，是最慷慨热情的黄金组合，特别是曾嫵芬、苏国贤、刘华真、吴嘉苓、林鹤玲、林国明等饭友，助我超脱学术界的孤独囚牢。

最后，仅以这本书献给我的父母。我的母亲王鹤，是台北农村家庭长大的女儿，她拉拔大我们一家五个小孩，没有任何保姆和女佣的帮忙。我的父亲蓝志青，在 1949 年的战火中，意外搭上军舰离开广东家乡，成为台湾岛的政治移民。在冷战的阻隔下，他没有机会与家人团聚，直到四十年后，在母亲的坟前潜然跪下。

在饮水行走之间，我的父母默默地教我体会与珍惜人生的素朴简单。驽钝如我，直至近年方才听见这无言旋律，仍然笨拙地学习吟唱。我但愿这本书在政治的高亢、学术的中音之余，也能传递生命的饱满低音，在芝加哥的洗衣篮、马尼拉的香水信纸之间悠悠回荡。



编辑说明：

探访对话中，若无特别标明访问者与受访者，则以斜体字表示访问者。

对话中，[ ]符号夹注文字为作者所加说明或为受访者表情说明。



# 目 录

1	自序	
1	导论	
		当女主人没有白皮肤
		家务服务的历史侧影
		当东南亚移工遇见台湾雇主
		田野告白
		界线为何重要?
		章节地图
39	第一章	合法的奴工
		亚洲的客工制度
		台湾的外劳政策
		菲律宾:输出“移工英雄”
		印尼:现代性的朝圣
		地球村中的劳力中介
		契约束缚与债务镣铐
		有国界的全球市场
77	第二章	谁是“外劳”?
		新与旧的族群他者
		种族歧视的修辞学
		聪明刁钻的菲佣 vs. 单纯温顺的印佣?
		打造理想仆人
		移工之间的分化



- 阶层化的他者
- 119     **第三章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跟父权讨价还价  
           女主人为何吹毛求疵？  
           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见人厌？  
           阶层化的母职劳动  
           婆婆也焦虑  
           媳妇熬成雇主婆
- 159     **第四章 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  
           经济诱因的再思考  
           海外生活的文化想象  
           从持家到养家  
           单亲重担与婚姻枷锁  
           我们跟女主人差不多  
           乖女儿与老处女  
           从外籍女佣变成外籍新娘
- 205     **第五章 灰姑娘的前后台**  
           家作为工作前台  
           周日的后台领域  
           灰姑娘的手机  
           全球城市里的边缘客人  
           跨越多国的旅程  
           多层次的前台与后台
- 251     **第六章 屋檐下的全球化**  
           雇主的划界工作  
           移工的划界工作  
           屋檐下的认同政治
- 303     **结论**



愈全球,愈分化  
界线的模糊与不连续  
行动方向与政策建议

325 附录 研究方法

332 注释

352 参考书目





## 图表目录

- 11 图一 《妇友》杂志的女佣广告 (张毓芬提供)
- 108 图二 受训移工正在练习医疗照护 (作者摄)
- 111 图三 在训练中心的移工学员 (作者摄)
- 166 图四 菲律宾杂志的中介广告
- 169 图五 一位移工的重新粉刷过的房子(相片右半边),与邻居的旧屋形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摄于东爪哇)
- 176 图六 东爪哇村一位女性移工的丈夫正在照顾小孩 (作者摄)
- 216 图七 在公园野餐的印尼女性移工 (作者摄)
- 224 图八 两位印尼移工在周日的台北火车站 (作者摄)
- 229 图九 一家移工常去的商店,橱窗上满是预付卡的展示 (作者摄)
- 234 图十 中山北路上的菲律宾商店与放假外出的移工 (作者摄)
- 236 图十一 菲律宾移工在中山北路圣多福教堂前的节庆游行 (作者摄)
- 239 图十二 印尼移工与作者(右数第三位)在台北车站大厅野餐 (作者摄)
- 89 表一 1998—2007年在台湾的家务帮佣与监护工的国籍分布
- 96 表二 台湾中介对不同国籍的移工描述
- 106 表三 印尼移工的训练内容
- 257 表四 雇主划界工作的四种类型
- 283 表五 家务劳工的四种划界工作类型

# 导 论





诺玛在 1967 年生于菲律宾的一个小村庄。她在镇上的大学念了两年书后，因父亲突然去世而休学。为了帮忙家里的经济，她飞去新加坡投靠在当地帮佣的姐姐。这是诺玛生平第一次离开菲律宾。她很快地找到一份工作，替一对新加坡夫妇照顾两个小孩。从家乡的平房搬到三十几层的高楼大厦，对诺玛来说是一个新奇但也令人恐惧的经验，她听说有不少菲律宾女佣在阳台擦玻璃时摔下楼。诺玛在新加坡一住五年，周日是唯一的放假日。这一天，她可以离开厨房边那个没有窗户的小佣人房，放松呼吸自由的空气，跟同乡自在聊天嬉闹。

在异乡工作半年后，在 Lucky Plaza——新加坡的菲律宾城，诺玛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在工厂打工的詹姆。他让她笑，忘记了离家的孤单和寂寞。诺玛怀孕后，他们回到菲律宾结婚，搬到马尼拉近郊，很快有了另一个小孩。他们用尽出国时的存款买了一台三轮车，詹姆用它载客赚钱，诺玛则在家照顾小孩。然而，捉襟见肘的家庭收入困扰着诺玛，她尤其忧心两个孩子未来的教育花费。于是，她决定再次出国工作。

1997 年，诺玛跟姐姐借了一笔钱，向中介买来到台湾工作的机会。这一次，她离开丈夫的怀抱和小孩的亲吻，只身一人飞越国界，成为一位跨国母亲，肩上背负着沉甸甸的家庭重担。她将两个孩子



托给妹妹照顾,每月支付她一些零用金。诺玛的薪水在扣除中介费后所剩无几,除了寄钱回家,她省吃俭用、努力存钱,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帮助她丈夫来台工作。然而,夫妻团聚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因为工厂外劳的中介费已经涨到台币十五万元之多,她的存款连前金都付不起。

为了照顾雇主的新生儿,诺玛在台湾工作的前两年都未放假回家。她叹着气说:“我女儿老是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我总回她,等下个圣诞节吧。”最后,她终于说服雇主让她休假一个星期。她带着很多玩具和礼物回家,有芭比娃娃、DVD 播放器,还有一只崭新的诺基亚手机。诺玛不确定她的帮佣旅程在台湾之后的下一站会在哪里。她只能向上帝祈祷,几年后全家人可以重聚。或许那时,她可以在马尼拉郊区开一家小杂货店(*sari-sari*),不用再漂洋过海,用手机短信跟女儿说我爱你。

佩君生于台北,和诺玛同一年出生。大学企管系毕业后,她进入一家跨国银行工作,最近被拔擢为经理。婚后,她和先生搬进公婆家楼上的公寓。虽然她同意遵循传统的三代同堂居住方式,但坚持生完孩子后继续工作。然而,经常要加班的她无法准时六点去保姆家接女儿,托儿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婆婆自愿要帮忙带小孩,但佩君心有排拒,她担心自己会因此失去照顾小孩的主导权。而且,她可以预见到未来会因养育方式的想法不同,而和婆婆起争执。

雇用外籍女佣,在佩君的同事与朋友之间越来越常见。如同大多数的台湾雇主,佩君对于要把小孩托付给一个外国人,一开始感到非常紧张。从小生长在没有雇用女佣或保姆的家庭,佩君也担心女儿会在外佣的照顾下,变成一个恃宠而娇的小孩。尽管有疑虑在心,佩君最终仍决定要雇用一名外籍女佣,为此,她必须花时间来说服其他家庭成员。婆婆皱起眉头,认为媳妇是在浪费钱:“干吗那么

麻烦？我可以免费替你照顾女儿！”先生也反对，担心这样会侵犯他的隐私，他拉高松垮的裤头说：“那我以后就不能在家穿着内裤走来走去了？”最后，佩君主动提议，会由自己的薪水里掏钱来支付女佣的全额薪水，才平抚了家中的反对声浪。

佩君从中介提供的照片和录像带里，挑选了一名大学肄业的菲律宾女性，她的教育程度和英文能力让佩君满意（“说不定女儿可以顺便学英文”，她心里想），同样具有母亲的身份更让她放心（“希望她爱我的女儿就像爱她自己的小孩一样”，她这样期待）。有了这名菲佣的帮忙，佩君不用再和先生争执今天轮到谁洗碗或者晾衣服，也不用担心自己没有扮演好伺候公婆的孝媳角色。更重要的是，在忙碌的一天工作结束后，她可以轻松躺在沙发上，等菲佣帮女儿洗好澡后，念一本故事书给女儿听，在睡前享受高质量的亲子时光。

全球化连结了诺玛与佩君，以及无数菲律宾、印尼、越南与台湾女性的生命轨道。有越来越多的女人，因为家务劳动的国际分工而相遇。自70年代中期后，东亚新兴工业国和中东石油输出国的富裕兴盛，吸引了来自于亚洲较为贫穷国家的国际移民。据联合国2006年发布的估计，全球共有1亿9600万人现居住在非出生国（占全球人口的3%），其中有超过5000万人住在亚洲。<sup>1</sup>在国际迁移的多种路径中，低技术及非技术的契约劳工，在亚洲地区的数量尤其突出。据估计，亚洲的临时移工（包括合法与非法停留者），在2000年已达到610万人，其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女性。<sup>2</sup>这200万名女性多从事特定的行业，如娱乐表演、护理照顾，以及家务服务。

亚洲的家务移工主要来自菲律宾、印尼、斯里兰卡、泰国、越南等国；她们打工的目的地则是新加坡、马来西亚、中东和香港、台湾地区等地。从90年代初期开始，台湾成为亚洲移工的主要停驻站之一。虽然政府严格控管雇主的聘用资格，但台湾家庭雇用移工的

数量仍在近十年快速扩张、渐趋稳定。根据 2008 年的劳委会统计，全台湾有超过 16 万的移工担任家庭帮佣与监护工，其中九成五以上是来自于印尼、菲律宾、越南的女性。她们在台湾社会的角落里，默默地洗碗、煮饭、拖地、倒垃圾、推着老人的轮椅、更换婴儿的尿布、擦洗病人的身躯，这些以短期契约受雇的过客劳工，付出她们看不见、但不可或缺的劳动，维持着台湾社会的清洁秩序与家庭美满。

这些家务移工的处境好比“跨国灰姑娘”（global Cinderella）。我以“灰姑娘”的比喻来彰显她们迁移旅程中的复杂与两难：她们与雇主的关系在地理上亲密但在地位上疏离；她们的迁移之旅既是一种解放也是一种压迫。她们为了逃离家乡的贫穷与压力远渡客乡，但也同时为了扩展人生视野及探索现代世界而展开旅程。然而，跨越国界后，她们发现自己坐困在犹如牢笼的雇主家中。工作时，她们必须谦卑地扮演女佣的角色，只有休假时才能涂擦脂粉、挂戴珠饰、穿上短裙。家务移工被台湾雇主雇用来扮演“代理家人”及“虚拟亲人”的角色，然而，地主国却待她们如低贱外人、用过即丢的劳动力。虽然少部分的女性移工可以美梦成真，成功地在返乡后实现阶级向上流动，但大多数的她们只能深陷在来来回回的跨国迁移行旅中，灰姑娘的美满结局仍如童话般梦幻。

## 当女主人没有白皮肤

曾经，在某个美国女性主义者的聚会中，与会者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她们激动地讨论着家事的性别分工对女人造成的不平等与压迫。居于少数的一名黑人女性，举起手不疾不徐地说：“我想在座的各位今天能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你们家里有女佣在帮你们做家事带小孩吧？”一桌女人沉默以对。

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自 60 年代起即成为西方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由于家务劳动在父权体制下被定义为女人的“天职”，职业妇女面临蜡烛两头烧的困境，除了白天要上班，晚上还有做不完的家事，有如“第二班工作”（the second shift）（Hochschild 1989）。

90 年代的女性主义，尤其是少数族裔的女学者，开始质疑“女性”的同质经验，正视女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性别的压迫不是绝对优先，而是与其他社会不平等（阶级、种族、国籍、性倾向等）相纠结。家务雇佣这个主题尤其暴露了女人之间的差异与不平等，鲜少有工作安排如此典型，雇主与雇工都是女性（Rollins 1985）。然而，在许多状况下，这两个女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剥削连带，而非姊妹情谊（Romero 1992）。

家务帮佣的历史前身，如台湾的“查某嫲”、美国的“黑嬷嬷”（black mammy），都具有封建、殖民的色彩。然而，这项职业并没有随着时代而衰退，反而吊诡地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持续成长。全球经济的整合、劳动力的跨国迁移，帮助具有阶级或种族优势的女人得以借由市场外包的方式，购买其他女人的劳务来减轻自己肩上的家事与育儿重担，避免天天和先生在家里开打性别平等的家事战争。

学者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 2000）借用食物链的比喻，描述已然成形的“全球保姆链”。上游是富裕国家中能够负担雇佣的女性，她们可将自己的地位提升到“母亲经理人”（mother - manager）（Rothman 1989），继续享有母职的情感回馈，也让孩子享有较完善的照顾品质。当她们把劳务向下外包，其雇佣的家务移工必须离乡背井来交换经济报酬。有家庭与小孩的母亲移工，必须借助亲人的协助，或是雇用母国更贫穷的女佣，让子女在母亲缺席的状态中仍然享有关怀与照顾。



国际分工,不只展现在加工出口区与生产劳动,也包含家事服务、照顾工作等“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Parreñas 2001)。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不只展现在国民所得与物质生活条件的落差,也变成孩童照顾品质上的不平等,甚至是母爱劳动的掠夺剥削。当来自菲律宾的诺玛,牵着佩君女儿的手,确保她安稳地坐在台北捷运上,手里拿着放学后的热点心。诺玛的小孩,正独自踩着石头路回家,准备回家帮外婆拣菜;如果诺玛决定从菲律宾乡下找个女佣来家里帮忙,“全球保姆链”会延升到更末端,有另一群孩子失去了母亲的陪伴。

在当代的“全球保姆链”中,移工的迁移目的地不再集中在北方国家。南方的新富国度,包括波斯湾的石油国以及亚洲新兴工业国(NICs),不论在生产或再生产领域中都出现大量对外籍劳动力的需求。国际迁移的多层流动彰显了所谓“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女性之间的不平等,家务雇佣的权力关系的图像不再是“白人雇主”与“有色移工”的简单二分。“有色女佣”vs.“有色女主人”的现象也解构了“第三世界女性”的这个概念,不如早期西方女性主义学者所错误假设为一个同质的群体。<sup>3</sup>

谁在雇用家务移工? Saskia Sassen(1992)在分析伦敦、纽约及洛杉矶等城市的研究中指出,随着制造业的外移,这些“全球城市”(global cities)已然成为生产服务业(producer service)的重镇,所雇用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员大幅扩张,这些城市居民对个人服务业的需求也激增,公领域的办公空间需要工友来清理,私领域的家庭中也需女佣、保姆与园丁。这些低阶服务工作,属于一般称为“三D”(dirty 肮脏、difficult 困难、dangerous 危险)的工作,本地人多不愿从事,外来移民成为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亚洲较低阶的全球城市,如香港、新加坡、

吉隆坡及台北等,其中的专业中产阶级的扩增,也促进了对家务服务的需求。亚洲的新富阶级诞生于80年代,西方市场在这段时期因低成长率及经济不景气而持续低迷,经济快速发展的亚洲成为一个充斥麦当劳、移动电话、高档车等各种进口商品的市场(Robison and Goodman 1996)。对亚洲雇主而言,消费外国商品及海外旅游是他们营造跨国新贵生活风格的元素,购买移工提供的家务服务也成为他们彰显中产阶级地位的一种身份标记。

探索亚洲内部的跨国保姆链的研究在近年来正萌芽发展中。<sup>4</sup>本书企图进一步连结政治经济学的巨观分析与认同形塑的微观政治,分析层次除了包含劳雇双方的互动关系,也触及台湾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脉络,包括族群政治、阶级形构与性别关系的转变。在研究设计上,我避免从移工或雇主的立场收集单边的资料,而欲探讨双方复杂与动态的认同构成。我的访谈对象涵盖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所追求的并非具陈两造说法或虚妄的客观中立,而是试图从劳雇互动的过程来理解认同政治。我也希望呈现立体的主体经验、多层次的权力关系,而非轻易地替雇主贴上压迫者的标签,或是把移工视为被动的受难者。

## 家务服务的历史侧影

早在家务移工出现前,女性被交易成为奴婢或女佣的情节,早已出现在台湾历史的章节中。清朝时期的台湾民间不乏有以契约买断婢女的情形,也就是俗称的“查某嫻”,富家女出嫁也多有从娘家带着“陪嫁嫻”(卓意雯 1993)。<sup>5</sup>另一个从事类似家务工作的群体是童养媳,台湾地区自康熙年间即有无子也可养媳的旧习,清代中期后,由于丁日昌与刘铭传示禁锢婢,养媳的内涵复杂化,经常变

相收养为奴婢或妓(曾淑美 1998)。

到了日本统治时期,1919年抱持同化主义的首任文官总督宣示“内地法律延长主义”,逐步在判决上透过“公序良俗”的概念来改变、废止台湾旧习。查某嫔便被判定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身份关系,有违公序良俗,应予废除。<sup>6</sup>在查某嫔的合法地位丧失后,统计上显示养女或童养媳人数有所增加,推测应是以养女之名行蓄嫔之实<sup>7</sup>。

在这个阶段,家务开始成为一种合乎现代意义下的工作,以契约关系规范的雇工逐渐取代人身从属的查某嫔。*Shijonin*(日本话,意指“佣人”)在市场上贩卖劳动力以交换薪资与食宿。在1920至1930年之间十年,*shijonin*人数成长三倍之多(从3578人至9877人),其中多数为本省女性。<sup>8</sup>这段时间正值日本殖民政府将台湾纳入工业化计划,以整合为战时经济后备基地的关键时期,受到农村衰退、城市兴起的影响,台湾女性大幅进入新兴的服务行业(游鉴明 1995: 30)。

虽然家务帮佣人数在日治后期逐年增加,但雇主仍集中于日本官员及少数的台籍地主与世绅阶级。台湾的家务服务部门在1949年后出现明显扩张,这与国民党政权自中国大陆撤退有关。在将近一百万的外省移民中,有些人带着仆役撤退来台,其他人则在迁移后,面临找不到佣人的困扰。因应帮佣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形,妇女会等官方妇女组织甚至出面从事中介的工作,其服务的会员主要是外省籍上层阶级的女性,在50年代到60年代间的妇女杂志里常可看到类似的招募广告(如图一)。

另一个雇主群来自于台湾内部的城乡移民,这些移民至都市的中产阶级小头家或双薪核心家庭,成为扩充中的家务雇主阶层的新成员。都市化吸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迁移至台北,从事教书、

护理及其他白领工作(游鉴明 1995), 远离娘家及亲族到外地工作的她们, 需要雇用帮手来协助照顾小孩。由于现代化的家电设备在当时仍不普遍, 家务在当时也仍是很费力的工作。<sup>9</sup> 这些自农村迁移至都市的雇主于是通过家乡人脉招募、雇用同乡的单身女孩来家里帮忙。



图一 《妇友》杂志的女佣广告 张毓芬提供

对这些年轻的女孩来说, 在台北当女佣的经历比在家乡种田来得多彩多姿。当时一出名为《我爱阿桃》的流行连续剧, 以阿桃这名乡下女孩来台北帮佣为主题, 浪漫化地描述城乡移民在花花世界大



开眼界的探索经验。<sup>10</sup>通常这份工作被认为是结婚前的一段过渡时期,甚至可以说是进入无酬家务劳动的实习期,许多人在帮佣后去学裁缝,然后就准备结婚。她们与雇主间虽然不一定有血缘关系,但通常以“阿姨”、“表哥”或“大姐”相称。这些雇主仰赖家乡的社会网络来雇用可信任的帮佣;这些帮佣的父母也同时将女儿托付给这些雇主,视他们为女儿在台北的替代父母以及道德上的监护人。雇主通常将报酬直接交给父母,在台北帮佣的女儿只领取少许零用钱。到了60年代,扩增的私人中介机构逐渐取代这种依据人际网络的雇用模式。大部分的私人中介机构聚集在台北火车站的后方,因此可以占地利之便,就近接纳自乡村移入的劳动力。

然而,台湾社会在经历50与60年代的进口与出口替代阶段后,家务工作不再成为年轻女孩脱离父权家庭及探索新生活的唯一选择。单身年轻女孩,作为廉价又驯服的劳动力,成为劳力密集出口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Kung 1983)。以外省中产阶级妇女为主要读者的妇女杂志,便充斥了找不到帮佣的雇主投书表达类似以下的抱怨:“工业起飞,女孩子全飞到工厂去了。”(张毓芬 1998: 71)此外,家庭经济条件的提升与国民义务教育的延长,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女儿得以继续就读高中或大学。家务帮佣的劳动力来源因此逐渐从单身女孩转变成“欧巴桑”,她们大多是已婚或寡居的中年妇女。

欧巴桑帮佣与年轻单身农村女孩的工作条件上最大不同处,在于多数的欧巴桑原本就住在城市里,许多住在雇主家的附近,因此倾向不与雇主同住。她们有些是日工,只在白天到雇主家工作;有些则是时工,只在周末或固定的日子到一些家庭打扫。做日工的帮佣领月薪并且只负责特定的工作内容,多数的工作内容以煮饭与打扫为主,通常不包括洗衣及照顾小孩。<sup>11</sup>如果是请来照顾小孩的保姆,则通常不需或只负担些微清扫工作。担任时工的帮佣,或所谓

的“钟点管家”，则通常以清洁工作为主，依工作时数领取时薪（坊间现已出现不少居家清洁的派遣公司）。<sup>12</sup>越来越少台湾帮佣愿意与雇主同住，尽管它的市场工资随着供需的状况而日益增高。<sup>13</sup>

台湾社会里雇用家务帮佣的传统，并不如香港的华人家庭或马来西亚的殖民地区那么普遍。<sup>14</sup>然而，单纯忠诚的女佣这样的一种理想意象，却映现在许多当代台湾雇主的心中，尽管他们的家庭记忆里可能从未有过活生生的女佣。我所访问的许多台湾雇主，感叹如家人般、来自乡下的“理想女佣”已在这个时代消失。这样的一种充满怀旧情怀光晕的历史侧影，和雇主们对现世里“欧巴桑”的抱怨形成强烈的对比。在台湾雇主的眼中，欧巴桑难相处、爱抱怨工作内容、对工时与工资锱铢必较，而且常要求加薪。此外，这些欧巴桑打扫得不够干净、带小孩的方式过时，并且缺乏专业训练与勤奋精神。

这些对欧巴桑的抱怨，从劳工的角度来看，其实反映出她们试图和雇主家庭维持距离以捍卫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理性化家务帮佣的工作内容与条件。对照于“欧巴桑”，与雇主同住的外籍帮佣显得截然不同。用雇主的话来说，她们“比较像古早时代的佣人”。台湾雇主用过去的理想女佣形象投射到对外籍帮佣的期待与管束：佣人要卑躬屈膝、心悦诚服；报酬虽微薄，但提供随传随到的服务，工作内容更应无所不包。

70年代的西方学者曾乐观地预言，家务帮佣这份工作将会随着家务服务的商业化以及新家务科技的发明而式微。<sup>15</sup>这个预言至今并未成真。即便是老派的住家帮佣工作，都未随现代化的进程而消逝，反而拜新自由主义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之助而蓬勃，甚至扩张。当代台湾中产女性，受惠于低成本的移工劳动力，为她们在良家妇女的父权规范，与现代职业妇女的处境之间的进退维谷，提供了一条市场外包的便利回路。

## 当东南亚移工遇见台湾雇主

本书聚焦于台湾、菲律宾、印尼三地之间的连结,它们在亚洲迁移体系中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数十年来,这三个“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具有不同的面貌:台湾在经历成功与快速的工业化后,地位已从美国的经济援助对象,变成主要的贸易伙伴。菲律宾一度是亚洲经济的龙头,但自80年代以来受到政治动荡与经济衰退的影响,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劳力输出国。印尼的经济发展稍晚但蓬勃,在1997年因金融危机而滞延,向海外输出劳工成为舒缓国内劳动力过剩及失业率高涨等问题的解决途径之一。

台湾地区政府于1992年开放重病与失能者申请“家庭监护工”,不久,也允许家中有十二岁以下的幼童或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雇主申请“家庭帮佣”,但配额有限。虽然今日家庭帮佣的名额已被台湾地区政府冻结,但雇用外籍看护的数量并不受限。<sup>16</sup>许多家庭因此伪造医生证明来申请外籍看护,却主要从事整理家务与照顾小孩等工作,另一个造成“家庭帮佣”与“监护工”的分类模糊的原因,在于实际工作的执行与分派上,很难有明确的区分,例如,多数监护工被要求兼做家务,即使法律上视为不符契约内容的工作。因此,我在本书中统一用学界惯用的“家务劳工”(domestic worker)来统称两者。

台湾的历史并无长期的奴役传统,蓄奴也未曾成为普遍风俗,这是和大部分的劳工输入国不同之处。台湾人口在90年代移工与婚配移民大量移入之前,除了以华侨身份来就学与工作者,只有少数、短期的外籍技术移民。由于整体人口中的族群多元性有限,大量移工的引进因而触发大众的疑虑与偏见。台湾人如何看待这些肤色较深的外国人,尤其是那些负责在亲密家庭中照顾老人与小孩

的家务移工？这个问题引领本书探讨在国家管制与大众论述的两个层面上，家务移工是如何被建构为种族的他者：台湾地区政府对于移工的管制严苛，包括禁止更换雇主以及永久居留等。而大众论述经常用冲突的刻板形象来刻画东南亚移民：她们要不就是犯法又野蛮的“恐怖分子”，要不就是生来顺从的“理想佣人”，天生适合做肮脏低贱的工作。

台湾的个案也揭露亚洲新富国家在族群阶层、性别关系与家庭模式等面向上的转变。90年代以降，雇用外佣的台湾雇主有很高的比例是“第一代雇主”，意指他们的父母辈并没有在家里雇用佣人的经验，这些雇主在成长过程中也少由全职的保姆带大（而是由母亲、祖母或其他亲戚照顾）。这些我称之为“新富雇主”的青壮年中产阶级，映现了台湾社会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代间向上流动的阶级形构的侧影。奠基于代间流动的新富雇主现象，也出现于其他的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Christine Chin(1998)便指出，雇用外佣是马来西亚雇主作为新中产阶级的身份标记。在新加坡和香港地区，雇用外佣则几乎已成为双薪中产阶级家庭的必要服务，在针对该阶层销售的公寓的蓝图设计中，都可以看到佣人房的必备设计。

许多台湾雇主也是第一代的职业妇女。她们的母亲或婆婆在结婚或生了第一个孩子后辞掉工作，专心做个家庭主妇，但女儿及媳妇则向往另一种生活。约束当代台湾中产阶级女性的性别规范，不再局限于贤妻良母，也铭刻了性别平等、夫妻平权与追求工作成就等理想价值。这些困于旧模范与新价值之间的新一代职业妇女，解决蜡烛两头烧的途径，是寻求家务、托育及服侍公婆等责任的市场外包，新引进的家务移工尤其成为她们仰赖的劳动力来源。纵然如此，职业妇女仍持续要心力交瘁地和母职、持家、孝道等文化意识形态讨价还价。

与分别来自第一世界及第三世界的雇佣组合相比,全球南方的家务移工雇佣关系中的劳资地位差距较为暧昧模糊。就此层面而言,台湾新富雇主与向下流动的菲律宾女性移工的相遇,特别具备重要的理论意涵。例如,有位匈牙利移工曾扼要地形容她与加拿大雇主的关系:“他们认为你就像你的英文一样笨。”(England and Stiell 1997)。但我田野中一位大学毕业的菲籍家务移工却如此描述她的台湾雇主:“她们比较有钱,但我说的英语比较好!”

菲籍的女性家务移工因为教育程度较高且具备英语优势,一直是全球移工市场的优势来源,具备大学学历的菲律宾中产阶级在国外从事女佣、看护的工作并不罕见。这样的现象引发几个社会学谜题:当这些菲籍移工在地主国从事的是女佣这份被社会污名化的工作,她们要如何确保自己能够向上流动?当台湾雇主的英语发音或文法被菲律宾女佣纠正时,他们该如何巩固自己身为雇主的阶层地位?家庭又如何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微观政治场域,让雇主与移工同时在其中确认与挑战彼此的差异与不平等?

印尼的女性家务移工虽较晚进入全球的迁移流动之列,但在新加坡和香港台湾等亚洲地区,她们的人数直逼甚至超越菲籍移工。我们要如何解释这个转变?这样的转变又与家务移工的种族化形象(例如,“聪明而搞怪”的菲佣相对于“愚笨但顺从”的印佣)有何关联?这是待解的另一个谜题。在本书中,我将藉由比较菲律宾与印尼家务移工的工作分派、论述再现及劳动条件,来检视阶层化的种族他者如何被建构。

本书聚焦于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的相遇,并藉此检视人们如何跨越国族与社会界线来认同自身与“他者”。我并将以“划界工作”(boundary work)这个理论视角来链接宏观的结构力量与微观的人际互动。社会界线的建构区隔出“我们”与“他们”的差别,这样的



划界工作不仅发生在公民身份与国界管控等政治与法律的层面,雇主与移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互动协商与象征斗争,也是形塑社会界线的重要场域。以下,我将先分享本书的研究过程与亲身田野经验,然后铺陈本书植基的理论脉络。对于学术文献较无兴趣的读者,可以跳过理论部分,直接进入章节阅读。

## 田野告白

后现代学者近年来已经对民族志诠释的权威提出尖锐的挑战,打破研究者客观中立的迷思,强调研究与写作必定是从特定的文化与社会情境出发(Clifford and Marcus 1986)。基于这样的立场,研究者必须对于研究方法与过程进行反思:我的社会位置与出身背景无可避免地形构了我进行观察与理解的认识论视角(我看见了什么?我如何进行理解?),同时也形塑了我与报导人之间的互动模式(他们如何看待、定位我,以及如何响应我提出来的问题?)。

身为一个中产阶级出身的台湾女性,在进行菲律宾与印尼移工的民族志研究过程中,我跨越了多重的国族与社会界线,同时进行的与台湾雇主的访谈,则让我进一步反思自己的阶级、性别、族群等位置。我的研究过程中发生的种种轶事,在彰显出研究过程与结果都镶嵌在、也揭露出研究者与报导人所处的社会脉络与权力关系。以下分享的田野经验呼应了本书主旨:跨国交会中的画界工作与认同形构。我是一个跨界的研究者,这样的主体位置得以容我深刻观察、体会、理解这个主题。

## 回家研究外籍女佣

在美国当了几年研究生后,我在1998年7月回到台湾开始进



行本研究的田野工作。我用滚雪球的抽样方式寻找进行深入访谈的雇主。找到受访者并不难,因为几乎我人际网络中的每个人,包括我家人,都认识一些雇用外佣的人。我的姐姐与她开旅行社的丈夫,经常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花十小时在办公室与来回的路上。他们从朋友那里“借”了一位菲律宾女佣,请她每周末到家里来打扫,所以他们可以不用牺牲星期天早上宝贵的睡眠时间来维持家中的整洁。甚至我母亲,一位六十多岁的全职家庭主妇,亲戚也怂恿她去雇个外佣:“你该享福啦!反正现在请个外籍女佣很便宜。”

许多雇主(多半是男性)刚听到我的研究主题时,会迟疑几秒后评论道:“嗯,很有趣,你为什么决定做这个题目?”这样的反应暗示了在他们眼中,相较于生产、发展等引人注意的阳刚议题,家务工作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家的事”。我之后试着在描述中把研究主题“升级”为探讨“外劳政策”或“照顾孩童及老人的制度安排”,有些受访者才觉得这样的访谈具有一定的公共价值,而不是浪费时间闲扯。

在我的研究中,只有四对来自于同一家庭的雇主与外劳同时受访。我特意避免这样的情形,是基于伦理与实际的考虑。有些雇主会主动“提供”她们的女佣让我采访。但当我看到这些移工不自在地坐在角落里等着受访,我意识到在她们眼中,我这个陌生人实等同于雇主权力的延伸,我只能拒绝雇主的好意。有几次,我提醒雇主要先征求移工对于受访的同意。这些雇主走到厨房(当我和雇主在客厅谈话时,厨房往往是女佣待的地方)回来后,往往一脸惊讶地对我说:“哇!你讲对了!她真的不想被采访耶。”

我尽量避免上述的情况发生,因为我不希望接受采访成为一件雇主的工作指派,换言之是一项让家务移工无法拒绝的工作。我也

不想处于一个尴尬的夹心饼位置,因为如果移工视我为“雇主的朋友”,我与她之间的信任关系便难以建立。例如,我采访的第一位菲籍女佣 Rosemary 是她的雇主芳萍<sup>17</sup>引介给我的。但她们两位后来都试着向我打探对方的事情:Rosemary 急着从我这儿知道她雇主明年是否继续聘她,而芳萍则跟我打听 Rosemary 在合约结束后的去向。

我和 Rosemary 因采访结识后,我参加了几次她与朋友在星期天的聚会。Rosemary 高兴地拿了几张我们在星期天聚会拍的照片给老板看。不擅英文的芳萍随即打电话给我来问个究竟:“嗯,Rosemary 刚让我看几张照片。我很好奇耶……你和她们在一起做什么?”我从她惊讶的语气里可以读出她没有明说的讯息:“你这个留美博士干吗跟这群菲佣混在一起?”

基于我的台湾中产阶级家庭出身,我很容易通过管道与受访雇主搭上线,而大部分的雇主也假设我的想法与行为和他们差不多,因此与我侃侃而谈。虽然这样的假设与现实多有出入,彼此在社会位置上的亲近性的确有助于搜集资料。然而,当我听到这些“同胞”雇主说出带有种族歧视或阶级偏见的话时,我心里备感困扰。有时候,当我坐在那听着受访雇主讲话,却无法有技巧、有礼貌地反驳其观点时,更深恐自己成为压迫体制的共犯。身为一位女性主义者,我也无法全然赞同一些(男性)批评者,毫不迟疑地批评女雇主纯粹就是自私自利或特权分子。

在一定程度上,如此的主体位置形塑了我如何提出社会学的发问。与其不假思索地责难女雇主的阶级与族群优势,我更想从结构环境与性别关系的脉络来分析她们的行为、态度与想法,试图以社会学式的同理心,来对人的经验有比较立体的理解。

在移工社群中的一个台湾人

我的另一部分研究资料来自对家务移工的田野观察与深度访问。我在1998年8月到1999年7月进行第一阶段的菲律宾移工社群田野。每个周日,我都起个大早,带着我的录音机、笔记本与相机,跳上公交车,前往圣灵堂(假名)这个天主教堂以及附属的一个非营利组织。我在那里当了几个月的志工,开了一班中文课,也偶尔协助移工的申诉个案。我也经常受邀参加菲律宾移工的各种社交聚会,如旅游购物、到迪斯科舞厅跳舞、唱卡拉OK、公园野餐、生日派对、快餐餐厅闲聊等。

第二阶段的田野(从2002年9月到2003年10月),我扩增研究规模来包括近年来人数增多的印尼移工。基于几个原因,我在接触印尼移工的过程比先前进入菲律宾社群来得困难许多。第一,印尼移工并未像菲律宾移工一样在教堂等固定地点形成社群。我和助理因此到台北火车站以打游击的方式寻找受访者,这里是印尼移工星期天的主要聚会点之一。不像先前有修女的“加持”,我们要在印尼移工的社群中建立信任关系,必须完全靠自己。

其次,在第二阶段的印尼田野中,我发现我变成大学教授的新身份是个负担,而非优势。在先前菲律宾移工的田野中,我还是个靠奖学金过活的研究生,每个月的微薄津贴只比家务移工的薪资多个几千块。此外,我当时的年龄和大部分的菲律宾移工相仿(二十八九岁),其中许多拥有大学学历,因此在教育与文化的经验上也没有太明显的鸿沟。例如,一位大学时修过社会学课程的菲律宾移工曾问我:“你现在做的叫做‘融入’(immersion),对不对?”她笑着跟我分享她的男同志教授在菲律宾做的同志社群田野研究。

相比之下,印尼移工较年轻(大多二十出头),且平均教育程度较低(高中)。这两个元素都让她们相对于我这位三十多岁的大学

教授之间的社会距离益形遥远(虽然我的性别、年龄与打扮并不符合她们心目中对“教授”的想象)。此外,在对地位阶级高度敏感的伊斯兰文化中长大,她们倾向视教授为“地位崇高者”,并以带有距离感的尊敬态度和我相处。我花了许多时间与心力,包括掩饰我的“教授”身份,改自称为“我在大学里工作”,方能淡化可见的地位鸿沟,逐步与印尼移工建立信任的关系。

在初识之际,移工们通常假设我是某人的雇主。当我对这个猜测摇头以对,她们便继续问道:“那你是中介?不是。记者?不是。那你来这里干吗?”有些移工也猜想我可能和其他移工一起工作:“你在哪个工厂工作?”似乎,与她们会发生接触的台湾人,不是工厂同事,就是试图从她们身上取得服务、金钱或信息的人。

田野初期,我可以从一些细微讯息中嗅到移工对我这位台湾人的不信任。有次,我和她们去海霸王吃自助午餐,吃到饱的餐厅通常很受移工欢迎,因为她们可以放心大吃特吃(不像在雇主家中的三餐常受限制),也不用顾虑用中文点餐的困难与风险。在杯盘狼藉之后,一位菲律宾移工,茱莉亚,把几个苹果与杯子蛋糕塞进袋子。另一位菲律宾移工轻推茱莉亚的手肘,用眼神提醒她我在旁边。为了减轻朋友的不自在,也为了掩饰她在我面前的行为,茱莉亚以开玩笑的口吻回答:“不用担心,她知道我带这些回去是给我老板的小孩子吃的。”

随着时间的累积与田野的推进,移工对我的不信任逐渐转变为友谊及互赖。当她们要与出租车司机沟通或与街头小贩讨价还价时,我可以担任语言与文化上的翻译。她们则成为我的导游,引领我探访隐藏在城市角落的移工聚落。我的本地人身份在田野中的作用,逐渐从原本的诅咒变成保佑。她们不时赞美我:“You are so easygoing, not like other Taiwanese. They are snobbish(你很随和,不

像其他本地人,他们都很势利眼)。”偶遇的菲律宾移工经常会对着我的朋友说:“You are so lucky. Your employer speaks good English! (你好幸运,你的雇主说一口好英文)。”她们听了则骄傲地回答:“She is not my employer! She is my kaibigan(马尼拉语)!(她不是我的雇主!她是我的朋友!)”

我不只是她们的一个朋友,更是一个台湾朋友,而且可以跟她们坐在火车站地板上,一起领受路过台湾的鄙视目光。基于此,我这位台湾朋友的友谊经常被转变成一种公开展演。我是她们寄给印尼或菲律宾家人的照片中最受欢迎的模特儿(我在田野工作一年间所照的相片量,约莫是我十年来照片的总和)。有些菲律宾移工甚至把与我的合照寄给她们的美国笔友,并在照片后面写着:“这是我来自芝加哥的中文老师。”我们去唱卡拉OK的时候(不是钱柜的包厢,而是窄小阴暗的地下室),满屋子流泻着马尼拉语或英文的歌声,她们却坚持要我点一首中文歌来唱,因为:“我们想要让其他人知道我们有个台湾朋友!”

甚者,在她们眼中,我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台湾朋友,还是一个镀上美国光环的台湾人。对多数菲律宾人而言,美国既是连结历史文化脐带的殖民母国,又是穷生难以登陆的梦想国度。就像我对她们在台湾的生活感兴趣一样,她们经常好奇地问我大大小小有关美国生活的细节,而且多数无法理解何以我不想办法在美国找工作嫁人,而想要回到台湾这个小岛。移工社群中甚至谣传我已经取得美国绿卡或公民身份。有些移工戏谑地对我说:“你在芝加哥需要女佣吗?”“你什么时候要帮我在美国找个老公?”

我在美国读书、可以说相对流利的英文,这样的背景不只提升了我在移工社群中受欢迎的程度,更让她们觉得我和“一般”台湾人有所不同,因此,她们感觉可以自在地在我面前批评与取笑台湾的



雇主。许多时候,我和菲律宾移工在吃饭、聊天之际,她们开玩笑嘲弄雇主的破英文后,常转过头来,拍拍我的肩膀赞美说:“但你的英文很好喔,你听起来就像个美国人。”

除了被菲律宾移工视为“准美国人”或“类美国人”,在做田野的过程中,我也经常被误认为菲律宾人或印尼人。当我与移工朋友一起坐出租车时,她们会用几句有限的中文跟司机沟通目的地(比方说,“去拜拜”意即去中山北路教堂),我通常等到鸡同鸭讲的情况发生时,才会介入说中文打破僵局。当司机听见我说话后,通常会转过头来惊讶地问我:“你怎么会说中文?”在我解释自己是台湾人后,他们的表情更为惊讶困惑:“那你为什么和她们混在一起?”

把我误认成“她们”的不只是台湾出租车司机,东南亚移工也常把我误认为自己人。有几次在教堂附近或台湾火车站,我跟菲律宾朋友同肩并行,路过的其他菲律宾移工用马尼拉话不解地问我的移工同伴:“这个菲律宾人怎么一直在说英语?”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我和印尼移工结伴活动的时候,听到我开口说中文后,旁边不认识的印尼人,才惊讶地说:“我以为你是印尼人呢。”

我被误认为菲律宾人与印尼人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当时留着短发、肤色比台湾女生略黑吗?根据我在菲律宾与印尼当地的田野经验,这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即便在我尚未开口说出恶补的几句当地话、暴露出我的滑稽口音之前,多数人早已从穿着和样貌上认出我是个外国人。或者,这是因为我的田野工作如此成功,我已经“蒙混”(passing)成为田野中的局内人?

虽然我真想相信自己是个有变身异禀的田野研究者,但我必须诚实地招认,真正的原因是,我和这些菲律宾与印尼移工的亲密共处与友谊互动,跨越了“我们”与“她们”之间无形的社会藩篱。在社会分类与地位区隔的地图里,她们是一群和我不同族群、阶级、国

籍的人,我的移位与跨界,让不细察的人们(不论隶属于社会藩篱的这一端或那一头),把我理所当然地归类为移工社群中的一员。

田野过程中曾出现这样一个关键性的时刻,清楚显露出我与移民社群之间的社会区隔。这一幕当头棒喝地告诉我,不管我的田野多顺利、我的跨界多努力,在移工社群里,我毕竟仍是个局外人。

那一天,我在台湾中部的某个小村落访问菲律宾移工 Elvie,她与另一位菲籍移工一起照顾在三合院老房子里同住的阿公阿妈,老人已长大成家的孩子则住在不远处的水泥房子。我和 Elvie 约好等到她照顾阿公上床休息后,我再带着零食去聊天访问。入夜时分,我们光着脚丫坐在藤椅上,轻松地剥花生、聊天。Elvie 谈起上个月有菲律宾朋友来家里看她,她的年轻老板很不高兴有外人来,频频交代不可再犯。

一听到她这样说,我差点被喝到一半的水呛到,立刻收拢翘在藤桌上的二郎腿,速速把身体坐正,紧张地问她:“我的造访不会带给你麻烦吧?”。Elvie 继续嗑着花生,一派轻松地说:“Don't worry. You are one of them! (别担心。你是他们的一分子!)”

## 界线为何重要?

根据 Michèle Lamont(1992: 9)的定义,界线指的是“我们用来分类物品、人群、实作,甚至时间与空间等的概念性划分”。社会界线的构成涵盖多重层次,包括认知、互动,以及制度层次。在心智层面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透过区辨各种事物来感知这个世界。<sup>18</sup>就制度层面而言,国家官僚使用的族群分类或专业组织设计的工作制度等社会分类,都体现了宰制与抵抗的象征政治。社会中的优势阶级常借由排外(exclusion)来确保界线与巩固地位,其他群体寻求

被纳入(inclusion)时,则透过使界线模糊、可穿透,或重新建构另类界线等方式。

更重要的,我们需要透过日常生活的各项实作来连结制度上的社会文化分类与我们脑子里的认知图像,也就是“划界工作”。<sup>19</sup>不管自觉或不自觉,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皆投入各式各样的划界工作,培养默会致知(tacit knowledge)或身体惯习(habitus, Bourdieu 1977),借此形塑我们对于自身与他人的理解。划界这项社会实作不仅让文化得以再生产,更巩固了既有的社会关系与不平等。

为什么我认为划界工作的概念提供了分析全球家务分工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因为这个概念所强调的关系性思考,除了有助我们理解跨越不同族群与阶级的女人的主体经验,它也强调实作的能动性以及动态的认同形构(identification)。<sup>20</sup>本书将在三个主要层次上探讨全球家务分工以及国际迁移经验所涉及的划界工作。第一,家务劳动是一个重要的建构“妇职”(womanhood)的场域,其市场外包突显了性别界线与其他社会不平等的缔连。第二,国际迁移的经验,如何导致了地主国与母国社会里的阶级与族群界线的重画。最后,家成了全球不平等与社会差异的交会之处。在屋檐下的日常生活中,雇主与家务移工都在协商、营造空间界线,也借此具体化了社会界线的存在。

### 在家务劳动的连续性中协商性别界线

要如何分析“性别”?传统的“性别角色”理论已被批评把性别当做静态的特质,有学者进而提出“性别界线”的概念来强调性别分派的可塑性与渗透性。<sup>21</sup>“男人”与“女人”其实是两个内部充满异质构成的群体,但在强化二元性别的异性恋体制中,被划分成截然不同的群体,突显男女之间、而非男女内部的差异。性别界线作为

一种规范、意识形态的机制,便透过建构二分的性别差异,来强化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之间的对立。“养家”(breadwinning)是一条重要的性别界线,突显“正港的男子汉”的特点与责任,这样的“男职”(manhood)规范,让无法赚钱养家的男人自惭形秽,也让男性工作(理应得到用来养一家子人口的较高薪资)有别于女性工作(只是补贴家用、赚私房钱)。

家务劳动——包括各种维系家计、照顾家人与维持家庭再生产的劳务活动<sup>22</sup>——则是建构“妇职”的另一条性别界线。事实上,不论是雇用帮佣的女性雇主,或是受雇的家务移工本身,她们的现实生活都与支配性的“妇职”规范大相径庭;两群女性都因工作而偏离了传统的全职家管及母亲角色。虽然她们跨越了性别界线,但仍然受到性别规范的约束,在例行的家庭事务中持续协商着“好女人”的意义与母职的实作。

家务劳动被社会视为女人的“天职”(calling),也因此被认为是一种不具技术且无需报酬的工作。无酬家务劳动的道德价值,即神圣的“爱的劳动”,被用来合理化它的经济贬值。类似的情感价值与金钱价值之间的互易消长,也常被用来合理化照顾工作的低报酬。人们认为商业化会玷污爱与关心的价值,甚至连新古典经济学家都认为,保姆、看护等工作者的薪水低是合理的,因为她们可以获得情感补偿的无形报酬(England and Folbre 1999)。换言之,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都被视为女性化的工作,也都因为内蕴道德价值而导致劳务的经济贬值。

既有文献往往将无酬的家务劳动与有薪的家务工视为分开研究的主题,忽略了两者间的缔连与镶嵌。比方说,夫妻间因家务分工不均而不时上演的性别战争,往往跟市场上是否有方便廉价的家务成品或服务,有连动的关系,而那些提供家务服务的劳工本身,也

时常兼任母亲与妻子的无酬家务角色。许多文献习焉不察地接受“女佣”与“女主人”之间那条僵化的二分界线,导致我们对女性的多重位置与变动的生涯轨迹视而不见,而忽略了女佣与女主人的角色可能相互流通、重叠出现等实际状况。

基于此,我强调无酬家务劳动与有薪家务工作不是互斥、独立的范畴,而是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跨越公、私领域所形成的结构连续体(structural continuities)。<sup>23</sup>在招募保姆或女佣时,中介或雇主都时常要求应聘者提供在自己家中担任母职或家管的经验,以此确保她们能够胜任有薪的家务工作。相反地,一个曾做过有酬家务工作的女性,可能被她的伴侣认为因此具备了当妻子或母亲的资历与能力。个别女性在其生命历程中,可能从事各种不同形式的家务劳动,而它们都一致被建构为女人的工作。

本书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视为结构连续体,企图对女性主义文献提出两点对话:第一,连续体的概念可以打破二元的思考框架,突显不同社会地位的女性所面对的相似的父权支配。家务劳动的性别分工并不会因阶级与跨国分工的取代而消失。后面章节将会呈现,女主持人与女佣其实都透过彼此的协助,寻求跳脱全职家庭主妇的角色的可能,尽管两者拥有的资源与位置大不同,仍皆受到父权规范与性别界线的桎梏。

第二,家务劳动连续性的概念也彰显了妇职的内容与意义如何与阶级、族群、国别等社会不平等相扣连而被差异化的建构。而这样的连续体也提供了女性施展能动性的媒介,使她们得以在女性化家务劳动提供的多重位置间移动,来改善自己的处境。

具体而言,家务工作不仅被许多人视为女性生来的专长,特定种族、族群的女人更被认为“天性”上适合从事这份工作。历史学家 Phyllis Palmer(1989)在探讨两次大战期间的美国社会的研究中便



指出,白人主妇的女性特质的建构版本和其他的种族、阶级的女性特质截然不同。“白皮肤的女主人”被视为是纯洁贤惠、宜室宜家的好女人,而深色皮肤的女佣却被看作肮脏、性欲强的坏女人,适合从事低贱的家务。

然而,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差别不是一条不证自明的界线。女雇主害怕被家中的另一个女人所取代,必须强化界线来捍卫两极化建构的女性特质。女雇主思量着如何在无损其“女主人”地位的状况下,将家务在社会容许范围内转移至市场代理人肩上(Kaplan 1987)。身为母亲的女雇主也在自身与保姆间发展出一套母职劳动的阶层分工,以确保自己仍然维持精神性与道德性的母亲工作(Macdonald 1998; Uttal 1996)。本书将呈现,当台湾女雇主试图在自身与东南亚移工之间刻划一条明确的界线时,她们既在化解自己的焦虑与形构自我的女性特质,也同时参与了阶级、族群差异的想象建构。

对已婚的女性移工而言,跨越性别界线的主要风险在于她们成为跨国养家者(transnational breadwinner)的新身份。虽然女性移工和男性移工一样离开家人从事全职工作,不同的是,她们仍必须从远距离竭尽妻子与母亲的责任,以确认性别界线的适当存在。许多移民学者已经观察到“跨国母职”(transnational motherhood)的运作:移工父亲通常只要从远方定时寄钱回家照顾家计,就被认为完成了他们的家庭义务,但移工母亲却必须扩展母职的定义,让家人与其他人相信,出国工作、赚钱养家,是她们照顾小孩、竭尽母职的最好方法(Hondagneu-Sotelo and Avila 1997)。留在家乡的移工丈夫常因未尽养家责任而觉得有损他们的男子气概,女性移工则借由用力扮演“超级母亲”(super mom)的角色来强化性别界线,例如透过密集的电话与短信来安排孩子与家人的衣食住行,以此弥补她们在

家庭生活中的缺席(Parreñas 2005)。

总而言之,台湾女雇主与东南亚家务移工皆同时参与了所谓的“跟父权讨价还价”(Kandiyoti 1991)的过程,这个概念描述女性面对多重形式的父权压迫时,如何运用各种日常策略来保障自己的生存安全、改善自己的生活机会。本书后续章节将援引此概念来探讨这两群女性如何运用特定的策略来协商在地的父权关系及性别界线。中产阶级台湾女性借由雇用女佣来减轻家务劳动的性别化重担,而东南亚女人却选择变成女佣,来换取出国工作的机会,以逃避母国与家庭的性别束缚。“女佣”与“女主人”两造的经验虽然相异,但也有惊人的相似,她们的命运与处境都受到家务劳动的女性化的高度影响。

### 在迁移地景中重划族群及阶级界线

“种族”(race)的概念,通常让人联想到以生物差异为基础的人群分类。19世纪的“科学”知识,如体质人类学,强化了种族分类作为客观存在的表象,并以此合理化殖民者与优势白人对于有色人种的刻板印象与差异待遇。<sup>24</sup>20世纪后期以降,学界已经普遍质疑“种族”作为一种客观实存的类属:肤色等外形差异不是互斥的类别,而是分布的连续体;近期的考古证据也揭露人类基因的同出一源;透过比较特定种族类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指涉内容的转变,我们更可以清楚察觉“种族”分类的社会建构性。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社会关于“白人”(white)的指涉内容的变化,贫穷的爱尔兰移民在19世纪中、犹太人在二次大战前,都被认为不是“白人”,后来才逐渐被纳入。

当今的学界多避免使用“种族”的概念,因为名词蕴含种族分类有客观存在的指涉,转而使用种族主义(racism)或是种族化(racial-

ization)等概念。前者指的是种族分类与歧视作为建制化、系统性的社会关系;后者则藉由过程性的动名词,强调构成种族区分的社会、意识形态过程。我认为种族化是一个有效的社会学分析工具,可以帮助我们考察种族主义形成的动态历史过程,更具体地说,种族化的过程标举(mark)出某一社群在生物或文化上的与众不同(Lie 2001),这样的族群差异被本质化、自然化,并贬抑为系谱学上的“他者”(Yuval - Davis 1999)。

在国际迁移的当代脉络中,外国人——政治文化社群的外来者(outsider),成为种族化的主要对象。然而,并非所有移民都面临同样程度或形态的种族化。比方说,对于法国人来说,移民(immigrant)一词,通常指的是肤色深的阿尔及利亚人,而非实际上人数较多的葡萄牙人。对于日本人来说,“外劳”(foreign worker)的范畴指的是来自贫穷亚洲国家的体力工人,而不包括其他外国人,例如韩国人、中国人,以及欧美人士(Lie 2001: 18 - 9)。

这样的现象告诉我们,种族界线实与阶级不平等、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阶序有高度的相关。<sup>25</sup>同时,种族界线的社会建构反映出该社会对于“他者”的文化想象:某些群体被认为具有历史或文化上的亲近性,可以变成“我们”的一部分;而其他群体被标举出有根本差异,是不可同化的永远他者。学者称这样的社会心态为“新种族主义”或“文化种族主义”(cultural racism),认为移民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与地主国无法同化兼容,进而合理化排斥与歧视移民的行为。<sup>26</sup>

回到台湾的脉络,我们要问,90年代以降的台湾社会,面临日益增加的短期与长期居留的新移民——包括“外籍劳工”、“外籍配偶”以及来自欧美日的所谓“外籍人士”——我们的社会呈现出怎样的种族主义的样态,如何将不同群体的移民施予种族化的过程?

我提出“阶层化的他者化”(stratified otherization)的概念,强调我们必须用关系性的架构来理解种族化的过程与结果。在包括一系列族群他者的光谱中,不同迁移主体的分布端赖于他/她们的社会位置与相应的文化想象。换言之,种族化作为一种他者化过程,衍生的是阶层化的复数他者。种族化不只建构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二元差异,也同时衍生了多重的族群他者,赋予阶序化的文化想象,其阶序除了建立在族群分别上,也与阶级分化与国家不平等息息相关。

为了具体描绘种族化的过程,我们必须确认这个过程在哪些层次上运作?参与者有谁?涉及哪些物质或象征利益? Michael Omi 与 Howard Winant(1994)曾指出,种族化是一种政治计划,国家根据种族分类来分配不同的权利与资源。种族化也同时是一个论述过程,透过运用象征、语言与意象来传达族群的刻板印象。此外,种族化的界线也透过各种指挥个人互动的规范、礼仪及空间规则,在日常生活中进行再生产(Glenn 2002: 12)。本书将从三个主要面向来彰显移工的种族化:台湾的政策规范、人力中介的招募与营销,以及移工与雇主及小区居民的互动。

除了族群地景的递嬗外,人们跨国界的各种迁移也重塑了全球尺度的阶级排序。我援引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87: 6),把阶级定义为“社会空间上的近似位置”——社会阶级是一种分享相似生活机会(life chance)与属性(disposition)的个体群聚。他认为阶级区分不只奠基在经济资本的分配上(财富、收入、资产),也同时透过文化资本(教育、礼仪、品味)、社会资本(人际资源、网络)与象征资本(正当性)的投资进行再生产。然而,他的定义并非把阶级视为社会位置或生活风格而已,阶级秀异不只是固定的界线、物质的存在条件,更是象征斗争的竞技场——不同的社会群体经由文化资本与

象征资本的投资与配置,来竞逐社会区分的正当性(Bourdieu 1984)。

布迪厄的阶级理论,强调透过社会空间进行关系性的思考,也强调阶级的再生产是一个社会实作(social practice)。这样的分析消弭了主观的阶级(意识)与客观的阶级(位置)之间的二元对立,强调阶级是在日常互动的过程中做出来的(doing class)(Hanser 2008)。然而,其理论也被批评,预设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空间,假定资本积累的过程发生在一个相对同质与静态的系统里,较少考虑到个人的迁移流动,以及社会空间的开放边界、相互渗透。<sup>27</sup>近来的移民学者便呼吁跳脱单一民族国家的框架,透过“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的尺度来分析迁移主体的多重位置与认同(Basch et. al 1994)。

已有一些研究开始探讨跨国移民的复杂的阶级认同形构。翁爱华(Aihwa Ong 1999)研究移居北美的香港移民,发现这些富裕的华人处心积虑地将他们的经济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如去英国留学、学英文与掌握上流文化品味),并透过持有多国护照的方式来维持“弹性公民身份”(flexible citizenship),以利他们在多重国度中取得身份与权利。尽管这些跨国移民者能够在多重的政治版图与全球贸易中游走,他们在移民西方国家后,依然受制于阶层化的种族分类。有个著名的例子是,一位移民北加州的香港富贾,因为想把郊区的洋房加盖中国宫廷式的屋顶,受到白人邻居的抗议。她后来愤而搬离小区,威胁要把房子捐去当游民的收容所。这些富裕华人在移居国被视为低下的种族他者,他们进行文化资本积累的弹性策略仍面临结构性的限制。

阶级较低的移民也在其海外旅程中以相似但独特的方式经历了矛盾的阶级认同过程。研究罗马与洛杉矶的菲律宾移民的 Rha-



cel Parreñas(2001)形容这种情况为“矛盾的阶级流动”。对女性移工而言,当个海外家务帮佣同时提升与贬低了她们在劳动市场中的地位。家务帮佣这份被污名化的工作虽然帮助移工获得足够的经济收益,但她们的地位却因此向下流动。她们的阶级脱位(dislocation)实肇因于全球化力量下区域发展不均等的背景脉络。

延续以上的文献,我用“跨国阶级划界”(transnational class mapping)的概念来描述阶级界线在跨国空间中的构成与变动。当阶级形构过程发生在横越不同国度的空间场域时,阶级与国族的界线不仅在结构的层次上相互缔连,国际迁移也创造了多重的主体位置,让个人得以跨越地理国度与社会藩篱来协商阶级界线的持续性与可变性。这样的阶级划分展现了全球化与在地化的交会力量。虽然阶级定位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运作,然而,“做阶级”的互动实作,仍需透过在地的生活空间与文化资源来进行协商与斗争。

“跨国阶级划界”不仅形塑了移工的阶级位置与认同,也影响了那些未实际迁移、但以不同方式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人。没有进行物理迁移的人们,也透过跨文化的消费与想象,来定位自我以及他人。台湾的新富雇主透过消费家务移工的服务,彰显自身的阶级向上流动。然而,有些雇主的优势权威却因菲籍女佣较能掌握英语这项全球语言资本而受到挑战。在进口购买与出口提供家务服务的过程中,台湾雇主与菲律宾移工都试图透过跨国连带来提升他们的在地地位,进行多重资本的积累与转换。双方都被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想象所召唤,希冀成为具有国际观与现代性的主体,而英文作为一种全球语言,尤其体现了这样的想象。

### 修筑“家”与“家庭”的界线

“距离”与“领土”等空间意象,经常被用来描述一些没有具体

存在,却在人们的体验中仿佛实存的社会差异与近似(Zerubavel 1991: 15)。空间确实是他者化过程中的具体元素之一。David Sibley(1995)便指出,“空间净化”(spatial purification)是社会空间组织的一个重要特征:人们在营造环境中借由强化空间隔离来突显社会界线的存在,借此巩固对少数族群的排斥,并防止界线的逾越。私人家庭尤其是一个高度阶级化、纯净化的空间;井然有序与巩固疆界是家务空间与家庭生活的重要特征。

“家”,根据牛津英文字典的定义,意指“人,特别是其与家人的居住之所”。当代的家与家庭的概念,作为私领域的表征,是特定社会与历史形构下的产物。公私领域的这组概念区分在不同的理论脉络里具有多重、差异的指涉<sup>28</sup>。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下,由于生产与再生产的分工,家庭与私人生活被建构为具有规范意义的私领域(“甜蜜温暖的巢穴”),成为人们躲避冷酷市场理性、混乱公领域的避风港(Lasch 1977)。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代表亲密关系的家庭生活,被普遍视为一处只容局内人进入的“后台领域”,庇护着他们的秘密与言行(Skolnick 1992)。

西方学者在批评家务全球分工可能造成的权力不平等之际,也感叹市场理性、商品化等力量介入亲密关系、家庭生活等私领域的后果(Hochschild 2003)。家务雇佣关系挑战了工作与家庭、公与私、在地与全球的截然二分。对于雇主与移工来说,作为亲密圈的“家庭”(family)与作为实际住所的“家”(home)都呈现断裂的状态。一方面,雇主“私”领域的家成为移工的“公领域”职场,而移工不仅是雇主家庭的局外人,也是地主国社会中的外来者。另一方面,不具血亲身份的移工需与雇主近距离同住,却被迫与自己的家人分隔两地。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私密家庭生活(private domesticity)的概念

是历史、文化依存的建构,我们不应把家务劳工的同住视为雇主家庭隐私的必然障碍,在特定文化脉络或社会情境下,雇用帮佣可能成为实现家庭的“理想”建构的必要手段<sup>29</sup>,或是维护家庭私密生活的前提条件。比方说,当我问一位雇主,她是否觉得家庭生活因为一个外人的存在而受打扰,她回答:“不会啊!我以前跟婆婆住,也是有外人在家,和我婆婆比起来,至少我不必努力取悦我的女佣!”如本书第三章所述,媳妇可借由雇用帮佣来避免跟丈夫的延伸家庭同住,核心家庭的隐私经由将家庭劳工内含为家庭的一分子而获得保障。相反地,雇主也可能透过看护工的雇用来外包照顾年迈父母或卧病家人的劳务,借此维护了三代同堂、孝亲团圆的和乐家庭形象。

本书将检视当雇主与移工面对生活中“家”与“家庭”的断裂时,如何重新定义与建构空间界线,而这样的建构家/庭的空间实作也与他们如何协商阶级、族群与性别认同息息相关。我强调,“家庭”与“家”的框架是变动、可塑的,会在日常家务生活中依不同情境与偶发状况而调整。<sup>30</sup>家务劳动的操演便是维系家人连带与私密家庭生活的重要一环。最常见的例子是,女人会借由打理日常三餐来“营建家庭”,透过熟悉家人的口味、关切营养的需求,来表达对于家庭成员的爱与关怀,此外,也透过共同进餐等日常生活仪式来建立家庭成员的情感联系与集体认同(DeVault 1991)。

台湾的雇主为了维持家庭生活的井然有序而邀请女性移工人住家中,但讽刺的是,他们经常不信任家务移工的卫生习惯与道德操守。当雇主把同住的移工视为“肮脏的外国人”时,会在家庭生活空间中如何区分界线与差异,来捍卫家庭领土不受他们所认知的外在危险的“污染”?此外,雇主又如何重新定义家庭的界线,以容纳家务移工近距离相处的共同生活?这份看不见的工作通常是由女性雇主来负责——她们在每天的家务生活中,要如何透过食物分

配、进食仪式、空间配置等实作,来标记无形的界线?

家务移工则在两个意义上经历了“家庭”界线的转变。首先,她们为了出国工作必须别家离子,其次,她们与雇主同住的贴身相处,再加上照顾老人与小孩的工作内容,也让她们在某个程度上成为雇主的代理家属与虚拟亲人。本书将探讨移工母亲如何透过情感、关心、货物、金钱等跨国回路,超过地理国度的区隔,营造跨国的家庭生活?其次,她们如何在从事“爱的劳动”的过程中,协商家人与非家人的界线、情感与工作的分际,在对被照顾对象投入情感之际,不至于伴随作为受雇者劳动权利的牺牲?<sup>31</sup>

家务移工也在跨国旅程中协商“家”的意义与参照点——何处是她们实际居住(肉身居所)的地方,以及何处是她们心理感情上感觉回“家”的地方(心有归属之处)。学者形容移工的这种两难处境是一种“过渡性的流离失所”(provisional diaspora)(Barber 2000),多数人仍想象未来以某种方式落叶归根。虽然,许多去国多年的移工归乡后却感觉处于“无家”(homeless)的矛盾情感状态中,促发她们想永远留在海外<sup>32</sup>。本书也将谈到在跨越多重国度的迁移旅程中,移工如何借由与离散社群的连结来重新塑造家的意义。

总结来说,家务移工的雇用是一个连结公领域与私领域、交织全球与在地力量的权力场域。台湾雇主为了外包家务而邀请移工人住家中,但将她们排斥在家庭的亲密圈之外;东南亚移工跨越了国界藩篱,却遭遇无形的社会阻隔。审视阶级、性别与族群等界线间的缔连与互构,不只让我们探究国际迁移处境中复杂的认同政治,更彰显了全球不平等如何透过社会界线的在地生产,而得以再制或转变。

## 章节地图

本书的第一章探讨台湾、印尼、菲律宾三地之间迁移连结的建立,是通过怎样的政策脉络与组织机制。我也将说明,亚洲移工的跨国移动,如何受到契约束缚、债务重担、地域规范等层层中介与约束。

第二章检视大众媒体与人力中介如何将移工“种族化”。通过广告论述与招工策略,移工中介以差异化的刻板印象来呈现印籍与菲籍女性,也分派给她们阶层化的工作内容与劳动条件。

第三、四章探究移工家务服务的供给面与需求面,检视位居阶级光谱两端的女性如何分别协商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界线。在第三章中,我们会看到台湾女雇主在聘雇市场代理者来处理家务、照顾孩子与老人的同时,如何捍卫自身道德化的妻子与母亲形象。在第四章里,我们会了解女性移工,在跨越国族疆界与性别界线之际,如何转化母职与婚姻的意义与实作。

第五、六章深入考察家务移工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与认同政治。第五章关注在家庭生活及城市空间中,排外与融入的地理策略如何运作。虽然移工在工作上备受监视,但她们仍可透过手机的使用与周日的集体现身,增加个人与我群的力量。第六章透过类型的分析,考察雇主与移工如何发展不同的策略来协商彼此间的社会距离,并重构公、私领域间的界线。

结论部分再探划界工作这个理论主题,我也将讨论本研究的政策与行动意涵,包括照顾与家务工作的公共化、专业化,以及公民身份的再思考。





## 第一章

# 合法的奴工





我一个人在那里[中正机场],因为我第一次出国,很紧张。那感觉很怪,我站在那里,左手紧紧握着护照,右手牢牢抓着外套。那外套是我们跟中介买的,上面有中介公司的名字,五颜六色的。你知道吗?它就像我们的身份证,这样中介公司的人就可以在机场找到我们。很多台湾人走过来,手上拿着一张有很多名字的纸,他们要看你的护照,确定你的名字有没有在纸上。如果你不在上面,他们就走开,一句话都不说,或低声用中文碎碎念。他们连说一句 Excuse me、Sorry 什么的都没有。我站在那里等了一个小时!中间至少有六个中介公司的男人接触我,很奇怪、很恐怖。最后他们终于找到我了。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路上都没看见人,我很怕他们会带我到森林或其他地方。他们带我到一个地方过了一夜。我以为我会睡在饭店,结果我睡在车库!我在那里睡觉,隔天就到医院[体检]。之后,我等了三小时才见到我的雇主。……[在菲律宾]行前说明会的时候,他们有讲到机场地图和很多其他事情,但我全部忘记了。我们都没在听,我们只想赶快出发。我们不在乎契约内容,我们只想到钱,我们的薪水。我们只想着:“要勇敢,反正不管怎样都要面对。”我们什么都不懂,我们有的只是胆子。

——Vanessa, 菲律宾家务移工<sup>1</sup>

每一天都有数以千计像 Vanessa 这样的女人与男人抵达台北、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国际机场,勇敢地将自己投入跨国迁移的洪流与全球化的恶水中。他们循着怎样的结构路径来到这里?他们面对的又是一个怎样不确定的未来?

其中的有些人比较幸运,或可衣锦还乡,有些人比较不幸,只能用愤怒的火苗烧出剥削冰山的一角。2005年8月22日,高雄捷运雇用的泰劳发生了抗暴事件。让台湾民众深深震惊的,不只是纵火的混乱场面,更是随后媒体进入宿舍与职场所暴露出来的外劳日常生活——如养殖场的居住空间、奴工般的劳动条件:他们被禁止抽烟、喝酒、使用移动电话;他们抗议工资过低,每个月加班超过100个小时,但只拿到46个小时的薪资。

移工的幸与不幸,不单纯是雇主的善心或恶意所造成的结果,而是国家法律与制度所强化了劳雇双方的权力不平等。本章将检视台湾的“客工”招募制度,加上私人中介的机制,如何组织跨国劳动力的输入与输出,并强化了移工作为“合法奴工”的地位。我将聚焦于台湾外劳政策与管理制,但也会与其他亚洲地主国的情况进行对照,并介绍菲律宾与印尼等国推动劳力输出的政策脉络。

## 亚洲的客工制度

长期以来,亚洲的劳动力一直是国际移民的主要来源。近几十年来的主要变化在于流动方向的转变,造成亚洲内部的跨国迁移在数量上的大幅增加。自60年代起,亚洲便有大量的移民潮,主要是学生和技术劳工,流动路径是由东亚及南亚迁移到北美及澳洲。70年代中期爆发石油危机后,快速致富的中东国家成为亚洲劳动移民



的新目的地。到了80年代,亚洲四小龙(包括台湾、新加坡、香港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历快速与成功的工业化,这些国家的移民开始从净移出转为净移入,逐步成为东南亚及南亚移民劳动力的主要目的地(Skeldon 1992)。

生产的全球化加速了国际贸易、金融的成长,并重新形塑“新国际分工”的地景。<sup>2</sup>欧美日等核心国家的全球城市,如纽约、伦敦与东京,成为国际金融城市与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点(Sassen 1992),位于半边陞经济体中的二阶全球城市,如香港、新加坡、首尔、上海以及台北,则扮演着控制节点的角色,中介、维系全球化经济的运作。这样的脉络引发了东亚地区的两种跨国人力流动(Findlay et al. 1998):第一种是来自西方核心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与经理阶层,他们穿着套装、提着公文包,在位处商业金融区、附有冷气空调的高楼大厦上班;第二种迁移流动则是低劳动成本的亚洲移工,他们的身影或出现在血汗工厂与建筑工地中,或从事倒垃圾及照顾小孩的工作,隐身在全球化城市炫目的外观之下。

迁移不是单纯的个人决定,而是受到既有政治—经济力量模塑的过程与结果(Sassen 1999)。贫穷输出国与富裕输入国之间的经济落差,必须透过组织化的招募、新殖民连带、政府双边协议等机制而被活化启动,进而形成个人迁移的有效推力。在下文中,我将检视亚洲国际迁移体系中的三个主要守门人:输出国、人力中介、地主国。

第一,政府直接介入促进国际迁移,是亚洲迁移体系的主要特征,也是与北美、西欧等地区的最大不同之处(Masseey et al. 1998)。有些亚洲国家,如菲律宾、印尼,已建立特别的政府单位来针对这项重要的“外销产品”,进行管理、征募、训练等工作,并积极与输入国政府协商,促使该国的劳工易受青睐。正式的双边国家协定的签

订,如印尼与马来西亚、菲律宾与沙特阿拉伯、越南与台湾之间的协定,也旨在促进移工的部署。较晚加入移民市场的越南,共产主义前身的国家机器,如今已经成立国营的劳务输出公司,来掌管招募与中介移工的过程,也向海外移工征收每年高达480美金的国税。<sup>3</sup>除了征税与汇款,政府也能在劳力迁移过程中的各个阶段抽取利益,如收取健康检查、旅行文件及离境证明的手续费、强制投保的生命及意外保险等等(Abella 1992)。

不仅是输入国偏好客工制度,输出国政府也从这样的劳力迁移模式中得到好处。它们希望海外劳工持续保有原国籍,而不是归化成为他国国民。原因不只为了维系象征性的国族认同,更基于财政的考量。很多输出国政府投注心力来确保海外国民的忠诚,以吸纳稳定的外汇。许多输出国政府也建立特别的财务计划来吸引海外国民的汇款,如提供汇款的减税额度或优惠储蓄利率、在地主国设立国家银行分部,甚至要求薪资中有一定额度必须汇回母国政府可控制的账户<sup>4</sup>(Athukorala 1993)。

商业化是亚洲迁移体系的第二个特征。亚洲迁移体系的中间人与北美不同。在美国与加拿大,移工有权利与资格在居留一定年限后取得永久居留或公民身份,因此,移工中介者通常来自移民社群,由先前的移工晋升而成中间人。但亚洲的契约移工劳动力需要不断注入新血,雇主与移工对彼此的信息有限,因此双方多仰赖中介公司作为中间人,因此造成中介在雇用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并权力大幅增强(Martin 1996; Okunishi 1996)。

支付了一定费用后,中介公司可提供给移工各种合法与非非法的服务,包括安排交通或偷渡、与雇主配对签约、提供翻译与训练、办理或伪造文件与签证,甚至与当地入假结婚、短期借宿、高利贷等(Prothero 1990)。近年来,在中介业者的游说劝进下,多数的亚洲

输出地政府都开始采取促进私人中介发展的措施。国家对国家的直接雇用方式遂逐步衰微,被解除管制、私有化的商业雇用机构取代。

亚洲迁移体系的最后一个,也是最显著的特征是,地主国的严苛规范。大部分的亚洲移工为暂时性的契约所雇用,只能在地主国短期居留,不得享有长期居留与入籍的权利;只能以个人身份来打工,不得接家人来地主国共同生活。客工制度在历史上的封建前身,就是19世纪后半叶的苦力劳工(*coolies*),来自中国、印度等地的男性劳工被招募,有时是被胁迫,只身前往欧洲或美国等殖民国的农场工作。苦力工受其工作契约束缚数年,且被迫接受高压控制和低廉的薪资(Castles and Miller 1993)。

今日,“客工”契约仍是跨国招募劳工的一种常见模式,特别是在欠缺鼓励移民的意识形态的欧洲及亚洲国家(Massey et al. 1998)。这与北美的系统大不相同:迁移到美国与加拿大的低阶外劳在若干年后便得以享有长期居留、家庭团聚与入籍的权利。<sup>5</sup>在欧洲,虽然不同国家接纳非欧盟国家的移工的制度有所不同,但普遍采取的仍是短期契约工的制度(Soysal 1994)。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欧洲福利国家是根据普遍主义的原则来分配资源,因此移工得以享有奠基于住民身份上的经济权与社会权。甚至,在一些国家,非公民的移民也能够享有部分的政治权<sup>6</sup>。至少在理论上(虽然与现实仍有差距),移工在欧洲得以享有某种“没有公民身份的成员身份”(membership without citizenship)(Brubaker 1989)。

亚洲的“客工”制度是最为严苛的。由于亚洲地主国普遍有领土有限、人口密度高,以及种族同构型强的特点,对于外来移民的管制普遍从严。许多国家采取类似的制度,如配额管制、工作证及保证金等,来控制移工的数量及分布(Cheng 1996)。到目前为止,没

有一个亚洲地主国允许低阶的外籍劳工入籍归化,为防止劳动移民转化为婚姻移民,新加坡政府甚至有违人道规定,低阶移工若与新加坡公民结婚,也无法取得在新加坡居住的权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严苛规定并不适用于专业技术的移民,相反的,被新加坡政府称之为外国人才(foreign talent)的高阶移工被鼓励申请居留入籍。

犹如政治哲学家 Michael Walzer 描述的,客工市场的创造,建立在移工作为一个被剥夺公民权利的阶级(disenfranchised class)的政治前提上:“没有政治权利及公民自由的否定,以及驱逐出境的恒常威胁,这个[客工]系统无法运作。”(1983: 58)

台湾社会常出现“我们给外劳这么高的薪水,他们应该感激我们”的说法,其实,刚好相反,是身为地主国的我们占了移工很大的便宜。“客工”的美称之下其实是把移工当做“用完就丢(disposable)”的劳动力。地主国雇用的是精心挑选的、身体勇健的成年移工,他们的劳动力养成的过程,无论是日常维生或是教育成本,台湾地区政府与社会没有付过一毛钱。透过禁止长期居留与家庭团聚,地主国政府只需负担在有限的契约期限内,移工个人的劳动力的日常维持。当他们不再受雇,或是当劳动力发生损伤(如生病、衰老或发生职灾),劳工会被丢回原生国,也就是其家人居住的地方。地主国得以把劳动力更新的成本外包给原生国,不论是移工本人的教养过程,或是移工家庭下一代的再生产。<sup>7</sup>

## 台湾的外劳政策

台湾对于外籍劳动力的正式开放,始于 1989 年 10 月,首度招募外籍劳动力投入大型国家工程。两年后,对外籍劳工的工作许可

逐步扩展到民间部门,主要是营建业及劳力密集的制造业,稍后进一步开放“家庭监护工”与“家庭帮佣”。1992年5月,立法院通过就业服务法,提供合法招募外国人的基础。过去数十年来,外籍移工的人数确实快速地成长,但这样的成长也受到聘雇法规的影响而停滞,根据劳委会2008年5月的统计,合法登记的外籍移工数超过36万人<sup>8</sup>,大约是国家整体劳动力的2.5%。大部分的工作都属于低技术或所谓的“三D工作”<sup>9</sup>,2008年5月的外籍家务移工人数总合为16.8万人,是目前为止最高的数字。<sup>10</sup>

为什么台湾在90年代才对外籍移工开放其劳力市场?为何相较于其邻近地区——如香港在1974年就合法开放移工,新加坡则在1978年引进外佣方案——台湾这么晚才开放,而且对于聘雇外籍女佣的资格限定要严得多?为什么台湾地区政府选择了特定国籍的移工?不像日本偏好雇用 *nikkeijin* (巴西和秘鲁籍的日裔移民),台湾如何对同为华裔的中国内地劳工关上大门?为什么台湾地区政府对于不同阶级、国籍的外国人采取差异甚大的聘雇规范?接下来的讨论将回答这些问题,并勾勒出台湾外劳政策的基本精神与逻辑。

### 劳力与照顾的短缺

移工进入台湾,主要是因应产业界反映劳力的短缺,吊诡的是,同时期台湾的失业率也逐步攀升。缺工与失业现象的并存,说明了台湾不是缺工,而是缺廉价劳工(刘梅君2000)。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多数台湾人不偏好三D工作,造成次级劳动力市场部门中对便宜劳动力的短缺。因为本地工资的高涨,以及中国内地和东南亚国家的竞争,自80年代中期起,台湾的劳力密集产业已在全球市场上失去竞争力,这些中小企业在逆境中求生存的方式不脱以下两种:一



是外移到提供便宜劳动力的邻近国家,二是留在台湾,但引进外籍劳工。

台湾的家务部门也历经了类似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自 90 年代起,本地的家务劳工(主要是中年欧巴桑)日渐难寻;即便薪资提高,本地女性对于与雇主同住的工作形态也不感兴趣。外国劳动力的引进为家务工作、孩童托育,以及病患与老人照顾提供了一个价格相对便宜的解决方案。这些市场需求,也反映出当代台湾在家庭形态及性别关系上的转变。

随着台湾女性在近几十年来劳动参与的提高,双薪家庭已经成为主要的家庭形态。工业化的过程同时为男性及女性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劳力密集产业对女性就业率提升的影响更为显著。<sup>11</sup> 日益扩张的服务业(其雇用人数自 80 年代中期起开始超过制造业)更吸引大批女性粉领劳工投入。2006 年,十五岁以上台湾女性有超过 48.7% 的人参与有酬工作,大学毕业及更高教育程度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则增加到 64%。<sup>12</sup> 双薪家庭成为一种社会常态,也因为一份薪水难以应付都会区高涨不下的房价与生活支出。

同时,核心家庭也成为一种主要的居住形态。年轻世代的夫妻多倾向与双亲分开居住,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自主选择伴侣者尤其如此。根据 2005 年的官方调查,将近 59% 的台湾家庭属于核心家庭,14% 的家庭为延展家庭(主计处 2006)<sup>13</sup>。虽然年长双亲自己居住的比例正逐渐升高,但台湾仍然存在着一种应由儿子,特别是长子照顾年迈父母的社会期望,将父母托付机构照顾遂与子女不孝的污名连结在一起。<sup>14</sup>

在这样的居住安排状况下,台湾社会对于孩童照顾及老年人照顾的需求自然逐年增加。核心家庭一旦不再与父母同住,没有阿公阿嬷的帮忙,需要对外寻求保姆。成年的子女,不论是在与父母分

住的状态下,或是在三代同堂的家里寻求孝亲照顾责任的分担,都必须雇用非家庭成员的照顾者来照顾年迈的双亲。

台湾对于外籍契约工的规范在许多面向都沿袭邻近国家的政策,特别是香港和新加坡。大石奈奈(Oishi 2005: 32)指出,这几个东亚新兴工业国共享一种独特的移民模式:政府对外籍家务工打开大门,是为了推进当地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换句话说,移工政策其实是国家发展政策的一部分。不同于香港和新加坡的是,台湾地区政府晚了十五年才对移工打开大门,并且以保留谨慎的态度来规范契约移工的进入,如劳委会采取配额管制与积点制度来控制移工的数量与分布。更明显的差异是,台湾对雇主资格的认定是基于由当局所定义的对照顾工作的“迫切需求”,而不像香港与新加坡,只要拥有一定家庭所得,就能够取得聘雇资格。<sup>15</sup>

这样的比较揭露了台湾与其他两个新兴工业国/地区的异同。同样地,台湾地区政府从经济的考虑出发,认为向外寻求家务劳动力可以促进台湾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不同的是,台湾的政策却仍受限于传统的性别规范,将妇女定义为私领域中的妻子与母亲角色(林津如 2000)。比方说,“家庭帮佣”的雇用资格被严格地限定于双薪家庭,也就是当女性的“天职”与受薪的雇用有所冲突之际。换言之,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缺乏雇用帮手的正当性。

此外,雇用来照顾老人或病患的“监护工”的雇主资格认定远比雇用“家庭帮佣”宽松许多,也就是说,施政者认为家务工作与孩童照顾的市场外包,迫切性与正当性都比较低。林津如(2000: 104 - 105)访问的一位“劳委会”官员,即明确地表示了这样的看法:“外佣可以帮忙照顾老人,但我们希望小孩还是由母亲来照顾,而不是交给外佣。”

家务移工的引进,在当时曾经激起了公共意见的争议及辩论。

保守团体忧心外籍劳工对社会秩序的影响,以及其提供的孩童照顾的品质。女性主义学者及团体,如妇女新知,则质疑这个政策并不会如政府所希望的有利于台湾女性的聘雇,反而强化女佣制度作为奴隶制度的残余(李元贞 1991)。这些都说明了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只是形塑台湾外劳政策的部分因素。移民政策的形成,实与一个国家或地区如何理解构成共同体身份(谁可以成为我们?)相关的文化论述与社会价值紧密地交织在一起。<sup>16</sup>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检视另外三个形塑台湾移民政策的因素:保持族群现状、增进外交利益,以及阶级主义的移民偏好。

### 看得见的族群界线

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比起来,韩国、日本及台湾等东亚国家/地区,被认为拥有少见的族群同质性(Castles and Davidson 2000)。与其相关,这些国家/地区也采取了严格把关的移民政策,包括以血统主义(*jus sanguinis*)为主的公民身份管制,以及外国人申请永久居留或入籍归化的高门槛。日本与韩国多年来禁止输入低技术的外籍劳工,虽然两国政府都以“受训工(*trainee*)”的名义为移工的引进打开一扇侧门(Oishi 2005)。2002年11月,韩国政府才开始允许输入外籍帮佣,不仅限制人数,且限定雇用有韩国血缘的中国人(朝鲜族)(Lee 2005)。这样的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明显改变,2004年8月,韩国政府决定正式接受低技术的外籍移工。

日本对海外移工的雇用,仍然维持了族裔中心的框架。和台湾一样,日本在80年代晚期经历制造业、营建业及服务业的低技术劳力的短缺,导致许多来自菲律宾、孟加拉、巴基斯坦、韩国、马来西亚及中国大陆的无证移工的登陆。但是,日本并未像台湾一样,将这些外籍客工合法化,反倒在1989年修正移民法,新增了“长期居民”

这个签证类别,提供海外日侨(*nikkeijin*)工作机会。到了90年代中期,被雇用的巴西日侨超过20万人(Yamanaka 2003),大部分都是男性。日本唯一允许非日裔的外国女性从事的工作范畴是“娱乐员”——她们大部分是来自菲律宾的年轻单身女性,在酒店与酒吧中表演歌舞及担任女侍。

在日本,除了少数商业移民与外交人员得以雇用外籍帮佣,一般日本家庭仍然不被允许。这样的政策与日本政府的性别意识形态强烈相关,日本政府相信,女性的工作地点是在家里,因此不鼓励女性出外工作(Oishi 2005)。直到近年来,基于人口老化而导致照护人力的严重短缺,日本才开始考虑从菲律宾与印尼引进机构雇用的外籍监护工。<sup>17</sup>

与韩国和日本一样,台湾的移民政策也分享一个类似的精神,便是维持族群同构型高的国家现状,但是,台湾当局却在移工的引进来源上,做出与日本和韩国大不相同的决定。在开放雇用外籍劳工的初期,当时的劳委会主委赵守博在某个公开场合表达了他的忧虑:“今天美国社会所存在的黑白问题,何尝不是由外籍劳工所造成。外籍劳工由于文化种族、社会背景的不同,一定会带来各种各类的社会甚或政治问题。……前述外国的经验与可能的发展,都是我们应慎重考虑的。”(1992: 145)

官员与大众之所以关心雇用移工进入台湾社会后所可能造成的影响,乃是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让外国人大批到我们自己国家来共同生活的经验”(赵守博 1992: 144)。然而,台湾社会的恐外心态从未投射在“华侨”这群“外国人”身上。为了尊崇华人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旅居在各地的华人在过去都有权申请台湾地区的身份证及护照。

虽然台湾对华侨张开双臂拥抱,对于雇用来自中国大陆的移工

则有完全不同的考量。在就业服务法的审议过程中,这是个引来极大争议的议题。有些立委主张基于语言及文化的类同,偏好雇用中国移工甚于东南亚移工;也有其他立委审慎以对,认为对一个抱持敌意的国家大开劳动市场,将导致严重后果。这些争议引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算是“外国人”吗?这群与我们文化相近但政治相左的人民,确实在面临如何适用相关移民规定时,构成了一个异例。<sup>18</sup>

台湾当局最终还是决定对大陆移工紧闭门户,唯一的例外是契约渔工,但他们也不被允许踏上台湾的土地。曾熾芬描述了其中的潜在逻辑:“一个社会对‘外来者’的疑虑有时不但不是‘不同文不同种’的融合问题,反而是‘他们’太像‘我们’,以至于‘他们’无法固定在一个清楚的‘他们’位置。”(2004: 29)

相对而言,东南亚人和台湾人在文化、语言及外表上的差异比较明显,尽管东南亚内部存在高度的族群与文化差异;基此,对台湾决策者来说,雇用东南亚移工较能维持“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壁垒分明。确保族群差异的可见性,不仅有助地主国对外来客工进行监控,也似乎“自然化”了他们在台湾社会中从属与边缘的地位,让他们作为短暂过客及次等居民的身份,变得理所当然。<sup>19</sup>

## 雇外劳拼外交

早在 80 年代早期,有些东南亚人民便以观光客身份,在台湾滞期居留。据估计,80 年代晚期的非法移工超过五万人(Tsay 1992)。移工在 1989 年的合法化,不应只解读成是对资本家需要便宜劳动力的回应,它其实更代表了国界控制的一个转折点:从完全排除,转变成有限度的、规范性的纳入。然而,这个新转变也只适用于四个国家:菲律宾、泰国、印尼与马来西亚,即东南亚国协(ASEAN)的会



员国。诸如斯里兰卡和孟加拉等其他国家的人民虽然在1989年前也在台湾非法工作,但仍被排除在外。

为什么是这四个国家?又为什么排除了其他的输出国?这个对比说明了,对输出国的选择不仅基于地理距离和文化上的亲近性,跨国连带所衍生的政经利益,也会被纳入考虑。马来西亚是最明显的例子。台湾地区政府虽然将其纳为输出国,但每年雇用的马来西亚籍移工,实际数字不超过十几、二十个。这并不令人讶异,因为马来西亚本身也有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且,其平均薪资不比台湾提供给契约移工的报酬低。因此,将马来西亚纳入移工来源国比较像是一种外交策略与结盟,象征性地确立了台湾与马来西亚的双边合作关系。

基于台湾长期以来在国际社会中的暧昧地位,以及发展正式外交上的困境,对台湾的执政者而言,经济实力成为其追求在全球立足的少数资源之一。台湾地区政府采行的“经济外交”策略,借此鼓励台湾企业前往选定的国家进行投资,以交换建立两国的实质外交关系。1994年,前总统李登辉宣布推动的“南进”政策,不仅意图解决劳力密集产业的外移问题,同时也具有与东南亚国协国家发展政治连带的目的。

在相当程度上,资本流出与劳力流入的连结,解释了台湾地区政府为何选择东南亚的四个来源国(Tsai and Tasy 2001);其后开放的越南、蒙古等国家移工的引进,也是基于类似的考量。外国资本的进驻,在当地建立社会连结,也促成劳力出口到海外(Sassen 1988)。举例来说,不少在台湾工作的移工,曾在母国为台湾投资的工厂工作过,他们熟悉台商在家乡的投资,因而取得直接资讯,了解这个小岛的富裕。另外,有些在东南亚投资的台商,也直接从他们的海外工厂聘用当地人到台湾工作。台商在东南亚的社会连带也

有助于他们为自己或朋友的家里雇用家务移工。

在台湾,外劳政策成为政府行使实质外交的重要场域,也就是媒体俗称的“外劳外交”。由于引进移工的协定签订代表国与国之间的正式互动,是间接确认台湾国格的一种方式(曾熾芬 2004),所以不仅外劳输入国名单的决定是由外交部所主导,外交的龃龉也屡次造成移工的冻结。

例如,1999年7月,菲律宾政府片面宣布断航;<sup>20</sup>一个月后,菲律宾海外就业署(Philippine Overseas Employment Administration,简称 POEA)发布对台湾人力中介业者认可的第十号公告,称劳委会为“台湾省行政院劳委会”,并片面决定从严审核台湾雇主与中介业者资格;<sup>21</sup>其后,双方政府在航权协议、中介问题上的谈判屡次破裂。这些外交拉锯战与主权争议,导致了2000年下旬台湾对于菲劳引进的冻结,历时六个月,但只限于公共工程与重大投资等专案。<sup>22</sup>1999年9月,航权争议出现的数月后,劳委会宣布与越南政府签署直接聘雇同意书,开放引进“个性温和”的越南外劳,越南遂成为台湾的第五个移工输出国,同时,劳委会也基于“外交考量”,宣称可能将移工输出国选择扩展至巴拿马、危地马拉、洪都拉斯等国。<sup>23</sup>

另一个例子是2002年8月,台湾冻结印尼移工的聘雇。原本劳委会希望借此督促印尼政府采取行动,抑制上升的印劳逃跑率,但这项禁令稍后却因台湾与印尼之间的外交冲突而延长超过两年半之久。2002年12月,当时的陈水扁总统原本安排了一趟私人的印尼访问行程(所谓的“度假外交”),这个计划被媒体揭露后,印尼政府公开反对,行程因而被迫取消。台湾副总统吕秀莲甚至对大众说:“印尼对不起我们。”<sup>24</sup>台湾的经济部随即暂停了在印尼建立加工出口区的计划,同时,立法委员更催促政府要“硬起来”,改招募较为“友好”的國家的外劳,以报复印尼政府。<sup>25</sup>

此外,2003年4月,在台湾正处于SARS高峰期时,媒体报导泰国政府以此为理由拒绝台湾观光客,<sup>26</sup>此举挑起了台湾舆论敏感的民族主义神经,劳委会也再一次宣布禁止泰国移工入境,以作抗议。台湾的这些决策政策并未达到外交目的,反而,其在外籍移工雇用政策上的反复无常,只导致了地主国及移工们付出更昂贵的代价,举例来说,因为台湾不准印尼移工来台,有些印尼移工便利用假结婚,留在台湾工作。<sup>27</sup>

### 种族化的阶级主义

1992年颁布的“就业服务法”为外国人的聘雇提供了法律的基础,其中的第五章明确地订立了二元的区隔规范。专业白领外国人<sup>28</sup>的聘雇,采取的是个别许可制,工作许可的取得没有配额的管制,契约及工作居留的年限也无上限。而低阶移工的雇用,采取的是所谓“客工”模式,劳委会官员一再强调,台湾地区的外劳政策中的核心原则就是避免外籍劳工成为永久移民。一开始,台湾地区政府限定外籍劳工合约期限最长为三年(两年加上一年的延展),而且每位劳工只能来台湾工作一次。为了减少逃逸外劳的数量,2002年1月修改发布的就业服务法,同意“有良好纪录”的外劳可再次来台湾工作到六年,2008年后再延长到九年。

契约移工的数量不仅受到管控,他们的身体“品质”也受到政府的监督。每个移工在入境前都必须接受体检,且之后仍需定期检查。<sup>29</sup>体检内容包括肺结核、梅毒血清、B型肝炎、表面抗原、疟疾、寄生虫、HIV、精神状态评估等。如果移工未通过这些检查,将被立即遣返出境。然而,外籍专业人士与外国教师并不需受此医疗监视。<sup>30</sup>

具有生产“种族他者”后代能力的女性移工的身体,更是国家

“医疗之眼”关注的对象(Huang and Yeoh 2003)。如果女性移工在检查时被发现怀孕了,会立即遣返,一些怀孕的女性移工因而选择堕胎,以避免被遣返。菲律宾移工中攀升的堕胎率已引起天主教会的关切,台湾媒体也报导了一些据称是移工母亲遗弃婴儿的新闻。因为 NGO 团体的长期抗议,以及两性工作平等法(2002 年 3 月颁布)的法源基础,怀孕检查已经于 2003 年 11 月后从定期体检项目中删除。但是,怀孕检查仍是入境前的体检项目之一。<sup>31</sup>

低阶契约移工的边缘化位置不仅源于他们短期居留的身份,更是因为他们在劳动市场中无法自由流动。劳委会规定,移工只能替契约中裁定的特定雇主服务,除非有以下情况才能转换雇主:原雇主破产、歇业或不能支付薪水;照顾的对象死亡或移民;劳工受到雇主虐待或非法转借给其他雇主;以及其他不可归责于外劳的原因。这些严格规定在 2006 年后才逐渐松绑,如今在两造同意下,移工可与旧雇主终止契约、转换工作。<sup>32</sup>但新规定在执行上仍然成效有限,多数雇主的意愿不高,因为合意转换后申请新移工时,必须重新申请医疗证明,造成雇用的空窗。此外,由于转换雇主的程序必须透过中介,而中介在招募新个案中得到的利润较高,所以中介多不建议雇主承接,因此,很多转出的移工面临没有雇主承接的情形。

台湾当局剥夺移工转换工作的权利,主要目的在于限制这些族群他者的流动,以在内陆有效延伸国界管控。这些规定剥夺了劳动者的最后王牌——“用脚投票”,无产化的劳动者可拥有的最底线自由就是通过市场流动选择自己要的工作。禁止转换雇主的规定,间接帮助雇主稳定生产关系,并强化劳雇关系的不平等(刘梅君 2000)。如此一来,当移工面对不合理的工作条件时只能忍耐或逃跑。若他们挺身反对其工作待遇,通常有契约无法展延、甚至直接

被遣返的风险。

台湾地区长期以来作为一个以汉人/华人为主要的社会,公民身份的取得采取的是血统主义的原则,对于外族人口的归化,采取严格的把关(成露茜 2002)。直到近年来通过“国籍法”与“入出境移民法”的修改,对于外国人的居留与归化才开了一扇窗口,然而,这样的管道仍基于阶级偏好进行筛选。蓝领的东南亚移工由于工作期限在台湾有限,因此很难有资格申请长期居留或公民身份。白领专业移工在台湾合法居留满七年后得申请永久居留,<sup>33</sup>满五年、无犯罪纪录,并且“有相当之财产或专业技能,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无虞”者,<sup>34</sup>便得以申请归化入籍。

由劳委会、卫生署,以及移民署等政府机构,通过以上的法律政策,集体打造出一个如何定义“我们”与“他者”的体制,在进入劳动市场的管道控制以及居留/公民身份的规范上,采取的主要原则是根据原生/外来、公民/非公民进行区分的种族国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模型,次要原则是阶级主义与唯才主义(meritocracy),凡“符合我国国家利益”、“对我国有特殊贡献者”、“为我国所需之高科技人才”,<sup>35</sup>即使是不具有共同血统的外国人,仍得以被接纳进入台湾这个共同体。

换言之,台湾的政策阶层化地区分出不同阶级的异族性(foreignness),白领移工是台湾有需要的“外国人才”、是欢迎归化的,而蓝领移工仅被认为是理想的仆人、却不够资格做台湾的公民。固然,阶级主义主导了接纳外国人进入本国劳动市场与政治社群的相关规定,然而,当来自东南亚国家的低阶劳动者被界定为与我们不可相容的他者时,职业分类与族群分类无形中被混为一谈,衍生了曾熾芬所谓的“种族化的阶级主义”(racialized classism):



低阶外劳被认为在本质上缺乏一种使他们可以成为台湾社会人口组成的素质,他们缺乏成为“我们”的基本条件。于是原来的阶级主义进一步被种族化,形成了种族化的阶级主义……低阶外劳与其他外国人分离的归类,使得他们成为“他者中的他者”(others within others)。在这样的命名政治之下,低阶外劳独立地成了台湾社会的最外围的他者。(2004: 45 - 46)

我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这里牵涉到的阶级主义,不只是个人在职业分类上的阶层位置,也是个人的公民身份与其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阶层位置。来自欧美日的管理阶层、专业人员,其个人的迁移与跨国资本的输入是平行的路径,同样的,低阶劳工的来源之所以是东南亚的国家,也并非历史的偶然,而是与台湾劳力密集产业的南进有着结构上的平行关系。核心国的资本、人才与发展成果是半边陲所欲求模仿的,相对的,边陲的贫穷国家则被视为填补廉价劳动力的后备军产地。对于移工的人力资本的价值评估,也不可能脱离国际化的制度场域而独立存在。在台湾,聘雇的外籍英语老师多来自美英澳,而非印度、菲律宾,反映出语言资本的社会镶嵌有权力阶层的高低。台湾的学生与家长急切拥抱的不仅是核心国的语言与文化,而且期待教授者有着淡肤色与“上国”口音。

## 菲律宾:输出“移工英雄”

今日菲律宾是亚洲最大的移工输出国,在世界上排名第二,仅次于墨西哥。据2003年12月的统计,海外菲律宾移工(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简称OFWS)人数将近770万人(菲律宾总人口将

近 8 千万人),其中,43% 是契约移工,68% 在亚洲工作。<sup>36</sup> 海外菲律宾移工的汇款是菲律宾最大的外汇来源,在 2003 年时贡献了 70 亿美金给国家经济。<sup>37</sup>

劳力外移在菲律宾的殖民历史中,早有轨迹可寻。西班牙自 16 世纪中期开始对菲律宾的殖民,1898 年的美西战争后,美国接着宣称拥有这座群岛的政治主权,直到菲律宾在 1946 年独立。美国殖民的历史促进并鼓励了菲律宾劳力的外移。早在 1909 年,许多菲律宾男人就受雇到夏威夷的蔗园工作。美国在 1921 与 1924 年颁布的移民法案中,决定对亚洲移民紧闭门户,并限制欧洲移民人数,随后,太平洋沿岸的农庄与食品加工业者为了解决劳力短缺的问题,转向菲律宾人招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海军也招募了大量菲律宾男性,其中许多人因服役而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之后得以携家带着到美国居住。1965 年后,因为美国的内陆城市与乡村地区的医疗人力短缺,菲律宾移民到美国的主要人口转而成为白领专业劳工,尤以护士为大宗。<sup>38</sup>

菲律宾停滞不前的经济促使其人民积极寻找海外工作。1952 年到 1969 年间是菲律宾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其后,工业化的成长就因政治腐败及频频内乱而慢下脚步。然而,经济衰退的苦果早在高度仰赖美国的发展体制里就植下种子。在 60 年代期间,马可仕政府的经济计划将菲律宾设定为美军投入越战的军事经济后备基地,战争结束后,徒留给菲律宾不符合当地需求的基础建设 (Espiritu 1995)。菲律宾的经济每况愈下,原本就庞大的外债更如滚雪球般不断增加。到了 80 年代初期,菲律宾的物价平均涨幅达 32%,人口中的三分之二位居贫穷线之下 (Constable 1997a)。

马可仕政府在 1974 年启动“劳工出口政策”,宣称这是个可以舒缓失业问题且带来外汇的权宜性政策,但在数十年后,它已变成

一个“永久的暂时性”政策<sup>39</sup>。在国对国的交涉之下,数以千计的菲律宾人参与了中东地区的各项营造计划。菲律宾政府一度以“海外雇用计划”(Overseas Employment Program)作为正式负责单位,禁止设立私人的中介机构,并强制海外移工汇款回国。<sup>40</sup>1978年后的政策则改为大力推动私有化,菲律宾政府将大部分的聘雇作业转移至私人中介手中,但仍借由 POEA 与海外劳工福利处(Overseas Workers Welfare Administration,简称 OWWA),来扮演规范与监督的角色。1986年阿基诺夫人(Corazon Aquino)掌权后,她的政府持续肯定并掠夺海外菲律宾移工的经济贡献。政府官僚虽不强制移工汇款回国,但转而利用更细微的措施来压榨移工,例如,提高移工携带回国物品的进口税。<sup>41</sup>菲律宾政府并以“国家英雄”之名来提升海外移工的地位,将他们的名字与建国之父黎刹(José Rizal)与阿基诺(Ninoy Aquino)等民族解放者并列(Aguilar 1999)。

菲律宾海外移工的目的地,已逐渐从北美、欧洲,转换到中东与亚洲。2001年到2004年间移出的菲律宾劳工人数中,46%在中东工作,41%以东亚及东南亚为目的地,只有一小部分人前往北美(1.7%)与欧洲(6.7%)。台湾则自90年代中期起,成为菲律宾移工的主要输出地。在1998年,台湾接收的菲律宾移工的人数占当年移出总数的第二名,仅次于沙特阿拉伯;2004年,台湾是菲律宾劳力输出的第五大输出地,排名居沙特阿拉伯、香港地区、日本、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及之后。<sup>42</sup>

菲律宾移工因其流利的英文与教育程度,在全球劳动市场中取得竞争上的优势。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的移工都受过良好教育:一半以上具有大学学历或至少修读过大学课程;三分之二的人完成中等教育(NCRFW 1993)。然而,大量外流的技术与专业人才,也可能对菲律宾本地的发展造成威胁。

从菲律宾海外移工每年的人数变化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移工女性化的趋势。在1980年,海外移工只有18%是女性,但在1987年增加到36%,2002年更蹿升到69%。<sup>43</sup>大部分的女性都从事女佣、看护、娱乐员等服务性质的工作。在2002年,有三分之一的菲律宾女性移工在海外从事家务工作,即便其中的大部分具有相当教育程度与技术。<sup>44</sup>

菲律宾女性移工在人口特征上与男性移工不甚相同。大部分的女性移工年纪约在二十岁后半或三十出头,比起大多是三十或四十多岁的男性同胞,年纪较轻。<sup>45</sup>官方统计虽无提供婚姻状况的资料,但根据一项稍早的调查,过半数的菲律宾女性移工是单身(56%),37%为已婚。<sup>46</sup>相对的,绝大部分的男性移工已婚(71%),只有27%是单身(NCRFW 1993)。这样的差异显示,菲律宾的家庭意识形态及性别分工仍较支持已婚男性(相对于已婚女性)出国工作。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在海外工作期间,女性移工要建立或维系家庭的困难度,也比她们的男性同胞要高。

菲律宾的海外移工人数因90年代的几个危机而回流。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导致300万名菲律宾移工被遣返,其中多数在科威特工作。1995年发生震惊各界的Flor Contemplacion的悲剧事件:她是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菲律宾家务移工,被判定谋杀了同在新加坡工作的菲律宾同事,结果被新加坡政府吊死。这个事件爆发后,引起菲律宾人民的震惊与愤怒,质疑侦办与审判过程欠缺公平审慎,特别怀疑该名新加坡雇主的涉入。为了平息国内大众的抗议声浪,当时的拉莫(Ramos)政府暂时禁止前往新加坡的移工申请,国会也在1995年通过“移工与海外菲律宾人民法”(Migrant Workers and Overseas Filipino Act),宣示保护移工的福利。但最后证明,该法律的象征意味大于实际作用,“国家英雄”这顶充满荆棘的光环,似乎

只有在政治选举与动员时,才发出权宜性的光芒。

## 印尼:现代性的朝圣

印尼,身为人口总数世界第四的国家,比菲律宾晚了许多才踏进了全球劳动市场,但印尼移工——当地人称为 TKI (*tenaga kerja Indonesia*)——的人数在过去二十年里已经快速地成长。学者指出,印尼移工的增长,展现了当代的新国际迁移的几项特征:全球化、快速与女性化<sup>47</sup>。据估计,在海外合法及非法工作的印尼移工的人数已经超过 250 万人,约占国家整体劳动力的 3% (Hugo 2002a: 19)。

印尼的劳力外移模式自 80 年代后有了明显的转变。在那之前,移工外流的人数有限,且将近一半的移工是到欧洲工作,尤其是前殖民母国荷兰 (Nayyar 1997)。80 年代石油涨价带来的财富,让中东成为西爪哇移工的打工目的地,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到了 90 年代,东南亚及东亚各国则加入印尼移工输出国的主要名单,马来西亚更是聚集了最多有证与无证印尼移工的最大地主国。<sup>48</sup> 印尼移工在性别与职业上的分布特征依地主国而有不同:男人通常到马来西亚当农工及司机,女人则多赴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香港、台湾等地当看护或女佣。

从过度拥挤的爪哇安置人口到国内其他岛屿工作,一直是印尼政府用来舒缓人口过剩的策略。这项政策首先被荷兰殖民政府所实施,苏哈托执政的“新秩序”(the New Order)期间也采用类似的做法,作为稳定政局、整合国家内部的工具。<sup>49</sup> 直到 80 年代中期,苏哈托政权才开始正式管理劳动力的国际迁移。这个崇尚发展主义的独裁政府,试图借由开放外资、创造新工作,以及劳动力输出等方



式,来促进印尼国内的经济成长。<sup>50</sup>1983年,印尼的劳动与人力资源部(Depnaker)设立了“国际劳动迁移办事处”(Angkatan Kerja Antar-Negeri,简称AKAN),以协调劳力外移的相关事宜。1988年,该部长通过“第五法条”,明文规范了海外移工的输出流程。

虽然印尼接收自海外移工的汇款并不如菲律宾那么金额庞大,但印尼政府体认到劳力输出是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便宜之计。印尼政府每五年颁布一次“国家政策纲领”(Garis Besar Haluan Negara,简称GBHN),自第三期的五年计划(Repelita III,1979—1984)中,开始设定海外移工人数目标。在第六期的五年计划(Repelita VI,1994—1999)里,印尼政府预计输出125万名海外移工,结果,实际输出的数字(146万)更高于计划目标。第七期的五年计划(Repelita VII,1999—2004)的目标更大幅加码,计划输出280万名移工(Hugo 2002b: 178)。

印尼经济受到1997年金融风暴的重击,其后几年的经济萧条,迫使许多印尼人民走向海外劳动市场,一方面因为失业或不充分就业造成收入减少,另一方面,卢比的贬值更强化了民生物资的高涨(Hugo 2000)。同样地,印尼政府也开始承认海外移工的汇款对国内经济的重要帮助,因而将其宣扬为“外汇英雄”(pahlawan devisa)。

宗教在印尼与阿拉伯地区的迁移连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爪哇岛的穆斯林出国工作的目的,不只为了赚钱,也为了到麦加朝圣。有些工作契约上更载明契约结束时,雇主必须赞助其印尼移工前往朝圣(Raharto 2002)。假如说,沙特阿拉伯是印尼伊斯兰教信徒的宗教朝圣地,那么,新兴的亚洲国家就宛如资本主义版本的麦加,吸引越来越多向往现代性的印尼移工前往膜拜。

除了台湾地区政府冻结印尼移工输入的两年期间(从2002年

8月到2004年12月),台湾一直是印尼移工的主要目的地。台湾的印尼移工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1991年,在台湾的印尼移工只有1万人,但到了2001年,数目超过9万人。在台湾的印尼移工大多数都是来自东爪哇的女性,而且多从事女佣或看护的工作。印尼家务工在台湾的人数的增加,伴随的是菲律宾家务工人数的减少。香港及新加坡也发生了类似的移工国籍分布变化。香港的菲律宾移工占有所有外籍家务工的比例,从1995年的85%,下降到2000年的72%,但印尼移工的人数却在这段期间激增三倍。新加坡在1995年时,印尼移工只占有所有外籍家务工的20%,但据一家中介业者估计,现在新雇的家务移工之中,七成以上来自印尼(Ogaya 2003)。

印尼已成为亚洲各国雇用外籍女佣的主要来源国。在过去二十年来,印尼循合法管道外流的移工大多是女性,且多数从事家务服务工作。<sup>51</sup>她们的年纪大多在二十多岁或三十出头,教育程度并不高,大部分是单身或离婚,唯一例外的是沙特阿拉伯的印尼女性移工,她们多半已婚(Hugo 2002b)。

Kathryn Robinson(2000)指出,印尼政府近来对输出女性移工的政策支持,和当地有关女性的文化规范及政治论述其实大不相容。印尼官方的性别意识形态,视父权家庭为国家的基石;家父长对女人与小孩的权力支配被视为理所当然,藉此意识形态也正当化了政府对人民的威权统治。印尼政府在1978年颁布的国家政策纲领中,将女性定义为“下一代劳动力的生殖者”。一直到1993年,国家政策纲领才把女性定义为一种“人力资源”,具有裨利国家发展的经济潜力。这时,女性的价值才被连结到她们的市场劳动,而不只是具有繁衍国家未来主人翁的子宫。

印尼是亚洲唯一大量输出女性移工的伊斯兰国家,这项事实让不少印尼人,尤其是社会精英,心生疑虑。印尼的妇女部曾在1997

年时,要求政府禁止女性移工赴海外当家庭女佣,理由是身为国家支柱的女性,应该被人以敬相待,而到异地帮佣有损印尼女性的尊严,尤其因为与男主人近身接触而有高度性骚扰的风险(Ananta 2000)。在1980到1986年期间,印尼政府囿于中东地区抢夺与虐待事件频繁(包括一位印尼家务工作者因谋杀其沙特阿拉伯雇主被处死),两度禁止女性移工赴当地从事家务工作。但这些禁令多在几年,甚至几个月后即解除(Raharto 2002)。

根据大石奈奈(Oishi 2005),许多亚洲输出国的劳力移出政策有着性别差异,对于男性移工的规范多以经济利益为考量,对于女性移工的管制则要兼顾社会价值、道德管束、“保护”女性等因素。印尼也不例外。印尼女性必须年满二十二岁才能到海外工作,而且必须得到父亲或丈夫的许可。综合而言,印尼的劳力外移政策呈现了不同国家部门、不同社会价值之间的矛盾紧张,该国政府既想要以道德论述来“保护”伊斯兰女性的身体与尊严,又为了与其他输出国竞逐经济利益,而将印尼女性宣传为天性适合的优秀女佣。

## 地球村中的劳力中介

“这个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了!全球化让移工更容易到海外工作。”留着八字胡的菲律宾中介业者在他的马尼拉办公室内,兴奋地对我这么说着。在访谈期间,我不断听到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楼下挤满了想要出国工作的菲律宾申请者,她们排着队准备去与台湾的中介业者面谈。此外,我也不断因桌上的监视器屏幕而分心,画面上是邻房正在进行的训练课程:一群年轻苗条的菲律宾女人在落地镜前弯腰拉筋、踮脚旋转,她们正在学习跳舞,准备到日本当娱乐员。

移工来台湾所须缴纳的中介费用比亚洲其他地主国都来的高。根据我在 2005 年的调查,菲籍家务移工付的中介费用,约在台币 9 万到 11 万之间。<sup>52</sup> 印尼家务移工支付的费用,则约为台币 14 万到 16 万元,通常经由来台工作后的薪水中扣减,最常见的方式是一个月扣 1 万,扣十四到十六个月。营建(建筑)业及制造业的费用更高,最高可到 22 万。换句话说,移工支付的中介费的额度相当于他们在台湾五到十四个月的薪水。

有关中介费的合法收取标准,各输出国政府的规定不一。以菲律宾来说,政府规定母国中介收取的费用,最高不能超过移工一个月的薪水。台湾的劳委会也在 2001 年 11 月后明文规定,台湾中介不得收取“中介费”,只能按月收取“服务费”<sup>53</sup>。尽管如此,中介公司通常以“服务费”、“入境费”(entrance fee)、“迁移费”(mobilization fee)等名义来掩饰实收的中介费。一些中介要求劳工在离境来台湾前,签下伪装的“借据”,而后就化中介费为借款,从每月薪资中扣除。例如,一个移工给我看他被迫签的同意书,上面这样说:“在等待台湾发薪水之前,我向公司借款 xx 万元以因应我家里的紧急支出。”

我们要如何解释台湾的高额中介费呢?首先,台湾的移工劳力市场中存在着供需不平衡的情形。台湾成为最吸引亚洲移工的目的地之一,主要是因为薪水。最低薪资的规定造成移工在台湾赚取的平均薪资略高于其他亚洲输入国。然而在配额管制的情形下,到台湾工作的机会变得相当珍贵。如同蔡明璋与陈嘉慧(1997)指出,台湾地区政府管价(外劳适用于基本工资)又管量(循环配额的管控)的政策,创造了招募过程中的寻租空间,使中介得以在招募及安置劳工的过程中获得很大的利润。

限制居留年限、禁止转换雇主等规定,更进一步提高了“工作位

置作为一种商品”(林秀丽 2000)的价值。虽然政策上允许同一移工在三年期满后可以再度来台工作,但除非是雇主自行办理程序,该名移工多半还是要透过中介机制,再缴纳一次中介费。在这样一种配额循环使用、劳动力替换率高的系统里,要透过移工社会网络发展为替代性的招募机制较为困难,相对地就增强了对于中介机制的依赖。在香港和新加坡,移工在雇用契约成立的前提下,可以在当地无限制的居留,资深的移工经常替雇主的朋友邻居介绍家乡的亲戚家人来打工。在台湾,除了少数大型企业(如台塑)自行引进外劳,家庭雇主与中小企业由于规模与资源上的限制,面对繁琐复杂的申请流程,直接聘雇的时间与人力成本过高,结果就是强化了中介在招募过程中的支配性。

第二个原因有关中介市场的恶质生态。根据我所访问的中介业者的估计,现在约有 600 家有执照的本地中介公司,此数字尚不包括没有执照的公司和个人。然而,对于中介服务的需求是有限的,因为享有配额得以聘雇外劳的雇主是定额的。过量的产能及有限的需求合起来,便强化了中介业的恶性竞争,支配回扣便是这样的市场生态下的产物。

为了争取工厂的雇主,中介通常必须付给雇主回扣,估计每招募一个移工来台湾,就要支付新台币 1 万到 3 万元的回扣。这样的产业生态是非常诡异的情形:由服务提供者付费,而非服务使用者付费(蔡明璋与陈嘉慧 1997:82)。中介的回扣负担也包括与雇主的酒食社交、免费招待雇主去国外面试应征者,甚至包括雇主在东南亚行程中召妓或招待伴游的费用。中介公司愿意支付回扣,因为他们仍能将成本转嫁到对移工收取的中介费。

组织扩充与重整是台湾中介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优势的一个策略。台湾中介近年来纷纷兼并输出国的中介公司,或成立



海外分公司,以减少对国外中介的依赖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与成本,帮助他们在招募和训练过程中拥有最大的控制。由于印尼、菲律宾、越南政府都禁止外国人开设中介,因此这些台湾中介借用当地人的名义(“人头”)来登记公司,但仍由台湾中介掌握实际的运作与管理权。除了透过中介费的收取,中介还透过贩售强制移工购买的商品来抽取利润,例如:看护的制服、学中文的工具书或录音带、有中介公司标志的帽子或夹克(如此劳工可在机场轻易地被识别)等。

台湾中介之所以对他们的两造客户(雇主及移工)有着如此两极的态度,有部分的原因根植于台湾的外劳政策。移工被允许来台湾工作的次数是有限的,但雇主拥有的配额是可以循环利用的。因此,配额作为招募及补充劳工的抽象潜能,变成比个别移工更为宝贵的商品。释放配额及给予申请许可,也因此成为滋生贿赂与腐败的温床。台湾媒体曾揭露数起雇主动员政治人脉,或中介业者对劳委会官员行贿,以加快申请许可作业的丑闻。<sup>54</sup>在这个高度规范的市场,配额于是成为雇主与中介之间,以及合格的与非合法的雇主之间交易买卖的暴利商品。<sup>55</sup>

中介公司在母国招募劳工时,通常模糊地告诉他们台湾的工作契约是三年。没有充分告知的事实是,他们的合约其实只有两年,第三年要办理展延。无法展延合约或者中途解约的劳工,很少拿到中介费的退款。劳工通常先在母国支付中介费的头期款,这笔钱或由母国中介所取得,或由两国中介按比例分配。台湾的中介公司主要是透过移工每月的薪资扣除收取费用。在第一年合约期间,移工可以拿到的实质薪水非常有限,扣除的费用包括中介费、“强制储蓄”(新台币 3000 到 5000 元左右,旨在防止移工逃跑)、可能高达 20% 的所得税<sup>56</sup>、劳健保、膳宿<sup>57</sup>等。李易昆(1995)便把外劳停留

在台湾三年(或更短)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年是偿债,第二年是还本,第三年才可能净赚。

王宏仁、白朗洁(2007)对越南移工的调查,揭露了更令人震惊的情形:根据一位受访中介的说法,他们公司的移工平均在台湾工作的时间只有1年4个月;他们访谈的越南移工在台湾的平均停留时间则是16.5个月。虽然我们需要进一步的田野资料来了解为何多数越南移工无法完成两年契约,并展延第三年,这些幕后原因与越南移工的高逃跑率有怎样的因果关系也值得推敲,但一个确定的事实是,这样的短期工作与高转换率,将有助于中介回收雇主配额、从再度引介外劳中谋利。

个人证件是另一个可在移工聘雇过程中买卖的商品。为了回避只能来台湾工作一次的规定(在雇主团体的压力下,此规定在2003年后改为两次共六年,2008年后延长到三次共九年),很多移工必须“换名字”<sup>58</sup>、用不同的护照再次来台。菲律宾移工间称这些人为“老台湾”(ex-Taiwan)。在不少个案中,以假名再次来台湾的行为其实是雇主知情甚至予以鼓励的,因为这些家庭类雇主希望继续雇用他们所熟悉的移工,不想招募训练新人。很多老台湾“借用”她们的姐妹或表堂姐妹的名字,只要后者决定不出国工作且愿意出借她们的法律身份。另外也有人向中介购买他们素未谋面的人的名字,中介也可协助行贿来打通海关与其他政府关节。

名字、护照,这些在行政体制中被视为个人身份的单一体现物,对于在全球资本主义中钻法律缝隙求生存的移工来说,成为一个可用交换、买卖等方式取得的复数通行证。一位我认识的菲律宾移工,十年来已经用三个不同的名字、三本不同的护照来台湾,她嘲笑自己说:“我有太多名字了,现在我已经快不记得我真正的名字了!”当使用假名字通过海关时,她们必须谨慎小心地扮演“菜鸟”的角

色,例如不要显露出听得懂很多中文,行李打包时,也要避免携带先前在台湾购买带回的物品。

移工使用内容与实际不符的护照,不只为了回避地主国政府的若干规定,有时也为了逃避母国政府的一些限制。多数的亚洲输出国对于女性出国工作有最低年龄的规定,比方说,菲律宾政府规定,女性必须要年满二十一岁才可以出国担任家庭帮佣,至少要十八岁才能出国担任娱乐员。南亚国家对于最低年龄的限制格外严格,例如印度政府规定女性必须要年满三十方得出国从事家庭帮佣(Oishi 2005: 60)。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年龄规定鲜少适用于男性移工。尽管存在以上规范,年龄不足的移工仍然可以使用假护照来申请出国。

护照是民族国家运作的基石之一,它代表了国家机器对于人群迁移的文件管制,以此行政运作巩固一个地理上封闭的国家社群(Torpey 2000)。当原生国颁布给其公民一本护照时,一方面借此让官僚组织得以辨识、登录公民出国离境的行踪,另一方面,也提供个人进入及流动于全球劳力市场时的必要文件。移工使用假护照或是登录不实资讯的做法,可以说是移工的草根策略,通过操弄国籍身份等制度管道,来对抗、化解国家的文件控制,以增加他们在国际劳力市场中的工作机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内容不符的证件似乎显示输出国的官僚机器的失灵,但这些政府之所以对此违法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因为此举便利劳力输出,可为国家带来大量外汇与利润。

除了蓝领移工,其他移民也发展出其他回避民族国家的文件控制的不同策略,两相对照突显出不同阶级的移民在资源分配上的巨大落差。台湾一度风行以投资数10万元就可取得如贝里斯等小国的护照,现在也有许多人通过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投

资,甚至去美国待产生小孩等方式来拥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国籍。建立在多本护照上的“弹性公民身份”(Ong 1999),帮助这些中上阶级移民建立跨国界的商业及社会连带,不仅可将资产转移海外,以利理财节税,也让子女以外侨身份就学、逃避兵役,在横越多重领土的生活中维持世界人(cosmopolitan)的特权。相反地,劳动阶级的移民以多本母国护照来帮助他们回收配额、好重复进入雇主国工作。在经济困窘的输出国里,许多国民除非是为了海外工作,否则难能负担出国旅游,护照反而变成在地居民与移民劳工之间可以相互买卖的商品。

## 契约束缚与债务镣铐

台湾移工政策的特征在于,它是强制介入与宽松规范的混合体。虽然政府强制介入移工的招募过程,但对规定的执行却差强人意。例如,劳委会设下严格的雇主资格规定,尤其申请监护工的雇主更需经过巴氏量表等关卡审查,但移工受虐事件仍时有所闻。以照顾老人的理由申请来台的移工常被交付其他工作,照顾小孩、在小吃店工作,甚至到非契约雇主的其他地点工作,都是常见的情形。

台湾的就业服务法规定,外籍劳工得享有劳基法中的各项权利和福利,包括最低工资、最长工时、周休年休,及健康保险等。根据劳委会官员的说法,这项政策的目的是为了遵从国际劳工组织(ILO)的规定。<sup>59</sup>事实上,劳动基准的设定与其说是基于保障外劳福利,更多是为了安抚本地工人的不满。借此缩小雇用本劳与外劳的成本差距,有助于保障台籍劳工的劳动条件与就业机会。尽管雇主团体持续地抱怨与动员立委,来自本地工会的压力,是台湾地区政府迟迟没有将外劳与基本工资脱钩的主要原因。此现象说明国家

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相对的自主性：移工的引进固然为了缓和资本家的“投资罢工”（资本跨界流动到廉价劳力的国家如东南亚及大陆），但政府也必须兼顾本地劳工的利益，以维持其统治的正当性。

虽然除了家庭帮佣与监护工，多数的外劳可以适用劳基法的保护，但台湾对于移工的法律保障仅止于象征宣示而非强制措施。由于中央与地方的劳工单位无法监督确实的工作情况或提供有效的法律协助，很多移工只接收到部分福利、没有健康保险或有薪年假，本地劳工的最低工资的要求经常变成外籍劳工的“最高工资”。李安如（Lee 2002）观察中台湾的一家纺织工厂，其雇用的泰国劳工被指派做大夜班或双班工作，领取的是固定月薪（也就是法定的最低工资），远低于本地劳工按件计酬的薪资。移工超时工作的情况远超过本劳。根据劳委会在 1996 年针对制造业的本劳与外劳进行的调查，外籍劳工的每周平均工时要比本劳多出 8.9 小时，在加班时间上有更明显的差别，外劳比本劳每周加班时间高出 22.3 小时（引自吴挺锋 1997：37）。移工或因为没有与雇主协商的权力，或因为急着在有限的契约时间内赚更多的钱，多全力配合超时劳动，提供了雇主调节生产速度的高度弹性。

外籍劳工和本地劳工最主要的差别在于雇用契约的束缚。很多台湾雇主表示雇用外籍劳工的全部费用，包括伙食、住宿及就业安定费<sup>60</sup>，并没有比雇用本地劳工的薪资低太多，但外劳比本劳“好用”太多。对雇主而言，移工可以减少生产成本，不仅因为他们较低的薪资，更因为政策规范下的弱势地位，使他们成为较容易控制的劳动力。

由于背负大量的债务，许多移工同意在星期日工作以赚取更多收入并节省开销。有两位受访的家务劳工表示：“假如我出去，会花钱。我需要把钱省下来付给中介。”“我第一年没有休过一天假！但



我也不要。休假我能干吗？反正我根本就没有钱！”劳工也通过超时工作来向雇主证明她们的忠诚及勤勉，如此一来可确保第二年或第三年合约的展延。例如 Nilda 在雇主没有强迫的情况下放弃第一年的每周日休假，因为，她说：“我要在这段期间表现给雇主看我很乖……我要赢得他们的信任。”

像 2005 年 8 月泰劳事件这样的集体反抗或者公开申诉的案件其实是少数，多数的移工以隐忍来面对剥削与高压管理。身兼组织者的李易昆（1995）在他的硕士论文里曾以扼腕的语气提问：“他们为何不行动？”在一次和菲籍女性劳工的焦点团体访谈时我问了这个问题，所得到的答案集中在他们因负债及中介费的财务压力：“中介费把我们的手绑住了，没办法反抗。”“我们在家乡还有 five - six<sup>61</sup> 要付！”“我们害怕回嘴反抗的话会被送回菲律宾。我们不能再付一次中介费。我们要留在台湾，至少有赚到钱。”

在契约束缚与债务镣铐的捆绑下，移工只能忍受工作的困难及雇主的虐待。家务帮佣 Maya 的雇主没有依法替她加入健保，因此，由于工作过度而脚踝受伤的 Maya 必须自费就医。我告诉她，她应该要求她的雇主付费。她说：“不行！假如她知道我生病，她会把我送回家！”<sup>62</sup>接着她解释为何她必须避免和雇主硬碰硬：

一开始，我总是在电话里向朋友哭诉。我的雇主不喜欢这样。她说，“我不喜欢看见你哭。这在中国是不吉利的。”他们对我大吼大叫很多次。以前，我很敏感啊，可是现在，我的心像个石头[露出坚毅严肃的表情]。

为什么你不选择辞职或者是抗争？

我们害怕雇主送我们回家。

当这种情况发生，可以拿回中介费吗？

在四十天后[试用期],你只能拿回中介费的20%,但很多中介是 *mukhang pera* [money face,指眼中只有钱],他们不会退钱给你。

在雇主的严密监视下,家务移工只有在契约中止无可避免时,才会选择抵抗,因此公开的反抗大多发生在契约快结束或雇主试图终止合约时。在没有机会转换工作的情形下,有些移工也会选择“逃跑”(更确切地说,“不告而别”),脱离契约雇主的掌控(详见蓝佩嘉 2006)。

“查缉逃逸外劳”一直是台湾地区政府的重要关切课题。因为,“外劳逃跑”的现象不仅挑战了台湾地区政府对于国界管控的治理能力,也撼动了外劳管理系统运作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然而,劳委会并未认识到移工出走的结构性原因,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管制手段,如对非法雇用的雇主处以罚金<sup>63</sup>、冻结该国的劳力输入,或是把防止“逃跑”的烫手山芋丢给雇主负责。

台湾雇主要按月缴纳新台币 1500 至 5000 不等的“就业安定费”<sup>64</sup>,根据劳委会早期的规定,若该名外劳“行踪不明”,雇主仍要继续缴纳“就业安定费”,直到该名劳工被逮捕或此合约结束为止。<sup>65</sup>另一个对雇主更严重的惩罚是若其雇用的劳工潜逃,劳委会将暂时冻结其配额,在该名外劳被查获出境前的这段期间,该名雇主不能使用同一配额雇用替代的移工劳动力。这样的处分对雇主的规范效果甚巨,因为,雇主不仅失去了该名离职劳工的劳动力,也失去配额这项更值钱的商品,也就是再补充其他移工的资格。<sup>66</sup>

为了掌握外籍移工的行踪,台湾地区政府严格限制他们转换雇主,并要求雇主代为看守监护,以外部化管理成本。结果,严防移工逃跑成为雇主念兹在兹之事,也从而衍生出许多控制策略,如强制

储蓄、监视隐私、道德监护等(详见第五章)。然而,诸类措施只是让移工受虐与被剥削的情形更加恶化,也因此更将处于艰困劳动条件下的移工推向逃逸之途。

## 有国界的全球市场

有越来越多的人,在社会网络与商业中介的协助下,持续、频繁地穿越国界,然而,全球化与迁移也同时巩固、加高国界的堡垒。<sup>67</sup> Aristide Zolberg(1991)描述,当代的民族国家是“全球市场中有国界的国家”(bounded states in a global market),在国际迁移的洪流中不断依照公民身份的分类来施展自治、分配资源。换一个方式说,契约移工也置身在一个“有国界的全球市场”(bounded global market)。虽然区域性的市场与经济已经形成,地主国仍在契约移工身上强制施行一系列的法律、政治、经济规范。经由管理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亚洲地主国才得以控制易穿透的地理疆界,并划定象征性的国族界线。

Roger Brubaker(1992)在比较法国与德国的移民政策研究中提醒我们,一个国家对其成员与公民身份的定义,中介了该国迁移政策的形构。我要进一步强调,这样的政策制定不仅划分了公民与外来者之间的界线,也沿着阶级、族群、性别等分类,建构了各式各样的社会界线。所有的亚洲地主国对白领移工的规范,都比蓝领移工来得宽松、友善。植基于阶级偏好的政策,把外国人进行阶序高低的分类,并与移工的公民身份/国籍在阶层化的世界体系的位阶中有着平行的关系。在比较亚洲各个地主国的移工政策后,我们也发现,整合外来劳动力的模式,相当程度反映出该国的族群组成以及沿着族群界线而构筑的国族想象。

迁移政策中与家务移工有关的部分,则反映了一个国家如何就性别意义来界定其成员身份。一个国家主要是将女性公民身份定义为妻子/母亲,还是劳工,决定了其欢迎家务移工的程度。女性的再生产角色,也导致地主国针对女性移工制定许多与性别相关的规定。具有生产“外族小孩”能力的女性移工,时常受到医疗之眼的控管(尤其借怀孕条款之名)。类似的性别意识形态也形塑了原生国的女性移民政策。输出国则面临两难,不知该将女性移工宣传为汇款回国的劳工英雄,抑或视她们为未来繁衍国族后代、需要“保护”的母亲。

最后,国家政策对中介业者及雇主的日常实作有很大的影响。台湾地区政府实施的配额管制政策,使得中介业处于高度竞争的状态,而被索取高额中介费的移工,在台湾受到无法转换的雇主的束缚,回国后又需面对借款压力。经济重担加上每年更新契约的不确定性,导致逃跑外劳的人数逐年增加。台湾地区政府的处理方法是将监视移工行踪的责任交管给雇主,但并未积极地铲除问题根源。事实上,雇主对移工的控管越严苛,移工逃跑的可能性就越大。对于移工的劳动控制,是由国家、中介、雇主共同编织起来的管控网,结果便是强化了移工受害及被剥削的恶性循环。



## 第二章

# 谁是“外劳”？







每天傍晚的台北街头，随着少女的祈祷的音乐声响起，家家户户拿出垃圾与厨余，配合市政府的“垃圾不落地”政策，以维护这拥挤首都的卫生与市容。伫立人行道上等候垃圾车抵达的人群当中，你可以留意到聚集在角落的“与众不同”的一小群人，她们的肤色较深，使用多数台湾人听不懂的方言聊天。这些家务移工的身影鲜少在周间公开出现，丢垃圾是她们得以离开雇主家的少数机会之一。她们在这段时间里可以与同乡简短地聊天、交换阅读罗曼史小说，或使用公共电话与远方家人倾诉。其他等着丢垃圾的当地民众对她们的存在有着不同的反应，有些人冷漠以待，有些人好奇探看，也有些人面露嫌恶神色。

这幅景象栩栩如生地呈现了家务移工在台湾的双重位置：她们负责做的是多数台湾人回避的肮脏工作，其地位也被贬为卑贱的外族。“外籍劳工”一词约在 80 年代后期正式出现，首先出现在报章有关非法打工、是否开放外国劳力输入的议论中，随后也成为就业服务法中的官定用语。纯就字面上的意义，此词汇应该涵盖所有非台湾地区的劳工，然而，其言外之意具有特定的阶级与种族意涵。当我们提到“外劳”，脑中浮现的是来自东南亚“低度发展”国家、从事 3D 工作的劳工，而不是德国工程师、日本经理，或美语教师，如此便将特定族群类属与特定职业类别理所当

然地混为一谈,更加强这些族群“天生适合”做这些肮脏、危险又低贱的工作的印象。

谁是“外劳”?这个问题提醒我们不要轻率地把外籍劳工视为一个固定的人口群体,而要进一步考察“外劳”作为一个相对于台湾人与其他外国人的社会范畴,是在怎样的族群地景、媒体论述中,被建构为一个族群他者?

我在导论中已提到,“种族”不是客观存在的范畴。“外劳”的与众不同,是以台湾公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的社会建构,是透过“种族化”(racialization)的过程,建构出某一族群在生物或是文化上的差异。本章也引用 Patricia Collins(1990)提出的“控制形象”(controlling images)的概念,描述主流群体(“我们”)如何透过客体化(确实如此)、二元对立(截然不同)等论述方式,赋予弱势群体本质性(天生如此)、对立面(大相径庭)的差异形象,借此巩固支配团体的优势与弱势群体的从属地位。

谁是“外劳”?这个问题也引领我们探讨移工内部的差异,特别是不同国籍的移工如何被建构、定位成不同的劳动商品。近来,不仅在台湾,香港与新加坡等地的菲律宾家务移工人数不断衰减,相对的是印尼移工雇佣人数的逐年攀升。我将探讨“聪明刁钻的菲佣”与“愚笨温顺的印佣”等刻板印象背后的因素,以及中介公司如何依国籍来建构家务移工的刻板印象,并透过招募、训练等组织化的过程,打造“专业的仆人”。这些行销策略不仅引导了雇主雇用上的偏好,更形塑了不同国籍的移工间的竞争关系与劳动条件上的阶层差异。

## 新与旧的族群他者

中介带她来的[时候,我的]第一眼哦,你知道我心里,惊一下耶[闽南语],心情很不好,你知道,就好像那个针刺到,就这样,很不舒服耶,一看到她这样黑漆漆的,好像山地人一样,一看就是会排斥她的感觉耶,心里就刺一下说,哎哟,完蛋了、完蛋了,怎么一个外人黑漆漆的,一个黑人要住我们家啊,怎么办、怎么办?而且身体上也有一个味道,很臭。那时候心里很怕耶,心里很矛盾说,这个人要住我们家两三年,怎么办、怎么办?

何太太是一位四十多岁的餐厅老板,她在访谈中直言不讳地坦承她当初见到所雇用的印尼监护工时的感觉。许多年岁和她相当或年纪更大的雇主,也常将东南亚移工类比于台湾原住民,冠以带贬义的称呼,如“山地人”、“番仔”等。种族歧视在台湾当然不是件前所未有的新鲜事。台湾民众对东南亚移工的论述建构,援引采纳了他们先前用于原住民身上的种族歧视的叙事方式。要想彻底了解移工的种族化,我们必须检视族群他者的历史建构过程,如何坐落在当代台湾的国族论述工程中。

台湾是一个移民社会,其人口的多数是由在不同时期从中国内地迁移来台的汉人所组成。此外,台湾目前的人口中有约 1.6% 是南岛语系的原住民,早在汉人迁徙之前,他们就在台湾住了几千年之久。近数十年的工业化,破坏了原住民的维生经济,并加速人口往都市迁移。大部分的男性原住民是在高危险的建筑业中工作,但自 90 年代初期以来,这些工作机会已因外籍劳工的引入而逐渐难

以取得。

建立在汉人/原住民差异上的台湾族群地景,其实并不像表面上这么一目了然,族群的界线是模糊、游动的,受到政治协商与历史洪流的转变形塑。台湾汉人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其中的三大族群(福佬、客家、外省),在风俗习惯与社会经验上有若干差异,他们建立在儒家文化上的集体认同与自我想象,乃是对立于族群他者的存在。

台湾原住民长久以来一直都是殖民凝视的对象。清朝文人对这些岛民的再现是将他们譬喻成非人类的、原始的、女性化的原住民男人,以及高度性欲化的“野蛮”女人(Teng 2004)。经过无数的血腥洗礼,日本殖民政府终企图将这些不文明的野蛮人改造成“皇民”。到了战后时期,许多台湾原住民从山区迁移至都市。然而,跨族群的接触却无法消弭他们长久以来的隔阂感,因而形塑了原住民族充满屈辱的族群认同(谢世忠 1986)。

汉人与原住民之间那条被许多人认为是“种族”差异的界线,其实在历史中经历数度穿透与移动。清朝的统治者以及后继的日本殖民政府,曾根据原住民的政治归顺与汉化的深浅,而将其划分为“生番”、“熟番”两类。熟番即是所谓的“平埔族”,采纳了包括语言等大部分的汉人文化,因此逐渐汉化。在日本殖民政府改变行政规定后,平埔族的身份逐渐变得不可辨识与指认。直到90年代,原住民运动者才成功地重新宣称“平埔族”的身份认同,并受到学界与社会大众的认可。

台湾的族群地景在90年代引入外籍劳工与外籍配偶后,逐步浮现另一幅相当不同的样貌。一位计程车司机在接受电视记者采访时,描述移工在周日的聚集,造成过路台湾女性的恐惧:“查某人惊死,好像看到生番逃出来(闽南语)。”<sup>1</sup>“生番”这个用



语让我很惊讶,对这位司机来说,似乎光是“番”这个字眼还不足以形容外籍劳工的“未开化”。在许多汉人眼中,台湾原住民已经“熟”了、“汉化”了,因此已成为“我们”的一分子,但来自“番邦”、很“生”的东南亚移工,在台湾的地位因为制度的隔阂,被定位成永远的外来者。

换句话说,当“新台湾人”的国族主义修辞学已将“旧族群他者”(台湾原住民)融合进台湾主体认同的关键部分后,外籍劳工与外籍配偶继而成为当代种族化过程中的“新族群他者”。<sup>2</sup>

在汉族的历史中,“番仔”这个具贬义的词汇也曾经与西方人连结在一起。中国古文献中以“灰白”来嘲讽西方人的白皮肤,并且认为他们粗硬的头发与赤红的胡子是野蛮的象征。19世纪的文献将西方人形容为“番鬼”,以侵犯清朝领土的方式对中国构成严重威胁(Dikotter 1992)。在台湾,闽南话“番仔火”将火柴描述为“野蛮人之火”,精准地描绘出台湾人当时对西方文明妒恨交织的暧昧情感。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西方人在台湾人眼中也逐渐脱离了“番鬼”的污名。甚至,台湾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与政治发展,其实是立基在美国援助与投资之上。今天,在一般台湾人民的心目中,西方的野蛮人已升级为优越的“洋人”他者。

当代台湾的种族主义论述与恐外症(xenophobia)所指向的目标在于菲律宾、泰国等东南亚社群,鲜少对来自日本、欧洲、北美的移民产生类似的焦虑。台湾的媒体将这些白领工作、淡肤色的移工形容为“外籍人士”,但却以“外劳”来指涉蓝领的外籍移工,仿佛只有前者才具有完整的人格身份,而后者的身份却被化约为他们的劳动表现。这种我称为“阶层化的他者化”的社会建构过程,把东南亚“外劳”视为低劣的他者,独立于较为普遍、中性的“外国人”范畴,后者的文化想象则是来自西方先进国家的白领外劳,虽是族群他

者,却被认为具有文化与经济上的优越性。

处于半边陞的台湾人,在抬头仰望白皮肤的“优越他者”的同时,复制了殖民之眼的凝视,低头蔑视肤色更深的“低劣他者”。

## 种族歧视的修辞学

台湾地区政府宣布开放外籍契约工的聘雇之际,警告其将带来危险的报导与社论如排山倒海而来,例如,“门打开后,就关不上了”<sup>3</sup>、“旋风和野火,扑到家门前”。<sup>4</sup>自移工来到台湾后,台湾媒体也不断以“社会成本”的论述来警告大众可能的负面效应,如某篇报导所言:“为了降低成本引进外劳,却要全民承担高失业率、犯罪、暴动等社会治安成本”<sup>5</sup>。1999年9月,台湾一家工厂发生菲律宾移工与印尼移工打群架的事件,之后,媒体用军事用语来比喻这次意外,例如以下标题:《台湾不能沦为外劳战场》<sup>6</sup>。这些媒体论述体现了一种萌生中的“社会病理学”论述(吴挺锋1997):把台湾社会或台湾家庭想象成一个干净、封闭的系统,东南亚的入侵者成了公共卫生漏洞的代罪羔羊,是需要小心监视与有效管理的社会问题。

台湾报纸与杂志也常使用耸动的标题,来报导移工的传染病个案,例如:《寄生虫,菲佣感染居多》<sup>7</sup>、《爱滋外劳,首传病逝》<sup>8</sup>。在媒体的凝视下,移工的卫生有问题不只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居住条件,也可能是“道德低落”的结果。东南亚移工常被怀疑兼职从事性工作或是经常使用性服务,因此是性病的高危险群。一篇报导的标题是这样下的:《泰劳有召妓习性,应慎防艾滋病传播》。<sup>9</sup>电子与平面媒体几度用偷窥镜头或腥膻文字,把外劳的假日集散地,描述为户外的性爱淫窟,或是性交易的据点。一家电视台在报导移工周日

在桃园火车站后的公园活动时,以“外劳打野炮,公园上演活春宫:周末激情夜,V8 全都录”<sup>10</sup>的耸动字眼作为标题。另外,也有某报社以“桃色风暴:外劳激情配对,公园嘿咻”的标题,描述移工在放假时间的生活和紊乱的性行为脱不了关系,<sup>11</sup>即便这些报导的内容根据的只是台湾民众与中介的说法,而没有访问任何移工或相关团体。

这样的媒体再现经常引发了大众的恐惧,害怕东南亚移工的迁入有害台湾的公共卫生。某位桃园县议员在议会发言时表示,怀疑当地艾滋病带原者人数的逐年上升,与移工的出现有关(桃园县是台湾移工人数最多的行政区)。批评移工的健检“成效不彰”的这位议员继而指出:“外劳体检不确实,让已患有艾滋病者蒙混到台湾,危及个人健康。”<sup>12</sup>一家报社刊出一位患有肺结核的家庭主妇的投书,她抱怨道,她的“作息正常”,会得到这样的病应该是“与外劳大量引进有关”<sup>13</sup>。

“外劳”经常被台湾媒体与民众视为潜在的犯罪者,他们国家的经济弱势,被认为导致人民在品格与生活习性上的低劣。有篇报纸报导的标题是:“为一千元,泰劳砍泰劳”,暗示移工是如此贫穷,以至于会为了小钱铸成大祸。<sup>14</sup>地方新闻屡屡报导荔枝被偷采、鸡禽猪只遭窃的事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遭窃的农民往往遽下结论:“一定是外劳干的!”<sup>15</sup>认为这么便宜的东西只有外劳才会偷。

移工也常被认为缺乏“工作伦理”,这解释了为何他们会用偷的,而非赚的。<sup>16</sup>例如,我访问的一些台湾雇主表示,台湾的经济繁荣证明了儒家道德观的优越性。相反地,东南亚国家由于热带的气候、民族的基因(“菲律宾人是海盗的后代”),以及不符当代资本主义标准的工作伦理,导致了其经济衰败成为无可避免的

结果。

男性移工的负面形象多与抢劫、强暴、偷窃等暴力犯罪有关,而女性移工的污名则环绕着她们的身体与性。女性移工经常被污名化为“假打工、真卖淫”,为了逃脱贫穷不惜出卖肉体,在周日贩卖性服务给男性移工。<sup>17</sup>女性移工也被塑造成勾引男雇主的潜在对象,其“热带女人”的丰满身体与高涨性欲,可能危害雇主家庭的幸福。另一个极端的形象是,女性移工作为遭受雇主虐待与性骚扰的受害者,在媒体上也很常见。报纸上刊出的受虐女佣的图像,经常是一张看不见脸孔的、满布瘀青的裸露身体。这样的照片以及描述虐待细节的文字报导,吊诡地让受害者成为诱惑的来源。<sup>18</sup>窥淫癖的媒体,凝视的是女性移工被性欲化的身体——不论她们是主动积极的性主体,或是可怜无助的受害者。

台湾曾经出现几件外籍监护工心智不稳定而造成病人死亡的案例。<sup>19</sup>1999年11月3日,台湾一家有线电视播出一卷录像带,内容是一个菲律宾女佣踢三个月大的婴儿的画面。这则新闻引发大众对外籍保姆的恐慌。警告读者移工看护可能会故意忽视或不利小孩成长等负面意涵的文章,大量出现在报纸与杂志版面上。虽然类似的个案也曾发生在台湾本地看护的身上,移工的个案往往受到更多注目,因为他们不只是雇主家庭的外人,更是台湾整体社会的外来者。

事实上,外劳的犯罪人口率明显低于台湾本国人。根据警政署2003年的统计,嫌疑犯人数占外劳总人口的0.08%,本国人则是0.7%。然而,当外劳的犯罪个案在媒体曝光时,嗜血的报导风格经常把部分与整体混为一谈,把个别外劳的犯罪,延伸为该国外劳,或是全体外劳的道德缺陷。

媒体将“外劳”建构为卫生不佳、道德低落的卑贱外族,这影响

了雇主如何在家中遂行劳动控制。雇主通常借由空间隔离与生活管理等策略,来避免家庭遭受家务移工的“污染”。有些雇主要求外籍女佣使用的餐具必须与家人分开,或者衣服需与家人的分开洗涤。有个雇主甚至要求移工喝不同瓶子的水,并且使用不同的浴室。其他的雇主则试图规训家务移工,将他们的生活习惯“文明化”。例如,台湾人通常在晚上洗澡,但大部分的菲律宾移工在早上淋浴,有些雇主会认为这样“很怪”、“反常”或“不干净”,因此要求移工改在晚上淋浴。生活习惯的些微差异被诠释为落后或反常的象征,因此应该遵循雇主所定义的“正常”习惯行事。

雇主希望家务移工不管在个人卫生或道德手脚上都“干净”。我访问的雇主们时常提及家庭财物被移工偷窃的事件,不论它们是道听途说的故事,或是雇主的亲身经历。为了保护财物,雇主会让移工远离贵重物品,避免给予房间钥匙,或禁止访客。许多雇主还会故意将金钱或珠宝放在家里或抽屉,以“测试”移工是否诚实。

在一些极端的例子中,移工被当做危险人种看待,因而有必要与当地隔离开来。例如,一家国小以“保护孩童安全”的理由,禁止移工进入校园。<sup>20</sup>另一个控制移工的方式是标示他们的身份,使其醒目可见。根据新闻报导,一名居民在小区会议时建议所有的移工别上写有“我是外劳”的名牌。<sup>21</sup>这个粗暴的建议并未被会议的其他人接受,但台湾地区政府却采取了另一种更细致的监视手法:所有的契约移工在入境时皆须捺印指纹,并需要随时携带证件,以利警察的不时检查。在人权论述普遍于全球的当代,各国鲜少采取明显的、种族排他式的隔离措施,然而移工仍受制于身份登记与空间分配而受到组织性的监视。<sup>22</sup>

甚者,外劳作为一个阶级化与种族化的范畴,在台湾社会已经



变成一个脱离字面意义的譬喻 (metaphor)。当我用“外劳”与“外佣”的关键字在新闻资料库中进行搜寻时,经常找到一些与移工议题完全无关的报导。例如,一群国中代课老师陈情抱怨他们的工作,叙述的方式是:“我们连外劳都不如!”<sup>23</sup>另一个例子是某电视演员在拍戏期间风吹日晒而皮肤变差,她因而被冠上“菲佣”的绰号。<sup>24</sup>在这些例子里,“外劳”与“外佣”被当做一个譬喻,象征的是台湾社会中最不被欲求的位置,不仅是底层阶级 (underclass)、被去除了女人味,更接近具有种族或种姓 (caste) 意涵的贱民。

Mary Douglas (1966) 极有洞见地指出,纯净与肮脏的划分,对象征秩序的维系非常重要。每个社会都有隔离仪式以及对人事物的分类,以防止外来的污染与污秽。台湾的外劳论述也完全落入这种纯净/肮脏的二元划分。媒体将外籍工作者报导成危险的野蛮人,既贫穷又落后。同时,它们也投射出一个对纯净社会的想象,而这个社会的公共卫生、安全与道德秩序正因外来者的出现而处于危险当中。外籍工作者被投射出来的“控制形象”:野蛮人、坏人、妓女、受害者等,也许彼此之间并不连贯,甚至矛盾,但它们共同编织了一条种族化的界线,划分出“我们”与“他们”、台湾人与落后的族群他者之间的不同。

## 聪明刁钻的菲佣 vs. 单纯温顺的印佣?

外籍劳工开放的前几年,菲籍移工占据了台湾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市场,但近来已因其他国家的竞争,而人数逐年下降。许多雇主常在中介的建议下,不再偏好菲籍移工,而改聘印尼与越南籍移工。菲籍移工在台湾所有家务劳工的比例,从 1998 年的 83% 降到 2007 年的 15%。印尼籍移工则从 15% 上升到 2001 年的 70%; 2003 到

2005年间的数量明显下降,是因为劳委会从2002年8月冻结印尼移工的聘雇,直到2004年12月才重新开放(参见第一章)。在这样的脉络下,有些雇主转雇用1999年11月才开始引进的越南移工。在最近的统计数字中,印尼家务工的数量再度大幅领先,越南、菲律宾居次。

表一 1998—2007年在台湾的家务帮佣与监护工的国籍分布

年度	菲律宾		印尼		越南		泰国	马来西亚		总计	
1998	44,559	(83%)	7,761	(15%)	-		1,030	(2%)	18	*	53,368
1999	42,893	(57%)	27,948	(37%)	33	*	3,912	(5%)	7	*	74,793
2000	34,772	(30%)	63,563	(60%)	2,634	(2%)	5,356	(5%)	6	*	106,331
2001	24,875	(22%)	78,678	(70%)	5,221	(5%)	4,158	(4%)	2	*	112,934
2002	21,223	(18%)	81,490	(68%)	15,263	(13%)	2,733	(2%)	2	*	120,711
2003	29,347	(24%)	47,891	(40%)	40,397	(33%)	2,901	(2%)	2	*	120,598
2004	34,446	(26%)	21,457	(16%)	71,783	(55%)	3,333	(2.5%)	2		131,067
2005	35,047	(24%)	41,906	(29%)	63,956	(44%)	3,057	(2%)	-		144,015
2006	29,107	(19%)	75,577	(49%)	46,767	(30%)	2,318	(1.5%)	-		153,785
2007	24,369	(15%)	101,619	(63%)	34,414	(21%)	1,819	(1%)	-		162,228

资料来源:行政院劳委会统计资料库查询<sup>25</sup>(\*百分比低于1%)。

“菲佣聪明但刁钻”、“印佣单纯温顺”,是雇主、中介与大众对家务移工的普遍印象。我们应该如何解释这些族群特色的形构,以及这两个国家在移工聘雇人数上的消长?有些人认为,这反映两个国家的历史背景的差异:相对于在威权统治的过去与伊斯兰文化影

响下的印尼人,曾受美国殖民的菲律宾人,具有较强的民主理念与权利意识(Loveband 2004b)。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两个国家的家务移工在教育与语言资源上的差异,决定了她们与台湾雇主的协商能力。我也将分析中介业者的行销论述与聘雇策略,如何突显了两国移工的族群差异。

### 教育资本与语言资本

当我与菲籍家务移工谈到她们之前的工作时,许多人常在应答前深深地叹一口气,或回以自我解嘲的语气。Jorita 之前是菲律宾的高中老师,她说:“我在菲律宾的朋友都取笑我,他们说我以前的工具是拿笔与纸,现在拿的却是菜刀、搅拌机与砧板。”Vanessa 以前则在菲律宾的连锁书店当经理,她说:“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在政府单位工作,但你知道她现在(在台湾)做什么吗?她现在每天都在打扫厨房。我常说我以前在菲律宾是经理,而我现在却是管家!”

菲籍和印籍的移工在平均教育程度上有明显的差距。先前的研究已经指出,有相当比例的非籍移工具有大专学历并在菲律宾担任低阶白领的工作(Parreñas 2001),根据菲律宾的官方调查,有二分之一的菲律宾海外劳工具备大专毕业或肄业的学历,另外三分之一完成了中学教育(NCRFW 1993)。这样的教育水平和美国殖民政府在菲律宾广设大学的历史有关。在菲律宾的就学年龄人口层中,大学与专科的在学率超过 31%,明显高于印尼的 14.6%。<sup>26</sup>相对于菲律宾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现象(Alegado 1992),印尼大学生寻找海外工作的比例低得多。在台湾的印尼移工的平均教育程度介于初中和高中之间。<sup>27</sup>

除了教育程度,菲籍移工也因其良好的英语能力(另一项美国殖民的遗产),而拥有在全球劳动市场中的相对竞争优势。然而,语

言能力不只是个人的人力资本,其市场价值为制度性的社会脉络所决定。要了解英语作为一种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的社会价值,我们必须考察置入菲律宾与台湾的语言环境,两者的形塑都镶嵌在国际化的语言场域。<sup>28</sup>

英语自1901年起,也就是美国从西班牙手中取得菲律宾主权的三年后,开始成为所有菲律宾公立学校的官定语言。这项政策为殖民政府所支持,理由是相信“对英语教育的知识是学习美国方式生活的必要前提”(Bresnahan 1979: 65)。直到今天,英语的使用仍然在菲律宾的政府档与教材当中占了压倒性的优势;<sup>29</sup>受过教育的菲律宾人,在日常对话时经常混合马尼拉语(Tagalog)和英语(当地人称为Taglish);专业与高等教育者仍然偏好使用英语,认为方言的智识性低、不够现代化(Sibayan 1991)。

殖民者的语言与文化遗产,吊诡地在国家独立后,变成菲律宾人逃脱经济困境的重要资源。比方说,台湾的工厂老板喜欢用菲劳胜于泰劳,因为前者可以看懂进口机器与设备上的英文指示。亚洲主要城市里的饭店与俱乐部广泛地雇用菲籍乐手,因为他们擅长唱美国通俗歌曲,但要求的薪资比美国乐手低了许多。

虽然台湾在发展历程中受到美国文化的相当影响,但相对于菲律宾,多数台湾人,即便是大学毕业生,口语英语也不甚流利。这样的情形到近十多年来才有显著的变化,英语已被普遍认知为是一种具有重要市场价值的语言资本,近年来开始举办的英语检定,吸引了跨年龄层的群众参与,制度性地呈现了此项语言资本的霸权地位。教育部已经将英语课程提早至小学开始,以改善英语教育的质量;前总统陈水扁甚至口头建议过把英语当做第二官方语的可能;<sup>30</sup>为了方便招募更多以英语为母语的教师,舆论也要求政府放宽对于外籍白领的工作许可的管制。<sup>31</sup>

英语俨然成为台湾新生代在全球化的社会中寻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新一代的台湾父母因而急于投资更多的经济资本来增强孩子的英语能力。上层阶级的家庭,雇用私人家教来教小孩英文,中产阶级父母则积极送孩子去上双语幼儿园、安亲班,或参与海外游学团。雇用会说英语的大学生菲佣,也成为培养小孩语言能力的方式之一。然而,这样的安排像是一把双刃剑:虽然可以彰显雇主新近的阶级流动,却也可能削弱了雇主支配佣人的权威。

我访问的台湾雇主和菲籍移工中,有不少人向我表示在使用英文和对方沟通时有困难。这样的抱怨特别容易发生在高中或高中以下学历的雇主身上,他们必须仰赖第三者的协助,像是中介、孩子(甚至是上英文安亲班的小孩),或是使用电子字典,来和菲籍移工沟通。<sup>32</sup>Judy 为一家家庭工厂的老板工作,雇主家只有长女会说流利的英语,但她正在加拿大读书。Judy 对我抱怨和老板沟通的困难:“如果我有问题,我会写一封信,然后我老板会把信带到工厂,那里的秘书会说一点英文,这实在很复杂,有时候我想跟他们抱怨一些事情,他们只会说:‘Sorry, I don’t understand.’(抱歉,我不懂。)”

在台湾,英语流利的菲籍移工常被指派许多家务之外的工作,意谓她们的地位高于一位“女佣”。药学系毕业的 Claudia 骄傲地告诉我,她的英语说得比老板好,所以她被要求在一家上层阶级的私人俱乐部接听电话:

我的老板是一家女性俱乐部的副总裁,她时常带我去参加会议。

为什么?你要服务她们吗?

不,她是要我去接电话,以及叫我打电话给这个人或那个人。她们那边有很多美国人。



所以，她要你去说英语！

对，我想是这样没错。她们有比较多的钱，但我的英语说得比她们大部分的人还要好[微笑]。

台湾的菲籍家务移工也常被要求当英语家教或语文交换。我在田野期间曾在菲劳聚集的教会开授一堂中文班，班上的学生向我抱怨她们在雇主家没有练习的机会：“我们的老板喜欢跟我们说英文。”“他们想要练习英文！”许多雇主也要求菲籍家务移工教小孩英文，犹如 Olivia 与 Imelda 所说的：

我的老板跟我说，当他们在看我的履历表时，老板娘不喜欢我，她说我看起来太老太丑。可是老板说：“但是她是大学毕业耶，而且是英文系的，也许她可以教我们英文。”

他们雇我们菲律宾人，因为想要学英文。家里的小孩子都是念美国学校，他们从来不跟我说中文，因为想练习说英文。我知道如果要请一个英文家教很贵，可是我们什么都做，而且很便宜！

虽然雇用一个大学学历的家务移工具有同时得到一位英文家教的附加利益，但教育程度低的雇主，将可能因此付出沟通与管理困难等额外代价。有些雇主在用英文向家里的菲籍移工提出要求时，深感挫折。淑雯是一位高中毕业、经营电器行的老板娘，她无奈地说：

本地的，你要求她们，她们未必会听你的；外劳，你要求她们，她们未必懂你的意思。她会问你：“Ma’am，你说什么？”她被搞混了，而你也是，每天你都在担心要怎样[以英文]表达你的要求，有时候我想，算了，我干脆自己做好了！[苦笑]

这样的语言障碍，在有些菲籍家务移工的眼里，却被认为是一

种有利无害的处境：因为她们的雇主无法指派太复杂的工作，如一位菲籍受访者所说：“如果你的雇主懂的英文不多，反而好，他们就不能要求你去做太多的工作。”更有些移工有意识地操弄英文作为反抗雇主的工具。举例来说，玛西先前在新加坡工作了五年，然后到台湾来，在一个经营小工厂的家庭里工作，她描述了以下场景：

上次我老板要我去清理他工厂的办公室，我就说：“What?”继续擦我的地板，假装什么事也没听到，然后他就不再说什么了，因为他不太会说英文。

但在新加坡你不可能这样做，那边的雇主会说英文。

还是可以啊[带着微妙的笑容]，我就假装我不懂英语！

菲籍移工的英语能力与白领背景，解构了台湾民众赋予移工的落后他者、从属佣人的控制形象，有少数菲劳甚至会指正雇主说英文时在发音或文法上的错误，让这些雇主觉得颜面尽失。有些雇主因而转向改雇用被认为较为温驯的印佣与越佣。其中之一是瑞华，一名大学肄业的安亲班经营者。瑞华先前雇用过一名菲律宾人，但认为她意见太多、要求放假又交男朋友。瑞华后来决定改用印劳，她向我说明她的雇用条件：

我们要很单纯的、没有出过国做事情的，因为有经验，她比较会知道说要怎么偷时间啊……我们被那个菲律宾的怕到了，所以我先生说要找一个不识字的、不会讲、不会听、什么都不会的。我宁可从头开始教她，没有一点污染的，这样子才好带，就是心里打好主意了。

瑞华后来雇用的印尼移工，是国中毕业，而非不识字。访谈中“不会讲、不会听”的夸大说法，指的其实是不会英文或中文。和菲佣用英文沟通感到挫折的台湾雇主，如今在和印籍和越籍女佣的语

言互动上,确保了支配的位置。不同于菲籍移工,印尼与越南移工必须要学习国语或台语,才有机会获得台湾的工作,稍后将会说明,她们在来台湾前必须在中介处接受长达数月的训练课程,但即使在经过训练课程后,移工也难以用雇主的母语来对工作内容与条件进行议价。雇主母语的优势地位,象征性地标示出雇佣关系中的权威,也在现实互动中迫使印籍移工不得不噤声沉默。

语言资本的拥有与否,也影响了移工获取资讯与社会支持的管道,也就是瑞华所说的“污染源”之一。说英语的菲籍移工有机会阅读英文报纸与聆听英文广播节目,<sup>33</sup>这些媒体的服务对象是全台湾为数不少的英文使用者与学习者,相对地,其他国家的移工只能聆听极少数用母国语言制播的广播节目。国语能力还不错的印籍移工,如果在雇主的家中有机会看电视,还可以用中文取得有限的外界资讯。此外,印尼移工的社会支持也较为薄弱与有限,不像菲律宾移工能够经由天主教教会以及隶属的非营利组织,取得法律资讯或权益咨询的服务。<sup>34</sup>语言资源上的弱势、资讯管道的不足,都局限了印尼移工在台湾的培力(empowerment)空间。<sup>35</sup>

### 刻板印象与市场利基

印尼与菲律宾都是由多元族群与文化所构成的国家,但台湾的中介业者时常将同一国家的移工,即便来自不同地区或族群,视为一个拥有同质文化的集体,进而依照国籍别,划分不同的“产品线”来经营家务移工的劳动市场。<sup>36</sup>这样的行销策略有三个主要目的:一,通过这样的广告与论述塑造其对于劳动力来源有专业了解的形象,借此说服雇主媒合安排的重要性;二,经由劳动力的市场区隔提供类型化的聘雇选择,满足不同雇主的需求(家务、孩童或老人看护);三,这样的刻板印象可以说服某些类型的雇主从雇用菲劳改为

雇用印劳,后者的招募提供了中介较高的利润与相对于母国中介的自主性。

为了系统性地探究移工的论述建构,我们浏览了从 Google 上找到的 93 家中介<sup>37</sup>,其中有 29 个网页提供了以国籍为基础的移工特征,并透过以下表格,对其中的论述内容加以编码分析。<sup>38</sup>

表二 台湾中介对不同国籍的移工描述

菲律宾:西化的他者 ( <i>The Westernized Other</i> )		印尼:传统的他者 ( <i>The Traditional Other</i> )		越南:共产主义的他者 ( <i>The Communist Other</i> )	
描述	次数	描述	次数	描述	次数
教育程度高	15	服从性高	15	近华人文化	17
聪明	10	单纯	10	吃苦耐劳	10
易沟通	9	忠诚度高	8	温和	8
西化程度高	8	性情温和	8	节俭	6
活泼	8	可不放假	6	勤奋	6
自主性强	3	任劳任怨	5	受共产主义影响, 不易逃跑	5
懂察言观色	1	诚实	4	善良	4
				华语能力佳	3
				外观讨喜	1
具劳工意识	6	反应慢	2	不宜谈政治	4
不好管理	6			因较无经验 需耐心沟通	4
喜欢交朋友	4			易逃跑	2
易逃跑	4				

资料来源:台湾 29 家中介业的网站,2003 年 10 月。

在这些论述中,来自同一国家的移工们被同质化为享有共同特征的集体类属,有些简要提到形成族群文化差异的历史与社会脉络,有些甚至使用诸如“自然的”和“天生的”等词汇,暗示种族特征的本质性。这些种族化的控制形象,呈现出不同类型的他者化方式。菲律宾人被视为“西化的他者”(the Westernized other),描绘的形象是“乐观、罗曼蒂克、独立自主”<sup>39</sup>和“外向、自我中心、意见多、聪明,以及难管理”<sup>40</sup>;印尼人的典型则化身为伊斯兰习俗中的温顺女人形象,是一种“传统的他者”(the traditional other):“服从、忠心、动作慢,以及生活简单”<sup>41</sup>,因此,自然适合辛苦的工作,以及“不放假”的劳动条件<sup>42</sup>。

越南移工的形象建构是其中最为模糊与复杂的。一方面,越南被认为长期以来受到汉文化所影响,越南人也被认为理应具备一些与儒家文化相关的明显特征,像勤奋、俭朴以及容忍;根据台湾人主观的美感标准,她们较浅的肤色被认为比菲律宾人和印尼人较深的肤色来得好看;因为以上这些预设的种族与文化的亲近,中介将这批新来移工标示为适合台湾家庭生活的好仆人。然而,另一方面,越南的政治背景则催生了一种“共产主义的他者”(the Communist other)的刻板印象。昔日被锁在“铁幕”里的越南移工,被想象成在政治上是心胸狭小的,对外面的世界是无知的。有趣的是,不同的中介论述对于在共产统治下的人民有着矛盾的印象:有的认为高压统治应该培养出效忠的人民,所以应该不太会“逃跑”,但也有人怀疑这样的生活背景导致越南人工于心计的个性,会增加他们“逃跑”的可能。

为了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生存、成功,中介业者必须有效地以明确区隔的移工形象,来让需要专业筛选服务的雇主对他们印象深刻。<sup>43</sup>同样地,台湾中介借由放大印尼籍移工与非籍移工之间的差



异,来操作种族化的刻板形象,以便利他们拓展印尼移工的市场。这样的行销策略背后的主要考量,在于中介印劳可以获取比中介菲劳更高的利益,这一点为多数受访中介所承认,虽然他们不愿告诉我确切的数字。<sup>44</sup>其中描述地最坦白的是一位在中介公司作翻译的印尼华侨,他私下告诉我:“他们说菲佣比较难搞,才怪,那只是因为中介可以从印尼佣身上赚到更多钱。”

中介也挪用种族化刻板印象来自然化(naturalize)工作的安排,借此来满足雇主的不同需求。在加拿大,肤色较淡的女性移工通常被雇来照顾小孩和煮饭,而肤色较深的女性则被安排作家务工作(Cohen 1987)。台湾也有类似的状况,中介根据有关菲律宾人与印尼人的本质化论述,建议雇主指定安排不同的工作给他们,并且采取差别化的管理方式。被描述为顺从、忠贞和配合度高的印劳,成为照顾老人与病患的最佳人选,而说英语的菲劳,则被认为受过较良好的教育、文明程度较高,因而较适合照顾台湾的小孩。此外,印劳常常被安排了家户外的额外工作,我接触到的许多印尼监护工,白天会在雇主经营的家庭工厂、餐厅、安亲班、面包店、杂货店、小吃店、夜市摊子等地方帮忙,多数没有领到额外薪水,或只有小额的补贴。印尼女性被塑造为笃钝与恭顺的形象,使她们成为 Anne Loveband(2004a)所说的“双重剥削”(double exploitation)的适当人选。

家务移工之间的国籍界线,不仅划分出他们在劳力市场的区隔位置,同时也形塑了他们在地位与权利上的阶层差异。外劳依国籍不同而出现薪资差别的情形在台湾并不那么常见<sup>45</sup>,比较明显的是劳动强度与条件上的差别待遇,特别是有关放假的规定。中介公司通常告知雇主,可以要求印佣或越佣放弃她们的休假,但是不放假的规定却是菲劳所不能接受的,因为,根据中介的说法,菲律宾人的特征就是精于算计与争取权益,更重要的是,菲劳有马尼拉经济文

化办事处<sup>46</sup>与天主教教会的支持,有较多相关劳动权益的资讯与申诉管道。此外,印尼与越南家务移工的弱势地位与次等待遇也被差别性的契约所确立。早在她们抵达台湾之前就半强迫地被要求签订契约,其中详列了她们同意不休假,或每个月只休一天;相对起来,中介公司较少要求菲劳签订这样的条款。在香港,印尼移工的薪资通常比菲籍移工低,而且放假日更少。<sup>47</sup>

要看到族群特色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性质,最清楚的方式就是考察其浮动、相对的构成。事实上,有关某一族群的控制形象经常是对照于不同的对象而被关系性地界定。在台湾,菲律宾人被认为是强硬好斗,比较的族群是温顺服从的印尼人。然而,在加拿大,中介将菲律宾人描绘成温柔有爱心的保姆,因为她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对手是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岛来的移工,后者被视为强悍又野蛮的“岛屿姑娘”(island girls)(Bakan and Stasiulis 1995)。

另一个例子是印尼家务劳工在台湾中介论述中的“服从”形象,此一形象近来已经被她们日渐增高的“逃跑”数字所解构,甚至导致台湾地区政府暂时冻结印尼劳力的出口。事实上,当仔细考察统计数字的消长变化时,我们可以发现,“逃跑”从来不是单一族群的家务工的独特现象。菲籍移工在1996年时有最高的逃跑率(3.6%),该年印尼籍移工的逃跑率只有2.6%,但是到2000年时,印尼籍移工的逃跑率上升到2.9%,在同一时间内,菲籍移工的数字则下降到1.2%,隔年更低(0.9%)。<sup>48</sup>印尼籍移工被冻结后,来自越南的替代劳动力,一度被中介推销为“理想仆人”的新典范,但是很快的,就变成“危险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逃跑率转而变成所有移工里最高的,在2003年底年上升到7.8%,隔年底增加到10.16%,<sup>49</sup>劳委会因而在2004年底宣布暂时冻结越劳的输入。

从印尼籍和越籍移工逃跑数字逐年攀高的趋势看来,此一状况

的发生实是导源于家务工作的剥削,而非任一国族特性。中介公司和雇主利用种族化的控制形象来合理化他们对印籍和越籍移工的高压管理,讽刺的是,移工逃跑的结果恰好颠覆了“顺从仆人”的本质化迷思。

### 订做女佣

在前文中,我已指出,中介业者如何建构与传播夸大的移工族群特征。然而,中介的影响力不仅止于论述层次。许多台湾的中介业者都在移工母国设立公司(尤其是在印尼与越南),以同时降低交易成本与强化控制。或者,他们会试图在移工母国寻找有效、长期的合作伙伴。地主国的中介业者借由建立一个跨国公司,将聘雇与训练过程整合进其对移工的行销策略中。为了快速定位菲律宾与印尼籍移工在市场中的位置,台湾的中介业者会经由不同管道选工并建立训练课程,以主动“改造”移工的劳动力。

印尼与菲律宾的中介公司利用多样的聘雇管道引入不同特质的移工。在菲律宾,集聚在马尼拉的中介公司不只是在乡村寻找可能的移工人选,同时也利用报纸刊登征人广告,甚至在社区散发招募传单。我在马尼拉,前去访问一家中介公司的路上,附近区域的墙壁与电线杆上都贴满了用粗体印刷、标题醒目的传单,上面写着:“Domestic Workers Wanted in Taiwan(寻求到台湾工作的家务劳工)。”容易接触到这些广告的对象,多是城市居民,或在城市里工作的职员、秘书等低阶白领,以及其他有先前海外工作经验而熟悉招募流程的人。一般来说,这些申请者受过较多的教育,也比乡村女性对于都市的生活形态有较多的了解,不需要经过太多的指引和训练,她们就可以准备好前往一个海外家庭里工作。

尽管如此,这样类型的申请者普遍被印尼中介认为是“不好”的

招募对象。原则上,印尼中介比较偏好乡村居民而非都市人,比较倾向于透过人际关系(当地的牛头)而非报纸广告作为招募的机制。此外,印尼中介偏好招募“认识的人”而非自行前来的匿名申请者,先前没有海外工作经验被认为是一种优点,因为这些“尚未被污染”的申请者比较容易被“改造”。在马尼拉,只有几间训练中心提供家务服务的短期课程(历时数周,学员只需在白天前往,不用住在那里),学员在训练完成后可取得一纸证书;这些训练课程的学员,多是自愿、自费参加,希望这张证书可以帮助她们取得地主国中介或雇主的青睐。<sup>50</sup>在印尼,所有的工人在经过牛头招募、中介核可后,必须花两到六个月住在由中介公司经营的训练中心里。

换句话说,“聪明菲佣”与“温顺印佣”之间的区别,不只是个别人力资本的差异,或是中介凭空塑造的虚幻形象,而是中介透过具体的、选择性的聘雇机制,从移工旅程的开始之前就确立了这样的差异。这些形象不是随机抽取移工样本后,推断而来的普遍轮廓,而是中介基于偏见下刻意选工导致的结果。中介特意地选择不同类型的招募管道,来寻找其“期望”与“所欲”特质符合刻板印象的菲律宾与印尼移工。为了要和说英语、西化、教育程度高、在全球劳动市场拥有优势的非佣竞争,印尼籍移工被设定为“温顺仆人”的理想型,其市场利基是农村背景与语言学习等密集的训练过程。

## 打造理想仆人

你知道印尼的工人怎么来报到的吗?带一个塑胶袋,还不是手提袋喔,塑胶袋里面放一件内衣、一条内裤、一件T恤。穿着拖鞋,身上带2万块卢比,她就说:“我要去台湾。”这样子来报到的咧,你看我把她训练到会穿衣服,训练到懂得卫生,会讲

华语,会做事,这很不容易的。

中介陈经理在他台北的办公室里,口沫横飞地对我这样说。会谈室外的电话声似乎从来没有停过,有十几位员工正忙碌地处理着中介女佣的相关事宜。陈经理在台湾的另外三个城市也有分公司,并在印尼、越南和菲律宾成立海外分部,透过这些单位,这家公司每年引进了800名女性到台湾来做家事、带小孩、照顾病人。在访谈过程中,陈经理毫不犹豫地将东南亚移工标示为未开化的、卫生条件堪忧的落后民族,更重要的是,他借此说法来炫耀其公司的训练计划的成功,能够奇迹般地将许多台湾民众眼中“不文明的他者”转变成适合台湾家庭雇用的“专业女佣”。以下检视中介业者在印尼如何透过招募、训练与再现等三个主要过程,来积极地制造“理想女佣”。

## 招募

印尼华侨 Mr. Damo 经营的中介公司位于雅加达北边的工业区,要经过一排排灰濛濛的厂房,才能看见他们老旧的办公室。公司的训练中心则坐落在更偏远、房租较低的城外郊区。Mr. Damo 向我解释他们的中介公司所偏好的移工类型,以及采取的招募管道:

我们通常不在报上刊登广告,这没有用,来这里的都只是在附近工作、然后进来问问的,他们已经有了工作,而且还没下决定。所以广告是没用的,你必须用牛头。乡下人和这些都市人不一样,牛头会先跟家里人说好几次,否则他们会担心自己的女儿是不是被卖掉。你需要认识的人的关系。以后,如果发生什么事的话,他们可以去找牛头,如果女佣逃跑了,我们也会去找牛头。[自己]来找我们的人,通常都已经去过台湾了,我们不喜欢,我们会怕她逃跑,因为她可能在台湾有个男朋友。



牛头,也被称为 sponsor,在印尼移工的招募过程里扮演了很关键的角色。他们通常是地方上的头人,例如村长、本地商人、甚至是伊斯兰教的教长(Rudnycky 2004: 414)。这些人有管道与人脉,可以和都市里的中介接轨,也熟悉地方政治,因而能加速处理移工出国所需的各项文件。牛头在地方村落里寻找有兴趣出国的人,替她们申请准备各项文件,然后带她们到城里找中介。一个移工通常付给牛头 200 万卢比(约美金 250 元),包括交通和其他杂支,到达之后,中介业者会给付牛头每一个招募人次大约 60 万卢比(美金 75 元)到 100 万卢比(美金 125 元)的酬金。移工通常不需预先支付费用给中介公司,直到海外工作开始之后,才从薪资里扣款。

Mr. Damo 的说法,指出中介公司外包招募工作给牛头的好处。借由这样的管道,中介能够以低成本找到没有海外工作经验的乡下女孩,同时,移工的家庭对当地的牛头有着比城市陌生人更多的信任,他们觉得把女儿交给一个同乡带出去接触未知的外在世界是比较令人安心的。同样的,中介倚赖移工与牛头之间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相互监视的机制。当一个移工从雇主家“逃跑”的时候,经由牛头的中介,中介可以要求她的家人负责支付剩余的中介费。换言之,家庭连带和社会网络皆被动员为管理的机制,中介借此遂行对移工的监视,抑制她们寻找“非法”工作的动机。

陈先生,这位在第 115 页提到的台湾中介老板,对我强调说,“理想的佣人”只能在某些地方才能找到,“愈穷愈好”是他在招募人力时的黄金守则。他通常会锁定一个贫困的乡镇,然后透过亲戚关系寻找可能的移工。缺乏经验的女性移工依赖社会网络来取得工作推荐,以及聘雇过程所需要的各项档案与许可。<sup>51</sup>然而,这样的社会网络也变成了一种监督与规训的机制。另外一名在泗水中介公司上班的印尼华侨告诉我,他如何有意识地运用人际关系作为一

种劳动控制的网络：

我都有一个观念在，我要找这个村庄的，我全部找这个村庄的，愈滚愈大。每一省都这样，互相有牵制的时候。譬如你们两个是姐妹，你们两个都来台湾的，你不乖的话，妹妹丢脸，搞不好，你们姑姑也来了，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不好，姑姑就会骂你们，你要乖一点，整个村庄会有一个牵制的影响力。

中介业也经由仔细拣选的过程来制造“温顺”的移工，他们倾向于排除“个性强”或“看起来聪明”的申请者。许多中介不喜欢已经来过台湾工作或甚至有华人血统的应征者，移工对于地主国文化和语言的了解与掌握，照理应该可以降低雇主的训练成本，并且转化为工作表现上的优势；但是，在中介眼里，这些特质反而可能增加劳动控制上的障碍与不确定性，特别是逃跑的风险。<sup>52</sup>一个中介业者解释背后的逻辑：“如果她们会讲中文，他们就会到处问别人，与别人比较，如果他们有了当地的人脉，他们就会逃跑。”

此外，以区域为基础的刻板印象，也形塑了中介业者对于印尼移工的偏好。根据我对中介的访问，他们普遍表示喜欢招募从东爪哇和中爪哇来的女性，这些地区的印尼女人被认为“品质比较好”，具体地说，具有顺从、工作努力、朴素单纯等特质。多数中介与训练中心是位于雅加达的近郊，照理说，招募西爪哇的工人的交通成本比较低，然而，恰好因为西爪哇在地理位置上接近雅加达，当地人被认为都市化程度较高，而较偏离“温顺仆人”的形象。西爪哇的女性被描述为比较凶悍、懒惰而且漂亮，他们较浅的肤色也让许多台湾女雇主担心会增加丈夫被引诱的机会。

我特别要指出的是，移工们对于种族化的形象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有些人刻意的配合中介的期待来进行表演或呈现，以争取工

作的机会。举例来说,一些我在台湾遇见的移工告诉我,她们会对中介隐瞒她们先前的海外工作经验,因为知道中介偏好录取没有经验的人;一些西爪哇人会对中介说谎,假装她们是从东爪哇或中爪哇来的。她们选择性的揭露或伪装与自己有关的资讯,以满足中介对“温顺仆人”的想象。

## 训练

经由牛头招募的未来移工,在被送出国之前,必须先住到中介的训练中心,经过二到六个月不等的训练。大多数的训练中心位于雅加达或泗水的郊区。以我访问的一家泗水近郊的中介为例,训练中心一共包括四栋房子,其中三栋是宿舍,另一栋比较大的是上课的地点。在那里,总共住了450名学员,居住的空间非常拥挤,一个不到十平方的房间住了15到20人。中介特别展示给我看他们新购的双层铁床和床垫,以强调他们的设备符合了印尼政府对于训练中心居住环境的基本规定。这项政策是在2003年后才开始强制实施的,这是因为印尼当地的移工组织申报了一些在训练中心被虐待、营养不良,或神秘死亡的案例后,才唤起了政府与大众对于这个人权黑洞的关心。<sup>53</sup>我在台湾遇到的大多数移工,在先前的训练期间都被安置在不合政府规定的居住环境里:她们睡在地板上,每天的饮食只有白米和蔬菜,数以百计的人必须一起洗澡,因为水的供应每天只有一到两个小时。一名印尼移工生动地向我描述当时骇人的生活环境,她说:“我们就像牛、像羊,你看到他们怎么洗牛?我们就像那样。”

在我参观的这间训练中心里,所有的学员都必须早上四点起床,晚上十点就寝。从周一到周六都有课程,周日是唯一放假的日子,但是她们不能外出,只准许有访客。每天晚上,她们被锁在中介

的宿舍里,不准外出,但常常要因为晚餐的分量不足而感到饥饿,只好等到街上的小贩拉车经过时,用绳子绑住一个装了零钱的篮子,缓缓降下给小贩,再把回装了宵夜的篮子吊上去。一伙女生嘻嘻哈哈跟我聊起训练中心的日子时,既是回味昔日情景又感慨有如“坐牢”一般的待遇。

多数移工在来到台湾之前,经过两到三个月的训练,但我也认识有人等待工作机会,在中心待了六个月之久。<sup>54</sup>训练课程的内容,整理如表三:

表三 印尼移工的训练内容

课程主题	上课时数
课程介绍(心理状况、宗教、动机与训练、雇佣关系、卫生设备)	15
家务(铺床、工具维护、厕所清理、吸尘器清理、拖把使用、汽车清理)	27
孩童照顾(洗澡、穿衣、喂养、喂牛奶、与学龄前孩童互动)	27
老人照顾(洗澡、喂养、喂药、护理技巧、按摩、运动)	27
餐桌服务(餐桌礼仪、餐点准备、餐具的安排、服务的顺序、餐巾的折叠)	27
烹调	24
熨烫	18
洗衣(手洗、洗衣机、干洗)	9
电器(如何使用榨汁机、烤面包机、微波炉、电冰箱等)	27
基本英文字汇及会话	114
基本中文字汇及会话	138
总计	453

资料来源:印尼中介提供的训练手册,2003年8月。

训练计划中的简介部分,通常包括几个小时的道德教育,涵盖的主题如工作伦理、生活规范等。当我询问台湾中介陈经理,他认为训练内容中哪个主题最重要时,他毫不犹豫的回答:“礼义廉耻。”在强调儒家式的道德原则的时候,他一方面强化了“我们华人”的种族优越感,另一方面也彰显出对于移工(“他/她们印尼人”)次等化、“道德欠缺”的想象。在访谈中,陈经理强调有必要对于印尼女性的性作控制,必须驯化她们野兽般的强性欲,而这样的性特质在他看来,是一种落后国家女人无可避免的脱贫策略(因为太穷只有用卖的)。道德教育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将移工训练成具生产力又顺从的劳工:当我在训练中心观察时,担任讲师的印尼华侨女性,反复地讲类似下面的道理给在场的学员听:“你们要努力工作、感激人家给我们赚钱的机会,不要反抗你的老板,不要让自己受到不好的影响。”

训练课程中有相当的时数是用在传授与家务和照顾工作相关的知识与技巧,这些课程指导的不只是如何完成家务工作,更要以“有效率”和“理想”的方式完成。她们学习如何使用现代化的电器设备,如洗衣机和微波炉,这些在农村生活方式中没有或不需要的设备。通过这些家务技巧的传授,中介企图纠正移工的“技术落后”(technological backwardness)(Cheng, 2003: 176),并将他们导正到符合现代精神的家庭生活方式。女性移工先前的家务经验,尤其是照看自己小孩的方式,被认为是不符现代卫生习惯的落后习俗,现在必须重新学习如何按照医生指示的无菌方式来照顾婴儿与孩童,以符合台湾社会追求“科学母职”的当代趋势。

餐桌礼仪是训练课程的一章,教材中有图示,标举如何将餐具、餐巾,以及水杯放在桌上的“正确”位置。我在印尼时,注意到电视肥皂剧中的家庭普遍采取西式的正式进餐方式,用剔透的水晶杯喝



水、用雪白餐巾优雅地拭嘴。这样的画面和现实生活大相径庭。大部分的伊斯兰家庭,坐在毯子上用手抓食。被纳入训练计划中的西化餐桌礼仪,反映出对于上层阶级生活的一种特定想象,而乡下人必须改进她们的“文明程度”,以参与这样的文化想象来表现出仆人的专业性。一些印尼移工对我抱怨,训练课程的这些部分是最没用的,因为她们来了台湾发现,大多数的雇主家庭,在家里吃饭都很随便,甚至不知道正式的西餐礼仪应该怎样进行。



图二 受训移工正在练习医疗照护 作者摄

语言课程占据了最多的训练时数,尤其是华语的学习。如我先前提过的,掌握台湾本土语言的能力是印尼移工与菲籍移工竞争时的主要竞争优势。语言教学不只有其实用的功能——便利移工和不说英文的台湾雇主之间沟通,也象征性地强化了劳雇权力关系,借由确立家务移工从属于雇主的语言,来巩固雇主的文化优势与控制。我认识的印尼移工,多认为语言课程的训练效果有限,在有限的时间内,她们通常只学会如何在拍给雇主看的录影带里用中文自

我介绍,语言的掌握还是在台湾的实作经验中才逐渐熟练。然而,对于印尼移工来说,语言能力的培养,仍是训练课程中最为实用的部分,也提供了她们肯定自我的来源,特别是可以借此彰显出她们相对于“不会说中文”或“懒得学中文”的菲籍移工的优越与勤奋。

Daromir Rudnycky(2004)观察雅加达附近的一家训练家务移工的中心,并借用福轲的概念,把训练中心的运作称为“仆佣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servitude),意思是说,这些训练课程不只是在传递特定的技巧或是能力,而且企图培养一种家务仆佣的态度与秉性(disposition)。他所观察到的“仆佣的技术”包括对学员的分数评量,以及言语与身体的规训。其中最令人惊讶的部分是,学员被指导要用跪着或者曲身、屈膝的姿势和雇主说话。

这些被中介定义为执行家务劳动所必须具备的能力与态度,一方面映现了中介与雇主共享的对移工的文化想象;但另一方面,他们定义下的移工学员的“不足”与“差异”,对照的标准是中产阶级现代家庭的意象,却未必符应于实际的雇用状况。除了餐桌礼仪为其中一个例子外,电器用品也是建构现代家庭意象的必备工具。然而,在一些家庭中,却只有女主人才有权力使用这些省力的现代设备,例如,有些台湾雇主要求其家务移工用手洗衣服,即使家里有洗衣机。

我们需要较长期与深度的观察,才能评估这些训练课程对于移工的主体规训有怎样的效果。姑且不论训练的实际成效如何,这样的训练计划象征性地提供了一种家务移工的过渡仪式(rite of passage)——通过此展演性的仪式向雇主宣示,“生番”已经获得现代化与文明化。这样的训练过程,也帮助中介同时兼顾两种对于移工劳动力的偏好:一方面,他们希望招募没有海外或都市经验的农村女性,提供相对顺服、易控制的劳动力;另一方面,他们透过训练计

划来向台湾雇主提供移工的保证书,担保这些没有经验的农村女性已经习得相关的道德伦理、家务技巧与语言能力,得以融入台湾的现代家庭生活。训练的过渡仪式,除了要达成对劳动力的驯化与控制,更是为了降低雇主的疑虑,象征性地宣示这些落后、肮脏、不文明的种族他者,已经通过了现代性的品管检定,准备好到“文明”世界的“干净”家庭担任专业仆人。

## 展示

在参观印尼训练中心期间,我很讶异在如此有限的空间里能挤进这么多人,却呈现井然有序的状况。在一间一间的教室里,有人拿着蒸气熨斗在烫衣服,有人在操作洗衣机洗毛毯,有几位用熟练的动作在折棉被、吸地毯,有一群围着瓦斯炉练习快炒中国菜,还有一些人以同学为对象练习按摩,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画面是:一整排女人抱着洋娃娃来练习换尿布以及喂奶,她们甚至对着假婴儿喃喃自语,虽是背诵着标准化的育儿台词,却是刻意地温柔细语。另一间大教室里坐满了人,大家肢体略显僵硬地坐在排得很整齐的课桌椅,正在看一支有关如何操作心肺复苏术的录像带。我靠着门檐,试着安静不出声地观察教室里的活动,但是一个外国人的出现无可避免地引燃了现场的兴奋与好奇,她们的注意力纷纷离开银幕,飘向我的存在。中介公司的职员索性走进教室,向她们介绍我是从台湾来的客人,现场开起朵朵微笑,学员们又默契地拍起手来,齐声清脆的用华语说:“小姐好。”

后来我才明白,我那天看到的其实并不是平日课程进行的实际状况,而比较像是一场针对海外雇主和中介的“表演”。前一晚,所有的学员都被交代有台湾客人来参观,提醒要穿着干净的T恤和牛仔裤(平常上课并没有规定穿着打扮),T恤的颜色则根据准备前往



图三 在训练中心的移工学员 作者摄

的国家来作区分：穿黄色的是要去马来西亚、橘色是去新加坡、白色是去香港，红色则是去台湾（中介跟我说明，因为华人将红色视为幸运色）。希弟，一个我在台湾认识的移工，回忆起她在训练中心待了四个月时，国外中介来到训练中心选工的情形：

[中介说]把东西弄好、穿上好的衣服，每天乱乱的要弄干净，要做快一点，要快点走路，头发要梳一梳，不要那个哭哭的脸，等一下他们来了，要笑笑，要跟他问安。

所以跟平常不一样？

我们这样很难过，他们说一定要笑，我们在那边不[想]要很久，要赶快找工作、出去，等很久很难过，还要笑。

等待工作机会的未来移工，因为长时间失业与家庭分离往往已经心力交瘁，尽管如此，她们被要求要精神抖擞地表现自己。好比

穿上制服一般,她们展露标准的微笑、操演恭敬的问候,为的是要通过中介选工的评量。在一些训练中心里,学员甚至不用名字称呼,而是以号码来称呼。她们在制服上别戴了注明个人号码的名牌,她们的身体是去个人化的(depersonalized),有如商品一般,只由颜色来编码、由号码来辨识。

事实上,家务工作是高度女性化的,私人家庭的工作场所也潜藏着性骚扰的高度风险。然而,未来的家务移工的身体,在选工时的再现方式,却是高度地去女性化(defeminized)与去性化(desexualized)的。在训练中心里,化妆是不被允许的,朴素齐耳的短发是被指定的造型。在印尼,长发被普遍认为是美貌与女人味的主要元素,一些我在台湾认识的移工,回想起她们在训练中心的登记处被剪掉长发的时刻,仍然充满感伤。有些人把她们剪下的头发保存起来,寄回给家人,以兹留念或是为她们的妈妈作假发。她们初抵台湾时的照片,多和我认识她们时的造型判若两人。当我要求看她们的外侨居留证时,有些人觉得很尴尬丢脸,因为上面的照片是她们在训练中心时照的,有人这样说:“不要啦,我看起来好丑喔!像男生。”这样的发型服膺了纯朴贫穷、缺乏时尚感的“女佣”形象,不仅具有特定的阶级意涵,也抑制了移工的女性化气质,因为性感与美貌通常不是女雇主所喜好的择工条件。一言以蔽之,借由控制女性移工的服装、发型与举止,中介让她们展现出了合宜的形象——去女性化的、规训的、天生卑微的——以实现雇主的期望。

## 移工之间的分化

菲籍移工安娜以充满同情的语气来描述她的印尼邻居的工作环境:“她不能睡觉、不能休假,还有,不准抱怨。”周日出门时,安娜



会帮忙买食物与易付卡给她行动自由受到局限的邻居。尽管移工之间确有类似上述的跨国团结的时刻,但中介业者与雇主所建构的种族化界线,经常造成不同国籍的移工之间的敌对状态。

许多菲籍家务移工对挺身争取权利感到迟疑,因为雇主会威胁要以印尼移工取代她们。在这样的状况下,菲籍家务移工常复制了种族化的刻板印象,以确保自身相对于印尼移工的优越性。<sup>55</sup>她们宣称“那些印尼人”教育程度低、不会讲英文、和男雇主调情、偷雇主的财物,生活习惯落后,所以无法担负现代化家庭的劳动工作。她们尤其无法认可印尼家务移工与其他族群的男性有情感或身体关系。一位菲籍移工如此评论:

有些雇主认为菲律宾人交男朋友。错了,印尼人才交男朋友。你去过清真寺对面的那个公园吗? 印尼人和黑人、黑鬼或泰国人在一起。菲律宾女人很聪明,她们知道交男朋友很蠢。我们来这里是要工作的,不是来玩的。

Nicole Constable(1997a)分析针对海外菲律宾人发行的杂志中的 *Tinig Filipino* 读者投书,发现其中许多菲律宾移工试图召唤国族的骄傲认同,以提醒同胞在海外生活中自律的重要性。她们相信自己肩负着道德责任,要破除香港人认为菲律宾人爱喝酒、无所事事、性泛滥等刻板印象。我在台湾的观察中也发现,不少菲律宾女性把自己迁移的身体当做国族领土的延伸,在规训自己与同胞“不要丢菲律宾人的脸”的同时,她们也同时把国族界线投射到其他女性移工的身体上(“我们菲律宾人不能比她们印尼人丢脸”)。菲律宾人借由指出印尼竞争者的行为不检点,来强化自我规训,并以此证明菲律宾人拥有较为优秀的工作伦理与道德价值。

同样,我在印尼家务移工身上也感受到她们对菲籍移工的敌

意。不少印尼人向我抱怨她们的雇主之前会让菲籍移工每周日休假,但她们却只能每月休个一天或两天。或者,有些印尼移工会在无酬的情况下被指派其他额外工作,但前任的菲籍移工却不会有任何额外工作,就算有,也会得到报酬做为补偿。虽然她们对此深感不平,但少有人敢正面向雇主抱怨这种不公平的处境。当问到这些印尼移工为什么不敢正面反抗时,她们形容自己“胆小”(takut),而非律宾移工比较“勇敢”(berani),能对雇主与中介业者坚持自身的权利(Loveband 2004b)。

虽然有些印尼移工羡慕菲籍移工的挺身而出,但其他人认为避免冲突较符合印尼社会的宗教信仰与道德观。二十五岁的印尼移工 Utami 强调家里的教养方式影响了她回应台湾雇主的态度:“我习惯(这样的行为)了,我回到印尼时也是这样。我妈妈教我,不管别人对我们怎样,我们要有礼貌。”其他移工则认为吞忍的态度符合伊斯兰的教导:“我的女主人对我吼,我从不吼回去。我只是祈祷,忍受它。”

在许多印尼移工的眼中,菲籍家务移工是“high class”,因为她们的教育程度较高、会说英文,而且骄傲自负,没兴趣与印尼人用中文沟通。雇主的种族化论述,也影响了移工如何看待不同族群的差异。比方说,Utami 如此描述雇主不公平的态度:“他们对菲律宾比较好,好像我们印尼都不好,我们印尼比较笨笨。他们说菲律宾人比较聪明、比较好、比较漂亮、皮肤比较白白,不像我们,皮肤比较黑,不漂亮。”Utami 第一次见到雇主时,她的雇主甚至粗鲁地对她说:“你的皮肤那么黑,像拖鞋(的颜色)。”Utami 压下怒气,客气地回答:“喔,谢谢你。”

除了教育程度与皮肤颜色外,英文能力也成为另一个雇主用来划分这两群移工的阶层高低的特点。然而,Utami 发展出对抗论述

来驳斥雇主的这种观点：

他们说菲律宾比较聪明、会讲英文。可是他们不知道菲律宾的都不会讲国语。我跟他们说，你请我来这边是工作，不是来讲话，对不对？如果你要请来这边讲话，请菲律宾的会讲话、讲英文啊。我来这边是工作，是帮忙带小孩、煮饭、洗衣服、扫地、拖地，我需要讲英文吗？阿公阿妈会英文吗？

像菲律宾人一样，印尼人也用道德论述来强化种族化的界线。有些人诉诸宗教上的伊斯兰女性保守形象，来建立自身在道德上的高人一等。她们批评西化的菲律宾移工爱喝酒、抽烟、有外遇、道德沦丧。印尼家务移工也常利用工作伦理的议题来证明自己的道德优越性。在访谈时，有些印尼移工形容自己忠心、勤奋、合作，不像菲籍移工好斗、无情、自私、缺乏家务与照顾工作应该具备的耐心与毅力：“我不像菲律宾的，爱吵架：‘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不喜欢吵架，我做事，我不说话。”“我邻居说我照顾外公比之前的菲佣好，她很粗心、粗鲁。”“菲律宾比较 care about themselves[自我中心]，菲律宾比较漂亮、做事没有什么好。”“她们比较白，可是嘴巴……我们印尼是笨笨，但我们比菲律宾有礼貌。”

以上这些个别移工之间基于群体认同而产生的敌意与冲突，必须被放在更广泛的脉络下来理解。移工劳动市场中潜在的竞争关系，导致了不同国籍的移工间的对立；语言藩篱也成为说英语的菲籍移工与说中文的印尼移工之间的沟通障碍。第五章将会进一步探讨这样的国族界线如何体现在移工社群的空间分配上。在这些情况下，移工可能会认同中介业者的种族论述，并借由标示自身不同于其他移工群体的差异，而巩固了种族化的界线。这可以说是一种“自我种族化”(self-racialization)的现象：当一个少数团体借由

复制主流的刻板印象来边缘化其他少数团体时,将导致自身遭受同样的种族化的规范控制。

## 阶层化的他者

谁是“外劳”?要回答这个问题,本章的分析可用“阶层化的他者化”的概念来总结。我再一次强调,必须用关系性的架构来理解人们如何建构种族化的界线,“外劳”的主体位置的建构也与其他外国族群息息相关。

“外劳”不是一般、中立的“外国人”,而是被视为低劣一等的族群他者。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政策如何以阶层化的制度划分不同类型的外籍工作者:台湾以严苛的排外规范与种族标签来对待东南亚的劳力工人,但张开双手欢迎白领的外国工作者来当邻居,甚至归化公民。这一章继续检视种族化的论述面向,尤其是大众媒体如何将“外劳”再现为卫生不佳、道德低落、具犯罪倾向的落后他者,截然不同于来自经济富裕“上国”的“外籍人士”、“优越他者”。只有在这样的脉络下,我们才能了解“菲律宾女佣”在台湾的独特主体位置,她们被指派的英文家教额外工作,既彰显了台湾新富雇主的社会地位流动,也挑战了说不好英文的雇主的权威。

当代台湾的种族主义论述,既是新的,也是旧的。台湾汉人长期以来歧视台湾原住民的种族主义叙事,被挪用套到东南亚移工身上。当旧的族群他者已被整合成为“新台湾人”的国族认同的一部分,东南亚移工成了新的族群他者。这样的种族化过程有两个不同的面向:一方面,“外劳”被社会建构为一个“次等他者”的集体范畴,淡化内部差异而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移工之中又根据国籍区分成不同的次类属,如菲劳、印劳、泰劳,彼此的文化差异被放大、视为

不变的本质,以此强化了国族界线的区隔。<sup>56</sup>

中介对移工的行销策略与招募训练,也在建构“外劳”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中介不是单纯、随机地招募劳动力,而是积极地打造、有组织地规训符合市场需求的劳动主体。中介业者将印尼女性宣传为典型的“理想女佣”,胜过西化的菲律宾移工。这些种族化的刻板印象也体现在移工的聘雇与训练过程中。经由选择性的招募管道,中介业者刻意寻找被认为“温驯”、满足“传统他者”形象的年轻农村女性,并再经由规训性的课程,来“现代化”这些乡下女孩。透过这种象征性的过渡仪式,中介宣称已生产出准备好远渡重洋、出国工作的“专业仆人”。







### 第三章

##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一幅台北市小学在放学时刻的常见景象：下课钟声仍回响在空中，兴奋的小学生已鱼贯跑出校门。几个调皮的男孩嘲弄着另一位害羞的小男生：“王小明，你的菲佣在等你喔！”男孩一脸尴尬，低头玩着手中的掌上型游乐机，快步向前走，一两步之遥的菲律宾移工在背后紧紧跟随。另一个小女孩则高兴地跑向另一个菲籍保姆的怀抱。她们手牵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街头上其他的母亲牵着女儿一般，只不过两人是用英语叽叽喳喳谈着今天上课的趣事。

母亲与保姆的身影模糊重叠，甚至误认的情形也不少见。一位台湾女雇主对我描述了一个让她觉得有些好笑又尴尬的遭遇：“我家菲佣的肤色比较白。她每星期有两天晚上带我儿子去上电脑班，她就坐在后面等上课结束，课上了已经有两三个月以后，有一天，老师走过去跟她说话，叫她：‘王太太……’，她听不懂[中文]啊，所以静静坐在那里没有回答，然后老师才明白，原来她是个女佣，而不是妈妈！”

女主人与女佣、母亲与保姆之间的区别，其实颇为隐晦幽微。一个提供的是无酬的“爱的劳动”，另一个从事契约规范下的薪资工作，但是她们同样在维持一个家庭的日常生活秩序、照顾其中成员的身心健康。两人之间也产生某种形式的分工。即便多数的家务

工作已被外包给移工,不少女雇主仍保留一些家务亲力而为,也有许多雇主不愿将照顾小孩这件事假手他人。

本章将检视为什么台湾女性雇用家务移工,而这种雇佣关系又如何影响她们的家庭关系与性别认同?我试图探讨下列问题:女雇主如何划分与家务移工之间的界线,以维持自身在妇职上的“优越”阶级与族群地位?她们如何重新界定家务劳动的意义、区分不同类型的家务劳动,以社会文化认可为“适当”的方式来安排她们与替身之间的分工?她们如何避免因为另一个女人在家庭中的类似角色,而导致误认、混淆,乃至于威胁、取代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

“划界工作”牵涉到的不只是女佣与女雇主之间两个女人的关系,还包括经由女主人的丈夫、孩子,与婆婆为中介的三组三角关系。家务移工的涉入导致了既有家庭关系的变化、断裂、重组,且让我们从中检视台湾的婚姻、母职与孝道的社会机制与文化价值的意义与运作。

## 跟父权讨价还价

台湾女雇主为何雇用家务移工?本节探讨她们在雇用的决策过程中衡量折中哪些不同的考量。我归纳出主要的三类目的:寻找在家的托儿照顾、协助“家(里的)事”的全天候帮手,以及外包服侍公婆的孝媳责任。这些中产阶级女性雇用女性移工来外包家务劳动时,不仅希望购买到顺从的劳动力、廉价便利的服务,也在寻求她们身为母亲、妻子和媳妇等女性角色与责任的代理人。换句话说,她们希望通过家务外包,来“跟父权讨价还价”(Kandiyoti 1991)。



### 寻找随侍听话的保姆

阿苏是个三十多岁的广告公司行销研究员，她与同为广告人的先生，育有一个两岁大的女儿。阿苏像多数与她同龄的台湾女人一样，婚后选择继续工作，一方面是为了追求她个人的职业生涯，另一方面是需要两份薪水才能够支付台北市的高额房贷。阿苏怀孕之后，就开始考量未来孩子的照顾安排，交给长辈带的方式对他们来说并不可能，因为先生的父母不住在台北，阿苏的父母身体也不好。几番考虑下，她决定要雇用一名外籍保姆。由于近年来劳委会对于家庭帮佣的配额严格管制，许多雇主跟阿苏一样，是借用父母的名义，以监护工的资格提出申请，但实际担任的工作为家务与照顾小孩。

尽管外籍保姆提供了便利，但她对于这样的安排仍然有着安全上的顾虑。阿苏告诉我：“我听过有人请菲佣，跟他们住三年了，后来出国玩把小孩子交给菲佣，回来以后两个人都不见了，小孩子找也找不到喔。”她吸了口气，皱着眉头说：“所以我有时候就会想，会不会哪天我回家小孩子就不见了。”

阿苏也想过要请一个“自己人”来照顾小孩，但当她拜访过几个本地的保姆之后，她觉得，请一个外籍帮佣全天候住在家里，即使有心理上的担虑，仍是一个最为方便的安排：“我会紧张啊，可是又能怎么样，因为我不想去找本地奶妈，早晚要接送，我们上下班生活不固定，没有办法……我们双薪家庭送小孩来本来就是很无奈，怎么能配合这样的规定，太不 flexible，而且我觉得，小孩不是一个商品，你盯得那么死，好像也没什么爱心。”

许多台湾的双薪家庭，如同阿苏和她先生，雇用女性移工替代自己来照顾小孩。然而，由婆婆等长辈分担孩童照顾的方式，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加以及代间关系的变化而逐渐降低了普遍性。根据

官方统计的历年资料,学龄前的儿童,在家由母亲或其他家人照顾的比例明显的下降,而经由非家人的个人以及机构来安排托儿育婴的比例则持续升高。<sup>1</sup>

对雇主而言,能够提供在家服务是外籍照顾者的主要优点。双薪父母不必每天要在约定的时间去只提供日间照顾的本地保姆家或托儿所接送孩子,如同前引阿苏的说法,这样的僵化时间表,父母不仅觉得不方便,而且认为这不是一种“爱”小孩的表现。相反地,在家的托育照顾被认为能提供孩子比较舒适、安全而体贴的照顾。与其把孩子放在一个机构或别人家里,母亲们也觉得自己家被照顾,她们比较能够掌握状况,同时,在家的照顾服务,较为接近传统的母职形式,因而被认为是职业妇女较好的替代者。

此外,对雇主来说,家务移工比台湾保姆“听话”,也易于控制。美莉是一个三十六岁的经理人,她向我说明了为什么要请一个菲佣来代替先前的本地照顾者:“那个保姆主观性太强,她就是不接受父母的任何 command,她觉得她才是专业的。”本地的保姆,多半是具养育自身孩子经验的中年妇女,因此建立了基于经验与长者身份而来的权威。年轻的雇主基于华人顺从长辈的传统,常常觉得很难去挑战保姆的意见。现年三十三岁,个性腼腆、从事研究工作的雯真,向我解释为什么移工比本地保姆更符合她的需要:“本地保姆很多把我当孩子一样地跟我说话,我很难对她们提出要求,而且,她们也不会听你的,她们有很多自己的意见。”

也有不少台湾雇主雇用移工以争取相对于父系延伸家庭的自主空间。传统上,台湾婆婆在她儿子的育儿过程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她监督她的媳妇,而且在媳妇没把工作做好时,干预媳妇的工作(Wolf 1970)。在当今的台湾社会,如果媳妇在外工作,由婆婆来照顾孙子是件很普遍的事,这种安排尤其常见于三代同堂或婆婆住

得不远的情况。

珊琳和她先生两人都是三十多岁的专业白领，在美国取得商学硕士后，在台北的市场调查顾问公司上班。珊琳坐完月子回到职场后，一开始由她的婆婆照顾新生儿，夫妻两人每天早上把孩子送去父母的家，并在下班后把孩子接回来。虽然婆婆没有主动开口，他们仍每个月支付1.5万元给婆婆。这样的安排，虽然使珊琳不必担心把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却强化了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

她带那时候我们每天都有争执。

什么样的争执？

也不是争执，她就是不高兴，脸色很难看，我们去要抱小孩走也不是，要留下来也不是，要走她会说：你们抱了小孩就走喔；要留下来她说：“我那么辛苦，又带小孩又煮饭给你吃！”她对儿子不会这样啦，对媳妇就会。

珊琳婆婆的怨怼不只是因为照顾新生儿的疲累，也出自于一种剥夺感。她觉得自己牺牲了舒适的退休生活，来维持她儿子的家庭，而这本来应该是她媳妇的责任。后来，珊琳请了一名外籍帮佣来照顾女儿，她决定花钱来避免这种情绪上的纠结，与婆婆的紧张关系。

访谈对象中也有其他年轻的母亲聘请移工，是为了保有他们身为父母的自主权以及避免和长辈之间的冲突。例如，安安，一个三十出头的证券营业员，分住的婆婆本来主动提出要帮忙带小孩（婆婆说：“自己做就好了，干吗花钱。”），安安还是决定把两岁的女儿交给外籍监护工而不是她婆婆：

虽然说三代同堂其乐融融，可是会有很多意见冲突的地方，那菲佣我们可以控制，可是你总不能控制父母亲吧，到时候

照顾小孩上有不同的意见,你还是要听老人家的,那就没有自己的空间。

当这些家庭选择雇用移工来照顾小孩时,他们的主要考量在于劳动力的服从与可控制性。本地保姆透过年资或证照来建立其专业的宣称,在高品质保姆供不应求的市场中可以透过自由流动来平衡与雇主的权力关系;而婆婆的权威更是在传统的文化价值与亲族网络约制下,不容媳妇轻易挑战,相对而言,外籍劳工在台湾地区政府制度规约下的不自由与弱势位置(见第一章),给予雇主充分的支配空间,并以低廉的薪资提供全天候的居家服务,让移工成为较为接近居家母职的代理人。

### 家事/家里的事

借由聘请家务移工,女性雇主不只解决了孩童照顾的棘手问题,也缓和了她们家事工作上的负担。美国的社会学研究发现,中产双薪家庭为了实践婚姻中的平等伴侣关系,往往必须请人来打扫或做家事,而这样的工作者多半是低薪的少数族裔或移民,透过这样的折中方式,女主人方能够回避当她们要求丈夫更平等地参与家务时,所引发的紧张与冲突。<sup>2</sup>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很多台湾的中产阶级双薪家庭里。

余先生是一个四十岁的经理阶级,他太太是个秘书,两人育有两个上小学的小孩。他认为,家务雇佣对他们家庭的秩序与夫妻关系的和谐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余先生谈到他们在等待新移工到来的那两个月空窗期:“女佣走了之后,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紧张与混乱。那对我们来说真是一段痛苦的日子。我和妻子常因要如何分配家务,像是今天谁要接送小孩等而起争执。”他笑着下结论:“这

就是为什么我跟朋友说,用菲佣会上瘾。”

一些多来自都会区的年轻、中产阶级、双薪家庭的台湾男性,虽然认同家务工作应由夫妻双方共同分担,<sup>3</sup>然而他们仍苦于工作之余要负荷家事。移工劳动力对他们来说,提供了一个方便、经济的方式来外包“新好男人”的责任。

前面提到的珊琳,跟先生都是拥有硕士学位的财务顾问,两人发挥商学院的管理精神,明确协议家务由双方共同分担,太太煮饭、先生洗碗洗衣服。珊琳首先提议聘雇一名菲佣来照顾小孩兼家务,先生原本不赞成,因为“觉得家里有一个人怪怪的,没办法在家穿内裤”,珊琳耸耸肩说:“好啊,那你自己要辛苦我也没办法。”后来有一天,珊琳催促先生去阳台晾衣服,他不情愿地走出去,稍后抱着洗衣篮进来,幽幽地说:“这种日子我不要再过了!我们雇个菲佣吧。”

我访谈的七名主妇型雇主中,其中有五位家境阔绰,她们丈夫的职业多是企业主、律师或医生。对主妇型的雇主来说,请一个外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家务工作。她们的家多半坪数宽敞,对于环境清洁也有较一般为高的要求,因此,家里的清洁工作在家庭是比较繁重的。这些女主人希望透过家务移工的聘雇,让她们能够专心照顾孩子(比较“精神”层次的家务劳动),或是去参加慈善团体或社区活动。

五十多岁的刘太太是位有四个孩子的母亲,她从台湾一间顶尖大学毕业、取得商学位后随即结婚,在她的律师丈夫禀持“养家是男性责任”的传统观念下,她从未从事过任何一份有薪工作。刘太太雇用家庭帮佣已有超过二十五年的历史了,先是雇用本地的欧巴桑,后转雇用外籍女佣。她解释为什么要花钱雇用家庭帮佣的原因:



我不觉得一定要雇用别人来帮忙,但我先生喜欢家里有个女佣。他喜欢家里很干净的感觉……,但照顾小孩还是自己来比较好。我雇用女佣只是要她们来做家事。这对家庭主妇很重要啊,这样她们才不会被家事绑住,也才有足够的时间做家外面的事。

三十多岁的心怡是另一个例子,她拥有大学学历,先生是公立医院的医师。在生完第一个小孩之后,她辞去了营养师的工作,专职在家带小孩。虽然她相信全职母亲是对孩子较好的安排,但她逐渐被繁琐的家务和千篇一律的生活弄得精疲力竭。当她怀了第二个孩子时,她开始请菲佣,随着家里有了帮手,她开始享受一些属于自己的光阴,重拾她大学时对手工艺及绘画的兴趣。我们坐在她家的客厅,墙上挂满了心怡最近完成的版画作品,她谈到自己如何估量家务雇用的成本与效益:“有些人会觉得我很奢侈,其实我们是勒着裤袋在请菲佣的。可是我觉得满值得的,因为我可以有多一点自己的时间来运用,这样比较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小孩(笑)。”

在仅依靠她丈夫身为公立医院内科医师的薪水下,心怡的家庭薪资在支付房贷以及两个小孩的养育费用(包括中产阶级小孩必上的昂贵双语幼稚园)后,并未剩下太多余裕。雇用一個家庭帮佣固然帮她减轻了家事的负担,却增加了财务压力以及社会苛责。从婆婆以及其他人的反应中,心怡感受到别人经常对她投以批评的眼光,一个对家庭收入没有贡献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去请一个人在家里帮忙似乎是缺乏正当性的。她告诉我:“我的婆婆一直觉得我没有工作还请菲佣‘怪怪的’,她的形容词是这样,我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她叹了一口气后继续说:“她就觉得我只是懒惰,我不应该去请个女佣。”

访谈之际,心怡也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开始去找个有薪工作。事实上,很多女人的就业状况是浮动的,她们经常从全职的家务工作转换成兼职或全职工作,或是相反方向的移动,“在这样的有酬与无酬的工作轨道上,她们尝试在家庭经济、孩童照顾和个人福祉之间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

茉莉,一个四十岁的旅行社业务员,回忆她如何考虑在家庭主妇与有薪工作者这两种角色中做选择:

当初我本来跟我先生说我不要做了,因为我的收入不稳定,那这样算来不划算,所以我就说佣人不要请了。我先生就反对,他说我个性外向,每天在家里待不住,而且他要求的比较高,他没有办法要求我,可是他可以要求佣人。所以他宁愿花钱,他说这是“换工”,我的薪水等于是拿来付她的薪水,可是这样我不会跟社会脱节。

心怡或茉莉对全职家庭主妇生活的感受,和 Ann Oakley(1974)三十年前对于英国家庭主妇的描绘没有太大的差别:千篇一律、无聊、孤立、疏离。相对于无酬的家务劳动,有薪的办公室工作被认为是没那么无聊、较有组织并有报酬收益。不只一位受访的家务移工雇主作出类似的观察:“坐在办公室里一整天,很轻松啊;家务事和照顾小孩累多了。”“照顾小孩很痛苦;上班是我逃避的方法。”对心怡这样的家庭主妇,或是茉莉这样“换工”的上班族,聘请家务移工帮助她们逃脱了家务全天候的桎梏。

家事,或者,家里的事,对于家庭经营的店铺或企业的老板,即所谓的“头家娘”,有着不同的定义范围。台湾的传统店家或小型家庭企业,工作时间经常长达十二个小时,他们的店家和住家在地理上多是重叠或是相近的。我访谈的鞋店、电器行、安亲班的

经营者,她们的店或公司,通常与她们的住家位于同一栋楼或是同一条巷子。如此一来,她们可以看着小孩在店里做功课,或是在中午时间回家用餐或休息,可以较方便地整合家庭生活和工作。这样的头家娘,通常对请人来帮忙有迫切的需要,而她们需要的“家事”协助,也通常是涵括生产以及再生产性的工作,凡是“家里的事”通通得做。

淑文是一个四十岁、三个孩子的妈,她的丈夫管理一家保全中介公司,她自己则独立经营一家小小的电气行。当我打电话跟她预约访问时,她亲切地说:“你就来我店里找我啊,反正我都在,我们每天从早上十点开到晚上九点。”坐落在台北县夜市里的这家电器行只有一个小小的店面,附有一个小小的厕所,后面则坐落了一间塞满存货的仓库。淑文在怀了第三个孩子时,申请了一个菲佣;她头两个孩子都是请本地的保姆带,可是她没想到申请的过程比她预期的长得多,等到菲佣到台湾的时候,孩子已经三个月大了。

淑文形容菲佣还没来、但孩子已经诞生的这三个月的情形:“好像是梦魇一样,现在想起来会怕,会颤抖,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那时候还因为太操劳急性盲肠炎住院,”她指着我们身旁的一个小桌子,“那时候也是每天来店里,娃娃抱着就睡在这个桌子上。”

在头家娘每天的行程中,工作和家庭是没有空间与时间的界线的,她们在安排家务移工的工作时,也同样是公私不分,虽然这样做是不合法的。通常她们白天在店里帮忙、打扫环境、准备中餐或提供其他服务,到了晚上,他们在家里仍然持续工作,尤其当母亲忙于生意无暇照顾孩子的时候。她们通常不会得到额外的报酬,最多是领到小额加薪或是礼物。固然,公私不分的劳动形态是头家娘雇主自己的生活状态,也是她们迫切需要的帮助,然而,这明显违反了法令的规定,也造成了对移工的进一步剥削。

## 外包孝道

张太太是个快六十岁的退休中学老师，她和同是老师的先生，在台北有一栋普通的三房公寓。张先生的母亲在她丈夫过世之后，从外地搬来和他同住，张先生和张太太后来租下了对面的公寓给母亲，这样的居住空间，一方面能实践三代同堂的传统居住模式，同时能够容许她们的两个成年女儿以及他们自己足够的房间和隐私。

在汉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中，家庭成员、财产继承，以及权威分配都是根据父传子的亲族轴线。女儿在嫁入以她丈夫的父亲为首的家庭后，被原生家庭视为“泼出去的水”。媳妇在夫家的地位与福祉，很大程度取决于她是否生了儿子来传承嗣氏。如同大家耳熟能详的谚语：“养儿防老”，最长的已婚儿子有义务与他年迈的父母同住并照顾他们；把父母送到养老院被污名化为子孙不孝、不负责任的行为。当今的台湾社会中，父母自己住的比例已逐渐提高，但孝道的意识形态仍然影响深远（参见第一章第48页的统计数据）。

然而，在年迈双亲与儿子同居的大家庭中，实际的照顾工作，大部分是由媳妇在从事。以张家为例，张先生为母亲提供的照顾，主要是经济上的安全，他的妻子才是实际孝亲劳动的执行者。两年前，张太太说服她丈夫请一个菲佣来照顾他日趋虚弱的八十岁母亲，然后，张太太便将她过去的任务，如准备餐点、洗澡、换尿布、陪伴及个人照顾交给菲佣。在访谈中，张太太反复再三地表达她对于孝道规范以及传统媳妇角色的质疑，即使我没有主动提出相关的问题，她也深深担心我（以及别人）会指责她雇用一个人来照顾婆婆缺乏道德上的正当性：

你不要觉得我好像很不孝顺，过去一二十年都是我在照

顾,那现在请个菲佣才多少钱对不对?你想想看,从四十几岁,你就要媳妇来处理你的事情,到最后八十岁,还要媳妇来服侍你,这样对女人怎么公平?我们服侍婆婆四十年,还是不能出头天[笑],台湾就是这样,孝变成一个大帽子扣在你头上,说这样才有家庭的、人伦的温暖,怎样才能当个好媳妇,可是你要当好媳妇就没有自己了!家变成一个枷锁,绑着你。年轻的时候带小孩很辛苦,老了以后还要带老人,你说女人有没有自己的日子?我现在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还要跟你这样磨下去,我还有几年可以活?

张太太指出了从属于家庭权威的传统女性角色(“作个好媳妇”、“服侍婆婆”)与追求个人自主及成就自我(“作自己”)的冲突。刘仲冬(1998: 148)提到中国社会中照护行为的传统观念,是下对上的服侍病人(serving)与上对下的照料病人(supervising),而没有西方社会中较为平等的照顾(caring)观念。中国家庭的典型照顾者形象,是居于从属位置的女性家庭成员,像是服侍丈夫的妻子,以及侍奉公婆的媳妇。媳妇之所以担任主要的照顾者与“贤妻良母”的女性气质规范有密切的关连,未能克尽妇职将导致坏女人与不孝的社会污名。

为了逃避服侍婆婆的全职责任,从学校退休后,张太太找了一个编教科书的兼差工作。她自我解嘲地说:“我七月一号退休,第二天就去上班,一天都不想待在家里,就是不要,那我赚的钱就刚好拿来付菲佣。”虽然张太太是从自己兼职工作的薪水中拿钱来请另一个女人作为她的孝道代理人,但请人这件事却同时遭到她婆婆和先生的反对:

她常常讲菲佣的坏话啊,就是希望不要请了,这样她可以



住到这边来。

你先生呢？当初也不赞成？

那当然啊，第一点要花钱，第二点这样好像不是一家人一样，他就不是标准的孝子，妈妈要跟着他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孝子……

婆婆认为一个非家庭成员的照顾者的介入，会破坏她和儿子家庭的连带。儿子则担心这样的雇佣会破坏家庭团结的形象以及他孝子的名声，这两种看法都呼应了在台湾社会根深蒂固的三代同堂的意识形态迷思（胡幼慧 1995）。然而，这样一种“快乐大家庭”的浪漫迷思，是靠媳妇的无酬家务劳动所勉力撑持的。张太太充满怨怼地谈到她和先生之间不平等的孝亲劳动分工：

他是传统的大男人[摇头]，什么奶爸、参加小孩恳亲会，那要到你们这一代的男人才会去做。所以呢，虽然你也跟他一起工作，可是照顾孩子是女人的事，孝顺婆婆是女人的事，所以我的心理很不平衡，我也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你要当孝子，应该是你去孝顺你妈妈，不是我来孝顺你妈妈，对不对？我的父母生我养我很辛苦，应该是我去孝顺我父母，你的妈妈是你们七个人的妈妈，不要丢在这里都不管，只要媳妇来照顾。

张太太购买市场上的劳动力来外包她服侍婆婆的媳妇责任。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外包的其实是先生的孝亲劳动，如同另一位女性受访者所言：“很多丈夫都说，现在的女人比从前幸运多了，因为她们有菲佣帮忙，可是，拜托，你的妻子照顾的是谁？她照顾的是你的妈妈耶！”

这里展现了一个我称之为“孝亲照顾的转包链”的社会机制，包

含相扣连的两个环节：第一环是把孝道责任从儿子转到媳妇身上的“性别转包”，第二环则是将实际照顾工作从媳妇的肩膀移转到非家庭成员的监护工（仍多为女性）的“市场转包”。

媳妇雇用移工来协商婆媳关系，除了直接地外包孝亲劳动，也有人借此避免代间冲突。有一些台湾丈夫，大部分属于比较年轻的世代，也同意分担一些家务，却遭到自己母亲的反对。当我问秀云，一个四十出头的房地产中介，她老公是否帮忙作家事，她的回答是：

还好，他会做，因为他有洁癖，有一次他看不得脏他就自己拖地，那次好像家里佣人休假还是干吗，他妈妈来我们家看到愣住了，想说儿子在我家里跷二郎腿什么都不做的，竟然在这里拖你的地板，我就赶快说你不要做了我来做。

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两代的女人对于婚姻观念的分野，而且展现了婆媳之间环绕着一个男人（儿子/丈夫）的潜在竞争关系：原生家庭和新组的小家庭，被区隔为这两个女人所分别统辖的不同领域（被婆婆标示为“我的家”相对于“你的地板”）。在婆婆的眼里，儿子协助媳妇的家务是一个他从属于妻子的指标，伴随而来的，则是他与母亲、延伸家庭之间连带的弱化。<sup>5</sup>

有些媳妇便采取雇用家务移工的方式，来避免和同住的婆婆在家务分工上产生冲突。例如艾美，三十多岁的上班族，婚后跟婆婆同住，女儿出生后开始聘雇外佣，除了照顾小孩的功能，她发现家务帮手的出现可以让她回避掉家事分工中所蕴含的多重地雷（植基于婆媳、夫妻等权力关系）：

我在想将来我女儿结婚，我也要帮她请一个菲佣，这样可以减少很多婆媳问题，真的，像煮饭打扫这种问题，你不可能让

婆婆做，可是自己一个人做又很不甘愿，她也不会让儿子来做对不对？

有些女性雇主更积极地运用家务移工的聘雇作为抗拒三代同居的策略。小莉，三十六岁，专科毕业，生儿子前从事的是全职的护士工作。儿子出生后，她婆婆自愿从南部搬到台北来当他们的居家保姆，但是小莉拒绝这个提议，坚持要找一个外籍监护工，小莉解释了后来的情形：

我婆婆很厉害，她说你公公说请菲佣不好，她不会说是自己觉得不好。我婆婆就是想跟她儿子住，后来我发现她也不是真的爱孙子，她是爱儿子！

那你先生是什么立场？

我先生当然是希望太太跟妈妈住在一起啊，他永远当小baby，回来也不用做事情。你知道我婆婆多恶心，每天八点半就睡觉，可是我先生十点多回来，她就跳起来热菜给他吃，还叫我：“小莉，你不要跟他聊天，他明天还要上班很辛苦。”这是我家耶！这都变成后来吵架的导火线。

小莉的婆婆有技巧地转了一个弯来表达她的不赞成，她编造公公（延伸家庭中的父亲权威）的反对意见来向媳妇施压。在另外一次访谈中，我听过一个更加戏剧性的故事，有一个独自住在乡下的婆婆，每次拜访她住在台北的儿子的家，就会把外佣的行李丢出去来表达她对雇用这个外人的反对，她认为如果没有菲佣，儿子夫妻就应该会邀请她同住，并请她照顾孙子。这些婆婆的剥夺感，并不是因为她们的孙子被外籍保姆“抢走”，而是因为雇佣关系切断了她们原本可以和儿子家庭同住的连带。在本章稍后，我会仔细讨论婆婆的焦虑以及媳妇的因应之道。

## 女主人为何吹毛求疵？

许多家务移工告诉我，和男雇主相比，她们的女主人，较为“吹毛求疵”、“严厉”。为什么女主人会如此吹毛求疵？当我对受访的台湾女主人提出这样的疑问时，她们许多人不讳言地表示，自己的确是家里主要的劳动管理者，对移工的工作表现有较多的要求，相较之下，先生则显得较不在乎或持不介入的态度。碧兰是个四十出头的职业母亲，她解释了为何对待移工的态度会出现性别差异：

他们不 care 啊，因为对他来说永远是有 help，本来也不是他在做，所以，对他来说没有差别。请人的时候我也是办好了才跟他说，他也不在意，因为事不关他嘛，帮的也是我的忙。进来一个人，他也无动于衷，也不会排斥，对人家也很礼遇。

就如碧兰指出的，女主人对家务移工的表现要求得比较高，是因为她们必须对移工所做的负起责任。有些台湾丈夫甚至认为雇用—一个外籍家务移工是他们送给妻子的一项“礼物”，一种借由外包妻子的第二班工作以表示丈夫“贴心”的表现。当我问心怡——前面提到的医生娘——她丈夫是否分担一些家事，她语带嘲讽地回答：“我老公？不做，完全不做，没请人的时候也是一样。他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我雇菲佣啊。有时我会抱怨，他就说那我雇菲佣来干吗，一个月花我两万块耶。”

虽然女性雇主现在被提升至“母亲—管理者”的地位，她们仍必须对于所雇用的家务劳工的表现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在“贤妻良母”的文化霸权意识形态支配下，女主人自己也常将家事与孩童照顾视为女性主要的社会责任。

丽云是个四十多岁的房地产经纪，穿着时髦、短发利落，她形容自己“是那种爱孩子爱疯了、母性很坚强的人”。因此，当她晚上因商业应酬无法在家陪小孩时，其坚强的母性便引发十足的罪恶感，于是，她决定雇用一名移工来分担照顾的工作。当我问丽云她的丈夫对于此雇用提议做何反应时，她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

他？反正是我付钱，OK，没问题。一直都是我在付薪水，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该做的事情，我要出去上班，这是我应该付的……真的，你不要看我这样，我其实是很保守的人，所以我就觉得不好意思，带孩子是我的事，我的 responsibility，我没办法兼顾，我就应该自己赚钱来养这女佣。

很多台湾女人自掏腰包付家务移工的薪资是因为她们觉得“这本来应该是我的工作”。这种“母亲的罪恶感”是一种内化的社会责难。许多雇主都隐约担心自己会被指控为“坏母亲”——因为她们把孩子留给被社会污名化为“不够卫生”和“不够文明的”的外籍劳工——而觉得有必要去为自己的雇用安排作辩护。前面提到的广告人阿苏回忆道：

我刚请菲佣的时候，人家都跟我讲一些坏菲佣的故事，什么小孩子被菲佣传染 AIDS，被菲佣从阳台丢下来之类的，后来，我听到更多本地奶妈不好的例子。我觉得人都有一种变态的心理，他们心里想请又不敢请，就会说唉哟，这样小孩会不会这样，家里有一个人会不会很怪，他们根本不了解，就是很肤浅不成熟，不是在关心你嘛。

女性雇主也可能从先生与父亲那里经历更直接的谴责与压力。在心怡的个案中，当他们雇用的第一个菲佣“逃跑”时，她丈夫责怪



心怡是个失败的“管理者”，连个菲佣都看不住。另一个雇主，玉梅，回娘家看父母的时候，常常会把小孩和菲佣一起带去。有时候她和她妈妈会在厨房里指导该名菲佣如何烹调，但很多时间，她们只是坐在客厅里聊天而让菲佣一个人在厨房里工作，她爸爸就会抱怨说：“她[菲佣]的菜怎么会煮得好呢？你们女人为什么不待在厨房？”

玉梅父亲的话点出了某些家庭空间（厨房）与家务劳动（煮饭），被定义为女人专属与负责的场域，不论你是女佣还是女雇主。虽然年轻一代的台湾女性，拥抱职业妇女的“现代”女性形象，她们仍然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父权“贤妻良母”的牌坊阴影。家务劳动的社会责任并没有从女人的肩膀上移开，不论她们是否真的实际从事日常的劳动工作。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已经看到了家务雇佣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家务移工的角色其实就是女主人的替身，但她们是“影子劳动者”（shadow laborers），对雇主家庭生活的贡献被隐而不见。<sup>6</sup>家务移工的“影子工作”是女性雇主完成母职与家务角色时密不可分的一部分。职业母亲雇用服从的外籍劳工来扮演居家母职的代理人，现代媳妇购买廉价的劳动力来担任婆婆的孝亲看护，家庭主妇差遣全天候的服务来维护一个清洁有秩序的家庭。由于家务劳动的社会意义对于女性之认同扮演着关键性的影响，从女性雇主的角度看来，家务劳工的雇用涉及的不只是单纯地购买劳动服务，她们对替身的要求不是固定工时与特定工作内容的规范所能涵盖，她们期待的是雇工能够成功地代理她们完成母亲、媳妇、太太的女性家庭责任。

雇用家务帮佣的女主人想要拥有一个有能力的替身，但也同时希望这个替身乖乖待在外围，不会侵犯到女主人的妻子与母亲地

位。下文中,我将探讨当另一个女人进入台湾雇主的家庭生活时产生怎样的影响。女雇主对于家务劳工可能影响到她们的婚姻与亲子关系而焦虑不已,因此试图借由阶序差异来确保妻子与女佣之间、母亲与保姆之间的阶层化界线。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感到焦虑的不只是年轻的母亲,还有她们的婆婆,她们曾经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孝顺的道德牌坊不再能够确保子孙与媳妇对她们的奉养,如今更因另一个女人的进驻而威胁到她们在家务领域中的主导角色。

## 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见人厌?

我曾经读到一篇台湾报纸家庭版的文章,其标题大言不惭地写着:“不做家事的女人人见人厌”,内容郑重地警告雇用外佣的台湾女性,不论你在职场上有多成功,也不应该放弃做家事,那是基本的“女人的工作”,否则先生小孩都会对你产生负面的看法。<sup>7</sup>面对社会对她们背离了传统家庭分工形态的指责,雇用菲佣的女性必须重新定义并协商家务的社会意义:她们尝试区辨有哪些部分的家务劳动是社会允许可转由市场中介的,而无损于她们作为“好太太”、“好妈妈”的形象。

女性雇主通常将例行的清理工作交给佣人,但将联系家庭成员情感的工作留给自己负责,最明显的就是三餐的准备烹调。先前的社会学研究已经指出,这项家务工作涉及的不只是买菜和烹煮,也包括“建构家庭”的情绪工作,奠基于对于家庭成员的口味偏好和营养需求的重视与了解(DeVault 1991)。烹煮食物也涉及对于料理的文化知识,而这对一个外籍移工来说,有其困难之处。这些因素都强化了“老婆/妈妈煮的饭”的社会象征意义(明显地体现在酱油等料理广告中),很多台湾女性雇主因而把准备丈夫和孩子的餐点,视

为她们表达对家人情感的机会。

有些女性雇主天天料理三餐,而有些雇主只有在丈夫或孩子要求时,才洗手做羹汤。先前提过的电气行老板淑文,描述了她如何在雇用菲佣之后,仍觉得应该或想要为她的丈夫准备餐点:

昨天我忙得要死,回家去他[先生]跟我说:我肚子饿了,你没有买吃的回来喔?我说煮水饺好不好,[他说]好!煮三十个!我虽然很累了可是我还是去煮水饺给他吃。

不是你们家菲佣煮?

平常都是她在弄,可是她那时候正在做别的事,我也不想要她停下来帮我煮三十个水饺,而且,平常我都不弄东西给我先生吃,昨天他这样讲,我就想好,我去弄给他吃。

有些女性雇主,即使丈夫没有要求,她们也主动去为先生准备“爱的餐点”,因为担心自己在家庭中的位置可能会被家务移工所取代。一位菲籍家务移工唱做俱佳跟我说了她的女雇主争着和她准备早点的精彩故事:

几天前有个早上,男老板醒来了,我问他:“Sir, would you like some coffee? (先生,你要喝咖啡吗?)”[甜美有礼貌的语气],他说,OK[模仿老板对镜梳头,一眼都没有看她、冷淡的回答着],然后呢我就煮咖啡、切了一片蛋糕,老板娘就跟我到厨房来,很凶的说:“Don't make coffee for my husband! Let him do it himself. (不要替我先生泡咖啡,让他自己弄!)”我说:“OK, Ma'am. (好的,太太。)”第二天早上,我说:“Sir, good morning. (先生早。)”然后我走到厨房去,假装没事的样子,先生又来了[模仿他梳头发,没有正眼看她]:“Lucy, make coffee for me! (Lucy,帮我泡咖啡!)”老板娘听到了,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她

的头发还是乱七八糟，她的眼睛还是肿肿的，可是你知道吗，她立刻冲进厨房，煮咖啡、切蛋糕、放在桌子上！

在缺乏安全感的驱使下，这些女性雇主不知不觉地将她们与家务工作者的关系转变成为一场在烹调技巧、美貌和其他“好太太”必备条件上的竞争，而丈夫则成为这场竞赛里的裁判（不论他们是否认知到或实际参与这样的角色）。我认识的许多年轻菲籍移工，都感受到女性雇主对她们的敌意与隐约的竞争态度。下面是其中的两个例子：

我的老板娘不喜欢我化妆，有一次我们全家出门，她看见我涂了一点口红，我们已经坐在车子里头了喔，可是你知道吗？她居然跑进房子里去擦口红！

太太总是跟我说她先生不喜欢吃我煮的菜，我煮的东西不好吃……可是先生会到厨房来跟我说他很喜欢，她是在嫉妒。

为什么？

她觉得 insecure 吧，我猜。

“妻子的嫉妒”在家务移工的闲谈之间，是常常听到的八卦情节，同乡朋友们也经常断定有些移工被中途解雇遣返，是肇因于女性雇主的忌妒。二十多岁、五官肤色接近华人的 Maya 告诉我，男主人曾因对她友善而引发了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

有一次先生问我我生日是哪一天，然后他说，喔，那是下个礼拜，我们应该庆祝一下。太太就说，我会买蛋糕。可是下礼拜的时候先生买了蛋糕，太太就很生气，说：“你干吗去买这个？我说过我会买啊。”然后他们就大吵一架，害我连蛋糕都没有吃到[笑]。又有一次，太太出国出差，先生、小孩还有我去野餐，等到太太回来的时候发现了这件事，她好生气，所以我就不再

跟先生说话了,我只有在太太不在家的时候才跟他说话。

在我的访谈中,有许多菲籍移工会常跟我提到“善妒的老板娘”的故事,但会主动提到此个人问题的雇主少之又少,而且她们大多数人都用假设的语气来谈论这个可能情形,或是以其他家庭的经验为例。比方说,先生是企业总裁、年纪约四十多岁的家庭主妇张太太,引用别人的经验跟我说明雇用家庭帮佣如何造成了婚姻的潜在威胁:

住在家里的女佣最大的问题就是她和家里其他男人之间的关系。你对这个要很小心,就很像引狼入室一样,会威胁到你的婚姻,不管你找的是本地的还是外国来的女佣,都一样。丈夫把查某嫫“‘捡’起来做某”[闽南语]一大堆。我同学请的那个[台湾]保姆就很势奶……阿公抱小孩的时候,她就跟着抱过去,因为身体很丰满嘛……后来就跟他爸爸偷来暗去,结果竟然要把财产过继给她,他父亲就是日本式的那种大男人,后来还说,我印象很深喔,你们女人书读那么高,女人最基本的,要按怎么妆扮,怎么取悦男人都不知道,怎么生存。

“丈夫把女佣捡起来做妾”的这种描述,指出了被两极化的女性特质:受过高等教育的妻子是贞洁而去性(desexualized)的,截然不同于懂得“妆扮”以及“取悦男人”的风骚女佣。“风骚女佣”的形象更容易被连结到来自东南亚的外籍移工。四十多岁的护士何宜,跟我提到另一个故事:

我有一个远房亲戚,他先生曾经有个外遇。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这个女主人为什么不请个菲佣,因为我觉得菲佣对她来讲真的很方便,因为她有请欧巴桑,然后小孩又放在保姆家,然后两个又常常会出国嘛对不对,因为实际上她请个菲佣真的



很好,可是呢她就是不要,后来我是听我一个亲戚讲说,她是怕男主人跟她的菲佣这样子啦,那我先生就说,那也实在是眼光太低了吧,水平不够高……

“我的眼光没那么低”是许多台湾丈夫用来安慰妻子、降低她们对外佣的担虑的表达方式。一方面,外籍女佣被认为是“不够文明化”以及“落后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社会条件与文化资本和台湾妻子竞争。但另一方面,这些“热带女人”的种族化形象又在女主人的脑海中徘徊不去:她们丰满的身躯会让男主人抵挡不了诱惑,而且具有主动诱惑男人的天性。和其他国籍的家务移工相比,菲律宾女佣尤其容易被贴上与性有关的标签,因为西方社会常基于该国的性产业与“邮购新娘”的印象,而将她们污名化为因为爱钱而不惜牺牲道德的女人,会以性来交换金钱或移民的机会。<sup>8</sup>

台湾媒体也不时渲染臆测女性移工在台湾卖淫或性生活开放混乱的传说(见第二章)。报章杂志上不时出现耸动的标题,像是《外佣毁了我的家》<sup>9</sup>来报导先生与外佣外遇的故事,更强化了台湾妻子的焦虑。宛如是一个快四十岁的公务员,先生经营一家便利商店,他们雇用一名菲籍移工帮忙带小孩,偶尔去店里帮忙。宛如用迂回的方式提到了她对于菲佣与丈夫之间关系的焦虑:

你会不会担心先生跟菲佣会怎么样?

会啊会啊,其实那都是多余的啦,但是女孩子心很小,都会想到那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因为报导看太多,有一阵子真的好可怕喔……

真的喔?都怎么样的报导?

通常啊,就是女主人不在家啊,那就剩男主人跟菲佣两个人在家啊,所以就发生什么有的没有的事情啊,对啊,然后或是

男主人对菲佣做了什么不好的动作啊,就有这种事情发生,以前啦,以前有一阵子啦……

那你那时候担心,要怎么办?

没有,其实也没有特别,只是说我们尽量不要让他们两个待在家里,不要说小孩也不在,就先生跟菲佣两个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其实这种机会也很少啦,只是偶尔晚上带个小孩出去逛街还怎么样,她不去,那先生也不跟你去的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这两个……

那时候你怎么办?你会跟你先生明讲喔…

不会啊,不会,最后他还是没去,那我偶尔会打个电话回来问问看有什么事情[笑],对啊对啊,防人之心也不可无啊……

在访谈中,宛如重复着像是“那些有的没有的事”和“只是以前、有一阵子”的句子,来淡化她的担忧以避免听起来像个对自己没信心、跟女佣计较的“愚妇”。然而,她的语调与后来的说明都呈现出她对此事的具体担心,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男主人也常与家务移工保持距离,尤其是女主人在场的时候。许多受访者解释,身为“大男人”的他们若主动与女佣谈话会觉得很难尴尬,除了害怕妻子误解外,他们认为家务乃女人之事,不足以挂齿,也是原因之一。

女性移工也常自发性地减少与男主人的接触,以缓和女主人的焦虑或避免被性骚扰。标示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地位差异,是家务移工表演顺从的一部分。在工作时,她们会避免清凉暴露的穿着,并用宽松的衣服让身体“去性化”、失去曲线,以让自己不同于“一家之母”。她们也会避免与男主人目光交会,甚至不与其微笑或谈话。此外,她们也会技巧性地赞美女主人的外貌与时尚品味。

另一组类似的三角关系发生在女性雇主、家务移工与雇主小孩之间。男性雇主可以主动减少和女性移工的接触,但是孩子无可避免地会和外籍保姆之间发展出情感上的连带,因为后者本来就是扮演着代理母亲的角色,因而,女性雇主面临更强的焦虑,并采取更积极的方式来维持母亲与保姆之间的界线。

## 阶层化的母职劳动

照顾小孩不只是一种体力劳动,也是一种“爱的劳动”。雇主除了希望家务移工可以看顾孩子、帮忙沐浴、喂食、托育等,也期望她们能将爱、感情与承诺投注在孩子身上。有些台湾女雇主会跟我抱怨外籍女佣提供的孩童照顾质量不佳。美莉如此描述她的菲籍女佣:“她照顾小孩的方式就是喂她、看着她、哄她睡觉……真的就只是满足一些基本需求而已。不像我们,我们会希望孩子能够成长、我们会想跟她玩、我们会想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并不享受或了解这个过程,她不会付出太多,你知道的,爱。”

美莉不满她的菲籍女佣提供给孩子的爱太少,但若她的女佣投注了过多的爱,那么,美莉将可能陷入嫉妒、被剥夺等的情绪中。母亲雇主面对一种情绪上的两难困境:她们希望保姆爱她们的小孩,这样才能减轻她们把孩子留给其他人因而遭受未克尽母职等批评时的焦虑;然而,如果孩子和保姆发展出深刻的情感连带,甚至将保姆误认为母亲,她们又会因此忧心忡忡。

在日常的生活实作中,母亲雇主的解决之道是发展出阶层化的母职劳动分工。换言之,她们如何能让保姆成为母职的伙伴(partners),但确保她们的角色只限于母职中的一部分,而无取代母亲之虞?

全职且家境富裕的家庭主妇较能轻易化解这样的担忧与母职分工的问题,因为她们有充裕时间可以陪伴小孩,雇用移工的目的本来就只是为了把家中的杂务转包出去,以让她们专心陪伴照顾小孩。在这样的分工下,女雇主可以将家务移工的角色界定为“佣人”,而保有她自己不同于女佣的“母亲”地位。这种地位区辨对家中其他人而言也是必要的。一位在有钱人家当女佣的菲律宾家务移工告诉我:“我的女主人对我说,有次我在陪小孩玩时,她的婆婆跑去告诉她:‘为什么要让 Theresa 和你的孩子那么亲近?她只是个女佣,我绝不会让我的女佣靠近我的小孩。’”

和家庭主妇不同,职业妇女雇用家务移工的主要目的便是照顾小孩,上述家务/托儿的分工方式势不可行。于是,有些母亲借由区辨母职工作中的“卑微”与“精神”面向,来进行育儿的分工,借由创造出阶层化的象征秩序,来突显家中母亲的重要以及保姆的次要性,同时无损她们身为女主人的规范或家的社会意义。<sup>10</sup>

“精神层面的母职”是那些母亲认为可用来确认自身地位,以及强化与孩子间的情感连带的家务工作。<sup>11</sup>换尿布,整理小孩混乱的玩具房等与肮脏及失序画上等号的工作,时常是母亲避之唯恐不及因而会指派给女佣的任务。教育及帮助孩子社会化的家务工作,像是念故事书给孩子听、帮忙孩子做学校功课等,则多属母亲的责任,很少被指派给家务移工,因为人们认为她们的文化“不适合”或“不够格”完成这些工作。

帮小孩洗澡,以及和孩子们同睡,是另外两项我访问的台湾妈妈经常保留给自己的母职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涉及与孩子的亲密身体接触,被认为是建立亲子连带的重要情境。对家中有学龄期儿童的父母来说,接送小孩上下学也是一种可以彰显其情感价值与象征意义的日常仪式。昭如是一位近四十岁的律师,虽然工作繁重,但

她仍坚持每天下午亲自接送两位小孩放学。她宁愿将工作带回家，也不愿牺牲与孩子共处的珍贵时光：

我每天接送她们放学。就我的观点来看，这只要花二十分钟，但小孩子的感受会完全不同。对啊，二十分钟，回到家后，我就让女佣照顾她们……之前是由一位菲律宾女佣接送，但有次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你只来接过我两次。”我就想，哇，我必须亲自接送，我必须找时间陪伴她们。

母亲与保姆之间在母职劳动的阶层化分工方式，除了工作内容上的分工，还可能是母职风格上的区隔。人类学家 Margery Wolf (1972) 如此描述她在 60 年代的台湾观察到的亲职风格：父母相信他们若像是子女的朋友，他们便不能“教”孩子，因此，父母，尤其是父亲，在孩子稍微长大后，就在身体上和情绪上都和孩子维持较疏远的态度，主要的育儿原则是“管教”，因为台湾的父母相信，让子女养成父母所期待的行为的唯一方式，就是严厉地惩罚不符父母期望的行为。

然而，台湾新一代的年轻父母逐渐发展出与他们的成长方式截然不同的亲职风格。在台湾生育率日渐下降的影响下，一个家庭的平均小孩数目只有一两个，少数的孩子，成为父母与祖父母的掌上宝。<sup>12</sup>台湾家庭平均收入的上升，也允许当代的中产阶级父母有能力为他们的孩子购买昂贵的玩具、国外旅游，以及各式各样的教育课程。此外，体罚小孩已经变成法律禁止，也是社会不完全赞同的教养方式。新手父母不只从他们的双亲身上，也经由儿童专家所写成的育儿手册中来寻找指引，而这些书有许多是由英语世界翻译引进的。

当代台湾的亲职风格，正逐渐朝向美国社会学者 Sharon Hays



(1996)所谓“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的概念,认为孩子的养育该是以孩子为中心、专家导引、高度情感贯注、密集劳务投入,以及花费大笔支出。同时,亲职的传统概念,也就是强调纪律与管教的原则,也仍然影响着当代台湾父母育儿的风格方式。

犹如我在第二章提及的,大部分的台湾雇主都较偏好菲籍而非印尼女佣来照顾他们的小孩。菲籍女佣除了教育程度高之外,她们也常被许多台湾雇主形容在照顾小孩时是“很有爱心”并“充满感情”的。这种形象背后蕴含着一种强调本质性差异的种族化论述——把菲律宾女人视为“天生倾向”或“文化上适合”于照顾劳务工作。相对于用爱心陪伴小孩的保姆,台湾雇主成了“道德化的母亲”,她们是负责对孩子施与道德教育的权威角色。同样的,这样的分工蕴含了一种种族化与他者化的刻板印象,外籍保姆被认为不够文明,无法有效地培养台湾孩童的道德发展。

有一位受访的台湾母亲如此描述了她家里的阶层化的母职分工:“小孩知道他们可以去找 ya - ya(菲律宾人称保姆的方式),妈妈是比较严格的,会训人打人的。”对有些台湾母亲来说,这样的分工并不会挑战她们作为母亲的地位,反而有助于将母职中建立身体或情绪亲密性的工作移转给保姆,他们因此可以维持疏离的形象,以有效地执行对孩子的管教。芳萍就是这样的例子,四十岁的她有两个上小学与国中的孩子,也是一家鞋店的老板:

我妹妹就常常开我玩笑说,我看你们出去,她比你更像妈妈,小孩抱她比抱你还亲。我说没关系,我最怕小孩来抱我,连牵手我都不要,我才不会不平衡,小孩不要黏着妈妈比较好,这样他们会比较有家教。

当孩子比较偏爱“爱心陪伴的保姆”胜于“道德管教的母亲”

时,有些台湾母亲开始感到忧心,就像一位雇主描述的:“菲佣什么都顺着她(女儿),所以小孩被她宠坏了,反而觉得我们对她不好。”为了确立她们身为母亲的象征性地位,有些台湾雇主觉得有必要向她们的孩子用口语或肢体的方式表现出多于保姆所提供的感情。虽然宛如在忙碌的工作中没有太多时间陪伴自己的两个小孩,她试图用明显的方式对孩子表达出具体的爱,并且希望从孩子身上得到清楚的响应,以安慰自己的孩子仍然爱她胜于菲佣:

因为我本身真的很忙,然后我有时候,我在跟小孩子讲话的时候我有跟他们讲,我很爱你们,我真的很爱你怎样怎样跟他们讲,让他们也能感受我对他们的爱,那他们也会讲说他们爱我,可是有时候当我不在家的時候,我那个老大都会跟我讲,妈妈,妹妹都说她比较爱 Fila,她都会说她比较爱菲佣。

老大说老二讲的?

对,他说,你不在的时候妹妹都这么讲,然后他都说,妹妹跟你讲的是骗你的,妹妹都不爱你,她只爱 Fila……

那你听到心里是什么感觉啊?

当然是心里有点不太舒坦啊,因为她怎么会爱 Fila,而且我不太相信这个事,我就再回去问我们那个妹妹,可是妹妹她喔她真的是很鬼精灵,你问她的时候她死不承认说她爱她,然后我就故意当着菲佣面前讲,你比较爱谁……然后妹妹就说哎唷,都爱啦,都爱。

在有些家庭中,“严厉的母亲”与“关爱的保姆”之间的母职劳动分工可能会产生翻转。有些女雇主偏好当一个温暖、充满爱的母亲,因此把严厉、纪律分明的角色分派给家务移工扮演。以下两位女性雇主便将“爱心的母亲”角色留给自己,但要女佣对小孩扮

黑脸：

我太宠我家小孩了，没办法对他们太严厉。像晚上回去小孩闹啊不睡觉，我哄不来，我就故意走到旁边去让阿姨来指导他们睡觉，那他们就乖乖的睡觉了，这就是意外的收获啊，虽然她是很凶很严厉的，可是结果是正面的就也无妨。她可以去扮黑脸，小孩一闹我就说我让阿姨来带你，我不管你了，那他们都很害怕[笑]。

母亲通常都让女佣做比较难的工作，我所谓的“难”指的是当那个坏人。你知道的，小孩有时吵起来时是很恐怖的，他们不听你说话，也不要任何你给的东西。我看过几个母亲面对这种情况时，是选择不要涉入，然后让菲佣来处理。所以菲佣成了坏人，母亲则可以与孩子保持比较好的关系。

除了通过劳动内容、母职风格的区分，有的雇主也借由母职的时间区段，来和保姆维持了阶层化的分工。当父母雇用的是住在家外面的保姆时，可以借由保姆的离开来标示出亲子时间的开端（Macdonald 1998），但雇用居家同住的移工时，雇主无法为保姆的“下班”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有些雇主特别交代他们的移工，当他们下班回到家里之后，父母便会“接手”照顾孩子的责任。雇主也试着善加利用周日，移工出外休息的时段，来加强和孩子的感情联系。

此外，台湾母亲也借由强调外籍移工在台湾的短暂居留身份，来区辨她们的代理母职与自己的永久母职。由于台湾地区政府早期规定，外籍劳工在台工作的年限不得超过三年<sup>13</sup>，尽管许多雇主抱怨这项政策增加他们在训练与招募上的额外成本，我惊讶地发现，也有些母亲认为此一规定对亲子关系有正面的效益。因为必须不断地换保姆，小孩不会对特定的保姆有长期的情感连结，相对的

便强化了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主要连带。

护士妈妈何宜,就对她和孩子之间的母职连带非常有信心,不认为那会被外籍保姆的介入所挑战,原因在于她们只是短暂地居留在台湾与她的家庭:

有一次我带我孩子一起去上课,上那个课是亲子互动,然后菲佣也跟我们一起去,那时候我小孩就说要坐在她的身上,不要坐在我身上,其他妈妈就说,你会不会很怕她跟你小孩比较好啊,我说没关系,他小时候以前每次都叫菲佣妈妈,大了以后就会分清楚……她只是我们生活里面一个短暂的过客……她只能待三年嘛……那怎么样毕竟你还是妈妈啊,对不对,我觉得毕竟是亲骨肉,亲情绝对跑不掉。

好几位接受访问的母亲,都用“血浓于水”的说法,来向我(以及她们自己)保证,她们的母亲地位绝不会被外籍保姆所取代;她们将父母与孩子的连带视为天生的,并且为共享的文化和语言所巩固。前面提到,有些台湾母亲对她们的孩子把外籍保姆称做“妈妈”感到困扰,她们并努力地确保孩子能够在措辞上与心智上将妈妈与保姆之间划出一条清楚的界线。

Jessica 的四岁儿子有时会喊菲佣“妈妈”,但 Jessica 不会因此产生困扰,她对于自己的亲子连带,以及自己高于菲佣的阶层地位,有充分的信心:“没关系,我很清楚知道我在他心里的地位是不会动摇的,没有人可以代替我 mother 的角色。这只是过程,小孩有奶就是娘嘛,他六个月的时候也只认奶奶啊,等他大了要用心对待你的小孩不是那么难的,因为他们还有语言的 gap,等大了他们对母亲的定义会变。”

像 Jessica 这样的母亲是用种族化的族群差异叙事,来强化母亲

与保姆间的标示界线。她们以“族群化的母职”(ethnicized motherhood)来突显母职劳动中,一些基于共有文化与语言因此是母亲专属的要素。念书与说故事给孩子听是重要的例子。想要赢得孩子的爱的昭如,坚持保有睡前念故事书给小孩听的仪式,因为“这是一件阿姨做不来的事”。她说:“只有我可以当他们的朋友,我可以跟他们沟通。这是其他女人做不来的。”

在某些极端的例子里,有些母亲还会将母职“种族化”。印尼女佣 Rocha 告诉我,她雇主的三岁小孩很黏她,母亲很生气,就对小孩说:“你又不像 Rocha 阿姨,她是不一样的。她的皮肤颜色和我们不同。”这个母亲借由种族修辞学来标示自身“根本上”的母亲地位,是短暂过客的外国替身母亲无法动摇的。

## 婆婆也焦虑

有些台湾女性雇主经历了一场“革命”,才获得她们的婆婆对于聘请家务移工一事的赞同。毕竟,大多数老一辈的台湾女人,在她们媳妇这个年纪的时候,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与母亲;如今,这些在外工作的现代媳妇们,必须向婆婆保证,她们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母亲,或是懒惰的妻子。宛如和先生小孩住在公婆家的顶楼,当她聘请的非佣抵达时,她立刻带她去见她婆婆,当我问宛如为何要这么做,她说:

唉呀,一来总是得让婆婆知道一下,你不能什么都不让婆婆知道,这样不太好,因为我觉得说,你请这个帮佣进来帮你做事情,你不是来家里当少奶奶,因为一开始我婆婆会有那样的误会你知道吗。一开始她会这样问,唉呀,她会觉得说,什么事



都有人帮你做好好的，你都没有事啦，唉呀，你真好命啊。

尽管雇用了一个家务移工，有些女性雇主仍然尽量多少做一些家事，为的是确保其“贤妻良母”的形象，以避免婆婆的负面批评。Rowena，一个菲籍家务移工，深切体会到她雇主在这方面的挣扎，这名女雇主成功地经营了一家小区咖啡店，但是在同住的父系大家庭里却只是一个人微言轻的媳妇。Rowena 充满同情地跟我描述：

我的雇主白天的时候工作很辛苦，但是她晚上回家以后还是要做很多工作！我实在不明白，如果我是她我一定不会这样的！如果你已经工作了一整天，你回家以后应该要好好休息啊……当我跟她抱怨我的工作太多的时候，她很抱歉地跟我说她无能为力，她嫁到别人的家庭，她要做什么事情都需要阿妈的允许。

许多反对雇用家务移工的婆婆，心里隐藏着害怕被外人“取代”的恐惧。佩琪和她先生，两个人都是四十多岁，共同拥有并管理一家生产和研发计算机零件的公司。在艰苦的创业期间，先生的母亲从乡下搬来与他们一起住在台北，帮助他们养育三个孙子。五年前，佩琪和先生决定要请一个菲佣来家里帮忙，以减轻她婆婆的工作分量，好专心照顾小孩，然而，佩琪的婆婆对此安排不但不感到高兴，反而焦虑不已。佩琪这样描述：

第一次菲佣进来的时候，她[婆婆]很难过很难过，整天一直都觉得我们剥夺了她工作的权利，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她觉得你是不是不要她了……

她为什么觉得工作是一个“权利”？

因为她……生了七个孩子，从小把我们带大，她觉得照顾孩子就是她的权利，整理家务也是她的……除了义务之外，也

是她可以发挥的地方,她的价值观就是在这个地方,她看到孩子就很快乐,觉得有那个满足感,我们说:“今仔日这个有够好食! [闽南语]”她就很高兴,因为她没有办法出去工作,博取很多的赞赏,能让她有成就感的就是这个家庭。所以刚进来的时候,她很不快乐,我们一直跟她沟通,说是觉得她太辛苦,要带孩子要打扫煮饭洗衣服什么都是她在做,这个人进来就是要代替你的工作,你真的不要有那样的感觉。我们一直跟她沟通,后来决定好,留一项工作给她做,就是煮饭[笑]。

佩琪的婆婆终其一生都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家务劳动是她的主要专长与技能,也是她认同自己的基础。她将佩琪聘请菲佣的举动,理解为是对她的家管技巧的怀疑,以及抹灭了她对这个家庭的贡献。她也担心佩琪和她的丈夫“是不是不要她了”,深恐在她的工作被移转给移工后,他们想把“没有用的老妈子”赶出去。这种焦虑不只是个人之事,它其实是同一世代的婆婆们所共同面对的一个结构问题。三代同堂的社会规范已逐渐式微,孩子也不再保证一定会孝顺父母。在这样的脉络下,父母“努力让自己成为可靠的资源,借此确保地位安全无虞”(Gallin 1994: 138)。<sup>14</sup>

通常,当比她更为“专业”的家务移工侵入了过去被认为是她的地盘时,婆婆感到被威胁,因而对家务移工衍生敌对的态度。再者,老一辈的台湾人多数都不太能讲英文,语言的屏障更加深了婆婆“无法控制”菲籍移工的感觉。前面提到在外商银行工作的 Jessica,同住的婆婆便对于菲佣的进驻感到非常不安:“她觉得很失落,因为她的生活没有目标了,她所有的工作都被菲佣抢去做了,而且菲佣做得比她还好……对她来说,每件事现在她都不能控制了,她甚至不能控制菲佣,因为她不会说英文!”

像 Jessica 这样的媳妇,请了家务移工后,虽然避免了家务上的体力劳动,但是要负起额外的情绪劳动,来缓和她婆婆的紧张与焦虑。女性雇主所采取的一种常见的策略,就是通过象征动作来确保婆婆的权威,例如,他们刻意让婆婆把薪水拿给外籍监护工,即便钱实际上是年轻夫妻付的。

此外,许多媳妇会借由操弄翻译,来解消婆婆与菲籍移工之间的紧张。Jessica 的婆婆对于菲佣的存在感到非常焦虑,会抢着跟菲佣洗衣服做家事(这也使得该移工非常焦虑,深恐她的工作机会也会被威胁到),甚至试着赢过菲佣在家务劳动上的表现,特别是烹调这件工作,象征着她在文化上的优势以及情感上的投入。有一天,婆婆费心为家人做了一份非家常的餐点, Jessica 诠释了 this 动作背后的讯息:

有一次我婆婆做了一个韭菜盒子,我嫁到她们家这么多年都没有吃过,她就是故意要表演的……

表演给谁看?

菲佣看啊,因为她要告诉她,你要抢我的饭碗没有那么容易的,这是我的 territory,我会做很多事情你不会,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轻易就可以取代我,我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宣示的意义。

Jessica 经常利用翻译的机会来缓和婆婆与移工之间的紧张关系,平日她在菲佣面前淡化婆婆的不满与批评,在这一天,她借着夸大菲佣对婆婆烹饪技巧的赞美,来确立了婆婆与佣人之间的阶层化区分:

我看得出这层意义,那言语翻译中我就想办法加糖加盐。菲佣说很好吃,奶奶可以去外面开餐厅,我就抓住这个机会赶

快说,妈妈,菲佣说中国菜在你的手里两三下变成这样子,你可以媲美大饭店的师傅。奶奶就高兴得花枝招展,马上就再做一个热腾腾的韭菜盒子给菲佣吃!

婆婆害怕的家庭地位的丧失并不是件小事,事实上,媳妇与婆婆在家庭中地位的消长,深刻地影响了许多不同世代的台湾女性的生活质量。在1905年的台湾,二十到二十四岁的年轻女性有着远较于其他国家同年龄女性高的自杀率,佐证了汉人社会中,年轻媳妇的从属地位与抑郁生活(Wolf 1975),然而,胡幼慧比较1984年的统计却发现,年老女性的自杀趋势大为攀升,而年轻女性的自杀率则明显地下降了(Hu 1995)。年老女性的自杀率提高,相当部分源于她们的家庭地位和经济安全的下降,台湾社会中性别关系与代间关系的转变,不但未能带给她们解放赋权反而是威胁到她们的老年福祉。在年轻的时候,这一代的女性被要求为家庭的幸福与先生的事业牺牲自己,她们等着要享受老年时的安稳舒适,如俗谚说的“媳妇熬成婆”。然而,在熬过作媳妇的艰苦日子之后,她们不复享有以前婆婆所拥有的权威地位。

面对在职场寻求自我实践以及拥有经济独立自主的现代媳妇,婆婆反而必须付出她们的“婆职”劳力(胡幼慧 1995: 82)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借此交换经济上的无虞与社会支持。在这样的文化与社会脉络中,婆婆们认为家务移工的聘雇,不只可能取代了她们在家务工作上的角色,也可能威胁到她们的生存。<sup>15</sup>她们的焦虑指出了不同世代的台湾女性与母职/婆职相关联的社会位置与认同的转变,女人对于家庭的牺牲奉献曾经在昔日得到光荣的掌声,却不能确保她们在年老垂暮之际的安全与福祉。

## 媳妇熬成雇主婆

台湾女人借由雇用另一个女人作为代理人,而得以与父权讨价还价,避免在柴米油盐的家务上与丈夫天天开打两性战争,缓和她们在职场与育儿之间蜡烛两头烧的困境,或是减轻身为媳妇必须侍奉婆婆的孝亲劳动。在某个程度上,家务雇用的确把性别不平等转化为阶级不平等(Wrigley 1995: 142)。然而,性别不平等从未因为阶级不平等的取代而消失,女性雇主仍然面临好太太、好妈妈与好媳妇的性别规范与社会压力。

家务劳动的社会意义与妇职的文化建构密不可分,而家务雇用的关系确立了女主人和女佣之间两极化的女性气质的建构。我要强调的是,女人之间的社会区隔并不因为劳雇的结构位置就稳固地存在着,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女主人必须持续透过具体的行动,来确认与其家务劳工之间阶层化的差异。女雇主频频思量哪些家务责任较适合转包给市场代理人,而不至于伤害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又符合社会观感;她们希望外籍保姆可以付出爱的劳动,成为称职的代理母亲,然而又不至于凌驾她们在孩子心目中的地位。

当女雇主试图在女佣与女主人之间刻画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时,她们同时参与了阶级与族群差异的想象。害怕丈夫与女佣暗通款曲的女主人,在女性移工身上贴上具有“原始诱惑”威胁的标签,认为她们高性欲、低道德。她们也将移工保姆归类为“感情丰沛但文化落后”的照顾者,因而没有资格和“气质高贵的女主人”和“道德管训的母亲”相比。

正因为我们的社会持续视家务劳动为女性的责任,导致女性雇主常将家务移工视为“她自己较为卑微的部分的延伸,而非一个具



有自主性的劳工”(Rollins 1985: 183)。女主人转包至家务移工身上的不只是工作,还有社会加诸在女性之上的家务劳动期望;她们希望市场代理人可以协助完成自己的妻子、母亲与孝媳责任。基此,她们常提出不合理的、超过工作契约的要求,而忽视了移工的工作表现并不是“爱的劳动”,她们的有薪工作不是被情感承诺与家庭责任所规范。

讽刺的是,这样的情节有如“媳妇熬成婆”的翻版,她们与家务移工的关系,正与她们所试图挣脱的压迫性的婆媳关系极为相似。升级为管理者的女雇主,不知不觉地复制了对另一个女人的宰制与剥削关系。



## 第四章

# 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





Suna 和我坐在她卧室的地板上聊天，两个人都穿着她在台北夜市买的碎花睡衣。一周前，她刚从台北飞回印尼，重返东爪哇的家乡村落。我问她，在台北住了三年后再回到家乡感觉如何？她摇摇头，开始抱怨：“路太泥泞，很难走。家里很暗，不够亮。”

她用眼神指着没有天花板的木头屋顶，斑驳老旧的屋梁下孤悬着一只微亮灯泡。她继续碎碎念：“我晚上不能出去，八点以前要回家，不然爸爸会生气。我邻居会说：‘这女生不乖’。爸爸不准我穿在台湾买的衣服[指无袖 T 恤和紧身牛仔裤]。在台湾不一样。星期天我可以跟朋友出去玩，晚上十点再回家。”

她最后提到的一件事尤其让我惊讶：“这里的東西很贵。”“怎么会？”我睁大眼睛，不敢相信她的数学这么差。Suna 看出我的不解，清脆地笑着说：“在台湾赚钱比较多。在这里，没有赚钱。”

二十七岁的 Suna 来台湾打工前，先在雅加达的工厂工作六年，其中一个工厂替美商制作芭比娃娃。她小心翼翼地家中柜子拿出当时在工厂买的娃娃，兴奋地说：“我做衣服会喔，这个全都会做喔。”我问她：“你小时候有玩这个吗？”她缓缓梳理着芭比略略退色的金发：“没有，这个很贵，不可以。”当时的她，每天踩着缝纫机，看着川流不止的生产线，一个又一个金发碧眼的塑胶美女。她带着好奇与羡慕的心情想着：是怎样的小孩在玩这些漂亮的娃娃呢？那里

的人都是金头发吗？

1997年的金融风暴重创印尼经济，工厂倒闭、币值缩水，Suna失去工作回到家乡。邻居跟Suna说：“要不要去台湾？台湾很多钱啊。”在中介下线(sponsor)的说服下，她们一同前往雅加达，在中介公司度过四个月的训练，才等到台湾的工作。Suna怕保守的爸爸反对，离家时不敢提去台湾，只说要到雅加达找工作。出发去台湾的前夕，她打电话告诉家里，爸爸生气地吼着：“你回来回来，不要去那边，你女孩子不可以出去啊，不要出去！”

Suna边跟我聊天，边替她的手机充电。那是她在台北买的一支最新款诺基亚手机，价格是她半个月的台湾薪水。还在台湾打工的印尼朋友不时传短信跟她抱怨工作的困难或无聊。这也是她的恋爱热线，在马来西亚工作的男友每天打电话给她。Suna当初在翻阅一本专为印尼海外移工出版的杂志时，从众多交友广告里看中了她男友的相片。透过远洋电缆，她拨通他的手机号码，一场远距恋爱于焉展开。经过一年的远距恋爱(电话、短信、网路)后，他们开始讨论要不要等他回来印尼后结婚，尽管两人至今未曾亲身谋面。

电力、柏油路、西式衣着、芭比娃娃、手机，这些象征都会生活风格、西方现代性的标记，替出国工作的旅程燃起了绚丽的烟花，即便移工们所需穿越的是一条充满孤单、歧视、艰苦的黑暗通道。

本章探讨为什么女性移工要赴海外工作。大部分的菲律宾与印尼移工都是自己决定出国，有些甚至不顾丈夫或父母的反对。她们的迁移，并不是推力(国内的贫穷)与拉力(国外的财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促使她们决定到海外工作的是种种错综复杂的因素，包括经济压力、家庭失和、在家乡没有生活目标及选择权力等。然而，我们也不能把女性移工单纯视为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或是跨国



人力中介的商品。她们透过能动性(agency)的施展,以及意义的改写,来对抗身处的结构限制。她们的海外旅程可以说是一场“穿越国界的赌博”(Aguilar 1999);为了满足个人欲望、实现自我改造,她们面对的风险与机会一样大。这些女人离乡工作,不仅为了赚取金钱报酬,她们也想到海外探索自主空间、逃脱家庭束缚,以及寻求一张探访全球现代性的门票。

本章也同时检视,家务移工如何与父权讨价还价,特别是针对婚姻与母职这两个彰显再生产劳动力的性别分工的主要机制(Tung 1999)。性别与迁移的文献中长期辩论着以下议题:迁移是否能对女性造成培力的效果?程度如何,又能持续多久?<sup>1</sup>我发现,在跨国迁移的脉络下,女性化的家务劳动(指把家务看成女人专属的工作)能解放女性,但也同时维护了性别从属关系。女性移工在国外照顾他人家庭的同时,面临履行自己妻子及母亲角色的困难。已婚的女性移工成了养家者,但付出的代价是与故乡的丈夫与小孩别离。单身的女性移工则对原生家庭中履行女儿的孝亲责任,却难以建立自己的家庭。

## 经济诱因的再思考

当我问及:“为什么你会想要出国工作?”十位移工中有九位毫不迟疑地回以相同的答案:“赚钱啊!回国没有工作!”经济诱因无疑是大部分劳工跨国移动的主要驱力。印尼和菲律宾当地皆面临工作机会短缺及失业率过高的问题。菲律宾的失业排名自80年代始不断窜升(Abella 1993),2004年4月的失业率更高达13.7%<sup>2</sup>。印尼的失业率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以前是4.7%,但在2001年急速攀升到8.1%,<sup>3</sup>女性失业率更偏高(Nayyar 1997: 18)。

Trina 在菲律宾家乡内格罗省(Negros)完成高中学业后搬到马尼拉,已陆续在几家工厂工作过。菲律宾不稳定的经济以及当地工厂的不时倒闭,促使她向海外寻找较为稳定且收入较高的工作:“每两三年工厂就会倒闭。在下一个[工厂]开始前几个月我们没有工作。这样怎么生活?所以在我二十八岁时到新加坡应征工作。”

解雇和失业的情形不只发生在菲律宾的蓝领阶级,同样也改变了中产阶级的命运。Rosario 是一个大学毕业、四十多岁、两个孩子的妈,当我问她先前在菲律宾的职业,她神色尴尬且语带迟疑地回答:“我很不好意思说……我以前在银行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十二年。每个月的薪水只有 3000 比索(当时约 120 美元),生活还过得去。但是七年前银行倒了。当你来自一个破产的公司很难再找到新工作。所以我没有选择。我必须到国外工作。”

“那里没有工作”的陈述不但指向移工母国攀升的失业率;也意指那里没有“好”工作提供足够且稳定的薪水。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地位不再保证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自 80 年代中期经济自由化后,比索的贬值已造成实质薪资的大幅降低(Basch et al. 1994)。相较于都会区持高不下的生活费用,家庭收入的减少造成收支无法平衡,就算是中产阶级的家庭也面临同样的困境,这些因素增添了海外工作的吸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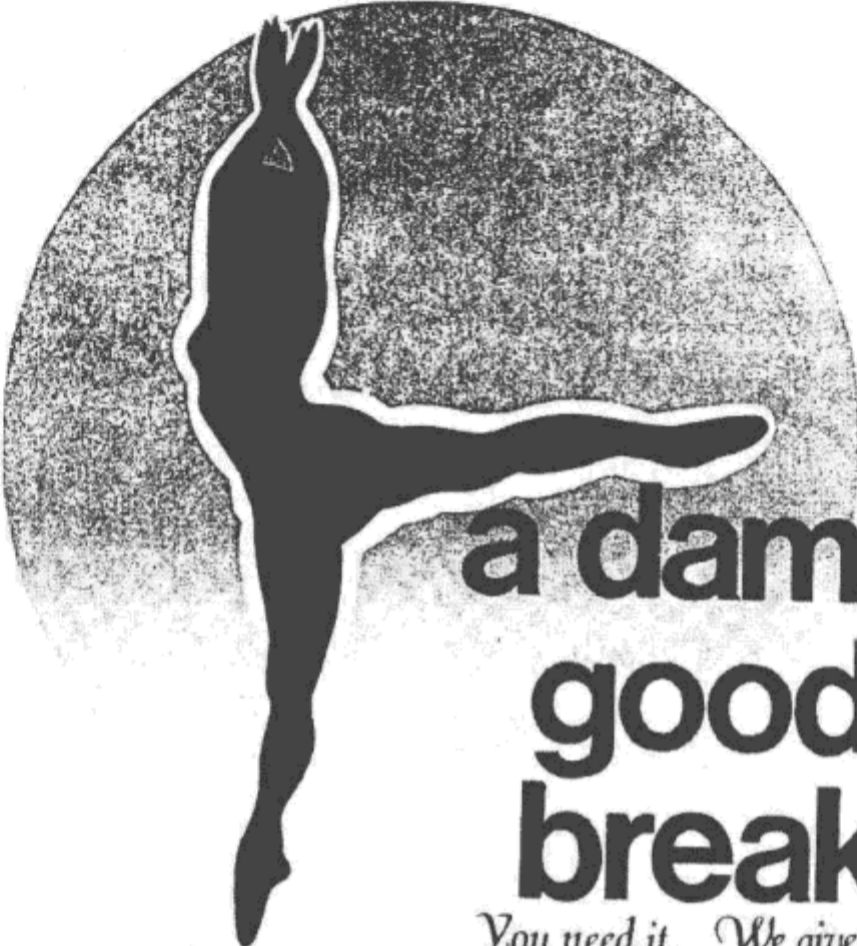
许多移工决定出国工作更是为了孩子的未来,而非急迫的经济需求,在乡间务农或捕鱼的印尼母亲尤其如此。例如,今年三十一岁、有两个孩子留在爪哇乡村帮忙丈夫捕鱼的 Naya,如此解释她决定到海外工作的原因:“我很怕出国,[我听说]有些人遇到不好的老板、被打。但是我想,我还年轻,再过几年我就老了,所以我必须现在多赚一些钱。我想替孩子存钱,让他们上大学。我想让他们多读一点书,这样我就不用再担心了。”

人们常常把劳动力的跨国迁移理解为一种推拉力量下的交互作用,一边是贫穷输出国的推力,另一边是与富裕输入国透过高薪资形成的拉力。固然,大部分的移工叙事中,经济诱因是她们出国工作的主要动机。但是,地主国与母国之间的薪资落差只是形塑出国决定的一项必要(necessary)而非充分(sufficient)的条件(Massey et al. 1998: 175)。推拉理论的有效性已经受到许多近来学者的批评(如 Sassen 1988)。最明显的经验例证是,印尼跟菲律宾都不是亚洲最穷的国家,但它们提供了亚洲最大量的移工劳动力来源。统计数字显示,菲律宾移工的大宗不是来自贫乡僻壤,而是经济发展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及都会边缘地区。<sup>4</sup>这些事实都证明,在金钱压力和经济贫困之外,还有其他中介因素影响了移工的决定。这些中介因素包括了母国社会对成就、探索等概念的建构,以及在后殖民、全球化的脉络中所形塑的对于现代性的想象。

## 海外生活的文化想象

“是的,你需要一个假期,一个难得的好假期让你进入世界,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梦想,而我们可以快速地让它实现。”当我在马尼拉看到这个杂志广告时,我目瞪口呆。该广告是用来招募菲律宾女性去日本做酒店公主、舞者、歌者,通称为“娱乐员”(entertainer)。这类职业通常被联想为性工作,返乡的娱乐员也经常被当地人贴上卖淫的污名,然而这样的海外工作机会却在广告中被染上浪漫的玫瑰色彩,冠名为“梦想假期”。

当我到印尼拜访一位移工时,她很开心见到我,但嘴里嘟囔着说:“你们台湾人出国玩,我们印尼人出国工作。”对那些除非出国工作否则就没有机会飞往海外的人来说,跨国移工的生涯散发出冒险



**a damn  
good  
break.**

*You need it. We give it.*

*See us and get that break  
This could just be it.*

**RG GATCHALIAN**  
Promotion Talents.  
"THE TALENT EXPORT EXPERT"

Yes, you need a break.  
A damn good break to get you into a world  
you've been dreaming to be. And we can  
give it to you - FAST.  
You can sing  
You can dance  
You can be a star reborn!  
FOR FREE!!!  
Let us mold you from a plain Jane  
to great entertainer you dream  
to be. Here, there and in the entertainment  
capitals of the world.

图四 菲律宾杂志的中介广告

和探索的光晕。三十出头的 Eka 来台湾当家庭帮佣,这位印尼单身女性,早在二十来岁时就去韩国工厂工作。当时,第一次出国的她非常兴奋:“我想去体验一切!我想去坐飞机,我不是想赚钱。我想看雪,所以选韩国。”她聊到十年前第一次坐飞机的兴奋时,记忆犹新。她语气激动、眼睛闪着光芒地说:“我非常非常高兴——我可以飞耶!”

许多女性移工将海外旅程视为一场到先进国家与现代社会的探险,可以享受物质的丰裕与性的解放。三十多岁、单身的菲律宾移工 Claudia 拥有药学系大学学位,在一场焦点团体座谈中,她明确

地指出让她决定到海外工作的不只是经济的诱因：

我想在台湾工作的人还可以得到其他的……怎么说……补偿。如果你在菲律宾，你只是一个母亲、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每周日到 disco、有自己的手机，这些事永远不可能发生！[其他人笑]没错，就是这样！每周日都吃麦当劳？开玩笑，你在菲律宾可以这样做吗？[其他人摇头]这就是不同了。我们戴珠宝、穿短裙，你在菲律宾不可能这样穿的！在我家乡，人们很保守，如果我穿这样[的衣服]大家都会盯着我看！我们想要待在国外就是因为有这些补偿。

对其他出国工作的人的羡慕或者好奇，也是她们决定当移工的原因：“很多人都出过国了，所以我也想要试看看。”不管出国工作最后是否符合她们先前的期望，这趟探索旅程都得以让她们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某周日在教堂，Johna 提到她的雇主要去美国受训两个月，他们正在考虑是要带她一起去，或让她回菲律宾度假。菲律宾同乡 Adora 听到了马上热心地提出建议：

不要回菲律宾啦！你应该和他們去美国！

但是如果她去美国，她可能只是整天待在家里……

没关系啊！只要你到了美国机场，你就算去了美国！然后你在家可以打电话告诉别人你在美国！[转头向我解释]因为菲律宾人很少有机会出国，所以可以出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那到台湾呢？也觉得很光荣吗？

是啊，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在这里照相。然后你可以告诉别人你出过国，不是嘴巴说说而是有照片为证！所以 Johna，记得在洛杉矶的机场拍照！



每周日,在中正纪念堂等观光景点,或甚至是百货公司门口,总有许多移工,特别是女性移工,正在摆姿势照相。这些照片选择性地记录下她们在台湾的生活:寻常的工作生活(站在街头等垃圾车或是医院陪伴病人),不是她们留影的重点,镜头下冻结的影像,多是在周日做时髦打扮,如同快乐观光客般地在雄伟的现代建筑(如101大楼)、异国情调的观光景点(如中正纪念堂)前留影。

当我纳闷移工们为什么这样勤于在台湾拍照,她们笑着回答:“为了回忆!为了让我的爱人看见我白皙的皮肤。”她们对于浅肤色的渴望,象征了对于优越的她者——都会的、中产阶级的女性特质——的向往,作为对立面的深肤色则体现了被贬抑的农业生活、劳动阶级的女性形象。林秀丽(2000:43-4)访问的一位菲律宾女性移工指出,她的表姊当初就是以“皮肤会变白”以及“看起来会比较年轻”等附加好处,说服她到台湾工作。对东南亚的女性移工而言,白浅肤色和异国生活一样,象征了她们对物质富裕、都会现代性的渴望认同。

我在离马尼拉三小时车程的小镇上访问到 Rocita。她曾在台湾工作一年,但雇主未续约。在付完中介费及债务利息后,她几乎是空手而还。她的丈夫曾在帛琉做非法的建筑工人,发生职业灾害后负脚伤回国。她的女儿最近到台湾的工厂工作,赚取全家的收入。在我们的访谈结束后,我告诉 Rocita 我想拍她的照片。她点头说好,然后径自走向她表姐的房子,那是她表姐利用出国工作收入重新粉刷过的混凝土屋。我问她,“为什么不在你自己的房子前照相?”她不好意思地说:“我的房子?太简陋了!下次我女儿寄钱回来盖一个新房子后,我再让你照!”

海外探索的梦深植 Rocita 的家族历史中,有成员移居比台湾更远的地方。Rocita 的爸爸因早年加入美国海军服务而取得美国公



图五 一位移工的重新粉刷过的房子(相片右半边),  
与邻居的旧屋形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摄于东爪哇

民身份,现住在加州<sup>5</sup>。借由女儿在台湾工作的汇款,Rocita和她的家人希望能够达成全家取得美国公民身份、在美国团聚的梦想。她笑着告诉我,“我们没钱付去美国的机票,所以我们必须先出国工作好赚到机票钱!”

Rocita的家人们虽各自前往不同的目的地,但都在寻找一种更好的生活。有些故事的结局美好,有些残酷,但这种出国寻求更好生活的梦想深植于菲律宾的文化及历史脉络。人类学家 Raul Pertierra(1992)研究北吕宋岛的伊洛卡诺省(Ilocano,菲律宾自本世纪开始向外迁移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对“好生活”(naragsak a panagbiag)的文化建构,他发现,移民的主要诱因并非追求立即的经济报酬,而是为了维持某种生活品质,包括一些难以量化的好处,像是声望、探险、实现梦想等。当地人把外移(out-migration)浪漫化为对梦土的追求,而视本地为落后、不眷恋的居住地。

如此的文化建构亦受到菲律宾的学校教材的影响。高等教育在菲律宾相当普遍,这是受惠于20世纪初美国殖民政府有系统的建立普遍的学校教育。然而,承继于殖民者的教材,不免隐含了脱离本土脉络的文化偏见。根据 James Young(1980)在伊洛卡诺地区的研究,地方的课程内容多对于维生经济的农业工作与生活形态给予不高的评价,而偏好培训有关工业都市经济生活的管理和技术。如此培育出的学生多倾向离开地方村落,向往都市、乃至国外的富裕生活。对许多菲律宾人来说,美国的生活,在殖民的历史光晕下,尤其闪耀着耀眼的迷人光芒。

借由电子媒体孕育而生的全球流行文化,是另一种形塑移工如何想象全球现代性的机制。台湾的流行音乐工业在亚洲市场的影响力尤其强大。举例来说,F4这个流行音乐团体,虽然唱的是中文歌,但在亚洲各地都吸引了大批观众与粉丝。第一张专辑全球共卖出350万张,这在盗版猖獗的亚洲是一项惊人的纪录(Seno 2003)。2003年F4在马尼拉举办的演唱会,最贵票价高达200美金,甚至连菲律宾总统艾若育都亲自接见这个男孩团体。我到印尼爪哇做田野时,从雅加达的百货公司到小村镇的市场,满目所及皆是F4的海报、T恤,以及由他们主演的偶像剧盗版DVD。

我在台湾遇到的印尼移工也常开玩笑说她们是来看偶像的。电视节目中的再现形塑了她们来之前对台湾的想象内容:“我在电视上看到台湾,看起来好美。”她们从台湾回去后,朋友和邻居也会问:“你在台湾有看到F4吗?”这个歌唱团体和他们主演的电视剧体现了 Appadurai(1996)所说的“全球化的媒体地景”(globalized mediascape),影响了印尼观众对特定的容貌与生活风格的渴望,以及关于美与舒适等标准的文化建构。<sup>6</sup>在这样的文化脉络下,迁移不只意谓收入的提高,更成为一种对全球现代性的朝圣旅程。

简言之,殖民历史与全球化的大众媒体建构出一种对“理想生活”的文化想象,这种想象铺陈出菲律宾与印尼移工出国工作的决定。媒体与市场的力量已经在全世界助长了消费主义的发展,也持续滋养人们对新商品与新景观的无止境的渴求(Appadurai 1996: 40)。相较于务农生活、与传统规约的村落,海外工作提供了女性移工一个体验她们所想象与欲求的“现代性”的机会,意味着能够消费更多的物质商品、保持白皙的皮肤,以及享受世界人(metropolitan)的生活风格。

## 从持家到养家

三十多岁的 Naomi,总是穿着 Levis 牛仔裤与白色 T 恤,看起来非常年轻,如果她没说,我根本猜不到她已有个二岁的儿子。Naomi 过去在菲律宾八打雁省(Batangas)地区和先生一起在市场开肉铺,离马尼拉有三小时车程。肉铺的生意还过得去,但如果将儿子未来的教育费用考虑进去,家里的收入就显得捉襟见肘,于是 Naomi 决定到国外工作。这是一个由她完全做主的决定:“我决定[出国],我先生说好,他会和父母一起照顾儿子。反正我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想到国外工作。”Naomi 十八岁便休学结婚,她把出国工作当作一个迟来的探索世界的机会,“我想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机会去看看不同的事物。你知道,我太早结婚了,现在我可以做很多我在菲律宾不能做的事。”

在我的研究中,40% 的菲律宾移工(包括 Naomi)都已结婚,有丈夫与小孩(58 人占 22 人),而且很多人在菲律宾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包括已婚及分居者,33 人占 14 人)。她们代表的是典型的菲律宾家庭:一位男性的养家者加上一位女性的家庭主妇,女性负责操

持家务和照顾孩子(Go 1993),铭刻上西班牙与美国殖民政权等文化印记的父权家庭关系,至今仍深具影响力(Illo 1995)。

吊诡的现实是,规范家务劳动之性别分工的父权逻辑,一方面限制女性参与当地劳动市场的机会,但另一方面却保留了菲律宾女人在全球劳力市场下的席位,她们甚至比丈夫有更多机会得到海外的工作。在我的研究中,大多数的菲律宾家庭有着相似的迁移模式:在80年代,丈夫离开家中的妻儿到中东工作;在90年代则变成妻子到国外工作,而丈夫和小孩留在菲律宾。如此的转变是因为波斯湾战争爆发后,中东地区以男性为主的建筑和制造工作大量减少,相对地,其他地主国对于家务劳工的需求却不减反增(Tarcoll 1996)。

Roland Tolentino(1996: 58)曾经这样描述菲律宾家务移工的生活转变:“从家庭领域中的无酬劳动,转变成国际空间里的有酬劳动。”当这些女性从家庭主妇变成家务劳工,她们其实是在不同的场景里担负相似的责任。她们的家务劳动在以往的私领域里只能得到情感、道德层面上的补偿,但到了海外市场却可获得金钱上的报酬。Anamaria 在菲律宾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她的丈夫曾在台湾工作,等到他约满回家时,Anamaria 坚定地告诉他说:“现在换我了,我要去台湾,我要体验台湾。”当我问到过去当家庭主妇比起现在替台湾家庭打扫、煮饭有何异同时,她回答:“在这里工作和我在菲律宾家里做的没什么不同,”接着淘气地笑说,“但我在这里可以领到薪水!”

与雇主同住的家务移工中,许多确实承受雇主无止境的要求以及冗长的工时,但是,对那些在菲律宾拥有全职工作的女性来说,有薪的家务工作可能要比她们之前在家中的双班制生活来得轻松。以前在菲律宾负责管理一家书店的 Vanessa 描述:



在菲律宾的时候,我每天累得要命。一大早就起床,煮饭、洗衣。小孩放学回家时,我还在办公室,他们可以把早上煮的菜热来吃。这里[台湾的工作]很轻松。下午我做完工作后可以休息一下,可以像这样[两脚交迭翘在桌上]看 HBO。所以,看看我[指着自己的身体],我这半年已经胖了十磅!

和许多女性移工一样, Vanessa 只身来台,和丈夫与孩子分隔两地。她们的迁移模式和常见的男性迁移模式不同。在传统的迁移路径中,由于丈夫拥有较多家庭的权威地位以及接近移工的人际网络,这些因素有利于男人先启程到国外工作,而后妻子与子女再尾随而来。在台湾与其他亚洲国家,女性移工则必须单独出国工作,因为契约客工的雇用模式禁止在地主国永久居留以及申请家人前来团聚。这样的一种女性化的迁移模式,使出国工作的家庭主妇的地位,从原本的无酬持家者转变成有薪的家务移工,并在跨国家庭生活中扮演主要的养家者。

女性移工的跨国家务劳动不仅提供她们经济报酬,同时也帮助她们得到解放的机会。有些已婚女性在未与丈夫商量的情况下就决定出国工作,她们紧紧抓住出国工作的机会,利用它来拓展生活视野、达到经济独立,以及挑战女性在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在某次的焦点团体讨论中,我问移工参与者为什么决定到海外工作,一位菲律宾大姐回答:“为了暂时休掉我的丈夫!”全场听了哄然大笑,人人点头如捣蒜。

根据 Rhacel Parreñas(2001:64)的研究,对许多女性来说,出国工作不只是一种维持家庭生计的策略,也是一种“帮助女性自家庭重担中解脱的隐微策略。”已婚的女性移工出国帮佣,不仅可逃避故乡无酬的家务重担,也能借由市场薪资达到经济独立。近五十岁的



Jenny 之前在菲律宾是家庭主妇,她觉得出国工作让她更有力量,不用在经济上依赖丈夫:“我想赚属于自己的钱。以前我只能从先生那拿钱,现在我想拥有自己的钱,这样我就可以买任何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给孩子零用钱、可以在外面吃饭,那是我的兴趣。”

有些印尼移工到海外工作是为了逃避不幸福的媒妁之婚,国外生活的解放与自由,让她们得以脱离家乡与父母的限制。二十五岁的印尼移工 Utami 在新加坡工作过四年,回家后在家庭压力下嫁给了同村的一名男子;她妈妈担心她变得太老会嫁不掉(她那时才二十岁)而逼她结婚。经过一年只是履行义务的婚姻生活后,Utami 决定到台湾工作。她在台湾工作的三年期间内,没有打过一通电话或写任何一封信给她先生,Utami 说:“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我嫁他只是因为我妈妈。”她在台湾曾和一位泰国移工谈恋爱。随着台湾契约即将中止,她开始烦恼回家后的状况,是否能够在丈夫不反对的状况下顺利离婚,担心他巴望着她在台湾工作存下来的钱。

女性移工跨越疆界出国工作的同时,也跨越了传统的性别界线。在我的研究中,只有一些印尼移工出国前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许多已婚女性会在孩子长大后,在家里的农场帮忙先生工作,或者做些临时工,像是市场小贩或收银员。然而,男性是养家者的观念仍深植在印尼社会里。一个丈夫会反对妻子到海外工作,除了因为她未扮演好预设的家务角色外,更因为这意味着他未尽养家的责任。Tiwi 是一位三十四岁的印尼母亲,离开家到台湾做看护。Tiwi 的丈夫是农夫,她描述丈夫知道她要出国工作的反应:

当别人问我先生我在哪里时,他只淡淡地回说:“我老婆走了。”他不喜欢我出去工作,他希望我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和家人。他跟我说,“你要去就去,随便你!”但他心里的想法其实相

反。他说：“如果我叫你别去，你会跟我要很多钱，但是我没有钱。”如果别人问他老婆在哪里，而他回答：“去赚钱了。”他会觉得丢脸。[别人会想]“怎么变成是你妻子赚钱？你赚不到钱吗？”

菲律宾人用“houseband”或“huswife”（“家庭主夫”）等词汇来嘲弄那些待在家里料理家务的移工丈夫。他们常因公开做一些被认定是女人家该做的事而成为揶揄的目标。Alicia Pingol (2001: 41) 的研究中曾描绘一位菲律宾的家庭主夫在清扫庭院时，一些路过的女学生嘲笑他：“你会长出胸部喔！”然而，性别角色的结构变迁，并不保证“顾家”的丈夫会从此接掌家务责任。为了保持阳刚形象，有些丈夫会另觅工作以逃避出国工作的妻子移交的家务负担 (Parreñas 2005)。<sup>7</sup> 女性移工常抱怨丈夫很少做家事，而且做得很糟，尤其不会处理家计，有些不用再养家的丈夫甚至开始酗酒或沉溺赌博。此外，女性移工心中还有另一个担忧，就像我与三位菲律宾移工的以下对话所呈现：

Helen: 你记得 Lisa 吗？她回家度假后又回来了。她抓到丈夫有小老婆[每个人都叹气]。

Claudia: 许多家庭里，只要夫妻中其中一方出国工作就会有麻烦，因为出国工作的妻子会寄很多钱给丈夫，每天都像是他的生日。然后丈夫有了情妇，妻子在国外也跟别人有了关系，因为他们都寂寞。

Olivia: 如果妻子不在，丈夫会觉得自己很悲惨，他会认为自己赚得比妻子少，所以就去找另一个女人！

菲律宾的媒体发明了“沙乌地症候群” (Saudi Syndrome) 这个新词，来描述在中东工作的男性菲律宾移工心中“萦绕不去”的恐

惧：他们害怕待在家里的妻子不守贞洁。<sup>8</sup>丈夫在家中的缺席让他们无法再控制妻子的性欲，并有碍下一代的生育，因此，男性海外移工放假回家时常会迫使妻子怀孕，作为一种控制手段（Margold 1995）。把丈夫留在故乡的女性移工也怀有类似的担忧，尤其因为女性移工的先生发生外遇的可能性，被认为更大于男性移工的太太。用 Claudia 和 Olivia 的话来说，一个家庭主夫会觉得自己“不如别的男人”与“悲惨”，因为妻子成为养家者这件事危及他的男子气概。最糟的是，丈夫的不忠常会繁衍出婚外子女，瓜分家中有限的经济资源，抚养小老婆家庭的费用有时甚至来自女性移工从海外寄回的汇款。

我在菲律宾乡下认识了 Linda 和她的丈夫。先生之前在香港当建筑工人，但回家后失业至今，Linda 随后到台湾做了两年家庭帮佣。我遇见他们的时候，大部分的家庭收入都是 Linda 赚的，除了先前出国工作的积蓄，她也在街角摆了个小吃摊。由于三个小孩昂



图六 东爪哇村一位女性移工的丈夫正在照顾小孩 作者摄

贵的私立学校学费，Linda 的积蓄变得越来越薄，在不久的未来，夫妻之中必须有一个人再度出国工作。当我问 Linda 未来有何计划，她话中充满着不确定且迟疑的语气：

我不知道，他[丈夫]叫我待在家里，继续卖 halo - halo(街头小贩卖的碎冰甜点)。他说他想要去工作，因为菲律宾男人想要当男子汉[笑]。我喜欢台湾的生活，因为有很多钱。我的老板跟我说，你先生很幸运，因为你包办所有的事。我把所有的钱寄回家养家，也养了我先生四个月！[我在家里做的]工作和台湾一样，烫衣、煮饭，[但是]有很多钱！这里？没有！但是我可以跟孩子在一起，这是最好的。

谁照顾你孩子呢？

我先生！他说同时当个父亲跟母亲很困难，这是他为什么不想再一个人留在家的原因。我问小孩，“你们希望我再出国工作吗？”他们说：“不，不要你去，爸爸去。”我先生不喜欢我去台湾，他说养家不是你的责任，是我的。他觉得很丢脸。

所以你不会再出国工作了？

如果我先生找不到工作，我一样会被逼着再次离开。

许多移民家庭的研究发现，女性移工对性别地位与男性优势的翻转，时常只是暂时或局部的(Espiritu 2002; George 2000)。此外，女性移工的“收获”通常也伴随着压力与冲突。Linda 的先生想出国工作的原因，除了想寻回理想的男性养家者形象之外，也为了逃避承担被看成女人家的事的抚育责任，正如他所抱怨的“同时当个父亲与母亲很困难”，但是像 Linda 一样的女性移工却没有其他的选择，必须兼顾双重的亲职。离家别子的紧张情绪以及“被逼着再次离开”的经济压力折磨着她们。跨越国家疆界与性别界线的女性移

工虽可能因此达到独立与解放,但在家务与母职的道德领域中,她们仍承受污名与罪恶感的重担。

## 单亲重担与婚姻枷锁

Olivia 才三十出头,却已是三个孩子的妈。她上过两年大学,但因财务困难而休学。十八岁时,她跟着姐姐一起到沙特阿拉伯做家庭帮佣。当她放假回菲律宾时,认识了她的先生。当她再回到沙特阿拉伯时却发现已怀孕(在马可仕时期的菲律宾,避孕工具的取得管道非常有限),于是辞掉工作并回国结婚。她谈到当时的决定时后悔不已:“我想保住我的小孩,但我不想和他结婚。我本来想要自己养小孩,但我妈妈哭着说假如我不结婚会有损我的名声。但看看现在的我,究竟是什么损毁了我的名声?”

Olivia 待在家里当了八年的全职家庭主妇后,她当业务员的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离开她。菲律宾的法律不容许离婚,所以 Olivia 退而其次想要申请合法的分居,但在菲律宾,合法分居只有在遭受身体暴力或通奸等前提下才被允许,而分居后的双方也不能再婚。<sup>9</sup>再者,申请合法分居所费不赀,官僚程序又庞杂,大部分的人因此只能诉诸非正式的分居或甚至不告而别(Chant and McIlwaine 1995: 14)。Olivia 渴望正式结束这段婚姻:

我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他了,但法律上他却还是我的丈夫,这实在不公平。我们菲律宾采用了美国所有的法律却不包括离婚这一项。我姐姐说,也许我应该去加拿大工作,然后取得那里的公民权,这样我就能和我的丈夫离婚了。

身为单亲妈妈是逼迫女性移工出国工作的另一个主要推力。



在本研究 58 名菲律宾受访者当中,有 3 位寡妇,还有 11 位在丈夫外遇后成为单亲妈妈。如同大部分的菲律宾家庭的女性户长,Olivia 未获得丈夫的任何财务资助,这是她决定再次出国工作的原因:“我的丈夫没有给小孩一毛钱!所以我必须再度出国工作赚钱!一个女人菲律宾很难找到工作,但却很容易在国外找到工作。你可以当帮佣、看护。”

Olivia 所说的“一个女人在菲律宾很难找到工作”,系由于菲律宾的劳力市场呈现职业分布上的性别区隔,以及男女不等的薪资差异。在“女性持家”(female domesticity)的意识形态之下,女性被认为是天生适于照顾儿童及家务,因而限制了她们的有酬劳动参与。女性在劳动市场中通常受限于类似“妻子及母亲角色”的范畴,例如农园的家务工作及护理、教育等专业工作。<sup>10</sup>

也有其他女性出国工作是为了躲避丈夫的家庭暴力、冷漠,或是外遇。<sup>11</sup>印尼女性通常很早就结婚,<sup>12</sup>离婚在当地也并不少见。<sup>13</sup>在我的研究中,35 名印尼受访者中有 13 名离婚。其中一名是个回教徒,她在十七岁就结了婚,生下女儿前,她在雅加达的一间工厂工作,也曾在新加坡当了两年家庭帮佣。在快三十岁时,她发现先生和一个邻居外遇而决定再次出国工作。离婚所带来的心碎和丢脸,让她决定逃离家乡的丑闻,到台湾工作:

如果留在印尼,我每天都会很难过。看着我的丈夫和另一个女人[叹气]……,那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到台湾。我想赚很多钱,这样我丈夫才会感到……,也许他知道我有钱后心情会不好,……嗯,他的[新]老婆是漂亮,但没钱。我想赚钱,没有老公没关系,但我想过好日子。

海外工作的收入让失婚的女性移工对自己重拾信心,更实际的



好处是,它替单亲妈妈及小孩提供经济保障。Rokayah 是来自东爪哇乡村的另一名离了婚的女性移工。她十六岁时借由父母安排嫁给了一个军人,十八岁生下一个男孩。她的先生有赌瘾,而且经常弃家庭于不顾。Rokayah 于是到雅加达当了两年保姆,每个月只能回家看儿子两次。她在快三十岁时到台湾工作,一样是做保姆,但赚的钱是她在雅加达的五倍。我问她有没有考虑再婚,她坚决地摇着头,“如果我再婚但老公不好,我儿子会很可怜。我想赚钱,这样他才能上学。我不想要孩子长大后没知识”。

为了供应孩子的教育费用,尤其是昂贵的私立学校和大学学费,母亲移工付出的代价是无法亲身陪着孩子一起成长。来自菲律宾的 Molina 流着眼泪告诉我:“有时候我会在晚上哭。我会想,我正在照顾别人的小孩,那谁来照顾我的小孩呢?这么多年来,我都不在他们身边。他们总是问我,妈妈,你为什么总是不在?我说,我虽然不在,但这是为了你的未来。”

当女性移工照顾别人的孩子时,谁来照顾她们的?许多人请祖母、阿姨、姐妹,或其他女性亲属来当保姆,也有些是丈夫辞掉工作,成为全职的家管。<sup>14</sup>此外,有不少的女性移工寻找非家庭成员来当孩子的保姆。有些女性移工认为,若是请亲戚帮忙,她们会碍于情面而无法要求或批评其工作表现,所以找个帮佣反而是比较好的安排。再者,移工同样要提供财务回馈给亲戚,请亲戚照顾未必比雇个乡下来的女佣便宜。

Molina 和我遇到的其他许多移工母亲一样,都主动热情地拿出孩子的相片给我看(通常放在她们的随身皮夹里),也巨细无遗地告诉我关于她们孩子的点点滴滴,即使她们鲜少参与相片中那些具有纪念性的活动:地方舞会、选美比赛、毕业典礼、生日派对等。移工妈妈借着这些方式向外人展现她们的“母性可见度”(maternal visi-

bility)(Garey 1999: 20)。相对地,我在台湾遇到不少作父亲的移工,当我问起他们的孩子时,他们经常不记得孩子当时的年龄,有些不但不觉得尴尬,反而强调他们在国外工作所得到的相对报酬。举例来说,有位移工父亲在想不起孩子的年龄后,不以为意地说:“因为我已经好多年没回去了……,我不想回去,在国外有较多的钱与自由。”

母亲移工是社会定义下的主要照顾者,所以容易因为未陪伴在孩子身边而招受社会批评,认为她们遗弃或忽略孩子。类似批评可能来自亲戚、丈夫,甚至自己的小孩。以 Rokayah 为例,她的前夫即运用类似的社会责难来破坏她的名誉,以赢取儿子的心。在她结束台湾契约后,我去爪哇拜访她,言谈间我惊讶地发现她返乡已经一个月,却还没机会看到与外婆同住在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儿子。Rokayah 伤心地对我说:“我的儿子不想跟我讲话。我前夫告诉我我在台湾有男朋友、做坏事。我儿子对我很生气[啜泣]……,我怎么可能在台湾做坏事呢?我所有的时间都在工作,都在为了他存钱!”

对非法延期居留的移工来说,由于她们在台期间都无法回去看家人,离家别子的痛苦以及害怕被取代的恐惧更为深刻。Evelyn 是一位四十多岁的菲律宾单亲妈妈,自五年前从雇主处“逃跑”后,一直在做钟点计酬的清洁工作。她在移工社群中非常活跃,她的慷慨与热心,使她广受朋友欢迎。然而,她在最近被诊断出脑部有肿块,但没有医疗保险可以支付治疗的费用。她被迫减少工作量,汇回菲律宾给两个孩子的钱也因而少了许多。

Evelyn 变成无证移工后,再也没有回家看过孩子。我要去菲律宾做田野前,她很兴奋地跟我说:“也许你可以在那里跟我的小孩碰面。”但我在马尼拉的那段期间并未接到来自 Evelyn 孩子的任何讯

息。有一晚,将近半夜,我接到 Evelyn 从台湾打来的电话,电话里的她很沮丧,啜泣地说:“我孩子都没打电话给你,对不对?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是母亲节!他们根本不记得今天,也不记得我的生日!我很难过,所以我打电话到菲律宾给你。我不会再寄给他们任何钱了,我要看看他们没钱时会不会想到我。”

在我们先前的访谈中,Evelyn 曾如此谈到她的孩子:

我很难过我的孩子不再跟我说话了。这个孩子……,我让她去念大学,但现在,她跑去结婚而且已经有一个儿子了……

她多大?

二十岁,她从没跟我说她交了男朋友,从来没说过!

为什么他们不再跟你说话了?他们生你的气还是?

我不知道……,我为了他们牺牲我的人生!我从来没跟男人乱来。我也需要人陪伴啊,但我从来不去想那些。我只想着家人,我不想他们变得跟我一样。我的婚姻很痛苦,但我的孩子并不了解我。有时候我没有工作,我没有钱给房东。有时候我饿肚子,没有饭吃……,我从来没有要他们帮忙。

Evelyn 对于孩子怀疑她在海外是在满足个人的享受而深感受伤,她替自己辩护的方式是再三强调她的贞洁(“我从来没跟男人乱来”)以及利他式的母爱(“我为他们牺牲我的人生”)。虽然 Evelyn 努力让自己像个“烈女母亲”(martyr mom)——在海外为了孩子受苦,并因远离孩子而悲伤(Parreñas 2005)——但经年累月的分离动摇了孩子对母爱的信念,她的病也导致她无法再固定汇款,用物质资源来克尽母职。

移工母亲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实践跨国母职:她们延伸母职的定义,说服自己与别人,当个养家者就是她们实践母职的最佳途径

(Hondagneu - Sotelo and Avila 1997)。她们常寄信、打电话或传短信给小孩,并以大笔汇款和昂贵礼物巩固和孩子间的情感连带(Parreñas 2001)。此外,移工母亲也会试着以虚拟存在的方式维持每天的家务再生产,我将这种情况命名为“跨国持家”(transnational homemaking)。

移工母亲常寄一大箱礼物回家,菲律宾人称之为 *balikbayan boxes*。箱子里通常装了来自工作国度的纪念品、雇主不要的旧衣和玩具,以及肥皂、乳液、零食等物品。有一次,我陪 Tiwi 海运一盒又大又重的包裹回印尼。她的朋友在我面前嘲弄 Tiwi 是个“不理性”的送礼者:“你知道她在箱子里放什么吗?她放了洗发精、牙膏,甚至还放了好几包 Qoo 果汁。”Tiwi 反驳:“我是想让女儿尝尝台湾牌子的果汁。”其实,那是 Tiwi 的雇主的小孩最喜欢的果汁品牌。离家多年的 Tiwi,没有机会亲手为女儿烹调食物,也难以确知女儿喜欢的饮食口味,借由资本主义的品牌商品的邮寄,她希望能与家人分享她海外生活的异国元素,并补偿自己无法亲自陪着女儿成长的遗憾。

事实上,很多移工寄回家的杂货在故乡也买得到。根据 Deirdre McKay(2004)在菲律宾的实地考察和计算,从海外寄包裹回家所需的花费,比寄钱回去在当地市场买同样的物品还要贵。虽然这种实物给付的汇兑方式不符合经济效益,但对移工母亲来说,这却是一种家务劳动的象征展演。McKay 注意到,会寄包裹回家的大部分是女性移工,她们在决定要寄什么东西回家时,其实是在进行某种跨国杂货采买(transnational grocery shopping),虽然她们人不在故乡家人的身旁,仍可借此行为履行她们作为妻子、母亲的身份。

除了跨国杂货采购外,移工母亲也透过其他方式来扮演跨国持家者的角色。例如,有些移工母亲为家人安排设计每周菜单,每天

用短信叫小孩起床,或是每天晚上睡前用短信寄给孩子一则圣经的话语(Parreñas 2005)。她们也可以越洋监控丈夫与孩子的生活与支出。在台湾工作的菲律宾移工 Trinidad 虽然不在孩子们身边(一个读高中,另两个读大学),但仍尝试监视他们的日常花费:

OCW(overseas contract workers,海外契约工)的孩子经常这样:他们有钱,然后怀孕、嗑药。他们的朋友会说:“你妈妈是海外契约工,你一定很有钱,所以要他们付这付那的。”我要我的孩子将所有花费的收据寄给我,这样他们就不会浪费钱了。

所有花费的收据?

是的,所有花费,包括买蛋、看电影、买书,所有的花费。

虽然移工母亲无法亲身参与家庭生活的细节,或亲力而为地操持家务,但她们能以跨国流动的商品、礼物、资讯和讯息来管理日常例行的家务再生产。跨国持家的实作帮助她们扮演精神性持家者以及远距离养家者的角色,并借此穿透国界,重新建构“家”(home)与“家庭”(family)的界线。

## 我们跟女主人差不多

移工母亲延伸母职定义以及合理化她们与家庭分离的另一种论述,是突显自己与女主人之间的相似点。Juliet 是一位离开子女到台湾工作的菲律宾移工,当我问她在海外工作有什么感觉,她淡淡地回道:“还好啦。很多女人都在外工作,我们就像我们的女主人一样。”她认同的是一种现代的职业妇女形象,这不只描述了她的银行经理女主人,也适用于她自己跨国移工的身份。借由这样的类比,移工母亲强调自己和其他离开孩子去赚取市场薪资的女性一



样,唯一的差异是,她们必须跨越国族疆界到更远的地方工作。

前章已说明,女雇主的结构位置使她们必须和市场代理人一起竞争妻子与母亲等地位。女性家务移工也经常把自己跟女主人拿来相比较。由于她们近身观察雇主的家庭生活,得以取得不少内线知识,她们借由这些资讯来评估女雇主的表现,同时也投射自己所向往的理想女性特质。借着将自己和女雇主放在同一平台上比较,女性移工让女佣和女主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弹性、似可穿透。

### 我在菲律宾也有女佣

我常从一些菲律宾家务移工身上听到类似的说法,其中尤以高学历、曾从事白领工作的比例最高。她们模糊女佣与女主人的界线,以此缓和自己因地位向下流动而产生的个人焦虑。一位菲律宾移工 Trina 如此定义她跟女主人之间的相似性:“我老板以前是个空中小姐,空中小姐就像女佣,这是为什么她能了解我的工作。”虽然 Trina 不了解跨越公私领域的劳动再生产在历史上的连续性具有什么社会学意涵(Glenn 1992),但她拒绝将自己的工作视为低贱的,并认为她的地位和担任空服员的女主人相去不远。

有些移工认为自己 and 台湾女主人地位相近,因为她们在母国也雇用女佣,可说是“远方遥控的雇主”。一些我访问的菲律宾移工会以骄傲或不好意思的口吻说:“你知道吗?我在菲律宾有一个女佣!”Christina 是其中一位。她拥有大学学历,之前在菲律宾是个老师,她在台湾工作时,聘用了一个乡下移民来照顾她在马尼拉的小孩。尽管她们从事的是类似的工作,Christina 在自己与家乡女佣之间划清界线,强调她们在文化资本、阶层地位上的差异。她这样告诉我:“我姐嘲笑我说,你有一个女佣在菲律宾,可是你自己在台湾就是个女佣!我说这是不一样的,她们是没受过教育的,并不是每

个人都可以在国外工作,你必须很认真、很有决心。”

对海外的家务移工而言,身为家乡女佣的“女主人”代表她们的地位比邻居高,而且也提供一种心理补偿,缓和她们在海外工作所受的痛苦。Parreñas(2001)访问的在罗马工作的菲律宾女佣,在异地寂寞生活与辛苦工作之际,安慰自己等到赚够钱回家乡后,每天只要翘着二郎腿,可以雇用好几个当地女佣来伺候自己与家人。“换我当老板娘”除了是一种对未来的想象或愿景,也是许多移工当前跨国生活中的具体图像。这些女性移工享有暧昧与矛盾的阶级位置,她们既是海外的女佣,也是远方的雇主。

Rhacel Parreñas(2001: 72)认为,她们这种不上不下的地位,是多层的“再生产劳动的国际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的中间界面:当她们替富裕国家的中上阶级女性照顾小孩以赚取高薪时,同时也把自身的家务劳动和照顾责任移转给母国的贫穷妇女。母国的家务帮佣位居这个多层结构中的最底层,拥有的经济与文化资本最少。她们可能因为教育程度有限或存款不足而无法出国工作,其劳动条件与薪资所得也与海外帮佣有明显的差距。

1999年我在菲律宾的一个小镇,遇到一个从事家务工作的菲律宾女人,她的月薪只有菲币500元(相当于当年的美金17元)。当我问她是否想过出国工作,她以破破的英文回答我:“Me? No money!”长期以来,家务服务是菲律宾女性的主要有薪工作之一,在1975年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女性受雇于家务服务(Eviota 1992: 88)。在主要城市,女佣或保姆的平均月薪大约是菲币1500到2000元(约美金30到40元),在其他乡镇薪资更低。家境优渥的菲律宾家庭主妇通常雇用数个赋予专职的家务劳工,除了寄宿在家中的“ya-ya”和“helper”(家务帮手)<sup>15</sup>,许多另外以寄宿或日工的方式雇

用厨子、司机、洗衣妇。

多数的当地家务劳工来自外省的农村地区，都市里的家务工作提供他们逃离家乡的贫穷并参与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一条途径。在马尼拉，我遇见好几位来自菲律宾中部的维萨亚群岛（Visaya）的年轻女孩，正在等待被安置到雇主家帮佣。比起我在台湾认识的“菲佣”，她们由于长期从事农事工作，肤色明显地较为黝黑，也较难用英文沟通。当我问到为什么会想要离家来帮佣，一位不到四十岁、小学毕业、已经生了八个小孩的妈妈告诉我在外省务农生活的财务困难，然后，她眼神发亮地说：“而且，我想看看马尼拉的生活！”

### 我不想当这样的妻子与母亲

通常，女性家务移工对没有从事有薪工作的女主人有较多的批评。一位移工受访者不屑地说：“她们除了监视我之外，不用做任何事。”在她们的眼里，这些家庭主妇雇主既未负起女性照顾家庭的责任，也不具备职业妇女的理想形象。女性移工认为她们的家庭主妇雇主懒惰、挑剔：“她很晚起床。她看报、看电视、去俱乐部，然后监视我！”有些移工怜悯家庭主妇在经济上的不独立：“她必须向先生要钱，而她先生会检查每一笔支出。她不能随心所欲地用钱，有时候她甚至要向我借钱！”女性移工严加批评家庭主妇雇主的同时，也意在证明自己身为职业妇女是一个相对理想的生命选择，不仅合乎勤奋伦理，且能确保经济无虞。

还没有成家的女性移工则认为家庭主妇雇主是自己的坏榜样。Jovita 是一位单身的菲律宾移工，她告诉我：“我不想变成像我老板一样。她跟我说：‘你煮东西给我先生吃，我要出去打麻将！’这样不好，她不煮饭给她先生吃，也不照顾小孩。我不想当这样的妻子。我会想要准备一份温馨、好吃的晚餐等我先生下班回家。”Jovita 批

评女主人未扮演好家庭角色的同时,也同时浪漫地想象自己未来会是位符合传统理想的家庭主妇和母亲。虽然实际上,要扮演好全职妻子跟母亲的角色,对她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外,帮佣移工也常批评雇主在养育孩子上的疏忽以及不合格。<sup>16</sup>她们批评台湾雇主将事业看得比孩子重要:“他们的父母都太忙了,没有时间跟孩子说话。”她们也认为某些台湾父母太过懒惰与自私。Rutchelle 是位三十多岁、有两个孩子的菲律宾母亲,在台湾当家庭帮佣已超过两年。我常在星期天的教堂里看到她带着两个台湾孩子,一个五岁的小女孩跟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旁边没有台湾父母的陪伴。我原以为他们的父母忙于工作而无法照顾小孩,但 Rutchelle 纠正我说:“不是这样,他们的父母都在家里,但孩子比较想跟我在一起。”我问小名叫做 Tommy 的男孩,爸爸妈妈在干吗。他回答:“他们在睡觉,妈咪昨晚喝酒。”Rutchelle 摇着头评论道:“我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睡那么多。”

比起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有些女性移工骄傲或兴奋地告诉我,她们所照顾的台湾小孩跟她们有更亲密的关系。一位菲律宾移工告诉我,她照顾的孩子在她契约届满时对她说:“我们不想待在这里[台湾],我们想跟你一起去菲律宾。”虽然和女雇主同样离开孩子去工作,但移工母亲会以雇主的小孩较喜欢她们而非亲生母亲的事实,来证明与确认自己的母职能力。

随着移工母亲与故乡孩子之间关系的日渐疏远,她们往往在替代母职的工作中寻找情感上的补偿。这种“移情母职”(diverted mothering)的状况(Wong 1994),往往导致女性移工陷入情感上的两难困境。她们既要跟女主人确保,自己这个代理母亲不会动摇亲生母亲的地位,在工作上谨守母亲与保姆之间的界线;然而,如果她们与朝夕相处的雇主小孩之间的情感连带显得稍纵即逝,她们也不免

感到难过或受伤。

我观察到的一个田野经验生动地呈现出移工所面临的情感困境。带着雇主小孩上教堂的 Rutchelle, 意识到她的女主人因目睹自己的孩子对外籍保姆产生情感依赖而心生嫉妒, Rutchelle 于是设法安抚这位母亲: “我跟她说这没关系, 我只是个打扫的人。我只是暂时待在这里。小孩以前不是也有两个菲佣吗, 但他们很快把她们忘记了。Helen 是我前面的菲佣, 我老板拿她的相片给他 [Tommy] 看, 他已经认不出来了。”

我于是跟 Tommy 确认: “谁是 Helen?”

男孩眨着无辜的黑眼珠, 摇头表示不知道。

我开玩笑地对他说: “喔, Helen 如果知道你忘记她了, 一定很难过。”

听到我这样说, Rutchelle 把男孩紧紧抱进怀里, 信心十足地说: “但是他会永远记得我!”

## 乖女儿与老处女

许多研究只关注移工母亲而忽略了另一群同样重要的团体: 单身女性移工。本研究中有将近 40% 的菲律宾移工受访者是单身 (58 名中占了 22 名)。年纪较轻的印尼移工还是单身的比例更加明显。以本研究来说, 有 60% 的印尼移工是单身 (35 名中占了 21 名), 她们大部分都只有二十来岁。已婚女性移工认为出国可以帮助她们挣脱家庭束缚, 而单身女性移工也有类似的想法, 她们认为这是一个可以让她们逃离父权社会对未婚女儿的控制的机会。有大学学历的 Jovita 曾在马尼拉当过秘书。二十四岁时, 她为了到国外探险以及寻求自由, 决定离家到台湾工作:



当我决定出国工作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都不知道,一直到了离开前一刻,我才告诉他们。他们知道以后也不能怎样,因为手续都办好了。他们很担心,因为我没有在别人家工作的经验,他们也担心我会碰到什么样的老板……之前我从来没想到过出国。我在乡下出生,做过最远的工作是在马尼拉。我只想要离家远远的,你知道,就像其他单身女性一样期待自由。但是现在[苦笑],只有周日我才有自由!

就像 Jovita 说的,住在雇主家中的帮佣移工能够享有的自由其实很有限。尽管如此,出国工作仍可帮助单身女性经济独立、脱离父母管束。在印尼,媒妁之婚仍很常见,当地父母也常为了保护家庭名声而催促女儿早点结婚(Jones 2002)。有些年轻的印尼女孩远渡重洋,是为了拖延婚姻以及抵挡父母的压力。Nani 是个二十六岁的巽他人(Sundanese),在西爪哇的一个农村家庭长大。她对务农完全没兴趣,于是在高中毕业后跑到雅加达当女服务生。二十岁时,她成为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家庭帮佣,而不是变成一个农夫的妻子。她回忆那时家人对此的争吵:

我爸还有我妈说:“你不能去阿拉伯。”我说:“别担心,无论发生什么事,阿拉都会看顾我。”每一天,我都跟我父母吵:“我可以去阿拉伯吗?我可以去阿拉伯吗?”他们说:“不要去阿拉伯,去结婚。”我不想这么早就结婚,我会受苦!我看到很多人不到二十岁就结婚,然后离婚。我不想那样。

Nani 告诉她父母,到海外工作:“我是赚钱给你们,不是给我自己!”单身女性由于还未成家,所以通常会出自于对父母的孝顺而汇钱回家。就我的观察,印尼单身女性通常只汇一些钱回家给父母,并把大部分的钱存下来替日后结婚、成家做准备。<sup>17</sup>相对起来,未婚

且是家中长女的菲律宾移工则担负着大家庭的沉重财务压力。

学者描述菲律宾的家庭为“核心家庭的居住形式但具有延伸家庭的功能”(Chant and McIlwaine 1995)。虽然经历都市化及工业化后,核心家庭已成为菲律宾的主要家庭类型,但延伸家庭的亲族关系在菲律宾仍然具有重要的经济共享与社会联系的功能。亲人间互助与互惠的文化价值——马尼拉语(Tagalog)称之为“灵魂的债”(utang na loob),意指家人之间终生的债务——仍根深蒂固,不论家庭成员因迁移而造成的地理距离有多遥远(Chant and McIlwaine 1995: 15)。大家庭的成员期待已成年的单身女儿提供财务协助,最常见的形式是由她们资助年幼弟妹的教育(Medina 1991)。

Mercy 是位二十出头的单身菲律宾女性,念了一年大学后,辍学到海外工作。她的父母生了十二个女儿与两个儿子,其中的八个女儿分别在不同时期到国外工作,并轮流汇钱回家资助年幼弟妹的学费。Mercy 叙述她如何开始出国工作:“我姐姐打电话给我,问我要不要到新加坡工作。我说好呀,因为我想帮忙家里。我姐姐说,‘别担心,我们有五个姐姐在这里工作。’”每个月 Mercy 几乎把所有的薪资都汇回家,毫无抱怨。她认为这是在分担家里的责任:“我姐姐越来越老了,她开始需要替自己存一点钱。我姐姐以前赚钱帮助我读书,现在该是我帮忙其他更小的妹妹上大学的时候了。我们彼此有约定,现在轮到我了。”

以 Mercy 的例子来说,决定到海外工作是一种家庭策略,意谓负责任的女儿为了大家庭的集体利益而做出贡献与牺牲,并以此彰显她们的道德价值。但是,对其他移工来说,汇钱给父母和其他家人未必是光荣的责任,反倒可能是项永无止境的义务。

某个周日我碰到 Jovita,她刚接到家人的来信,表情却很沮丧,一点都不开心。Jovita 最好的朋友 Amy 拍拍她的肩膀说:“嗯,他们

一定是写信跟你要更多的钱吧。”Jovita 无奈地说，“我妈妈和我姐姐妹妹，她们总要我寄更多的钱。她们问我为什么不把所有的钱寄回家。我已经一个月寄一万块钱台币回家了！我得替自己存一点钱。”长长的一声叹息后，她说：“我告诉自己，做完这份合约就不要做了，因为我已经老了、累了！”

除了家人的压力外，台湾工作约满后所面临的不确定未来，也让 Jovita 心烦，她怀疑自己能否接受菲律宾的低薪工作。另一位菲律宾移工 Nora 也有类似的担忧。Nora 虽然从一间很好的菲律宾大学毕业，但很难在当地找到符合条件的工作：“我不太容易找到工作，因为我太老了，而且我的教育程度也太高。”当我进一步追问时，她解释女性在当地劳动市场中所面临的年龄歧视：

在菲律宾找工作时，他们不喜欢女人太老。他们想要二十一岁的女性，漂亮、会笑，还有那要怎么讲，“普通”（ordinary）……[当 Nora 三十岁时从新加坡回国找工作时]，他们跟我说：“喔，你从这间大学毕业？”然后接着说：“对不起，我们只能给你两千比索。”

Nora 每个月都汇一半的薪资给母亲和姐妹们（她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其他亲戚要买东西或装潢家里时，她也会不时寄钱给他们。现在，她正负责最小的妹妹的大学学费以及其他支出。我问她会不会鼓励妹妹出国工作时，她说不会，并解释说，她是为了不让妹妹忍受出国工作的痛苦才资助妹妹：

在国外工作的生活太苦了……我了解我妹妹，她不会煮饭，不会做任何家事。

她想出国吗？

她想，但我告诉她：“如果你在那里有工作，有家庭，[待在

那里]我可以帮你买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我才买了一台机车给她。我跟她说：“不要出国工作，太辛苦了。”

这些替原生家庭扛起财务重担的单身女儿，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在海外工作。同时，她们也担心自己的婚姻因此被拖延、耽误。Rosemary 告诉我她一个单身朋友 Manny 的故事。快三十岁的 Manny 受雇来照顾一个新生婴儿。她的台湾雇主夫妇忙于跨越两岸的事业，因此，大部分时间只有 Manny 在家陪着小婴儿。Rosemary 描述后来发生在 Manny 身上的事：

他们[雇主]非常信任她。她过得很快乐，因为她也很爱这个小孩，就像她自己的小孩一样。当那个妈妈回家时，小婴儿因为不喜欢她[妈妈]而哭了。Manny 的合约很快就到期了，雇主跟她说：“我们希望你永远待在这里。”Manny 说不要：“如果我永远留在这里，我要怎么结婚？怎么有我自己的小孩？”

Manny 的话点出单身女性移工所面临的冲突：“照顾你家，如何成我家？”当她们协助照顾雇主家庭时，自己便难以建立或维护自己的家庭。在菲律宾，女性的单身地位通常伴随着“老处女”的社会污名；马尼拉话的“老处女”(*matandang dalaga*)一词，其字面意义为“不完全的女性特质”(Hollnsteiner 1981)。虽然菲律宾移工可能被贴上“老处女”的污名标签，有些人仍倾向保持单身，因为她们自知出国工作的生活和传统的家庭概念格格不入。自三十岁起，Fey 已经在海外工作十一年了。她提到自己的婚姻观以及对未来的计划：

我看到有些朋友离开家庭和小孩到国外工作，我觉得这样不好。如果你一个人，没有负担困扰，所以我说单身比较好。我想工作到我不能做的那一天，也许一直工作到六十岁吧。我会存一些钱，然后回菲律宾，我已经在那买了一栋房子。

也有菲律宾移工基于更激进的原因拒绝进入婚姻。三十八岁的 Trina 在新加坡和台湾已经工作超过十年了。她家中有十二个女儿、两个儿子，其中八个女儿分别在不同时期出国工作。我问 Trina 想结婚吗？她摇着头，坚定地说：

不需要[结婚]，我现在可以养家了。我看到结婚后的姐姐，我不需要那样的生活。她待在家、白白浪费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她先生在国外工作，她必须煮饭、洗衣、做所有事情！我不想结婚，因为结婚后你只能待在家里、为先生煮饭！就像个女佣一样！我是个女佣，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何必要结婚？

Trina 一针见血地点出无酬家务劳动和家务工作两者间的连续性。她认为，家庭主妇只是女佣的无酬版本，社会地位类似，所以她宁愿选择现在单身有薪的家务工作者身份，享受经济独立与个人自由。她用在海外工作存的钱买了一块马尼拉市郊的地，而且和同样单身的姐姐及表姐妹一起投资开了一家社区小杂货店。这些女性透过延伸亲属网络创造一个互助社群，而非选择进入传统的异性恋核心家庭。但也有其他女性家务移工采取截然不同的策略来面对婚姻的压力，她们寻找跨国婚姻来逃离老处女的困境。

## 从外籍女佣变成外籍新娘

在一次周日弥撒后，我在教堂后院看到一些菲律宾移工在偷偷传阅一张广告单，她们左遮右掩地试着躲开神父和修女的目光。这张广告单有个大胆的标题：“亚洲的甜心：美国男人和欧洲男人都想写信给你”。广告单的第一段话是这样：



我们的国际笔友俱乐部提供你和美国及欧洲男性交往的机会。这些男性的工作好、房子好、教育程度高。但在他们的生活里,少了一些东西……。他们正在寻找一位忠实、敏感又有爱心的伴侣;一位可以和他分享传统家庭与婚姻价值的人。他们正在寻找一个可以互相尊重和欣赏的人。他们正在寻找你。

这个国际笔友俱乐部和许多其他类似的中介机构一样,都将据点设在香港,一个拥有超过 15 万家务移工的城市。跨国婚姻在菲律宾历史已久,主要是源于美国军队在菲律宾长达一世纪的驻扎(Enloe 1989)。殖民历史和白人至上的意识形态持续形塑了当代菲律宾人对美、爱与欲望的观点(Constable 2003a)。现代科技,尤其是手机和网路的进步,更助长了跨国恋爱的蓬勃发展。最受菲律宾女性欢迎的跨国婚姻终点站是美国、澳洲、德国和英国(Eviota 1992)。近来,日本和台湾等较富裕的亚洲国家,也开始衍生对外籍新娘的需求。有愈来愈多的台湾男性到中国大陆、越南、印尼和菲律宾等国家寻找未来可能的伴侣。

既有研究已澄清一个广为流行的迷思,即认为大多数的菲律宾新娘都出身贫穷,或是来自马尼拉或天使城(Angeles City,美国克拉克空军基地所在)的性感酒吧女郎。Fadzilah Cooke(1986)访问一百多位嫁至澳洲的菲律宾女性,发现半数以上的人过去从事的是专业或行政工作,教书和护士是最常见的两种职业。这样的社会人口背景,其实和出国工作的菲律宾移工非常近似。

海外工作的经验与跨国婚姻的轨迹具有亲近性,其实并不令人惊讶,除了因为移工得以亲身接触外国文化与生活方式,出国工作也提供女性移工遇见外国人的机会,以及就近取得婚姻中介服务的

管道。此外,在国外工作许久的她们回国后,经常发现自己很难再适应家乡的生活方式与物质条件。这种格格不入(displacement)的感受可能驱使她们想要借由移民远离家乡。许多人申请去加拿大等可以允许移工永久居留的国家工作;另一条归化他国的捷径则是嫁给外国笔友或工作国的当地人。

国际笔友服务是菲律宾移工最常用来寻找未来外籍丈夫的媒介,Luisa便借此方法结识了来自美国与欧洲的八名男性笔友。Luisa常给我看他们寄来的相片、信件以及录音带,其中一位是住在德州的非裔美籍男性,Luisa这样描述他:“他长得丑,但他是唯一一个认真想结婚的人。我不介意他是黑人,我只介意他绿不绿(意指他是否有绿卡)!”Imelda是Lusia最好的朋友,也和一些男性国际笔友来往。虽然她已经申请去加拿大工作,但Imelda很担心她的高中学历会让她不够资格成为加拿大公民。她告诉我:“如果我想拿到加拿大的居留权,我就必须去上学(大学)!太难了,嫁给一个笔友比较容易。”

另一条比较不受欢迎的跨国婚姻路径,是通过个人网络嫁给台湾男人。大部分的菲律宾移工认为,嫁给西方笔友的地位比嫁给亚洲男人的地位高。在她们眼中,委身嫁给亚洲男人的,要不是教育程度低的菲律宾女人,只能依赖商业中介找到外籍新郎,就是印尼或越南移工,因为她们不会说英文或无法适应西方生活方式。然而,嫁给工作国的当地人,也可以帮助移工脱离那些针对非公民所设计的工作与居留限制。Fey的姐姐在80年代时拿观光签证在台湾当家庭帮佣,透过另一位菲律宾新娘的介绍,她嫁给一位几乎大她二十岁的台湾鳏夫。Fey如此评论她姐姐的婚姻:

Fey:这个男人告诉我姐姐,如果你嫁给我,你可以待久一点。

;

我反对这个婚姻,我说:“你不知道他是怎样的人!”但我姐姐想嫁给他,因为她想待在台湾。

作者:他们的婚姻怎样?

Fey:不好!他管住所有的钱。他有政府[荣民]津贴,但他只给她一点点零用钱,所以我姐姐必须做兼职[清洁工]。现在他在医院里,我姐姐在照顾他。他和前妻生了三个小孩,他们很少来看他,但是这个爸爸让这三个小孩管他的存款。我姐姐看不懂也不会写中文,所以他的小孩把钱都拿走了!现在,如果他死了,我姐姐就什么都没有了!

Helen[无意间听到]:真是浪费爱!

Fey[摇摇手]:不,这不是爱,只是互相帮忙!(This is not love, just help!)

根据当前的主流看法,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这样的社会迷思让为了寻求迁移机会而结婚的外籍新娘遭受非议。尽管婚姻的现代定义是由浪漫爱、亲密关系,和双方的自由选择所组成,<sup>18</sup>但婚姻机制向来具有经济互赖与社会交换的功能,牵涉的不只是小两口,而是两个家庭/家族;这对权贵阶级以及社会资源有限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婚姻常“不只是爱,而是互相帮忙”。菲律宾社会传统上认为,婚姻是女性追求社会流动的工具,一个丈夫的好坏,端视他能提供多少向上流动的机会。就此角度而言,跨国婚姻可以说是传统“上嫁婚姻”(marrying up)的最新版本。<sup>19</sup>不同的是,促成跨国婚姻中的社会地位流动,是新郎与新娘各自的出生国在经济资源的落差。

在菲律宾移工眼中,西方男人与台湾男人是较受欢迎的伴侣,因为贫穷家乡的菲律宾男人无法确保经济无虞或者提供向上流动

的机会。菲律宾男人甚至可能需要仰赖妻子出国工作,而变成“去势”的“家庭煮夫”(houseband)。Luisa 解释她较想嫁给外国人的原因:“我不想嫁给菲律宾男人,他们没有钱,薪水又低。如果他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回台湾、寄钱给我?’我会杀了他!”Luisa 除了担心会有个依赖成性的丈夫之外,她也害怕自己的迁移经验造成不利于她在故乡觅婚的条件:“我曾在日本跟台湾工作,所以我很难嫁给菲律宾人,因为人家会觉得我是个虚荣、时髦的都市女郎!他们会想我一定很重物质,但我不会。”对菲律宾男人来说,曾在日本做过娱乐表演工作的菲律宾移工,尤其不适合娶来当妻子。

人们认为这些在国外大城市住了几年的女性太“解放”、受到“污染”,不可能适应乡村生活方式以及服从传统的女性气质规范。在日本酒吧、饭店当服务生、歌手和舞者的菲律宾人——当地人称为 *Japayuki*——在菲律宾与日本都被烙上性工作者的污名。菲律宾的妓女形象太过深植人心,导致所有的女性菲律宾移工都被怀疑是在性产业中工作。<sup>20</sup>

菲律宾女性移工的形象在台湾男人与其他外国新郎的眼里则截然不同。他们认为,相较于已从传统性别角色“解放”的台湾和西方女性,虔信天主教且保有传统家庭价值观的菲律宾女性是最佳的妻子候选人。Rosamaria 是一位嫁给台湾公车司机的菲律宾人,她以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告诉我:“你知道为什么台湾男人想娶菲律宾女人吗?因为菲律宾女人很会打扫房子,又听先生和婆婆的话,而且把小孩照顾得很好。”

跨国婚姻同时反映了菲律宾男人与外籍新郎的男子气概危机。这些大多是鳏夫或离婚、来自农工阶级的男人,不受本国女性的青睐,因此他们想要借由“解救”贫穷的外国女人来重新彰显自身的男子气概。外籍新娘顺从奉献的家务劳动实现了这些男人心目中的

理想家庭形象,并满足了他们对前女性主义时期的家庭罗曼史的向往(Tolentino 1996: 67 - 71)。

在跨国婚姻市场中,海外家务工作的经验甚至成为女性申请者的一大优势。某个周日在教堂,一群菲律宾移工聚在一起讨论跨国笔友俱乐部的申请表格。Helen 觉得其中有个问题回答起来令人难为情,于是请问以前申请过的人:“你怎么回答这题?你的专业工作(profession)是什么?”Luisa 直率地说,“你可以说你是看顾或家庭帮佣啊,他们喜欢这些工作,因为他们都很老了,喜欢可以照顾他们的人。”Luisa 的这段话不仅点出无酬家务劳动与有酬家务工作之间的连续性,还呈现了女性移工处境的一个吊诡之处。如我在导论所说,家务工作女性化的文化逻辑,导致了家务服务这个专业领域的劳动与技术的不受重视,但却增加了女性家务移工在跨国婚姻市场中的价值,使她们成为妻子(及无酬照顾者)的理想人选。

相较于菲律宾移工,印尼女性与西方笔友交往与结婚者很少,因为她们无法与说英文的外国笔友沟通,而且伊斯兰教传统也不鼓励与异教徒通婚。然而,不管是菲律宾还是印尼女性移工,碰到台湾男性雇主的求婚并不是少见的事。这些雇主通常是中年离婚或丧偶。有些雇主的求婚的确含有浪漫的爱情成分,但在其他例子里,特别是那些被雇来照顾虚弱、生病的父母的女性移工,台湾男性雇主的求婚其实是在延续她们的照顾工作。前文中提到的从护理学校毕业的 Nora,她的雇主就在契约快到期时向她求婚。回绝求婚的 Nora 后来和另一位菲律宾移工 Rosemary 聊起这件事:

Nora:他[老板]说,“你可以留在这,因为阿妈喜欢你,你也喜欢阿妈。”

Rosemary[对作者解释]:他们想娶她[Nora],因为他妈妈喜欢



她在这里工作。然后我告诉她,不要答应,因为这会变成一辈子的工作。

Nora:对呀,如果你结婚了,他们就会要你待在家里,哪里也不能去……

Rosemary:而且你也赚不到钱! [所有人都大笑]

大部分的移工都像 Nora 一样,她们心知肚明如果接受雇主的求婚,将会继续以家庭责任之名而非先前的雇佣关系,来从事类似的家务劳动或照顾工作。成为妻子后的工作分量甚至会变得更多,因为家庭成员所提供的“爱的劳动”理应是无法衡量(所以无酬)且不能间断的(所以没有休假)。女性移工成为外籍配偶后,先前受合约规范的薪资、权利与福利也将失去保障。每次当我听到某个菲律宾移工提到老板的亲戚要约她出去时,其他移工多半这样提醒她:“你要小心一点!他们可能只是想要个免费的家庭帮佣跟看护工!”Helen 和一个美国男人鱼雁往返几个月后接到他的求婚。她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拒绝,她告诉我原因是:“当你有了丈夫,你必须提供所有服务:煮饭、洗衣、按摩……免费的服务!当个 DH(domestic helper,家庭帮佣),至少还有钱拿。”

有薪的家务工作虽然有金钱报酬,但社会地位低、常被污名化。人们认为它不需技巧而且也不是一份真的工作,这是为什么 Helen 参加国际笔友俱乐部时,尴尬地不知如何回答她的“专业”工作。相反地,无酬家务劳动的道德价值较高,也较受社会认可(一个值得尊敬的妻子与母亲)。这是为什么一些女性移工宁愿选择进入跨国婚姻,因为婚姻提供了有薪家务工作无法提供的非物质性的利益。Luisa 的美国笔友计划在她回马尼拉度假时去拜访她和她的家人,他们也商讨了在 Luisa 回去的那段时间结婚的可能性。我提醒 Lui-

sa 要小心点,毕竟是嫁给一个不太熟的人。“我知道,”Luisa 深深地叹了口气,“但我已经厌倦洗马桶了!”

事实上,Luisa 结婚后也不可能停止洗马桶,但她洗的将会是自己家的马桶,而不是别人家的马桶。她的家务工作将被归类在“爱的劳动”而非市场劳动的类别中,这意味着,她的家务劳动虽然失去金钱报偿,却转而得到情感价值和社会认可。加拿大的家务人力中介公司在招募海外移工时,甚至赤裸裸地宣传,跨国婚姻是来加拿大工作的潜在收获。有一张广告单引用了一名加拿大雇主的求婚内容:“为什么要当个保姆?嫁给我,我的小孩会叫你妈咪(Why be a Nanny; marry me and my children will call you Mommy”(McKay 2003: 46)。

像 Luisa 一样进入跨国婚姻的女性移工,不仅在寻找一个住在富裕国家中可以提供经济安全与永久居留权的伴侣,也同时在追求一种浪漫的想象,希望自己的社会地位可以从此提升成为“女主人”。借此,她们可以脱离“女佣”和“保姆”的污名,变成更符合家庭与母职主流规范的“老婆”与“妈咪”。

其他研究者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女性进入跨国婚姻,未必是为了移民,而是希望实现自己所想望的婚姻(Constable 2003b: 175)。有些女性以工作之因开始移民旅程的启航,但不久后转而驶入跨国婚姻的海域。也有些女性以外籍配偶的身份移民,因为合法的劳工迁移管道不可得。<sup>21</sup>民族志研究发现,用来划分迁移形式的各种类别,例如“婚姻移民”、“工作移民”,以及“依亲移民”等之间的界线其实是流动的(McKay 2003: 25)。在真实生活中上演的生命故事里,女性移民以多重的迁移形式协商她们的生命机运及性别认同:她们不只跨越地理疆界,也超越了女佣与妻子,以及保姆与妈妈的界线。

## 女佣还是女主人？

在上一章中,我们看到女雇主倾向在女佣和女主人之间划定清楚的界线,但对女性移工而言,私领域的顾家与有酬的家务工作之间的界线却模糊难辨。家务劳动的女性化让她们得以跨越不同劳动形式的多重位置,因为这些劳动仍都被定义成女性的工作。她们的迁移轨迹呈现出“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界线是模糊、流动的,而这样的模糊界线源于有酬与无酬的家务劳动在结构上的连续性,其间牵涉金钱与爱之间不同形式的交错替换关系。

在故乡担任家庭主妇的女性移工,出国帮佣后成为主要的养家者。她们虽然赚了钱,却赔掉道德形象,因为她们无法负起照顾自身家庭的责任。面对成为经济独立女性,却跨越性别界线(女人养家、不顾家)的困境,女性移工试图重新建构家务与母职的意义与实践。她们透过汇款、短信、信件和包裹来传送爱与关心,并借此操持“跨国持家”与远距母职。

虽然在雇用关系中,帮佣与女主人之间的阶级位置大不相同,但家务移工透过比较的叙事将自己与女主人并列,甚至认为在妇职的道德地图中,自己的地位超越女主人(是更好的女人)。移工母亲认为自己 and 出外工作的台湾女主人一样,都是为了家人的福祉才离开小孩。女性移工也会批评女主人是不合格的家庭主妇,并宣扬她们做妻子与妈妈的表现与能力胜过女主人。单身的女性移工则借由进入跨国婚姻来避免自己变成地位低落的老处女,并以此爬升至家庭主妇的地位。

把家务劳动等同于女性天职及道德责任的社会观点,严重影响了有薪家务工作者的劳动条件。在劳雇双方共处一个屋檐下的居家工作环境里,公/私之间的界线十分模糊,雇主透过求婚来延长移

工的工作期限或许是彰显此模糊界线最极端的例子。然而,一般而言,家务移工本身也希望能与照顾对象(雇主小孩)产生情感上的连结,这样她们才能从这份卑下的工作中找到意义,并减缓自己与家人分离的痛苦。结果,女性移工被困在一个无解的金钱/情感交换方程式中:一边是无酬的母职实践,另一边是有酬的替代母职工作。她们必须付出大量的情感与金钱成本勉力成为一个“好”妈妈,不论是隔海守护自己的子女,或是照顾身边终究要离开的台湾小孩。







## 第五章

# 灰姑娘的前后台





某次周日弥撒后，我跟 Luisa 及几名菲律宾移工朋友到一家美式速食连锁餐厅吃午餐，如同往常，店里坐满了一群群移工，在象征全球资本主义的金色双拱商标下，她们开心地吃着薯条和汉堡。在这个消费时段，只有少数的台湾顾客，空气中流动着菲律宾的家乡话、同乡团聚的热情兴奋，与离开雇主管辖区的轻松自由。

我留意到 Luisa 带了一个装着衣服的袋子，随口笑她一大早就忙着逛街购物。她摇头，有点难为情的解释：“不，这些是我回家时要换的衣服。我在外面时，想要看起来聪明、时髦。”Luisa 轻抚着身上穿的象牙色丝质衬衫：“穿着这样的衣服，我看起来像个企业经理（business manager）。”她指着袋子继续说：“那些衣服，我在市场买的，只要台币 100 块！穿着它们我就变成‘管家经理’（house manager）。”

爽朗的几声大笑后，她的上扬嘴角化为苦涩的自嘲：“所以我回家前要换衣服、卸妆、把迷你裙换掉。我在家里像个完全不同的人。你知道的，就像灰姑娘一样！”

移工灰姑娘跨越的不只是菲律宾/印尼与台湾之间的国界，她们的迁移旅程也来回穿越多重的空间场域，包括雇主的家、城市的公共空间，休假时返回的家乡，甚至透过电话与网络而连接出的虚

空间。在这些多重的地理尺度中,空间不单纯是固定的物质场域,而是透过人们认知与经验时空关系的方式造就了空间的样态。<sup>1</sup>

同一个地理空间,对不同的居民来说,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意义与功能。和雇主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家务移工在这个“家”中的位置却是高度边缘化的;工作与居住场所的合一,让她们难以保有隐私空间。同样是异乡人,社会阶层低的家务移工不像专业外派人员,可以享受外国人的特权优势与“世界人”的尊贵身份,她们是全球城市中的底层阶级,能够使用的公共空间与社会资源非常有限。

社会学家高夫曼(Goffman 1959)用“前台”与“后台”的戏剧学比喻来理论化人们的日常互动模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如演员,会持续因应不同的观众与情境,来展演自我的形象。而这样的印象表演是有时空限制的,“前台”(front region)指的是有观众在场、进行特定表演的区域,在前台受到抑制的某些行为则出现在“后台”(backstage)。我认为这样的概念非常适合用来阐明跨国灰姑娘在不同社会空间中的角色转换与情境表演。我更进一步扩展高夫曼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空间中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从此观点来看,人们如何刻画空间界线、协商空间意义与再现空间样态,构成了一处日常生活的斗争场域,雇主与移工双方皆在其中展现权力的控制与抵抗。

跨国灰姑娘并非只留下玻璃鞋,等待王子来拯救她脱离苦难。家务移工利用商品、科技与其他人群的跨国流动,帮助她们重构社会空间。虽然空间可能成为施行劳动控制与族群隔离的工具,但空间也是移工们施展能动性的重要媒介。她们利用生活科技(尤其是移动电话)来松动工作上的时间与空间的局限、经营跨越地理国度的人际网络。她们将火车站、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转化为聚会平台或暂时家园,在周日的集体现身中,用八卦当做抵抗武器,用消费建

立自我培力。

## 家作为工作前台

一位台湾雇主如此评论她请的外籍女佣：“我们家女佣并不完美，诚实是她唯一的优点。我们整天在外工作，把家和孩子都托付给她，诚实和信任比其他任何事都重要。”在保姆施虐、孩童绑架等犯罪新闻频频占据报纸首页的当代台湾社会，很多雇主都像这位受访者一样，挂念家中财物及孩子的安全，担心外来者可能造成的威胁。她们对“危险的外来者”的忧虑，更因雇用的是外籍劳工而强化。吊诡的是，雇主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的避风港”，却把自己的家转化成一处充满纪律与监视的场域。雇主的劳动控制不仅止于移工的工作表现，她们的私人生活与道德品性都受限于时间管理与空间监控的框架下。<sup>2</sup>

### 区隔、隐私、监视

日常生活的家庭空间部署确保了雇主与移工的地位区隔。在西方传统中，主仆隔离最明显的空间安排就是楼上、楼下分住的模式。台北和其他亚洲城市由于地少人稠，家庭空间多坪数不大，所以很少见到独立出入口及楼梯、室外厕所或佣人房等空间规划。在这样的紧密居住空间中，雇主的空间控制手法，必须比完全隔离的模式更为细致，且时常对移工的隐私更具侵入性。

有些雇主会界定明确的规则，清楚划分家务移工可进出的领域。更常见的是，劳雇双方发展出一种默契，知悉家人与女佣应如何以权力不对等的方式使用共享的家庭空间。当我问雇主与一个非家庭成员同住是否会不方便，他们常如此回答我：

不会啊,因为她会做隐形人!她一看人多,就会躲在厨房,躲在阳台,让客人看不到她,她是 well - disciplined。

这是客人来的时候,那如果是你们家人在看电视呢?

也是一样啊,她都躲在阳台,这真的是非常有教养的。

躲在阳台喔?

我们阳台大大的,view 又漂亮。

住所的不同空间组成,在家庭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与意义。客厅与餐厅是家人社交之处,也是招待客人的前台区域。相对来说,厨房与阳台被归类为是家务帮佣活动的地方。她在这些后台区域煮饭、洗衣,日复一日操持家务。此外,洗手间、佣人房(如果她有的话)、小孩房等,也是她较能使用的地方。

很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和她们照顾的小孩或病人住在同一个房间,以提供随传随到的协助。这样的居住安排严重侵犯移工的隐私,并导致情绪与劳动的剥削,如同以下两位移工所言:

我在这里一点隐私也没有。刚开始,他们不敲门就进房间,我可能只穿着短裤甚至内裤。[有时候]我想要睡了,他们却进房跟她[瘫痪的病人]聊天,我根本没办法睡。甚至在半夜,不管她什么时候醒来,我都要跟着醒来。她需要什么,我都得提供。我和小孩一起睡。我唯一可以休息的地方是厕所。我常跑到顶楼的厕所,没人会用的那一间。打扫完那间厕所后,我常常坐在那里哭!我祈祷:“主啊,我想要回去菲律宾!”

有些雇主为了便于监视或空间不足,要求移工睡在客厅的沙发床上,或者睡在附有半透明纸门的和室里(许多家庭要求移工起床后把被褥与私人用品收好,白天作为雇主家庭使用的休闲空间)。为了保护隐私与安全,家务移工会试着将她们睡觉的开放空间“后



台化”。例如,有个移工晚上会在她的和室房挂上许多衣服,好让纸门看起来不那么透明。另一个睡在客厅的移工在晚上会移动茶几的位置,挡在她睡觉的沙发床旁边,这样如果半夜有人试图靠近、侵犯她的私人领域,她可以马上察觉。

雇主的私人家庭领域如今成为充满劳动监视的工作场所。孩子可能遭受保姆的虐待或忽略,是许多白天在外工作的雇主心头萦绕不去的担忧。这些雇主通常依靠某些设备或代理人来进行监视。有些雇主上班时,会不定时打电话回家,以此遥控监看家中情况,或者趁午饭时间无预警地回家查看;有些拜托白天在家的家庭主妇邻居帮忙看管移工,或请托大楼或小区管理员禁止移工任意外出。更具侵犯性的监视方法,如偷偷在家里安装录音机或摄影机,虽然在我访谈的对象中不常见,但也并非没有。

最常见的状况,是请小孩的祖父母来扮演监视家务移工的代理人。有些雇主说,如果不是跟父母同住,他们是不敢雇用移工的。典型的说法是:“你把小孩留给一个陌生人,尤其是一个从国外来的陌生人,怎么可能放心呢?但以我的例子来说,我婆婆和我们同住,有个人在家看着比较好。”核心家庭的雇主可能拜托住在附近的祖父母白天三不五时造访家中,其他雇主则可能上班前将小孩和移工一起载到祖父母家,下班后再接回。

然而,在私密的家庭空间进行劳动监视,对有些雇主来说,感觉很尴尬或不自在,于是他们试图加以掩饰,例如,他们会假装突然回家是因为“忘了东西”,祖父母则常用“想念孙子”为理由,前往视察移工情况。

### “我们怕她会变坏”

尽管家务移工大部分的工作时间都独自在家,但仍有一些机会

可以外出。她们经常因工作所需而到超市、医院(照顾病人)、学校和公园(接送与陪伴小孩)等地方。在台北市,傍晚拿垃圾出去丢,等待垃圾车来临之前,是另一个移工可以离开雇主家、遇见其他移工邻居的机会。这些地方都是她们可以稍事喘息、远离雇主,并与同乡联络的后台区域。然而,雇主对移工的监控并不只止于家庭空间,也延伸到移工外出的空间。

如第一章所述,劳委会极度关切外籍劳工的“逃跑”问题,而雇主也会因为移工的行踪不明而付上相当代价(导致配额冻结)。许多雇主因此把防止移工逃跑视为管理重点,而衍生若干控制手段。例如,许多雇主或中介业者会在移工停留台湾期间扣留他们的护照,尽管这样的行为已被劳委会明文禁止并处以罚鍰。<sup>3</sup>此外,大部分的中介业者都建议雇主不要让移工在周日休假,尤其是契约刚开始的前三个月或六个月。有些雇主则要求移工把休假日排在非周日的时候,以避免他们与其他移工走得太近。

雇主监控移工最极端的方式,是不给她们家中钥匙或不允许她们擅自离开住所。多数雇主采用较隐晦的方式来监控移工的行踪。有些会在移工休假时,检查她们的房间或个人物品,看看有无任何不寻常的蛛丝马迹显示移工会逃跑;有些会向电话公司索取移工的电话账单明细,以便多了解移工的社交连带。当这些雇主对我描述这些行为时,看起来都不太好意思,但仍强调自己是移工在台湾的监护人,以此合理化对她们隐私的侵犯。“我们不是侵犯,我们只是关心。”一名雇主如此说。

许多移工被雇主要求在周日加班工作,在有些个案里,是因为需要持续照顾新生婴儿或病人,然而,也有许多雇主如此要求是基于控制的理由。淑华解释说:“我们不介意付她加班费。我们只是不想让她出去,和太多朋友鬼混。待在家里比较好,不做事也没关

系。”台湾雇主间普遍认为,让移工休假一定会导致负面的影响:“我们怕她一旦去教堂和其他菲佣交往,会变坏。”“我们在契约里特别注明不放假。我们怕她们一去教堂会被污染。”

雇主所说的“变坏”和“被污染”,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连教堂这样的神圣地,都被雇主贴上污染源的标签?在这些被理解为可能的威胁的背后,雇主真正心悬的重点为何?

我认为,雇主限制移工行动的首要目的,是让他们与被认为是危险来源的移工社群保持距离。在台湾,天主教堂和多隶属教会的非政府组织是提供移工法律资讯与协助的主要管道。<sup>4</sup>移工在周日弥撒及之后的聚会中,会互给建议、交换策略。雇主担忧移工社群带来“污染”,其实怕的是,移工会比较彼此的工作环境,逐渐察觉到自身的权利,而懂得跟雇主争权议价。

许多雇主心悬的另一个烦恼是,移工放假后会交男朋友而可能“变坏”。我访问的不少移工都有亲身经验,例如:“我家女主人老问我在教堂有没有和其他男人见面”,或“他们不喜欢我每个星期天都出去,因为他们怕我做坏事。”这些雇主认为,他们的外籍女佣和移工男友约会是一种道德堕落的行为,可能导致怀孕或“逃跑”的后果。由于先前发生过移工和男友联手犯罪的新闻事件,有些雇主也担心、害怕移工交男朋友和绑架、抢劫的可能关联。<sup>5</sup>

Peggy 是其中一例。当她发现她雇用的菲籍女佣交了一个菲律宾男友时,她立刻中止契约、把该名移工遣返。她认为自己处于一个两难处境,一方面要尊重移工的个人权利,另一方面要抚平自己对小孩安全的焦虑。访谈时,她告诉我:“我知道她有权利去约会,我们也许不该限制她,我先生也是这样跟我说……”低头陷入几秒钟的沉默后,她抬起头为自己爱子切深的行为辩护:“可是我真的很害怕、很担心我儿子,他就睡在女佣旁边的房间。你知道吗?我每

天晚上都醒来好几次,跑去我儿子房间看,担心他是不是已经不见了。”

除了“不准约会”的规定之外,家务移工通常也被禁止在雇主家里接待访客或在朋友家过夜,即便是休假时。女性家务移工所受的规训,和父权家庭对女儿行为的监控其实极为相似。在雇主眼里(尤其是女雇主),女性移工可能会勾引男性或制造麻烦,这些担忧合理化了他们对女性移工的道德控制,甚至是隐私的侵犯。这些空间监控策略强化了家务移工在家庭生活中的附属地位,并且巩固了族群和性别的道德界线。

## 周日的后台领域

如同灰姑娘从后母家的厨房角落,换装走进霓虹闪烁的舞池,家务移工翻转她们的角色,穿越工作日及休假天所形成的前/后台界线。家务劳工的工作前台,发生于周一到周六,坐落在雇主的家中,她们的言行举止必须符合观众(雇主)对于外籍女佣的期待,展现谦卑、服从及自我节制的一面。相对于此,放假外出的星期日构成了她们生活中的后台,可以暂时离开雇主观众的目光/监视之外。

跟中山北路、台北火车站类似的外劳集结的“周末聚落”(week-end enclave),也出现在亚洲其他地主国,如新加坡的 Lucky Plaza、香港的中环。新加坡地理学者 Brenda Yeoh 及 Shirlena Huang (1998)视它们为移工的“对抗空间”(counter-spaces)。对于寄宿于雇主家的家务移工而言,公领域与私领域的界定有着复杂交替的关系:她们所寄宿的私人家庭,成为充满监控窥视的前台、个人隐私经常受到侵犯的工作场域;而很讽刺地,在星期天,如火车站及公园这种远离雇主家的公共空间,反而能够保障她们较多的隐私及个人

自由。公共空间的后台,让她们能够展现不同于女佣的形象,并在同乡的社群中获得集体归属感以及自主的空间。

### 灰姑娘出门去

能够放假外出的菲律宾家务移工,通常是这样渡过了一个星期天:大清早,可能在赶着为雇主做完早餐之后,她们和朋友相约在教堂一起参加弥撒。之后她们到菲律宾首都银行汇款回家、或是中山北路上菲侨经营的小型货运公司托运要寄给家人的钱或礼物。午餐在菲律宾小吃店打牙祭,或是带着自制的家乡食物在公园野餐。饭后,有的人参加教堂举办的查经班、合唱团、球队练习,或只是在教堂院子里联谊聊天。其他人则去逛街购物、在观光景点照相,或是到以菲籍移工为主要顾客的卡拉 OK 和迪斯科舞厅。有几家舞厅甚至提供免费的公车服务,直接接送她们往返教堂及舞厅之间。这些活动之后剩余的时间里,除了打电话给菲律宾的家人外,她们三两聚在美式快餐店或群坐在台北车站的地板上,消磨最后的自由时光。

休息日的打扮是她们穿梭于前后台之间转换身份的鲜明象征。虽然在台湾很少有雇主如同一些白人或香港雇主,要求他们的家庭帮佣穿制服工作,<sup>6</sup>台湾中介或雇主给予外籍女佣的工作规则中,通常会规定工作时不可以化妆、戴首饰、涂指甲油,或擦香水。许多移工也有意识地在工作时“装丑”,大部分穿着简单的 T 恤配上及膝短裤或宽松长裤。如此低调素朴的穿着打扮,彰显卑下的女佣地位,也压抑女性移工的女人味,以免女主人感到威胁,担心男主人外遇。

当家务移工星期天出门时,她们离开了雇主的管辖范围,也远离家乡父母与丈夫的视线。她们换上了紧身 T 恤、迷你裙、名牌牛



仔裤,戴上闪亮的金项链、摇曳的宝石耳环,踩着高跟鞋,再刷上睫毛膏、擦上口红和指甲油。透过这些有形的装饰,她们装扮出一个截然不同于在雇主家工作的形象,将自己投射成为一个都会、时尚的异性恋女性形象。<sup>7</sup> 这样一种有流行感与女人味的造型,是对于女佣与女主人的角色翻转。她们经常用这种说法戏谑地赞美朋友的打扮:“You look like our madam! (你看起来好像我们老板娘!)”



图七 在公园野餐的印尼女性移工 作者摄

除了装扮形象上的差异,家务移工在星期天的后台活动,也和她们工作时的谦卑表演呈现了戏剧性的落差。平日她们只能配合雇主的饮食偏好,没有烹煮自己喜欢的食物的自主权,多数人必须在厨房孤零零地进食,有些人因为雇主吝啬于提供充分的食物种类或分量而挨饿,有些人甚至被迫要接受雇主出外用餐带回来的剩菜剩饭而感觉屈辱。星期天则成她们享受盛宴的一天,移工们可以结伙成群在小吃店自由购买家乡食物来满足她们思乡的肠胃。透过



假日的饮食行为,她们得以重建在工作中被抹煞的个人自主性,以及集体性的族群认同。

许多雇主会把穿旧的衣服、用过的玩具当做“礼物”送给雇主眼中为贫穷所困的外籍女佣,这些二手货就算陈旧不实用,家务移工碍于雇主权威也不能加以回绝(Rollins 1985; Romero 1992)。相对于此,星期天的消费活动则是让她们在后台自我培力的一种方法。虽然在台湾购物消费并不比菲律宾便宜,但逛街购物为她们带来一种自主的尊严、心理上的满足感,也变成一种女性经济独立的佐证。例如, Maria 在来台湾工作之前,在菲律宾是全职的家庭主妇,访问时,她一面用手拨弄着耳上悬挂的金耳环,一面向我解释出国工作的收益与成本:“在国外工作很困难,但你赚到很多钱。现在我可以买我自己想要的东西。在菲律宾,要靠我丈夫的薪水,而且也不够买我现在有的东西。”

此外,相对于平常孤立隔离的工作状况,星期天成为移工社群集聚的时机场合,她们得以交换有关劳工权益的政令资讯,或是日常生活中的抵抗策略,更重要的是,她们提供情感上的相互支持,伏在彼此的肩头上哭泣,或相互揶揄“身为女佣”而开怀大笑。当我和一群菲律宾女人在星期天的公园野餐时, Nora 对我和其他人开玩笑:“我以前不会跳舞喔。但我开始当家务帮佣以后,我放假回到菲律宾,我妹妹说,‘哇,你现在懂得怎么跳舞了。’”然后 Nora 夸张地摇着屁股模仿拖地的动作,“因为我每天做这个,肚子都没有赘肉了!”

路人可以轻易辨识出移工周日聚会时的嘉年华气氛。她们唱歌、跳舞、分享食物,偶尔喝点小酒、抽根烟,将公园及其他公共空间转化为野餐地点与节庆场所。这些休闲活动不仅脱离了日常工作,也与她们在故乡时的生活不同。海外生活的自主性,让女性移工得

以摆脱家乡村落的父母控制与保守规范。此外,周日宛如嘉年华的聚会活动也创造了乌托邦时刻,让移工可以暂时逃离工作时的压迫关系。<sup>8</sup>跳舞时的身体摆动尤其能帮助移工释放情绪压力。一位印尼移工告诉我,第一年到台湾时,她几乎每次休假都泡在迪斯科舞厅,因为:“我不开心,去跳舞,我通通忘记。”

后台区域的界线不只借由地理空间来区隔,也透过时间来界定。大部分雇主会明订外籍帮佣的收假时间,“宵禁”的时间从五点到九点不等。移工们通常都在外面撑到最后一刻才愿意回雇主家,即使是在附近打公共电话给朋友也好。

某个星期天傍晚, Claudia 和我坐在人行道的椅子上消磨她宵禁前的最后一小时。我揉着整日在城市中闲逛后酸痛不已的腿,喃喃地说:“喔,你们实在有够了不起。每次我跟你们出来,我总是累瘫了。我不敢相信你们早上六点就出门,直到回去的前一刻却还是这样精力充沛!” Claudia 回答我:“你知道实情是什么?我们很累,但是当你想到你必须再等六天或者更多天才能见到这些朋友,你不想回去!所以你尽情地玩!你不再感到累!就像是灰姑娘一样。明天,你要回到另一种生活!”

就像灰姑娘的四轮马车,在午夜钟响后会变成南瓜,舞会里的公主只能回到厨房里,与扫帚共舞。移工在周日嘉年华的尾声,也必须卸下化妆、关上移动电话,脱下时髦的衣服,换回屈卑的围裙。

## 后台的语言抵抗

跨国灰姑娘常进行的另一个后台活动是聊雇主的八卦。平常,她们必须赞美雇主、假装愚笨。但一到周日,她们会交换雇主的有趣糗事、揭露家庭秘密,例如,洗衣服时在男主人的衬衫口袋找到一

个保险套。她们也会批评雇主糟糕的品味与生活习惯,借此建立自身或我群在文化秉性或生活风格上的优越性,翻转相对于雇主的阶级排序。

某个星期天,在台北美术馆旁边的公园里,我跟移工们照例席地野餐,不时有路过的台湾游客不解地盯着我们看。一位菲律宾移工问我:“Fried rice 你们说炒饭,对吧?”我点头,她随即骄傲地跟她的同胞宣布:“我们菲律宾人吃炒饭当早餐,但我的雇主吃炒饭当晚餐。他们不是说我们菲律宾很穷吗?可是我们吃的是真正的晚餐,不是炒饭!哼,台湾人还觉得他们是什么社会名流(socialites)?”在另外一次的菲劳聚会里,Judy 谈论她的雇主:“台湾男人不好,有些很恶心,我的老板吃槟榔,他总是把槟榔汁吐在地上!”她模仿他吐的样子,大家都笑了。

Rina Cohen(1991: 204)指出集体八卦与玩笑在这样的脉络中所具有的潜在政治意涵:

笑话跟笑声对个人而言不只是纾解紧张的机制,也是允许参与者重新诠释经验、分享彼此确认(reassuring)的沟通,并且提供凝聚力和支持,把个人经验转化为集体经验。

借由八卦雇主,家务移工将自己从备受监视的客体重新定位成行动主体。她们在嘲笑、批评中暂时翻转了阶级位置,宣称自己成为比雇主还优越的评鉴者。前面已经提过,具有大专学历的菲律宾移工的英文能力比许多台湾雇主好,这个状况让嘲弄雇主的英文,成为菲律宾移工之间常见的一个八卦主题。<sup>9</sup>

某个星期日,几位先前在新加坡工作过的菲劳,与我慵懒地坐在大安公园的草地上闲聊,她们聊到跟雇主用英文沟通的情况:

Grace:我觉得在这里[台湾]说英文比较自在。

Carlita: 在新加坡, 他们会纠正我们的英文, 因为他们学的是英式英文, 我们学的是美式英文, 跟这里比较像。在新加坡, 他们不说 vase 跟 God [用美国腔]。他们说 vahse 跟 Gohd [夸张的英国腔]。

作者: 他们认为你的英语是错误的?

Carlita: 是啊, 他们认为我们是错误的, 而且我们应该用他们的方式说。

作者: 所以当你说, 你觉得在这里说英文比较自在, 是因为这里的英文跟你说的比较像, 还是因为这里的人英文说得比你烂?

Grace: 当然是第二个原因啰 [笑]。

Carlita: 我的雇主说: “啊, 你的英文说得很好”。我心里想“才不咧, 我的英文不怎么样。”他们要我说慢一点, 但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慢了!

Grace: 我雇主的朋友也对她说, “啊, 有个人免费教你英文真好!”

几个主要的亚洲地主国/地区, 包括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 都曾是大英国的一部分。即便在后殖民时代, 英式英文于这些社会仍有强大的影响力。1965 年独立成国的新加坡, 由于政治精英多有留英背景, 加上避免国内种族冲突的考虑, 教育上推动双语政策, 尊英文为共通语言, 视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为地方语言, 直到 1979 年后才开始推动“讲华语运动”(洪镰德 2002)。在独立后成长的新加坡人, 特别是中产阶级, 不论在正式场合与家庭生活中都普遍使用英文, 或是混杂一些马来话、福建话与广东话词汇的新加坡式英文(Singlish)。在香港, 虽然大部分的香港人说广东话, 但在 1997

年回归中国之前,英文是官方语言,也是各级教育使用的主要语言(Crystal 1997)。

如同上面的对话显现的,新加坡雇主对于什么是“正确”腔调或“标准”英文抱着既定看法,就是英国腔。这样的看法反映出殖民地语言惯习(linguistic habitus)的内化,即使他们说的其实是承袭英国腔调的新加坡式英文。然而透过这个方式,新加坡雇主建立了他们的权威,坚持他们语言展演的优越与正当性,远胜过于菲律宾人的“错误发音”(带菲律宾腔的美语)。

在台湾,英文并非通用的语言,这样的情形使得这项语言资本的价值相对增值,并且扩大了跨国雇佣关系中环绕着英文所进行的象征斗争的灰色地带。有些菲佣基于他们较善于展演英文——一种他们认为更有经济价值、更受文化认可的语言——而取得相对于台湾雇主的文化优越感。而当他们接受了这个全球语言的象征霸权的同时,他们也会贬低其他语言,如同他们的雇主贬低菲律宾方言一样。

我在教会义务教授的中文课里包含了闽南语的一些基本词汇,以便利她们照顾老人与日常生活中的方言使用。有些菲律宾学员跟我抱怨闽南语很难学。Helen 更直率地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里的人不说英文?那些百货公司的小姐长得又漂亮穿得又时髦,但她们一点英文都不会说!我不知道她们在学校学些什么?她们浪费她们的时间,然后现在我们要浪费我们的时间来学这个蠢语言!

另外一位菲律宾大学毕业生,Suzanna,在斗六小镇的台湾家庭工作。我在当地访问她时,她对学闽南语表达了类似的抱怨:

他们要我教他们的小孩英文,但我必须先学台语。他们说

如果我不学台语,我仍然是个笨蛋,即使是个大学毕业生……你不要跟他们说喔——其实他们才是笨蛋!英文在这里没什么用。也许我应该去加拿大,我不想学台语,太难了。

更常见的是,菲佣经常揶揄台湾雇主的烂英文跟口音,以此象征性地反抗台湾雇主的权威,如以下几个例子:

有一天他们[雇主]出去要我自己看家。他们从外面打电话给我:“Jamie, you go sleep first. Don't wait for us. We will come home eleven YEARS. [eleven o'clock] (你先去睡,不用等我们,我们会在十一年后[意指十一点]回家)。”我紧张地在电话里大叫:“Eleven years? But I'm here only for three years! (十一年?但我的契约只有三年耶!)”

我的雇主从办公室打电话给我说:“Luisa, twelve hours, don't forget to eat my children! (Luisa,十二个小时,别忘了吃我的小孩!)”她实际上的意思是说:“Luisa, twelve o'clock, don't forget to feed my children! (十二点,别忘了喂我的小孩!)”[笑]

我的天啊,你有纠正她吗?

没,我的雇主不喜欢被纠正。所以我只回答:“别担心!我已经吃了你的小孩了!”

这些笑话蕴涵了关于工作内容、劳动条件及劳雇互动等丰富讯息。当菲律宾移工与同伴分享这些笑话时,她们从劳动者的观点重新诠释了工作经验,并呈现了一个大不同于雇主指派的工作脚本的对抗论述甚至行动。许多移工嘲笑雇主下达指令的方式,例如:“divorce[divide] the chicken and pry[fry] it when oil is dancing[boiling] (当油跳舞[滚]的时候,把鸡肉离婚[分开]并打听[炸]它)”。



另一个常见的话题是当雇主无法使用正确的英文来下指令时造成的误解。例如,一个雇主要求她的女佣去“丢(throw)信”[意指拿信去邮筒寄],而该女佣非常尽职地把信都丢到垃圾桶去。

某种程度上,这些笑话可以暂时的翻转雇主与劳工,或本地人与移工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Constable 1997a: 176)。然而,交换笑话与笑声的行为仍多隐藏在移工周日的后台活动中。在前台,她们仍必须表演谦卑与遵从工作纪律,谨慎地抑制或掩饰她们对雇主的挑战与反抗。她们有意识地避免纠正雇主的英文,以防被解约遣返。Vanessa 聊到 Carina 这位被老板解聘的直率朋友时,提到自己的策略是“从不与老板吵架”:

你记得 Carina 吗? 她喜欢跟她的雇主争辩。她纠正她雇主的英文。我跟她说,不论他们说什么,你接受就是了! 不要纠正他们! 他们说,你“丢下”汤,他们指的是“把汤放下”。Carina 跟他们说:“太太,不对喔。”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喜欢她! 千万不要跟你的雇主争辩! 他们不喜欢你处于比较高的地位。我知道很多事,但这些我从来不在雇主面前秀出来。我只鞠躬和点头,说 Yes 跟 No。

## 灰姑娘的手机

在描述跨国灰姑娘的前、后台双重生活后,接下来我将检视家务移工如何使用手机来对抗地理限制。手机作为一种跨越空间藩篱、方便人们同步沟通的无线科技,为使用者创造了一种“时空的同时性”感,这正是全球现代性的鲜明特征之一(Pertierra et al. 2002)。手机这项科技一向被赋予信息传递无远弗届、随时随地自

由流动的形象。然而,手机讯号虽然可以超越地理的疆域,却未必能跨过权力的界线。科技造成的时空压缩效果,仍然被社会权力的几何学所中介。以下,我们将看到科技如何可能成为权力控制的媒介,却也提供了弱势者生存与反抗的空间。

2002年秋,我开始第二阶段的田野工作时,惊讶地目睹手机在移工间的高度普及。<sup>10</sup>今日,全世界的手机使用数目已超过电话(Accountancy 2003)。台湾是这项科技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移动电话的拥有率全球最高。<sup>11</sup>移工也不自外于这股快速扩张的手机风潮。这项科技产品的“行动”特质呼应了家务移工跨国度的流动性,但也和她们被禁锢在雇主家中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

在一定程度上,手机能让人们在沟通时不受实际距离及空间固



图八 两位印尼移工在周日的台北火车站 作者摄

着的限制。然而,行动资讯科技彰显了地理学家 Doreen Massey (1994) 所形容的“时空压缩的权力几何学”——科技进步所造成的时空压缩效果,并非同质普及,不同的群体与个人,因为社会位置的差异,能够运用时空压缩以进行跨国迁移与连结的机会也大不相同。

家务移工使用手机的方式,突显了她们的阶级位置与公民身份的特殊性,呈现出身为住家帮佣与弱势移工对时空关系的特殊体验。她们用手机来协商私领域边界及展示消费能力。手机可以帮助她们削弱或抵抗劳动控制,但它也可能变成雇主监控的工具。无线科技甚至创造了一个虚拟交友世界,让移工建立网络、维系家庭连带,或追求爱情缘分。

### 隐私空间的角力

有些移工是在雇主的允许甚至鼓励下使用移动电话。此举可以方便雇主在移工外出办事、接小孩时,即时联络与沟通。也有些雇主是为了避免移工使用家中电话,以防接到昂贵的国际电话费账单,偏好移工使用分开的电话号码,因为陌生人的来电代表了一种越侵亲密界线、破坏家庭隐私的打扰。

但也有些移工被禁止拥有或使用手机。雇主不允许她们工作时打或接电话。有位移工引述她雇主的话:“为什么你要打电话?你一打,就不工作了。”虽然家务移工长时间在家工作,有些雇主仍担心她们会偷懒。打电话,或“玩电话”(根据一位受访雇主的说法),被雇主认为可能让帮佣工作分心。在一些例子中,雇主甚至派小孩当眼线:如果外籍保姆在白天使用电话,小孩就会向父母报告。

雇主也可能因为劳动控制的理由而禁止移工使用手机。例

如,他们试图阻碍移工与其他移工联系,怀疑移工会彼此交换与自身权利有关的资讯,增加“逃跑”的几率。易言之,雇主认为电子通讯会妨碍他们维持移工在地理上的固着性。讽刺的是,有些雇主也基于同样理由允许移工使用手机。他们不想让移工使用公共电话,是因为怕她们借此理由外出,实则“和男孩勾搭”或“与邻居闲混”。

尽管遭到雇主反对,许多外劳偷偷地使用手机。她们只在晚上开机,或调成无声、振动模式。这是移工为了保护隐私不被雇主侵犯而偷偷构筑的“手机后台”。对那些受雇主严密控制(没有休假、不能外出)的移工而言,手机是他们唯一能与外界接触的管道。在经过一整天漫长的工作后,与家人或同乡的交谈,朋友传来的短诗、笑话或图案,帮助她们纾解疲累与寂寞。但是,她们经常必须缩在被窝里低声说话,担心雇主发现,或是怕吵到同住一房的小孩或病人。

某些例子中,手机成为监控移工动向的工具。有些雇主会借手机给移工,以掌握移工在外的行踪。雇主的来电于是成为一种对移工私领域的侵犯,在她们(休假外出时)的后台创造了一个与工作相关的“手机前台”。移工有时在周日会接到雇主以小孩或老人为理由要求她们早点回家的电话。有些移工为了避免额外的工作而选择不将电话号码告诉雇主。当雇主问如何联络她们时,她们只淡淡地回答:“不用麻烦了,我常换号码。”

## 预付卡与短信

移工使用手机的方式在许多方面都和台湾人有不同之处。第一,移工通常使用预付卡,而非按月付费的门号。这是因为台湾的电信业者多要求外国籍申请者提供一名台湾公民作为担保人,或是

支付台币 2000 到 3000 元的保证金。这对受雇于企业或学校的外籍专业移工或教师而言,问题不大,他们容易得到公司或同事的担保(许伟晋 2003)。然而,很少有家庭或工厂雇主愿意为低阶移工背书,他们在没有人脉与金脉的状况下,别无选择只得使用费率较贵的预付卡。

台湾媒体已创造了“外劳卡”这个新词来形容外籍契约工普遍使用预付卡的情形。警察单位则担心有些台湾人会利用外劳的个人资料申请移动电话门号,然后用于犯罪之途,因为预付卡的门号纪录难以追踪,不利警方调查。<sup>12</sup>台湾的警政署长针对 2005 年发生的静宜女大学生绑架案曾这样评论:“如果嫌犯不是使用‘外劳卡’,我们可能可以抓到人,受害者不一定会死。”<sup>13</sup>这桩绑架事件发生后,购买预付卡的规定对外籍人士变得更为严苛。<sup>14</sup>这些规定不仅旨在预防手机的使用沦为犯罪工具,也反映出警政单位视短暂居留的移工为治安网的重要缺口。

“外劳卡”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污名,暴露出台湾社会潜在的对于这群外来客工(以及他们难以追踪的手机号码)的不安与不信任,在静宜女生撕票案后,内政部决议要严格管制外国人使用易付卡(限于两张),却没有正视移工所面对的社会钳制,以及他们对于讯息与沟通的需求。

第二,移工也常因昂贵的电话费率而经常使用短信(SMS)这种较便宜的通讯服务。短信除了花费低廉外,它也让使用者可以等到方便的时间再回复来电。短信这种不中断当下生活的特点对移工尤其重要,因为在雇主视野范围内或工作时,她们通常是不准接手机的。具有不同步沟通功能的短信让在前台工作的移工,能同时维持后台的沟通。<sup>15</sup>她们可以开着手机但关掉铃声或改成震动,如此她们便可随时收到朋友的短信,稍后再行回复。



手机的使用者常因短信长度有限,而使用同音异义字、缩写或其他简称来节省空间和金钱。比方说,“u go out sndy?”是“Are you going out this Sunday?”的简述;“hapi 2 c u, gudnyt”意谓“Happy to see you. Good night.”。手机研究者已经注意到,青少年尤其会自创只有小团体能理解的俚语和新字(Ling and Yttri 2002),同样地,移工也运用既有的或发展新的语言代码来便利与家人、朋友间的快速沟通。这些“群体专属的语言惯习和代码”(group specific linguistic habitus and codes)(Geser 2004: 13)划定了群体间的界线,并巩固内部的认同感。

我收到的移工朋友寄来的短信经常混合了英文、马尼拉语或印尼话(Bahasa Indonesia),及中文罗马拼音。例如,“i just I 2 say, cie cie, slmat”的意思是“I just want to say, cie cie(中文‘谢谢’的拼音),salamat(印尼语的谢谢)。”这种“语言混搭”的现象彰显了她们跨越数个文化领域的临界(liminal)位置。一开始收到这样的短信时,我很难解出这些代码的意义,尤其对于她们即兴式地将中文拼音化,但彼此都能明确了解对方的讯息而感到惊讶。像这样的中文拼音方式显示出,对移工来说,中文与其说是语言资本,更像是求生工具,帮助她们在异乡的日常生活中存活。

短信不仅促进个人间的沟通,更是一种可迅速、广泛且便宜地传播公共资讯的工具(Lasen 2002)。短信是孤单工作或没有休假的家务移工交换彼此讯息的一个重要平台,家乡新闻及最新的台湾地区政府移工政策,都是她们交换的资讯之一。此外,夹带笑话、短诗、相片等由手机按键上的符号组成的连环讯息,也常在家务移工之间流传。移工们常借由这些小创作及幽默的文字互相打气,排解工作上的无聊和寂寞。

近来一些事件已证明,短信具有以低成本发起集体行动的潜





图九 一家移工常去的商店,橱窗上满是预付卡的展示 作者摄

力。举例来说,2001年1月,菲律宾电视报导当时的总统 Joseph Estrada 未犯下贿赂和贪污罪,拜短信资讯传播所赐,短短两小时之内有20万人聚集马尼拉街上,要求总统辞职。<sup>16</sup>短信的集体动员能力在菲律宾这个每天约发出一亿条短信的国家尤其明显。<sup>17</sup>旅居海外的菲律宾移工更是频繁的短信使用群。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期间,中东地区的菲律宾大使馆借着这项电子通讯工具,和菲律宾社群保持联系(Asis 2004: 14)。在台湾,移工间的集体政治行动虽有限,但短信的交换仍替逐渐蓬勃发展的移工草根组织提供一个公共平台。<sup>18</sup>移工会员利用短信告知团体集会的时间,并通知那些因工作而无法参与的人未来的活动。

最后,对于资源匮乏的移工来说,手机提供了多重的功能,可以替代其他短缺的电子设备。当雇主不允许移工使用收音机、电脑,

或她们缺乏这些物品时,她们便利用手机听广播节目或查收电子邮件。有些手机内建相机,这个功能也让移工可以在特殊场合拍摄有用的相片。在2005年1月发生的飞盟外劳抗争事件中,转换到不切合雇主的菲律宾移工,利用手机中的相机功能拍摄工厂中恶劣的工作环境,这些相片后来成为他们向劳委会争取工作转换机会的重要证据。<sup>19</sup>轻便又多功能的手机是移工重要的日常科技与工具,让他们能在生活中挣脱空间限制、争取更多的资源。

### 消费现代性与游牧亲密关系

消费是表达自我与彰显认同的重要媒介。购买手机这项容易展示的商品,对于想要展现消费能力的移工来说非常重要。轻薄、昂贵、新上市的手机最受移工欢迎。一位印尼移工解释,囿于同侪压力,她们别无选择,只能从众消费:“印尼人的手机都是这么小的。如果你买大的,大家会笑你:‘这是一只鞋子啊?还是一个闹钟?’所以一定要买小的。”许多移工不只为自己也为家乡的家人购买手机。移工合约终止或放假回乡时,最新款式的手机是她们必送家人的礼物。

移工消费手机除了具有“炫耀性消费”(Veblen 1912/1994)的象征意义,也基于务实的功能。因为印尼和菲律宾的许多家庭都未牵电话线,这两个国家的手机市场成长非常快速。在菲律宾,拥有手机的人数有2200万(总人口是8000万),但有线电话只有670万个号码,而且其中只有一半的号码被登记使用。<sup>20</sup>印尼使用手机的人数光在2003年间就成长了60%,2004年的使用者总数已超过2000万,占总人口的9%,根据市场预测,此数字在2008年会达到6000万。<sup>21</sup>

虽然流离在外,跨国移工仍可借由这项无线科技维系“游牧式

的亲密关系”(nomadic intimacy)(Fortunati 2001)。跨国家庭的情感连带建立在许多越洋电话及短信上,一些母亲移工甚至每天传短信给孩子。根据一篇菲律宾当地的研究(Pertierra et al. 2002),一位妻子在香港工作的菲律宾男性,每天早晚都会各接到一次妻子打来的电话,他觉得“她就在旁边一样”。这篇研究发现,手机对跨国婚姻的维系有正面的影响,因为夫妻可以在电话中分享亲密的时刻。这种亲密关系有时可以透过图像式的想象,例如,上述的移工妻子挂电话前喜欢巨细靡遗地引导丈夫进行想象的亲吻,从头亲到脚。此外,手机也让跨国夫妻得以监视彼此,预防外遇。

然而,便利的无线科技所费不貲。许多移工的手机和短信花费非常可观。根据许伟晋(2004)的调查,移工使用预付卡的花费平均每个月是台币 1637 元,仅次于食物花费(台币 2001 元)。一些我认识的移工甚至每个月花费近 5000 元在使用手机上,是每月薪水的三分之一。

移工建立“游牧式亲密关系”的对象,不只限于故乡的家人或亲戚。有些人也用手机扩展人际网络,寻找恋爱伴侣。我认识的有些印尼女性借此寻觅到在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国家工作的男朋友,也有些移工情侣经由朋友介绍而隔洋认识交往。以海外移工为目标群众的杂志也会刊登附手机号码的个人广告。我的一些移工朋友也透过跨国电讯发展出远距离的亲密关系,有些甚至计划等回国见面以后,便商讨结婚的可能。

总结来说,手机科技带来的便利沟通可以培力使用者,但解放的可能性也受到使用者的社会位置所中介。随着自由、自主的增加,个人所要担负的责任也越大,也越可能将自己暴露于新形式的社会控制。<sup>22</sup> 移工使用手机的方式(预付卡或短信)反映了她们在客国的边缘处境,包括非公民地位及高压的劳动条件。雇主可能鼓

励,或者禁止移工使用手机,但两者的意图皆在增强对于移工的劳动控制;然而,移工也借由手机的消费与使用,展现了能动性。借由与移工同伴及远方家人的隔空联系,家务移工松动了她们在实际生活中所遭遇的空间区隔与孤立处境。

## 全球城市里的边缘客人

台湾的移工社群没有明确的空间界线,也不是一个全天候运作的族群聚落。他们的活动断断续续——周间沉寂,只有周日才有活动;他们的成员来来去去——大部分的移工并未住在活动地区里,而是休假时才以消费者的身份造访。移工社群的这些特质再次反映了,家务移工在地主国政府与受雇家庭的强制规范下(只能在台湾短暂居留以及必须和雇主同住),如何以独特的方式体验时空关系。

即便有以上局限,在台湾的移工,借由神职人员、东南亚华侨及配偶等其他跨国移民的支持,仍旧发展出自己的社群。透过人与商品的流动,这些商业取向的聚落,满足了契约移工所欲求的社会活动与消费需求。而来自不同国家的移工,通常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活动与聚居。这样的社群生态固然源于族群聚落的规模经济,但也反映了移工族群之间的市场竞争关系。下文中,我将介绍台北的菲律宾与印尼移工迥然不同的社群空间,两者皆展现了台湾社会对于移工既纳入又排除的空间整合模式。

### 中山:充斥商业利基的宗教圣地

朴素的圣多福天主教堂坐落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三段。该教堂自50年代美军驻扎台湾起便提供英文弥撒的服务,附近的农安街

上则林立美式酒吧与餐厅,现仍是住在台湾的西方人经常造访的地段。此一地标象征了台湾过往对于美国的政治与经济依赖,以及当前与菲律宾的跨国劳力输入连带。圣多福教堂自90年代初即成为周日休假菲律宾移工最常群聚的地点,为了因应日益增加的菲律宾信徒的需求,这座教堂除了英文弥撒外,现在也举行马尼拉语弥撒。根据菲律宾传教士的估计,每周日参加马尼拉语弥撒的信徒至少有3000位。

教堂周围的地区,被移工称为 Chungshan(“中山”的拼音),移工只要告诉不谙英语的出租车司机,要“去中山拜拜”,便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此地也被台湾人昵称为“小马尼拉”及“菲律宾城”,菲律宾文字出现在此区域的许多店铺招牌,不论是杂货店、餐馆、卡拉OK店、汇兑与货物寄送等,随处可见。到了周日,大街上净是台湾与菲律宾商人叫卖各种商品,包括菲律宾报纸、杂志、音乐CD、电影DVD、罗曼史小说、衣服、内衣、金饰、化妆品、行李箱、床单、打字机,甚至二手电脑等。移工也可在这买到手工制的家乡小吃,在教堂后面的小巷,也有移工假日兼差发挥手艺,提供同乡廉价的剪发、烫发、修整指甲等服务。

在大街上交易可省下租金与税金,但这种非正式经济也有它的成本与风险。由于街头摊贩在台北市是非法生意,巡逻警察的出现常令移工心惊胆跳(合法与非法皆然)。因此,小巷中的小贩与小吃摊在近年来逐渐搬迁到邻近的万万商场二楼。这座商场以往有许多店面闲置乏人问津,自从涌进移工生意后,现已生气勃勃。

移工生意被收纳进正式经济之后,文化资源受限且不能合法在外工作的契约移工,难以进入商场开店做生意。因此,Chungshan地区的多数店面都是由华侨或嫁至台湾的东南亚女性(所谓的外籍配偶或新移民)所经营管理。这些台湾社会“内部的外来者”(outsider



within)<sup>23</sup>,透过跨国网络进口货物,替来来去去的客工重现了家乡的生活方式。有些店的老板也利用移工担任零售商品的下线,卖网络电话卡、手机预付卡、多层次传销产品或批发牛仔裤给同乡,成为移工赚取额外收入的副业。

大部分的商场店面都只有周日或周末才营业。当店家的营业时间如此短暂,他们该如何平衡店面租金与其他支出呢?其中一个解决之道是提高食品与服务的售价,而移工们并不会因价钱高昂而却步。Jessie 是一家卖有中式与菲律宾风味料理的小吃店老板,她在访谈中说:“他们[指移工]一个星期就只能吃这么一次家乡口味



图十 中山北路上的菲律宾商店与放假外出的移工 作者摄



的食物,所以根本不在乎要付多少钱。”店家平衡收支的另一个方法是与当地商家结盟。例如,一些台湾人经营、只服务本地客人的早餐店在周日会变成菲律宾小吃店;还有一家菲律宾卡拉 OK 店,则是向当地的社区中心承租周日的场地。

通过中介介绍嫁给台湾男人的 Jessie 来台湾已十年有余,拜近年涌入的菲律宾移工商机所赐,她的小吃店生意极为成功,也因这样的收入来源让她赢得丈夫与公婆的肯定。就如 Lisa Law (2001) 指出的,品尝家常菜可以创造熟悉感,让移工得以借由味觉连接,想象重回故土。像 Jessie 这样的婚姻移民在迁移的文化经济学中举足轻重,因为食物是协商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记(王志弘 2006);她们的烹饪技巧与知识或许不受夫家赏识,却对标记移民社群的文化差异与族群认同大有贡献。<sup>24</sup> Jessie 虽已在台湾落地生根,但仍不时感觉自己被台湾人看成外人,移工顾客的陪伴让她在异乡得到一种归属感,她说:“他们就像我的兄弟姐妹。每逢周日,我就好像回到我的家乡。”

台湾生意人也察觉到移工的消费力所带来的潜在可观利润。他们将市场区隔等级,在不同时段或以不同商品来服务本地顾客与移工消费者。佐丹奴、Hang Ten 等低价位的服务品牌已在此区开设畅货中心,每逢周日常举行过季或瑕疵品的特价拍卖。一些迪斯科舞厅会将周日下午这个鲜少受台湾人欢迎的时段,设定以菲律宾移工为主要客群。有些舞厅甚至提供免费巴士,载送移工从圣多福教堂直达舞厅。同样地,附近的宾馆也针对移工情侣在周日下午推出特价的“休息”房间。

对台湾人来说,中山北路三段是个以婚纱摄影闻名的商业地段。圣多福教堂不远处即有许多展示了华丽婚纱礼服的商店橱窗。台湾人结婚前拍摄婚纱照很常见,这种仪式可让准新娘体验、享受

宛如公主般的华丽一天(李玉瑛 1999)。<sup>25</sup>然而,美丽的新娘及象征西方童话故事成真的奢华婚礼,与形象被污名化的东南亚移工不太相配。当地商店与居民抱怨移工带来的噪音与混乱,几度投书报纸,用激动的言词抗议外劳星期天的聚集,严重破坏了小区的生活质量和安全。<sup>26</sup>他们也害怕“小马尼拉”、“菲律宾城”等名号会拖累当地生意与地产价值,尤其因为周日是婚纱拍照与房地产经纪最忙碌的日子(吴比娜 2003)。



图十一 菲律宾移工在中山北路圣多福教堂前的节庆游行 作者摄

菲律宾移工在中山区的集体现身改变了台北的消费文化地景,圣多福教堂不时配合菲律宾的节庆,举办花车游行等活动,为台北街头添增多元文化的缤纷色彩。移工利用购物来展现自身的消费

能力,抵抗工作时的卑微与无力感。本地的生意人为了赚更多的钱,张开双手欢迎这群客居消费者;华侨与新移民头家则与他们的打工仔同乡重聚,在移民经济中取得商业利益。移工固然被消费资本主义接纳收编,成为低价商品与冷门时段服务的抢手顾客,然而,他们仍没有被台湾的公民社会接纳为其中的一员。如吴永毅(2007: 41)所言,移工的周末聚会是一种集体化的“强迫出柜”,边缘族群被迫在公众空间展示秘密生活,却也使他们的“他者性”被放大检视。当地居民仍视移工为肮脏的种族他者,玷污了奢华的白纱礼服,以及社区的中产阶级形象。

### 火车站:人流与网络的节点

由于穆斯林女性传统上不被允许进入寺内祈祷,清真寺并未成为以女性为大宗的台湾印尼移工的活动中心,不若天主教堂一般,成为菲律宾移工文化认同与政治动员的重要据点。相对起来,印尼家务移工休假时的活动较分散、流动。台北火车站遂成为印尼移工最主要的聚集地点,是他们空间移动、人际网络与活动串连的节点。

台北车站是座现代化的六层楼建筑,内含公共电话亭、厕所、商店、美食街等公共设施。这座全栋空调的大楼为移工遮风挡雨,舒缓他们在夏阳冬雨的台北生活的不适。他们通常就在一楼大厅席地而坐,聊天、打盹、共享零食或家乡食物,或阅读从楼上商店买来的印尼杂志。饿了,他们可以在印尼熟食店慰劳自己思乡心切的胃;无聊时,他们可以到地下街商场购物,或去附近街道上印尼华侨开设的小型舞厅及卡拉OK吧杀时间。

在火车站活动的东南亚移工与台湾行人,被一条不可见但坚固的界线所阻隔。大部分的台湾人行色匆匆,赶着去买票或坐车,他们经过大厅时,有意识地与群聚的移工保持距离,或是下意识地避

免眼神上的接触。1989年改建的台北车站,其设计原意是要打造一种流动感,并预防无家可归的游民在此聚集(吴美瑶 2004)。因此,灯火通明、挑高宽阔的大厅并无设置任何座椅,等候区则设在地下楼(直到近年来才在时刻表下放置几排座椅)。建筑师脑中的空间意象,却因集聚移工的即兴使用而产生变化。台北车站成为移工的野餐地点与暂时的避风港,根据一份 2004 年的调查,移工周日平均在此耗上六个小时。<sup>27</sup>

当我和印尼移工坐在大厅地板上分享她们带来的家乡小吃时,不时有路过的台湾人对我们投以嫌恶的眼神。Utami 摇摇头,向我说明,她们试图把车站大厅转化为家中客厅,在此复制席坐的生活习惯,以舒缓在异乡的社会与文化疏离感:

台湾人觉得这样不好,坐地板,很丑、很脏。不管他,我们习惯了。我们在印尼那边,睡觉是地板、看电视是地板、吃东西在地板……在这里[火车站],我们吃印尼菜、说印尼话、买印尼东西,好像我们在印尼,不是台湾。

对孤立雇主家工作的家务移工而言,火车站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引领他们进入流动的移工网络。大部分的印尼移工一个月只休一或两天假,因此,她们的休假日未必和(人数有限的)朋友一样。许多人试着在火车站交新朋友,以在休假日做伴。她们常在火车站和“同学”(指由相同的中介业者在印尼招募的移工,她们来台前曾在训练中心共度数月时光)重逢,也会利用墙壁上的数字(例如 B20 等注记),来将火车站冷冰冰的公共空间“地盘化”或“后台化”,标志特定角落为与朋友定期聚会的地点。

像这样的公共空间的私人化,是社会资源匮乏的社会群体不得不的空间策略。然而,外劳星期天的“野餐”却引起不少台湾民众



的微词。一位台北市议员在台北车站对 276 名台湾旅客进行调查，其中有 70% 的人对星期天外劳制造的噪音和混乱感觉“恶心”或感觉很“坏”，有 90% 看待此一现象为“不良的次文化”，会破坏火车站作为台北地标的现代形象。<sup>28</sup>



图十二 印尼移工与作者(右数第三位)在台北车站大厅野餐 作者摄

这样的抱怨，与其说是基于公共卫生安全的考虑，更多是因为移工把台湾的公共空间“后台化”，所导致的不安与焦虑。一个台湾雇主在访问中描述，当他星期天早上搭着经过圣多福教堂路线的公交车时说：“你相信吗，那天我是公车上唯一台湾乘客！我感觉很怪，甚至有点害怕！那时我真的怀疑究竟我身在哪里？”如此恐惧感的浮现，是因为多数者变成少数者，支配者的前台变成弱势者的后台。换言之，“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界线被入侵，并翻转了‘自我’与

‘他者’的位置。”(Yeoh and Huang 1998: 593)

台北车站是一个城市交通的辐辏点,移工可在此搭捷运或公车到台北各地旅游。它也是散居各城市的移工在周日的最佳聚会地点,他们可利用火车轻松到达桃园、中坜等聚集大量工厂移工的邻近县市。<sup>29</sup>许多在台北工作的印尼移工几乎每周日都搭火车到桃园(历时四十分钟),桃园于是成为火车站延伸出的另一个重要的移工聚落。除了租金便宜外,另一个使桃园成为受移工欢迎的集会地的原因是,有许多男性移工在桃园工业区工作、居住。由于大部分来台的印尼人是女性,因此在桃园常看到由泰国男性、印尼女性组合而成的情侣,彼此用有限的中文字汇沟通。

如果你有机会拜访桃园后火车站一带,从大街上穿过地下道,你便会发现自己置身与街上地景迥然不同的奇异之地,满目所及是兜售电话卡、手机配件、廉价玩具的小商店。台湾地区政府长久以来一直忽视桃园火车站后方这块区域的开发,而今当地充斥许多三层楼的移工商家:通常一楼是小吃店,二楼是卡拉OK吧,三楼是舞厅。走访该处的移工,可以享用沙嗲肉串、泰式炒米粉;还可以买到椰奶、虾饼,或在舞厅遇见恋爱伴侣;有些餐厅也提供播放泰国或印尼综合新闻及节目的卫星电视。

桃园相对于台北县市,是个比较不受国家发展计划重视的后台领域。首善之都台北是金融与服务业重镇,桃园则深受缺水与空气污染之苦。这座卫星城市也是制造业工厂自过度拥挤与昂贵的首都迁往他处的首选。移工的商业聚落从台北扩散至桃园,也是遵循类似的空间分布模式。移工聚落在桃园的区位甚至远离主要的公共街道,换句话说,它坐落于后台区域的后台、边缘城市的边缘。

印尼移工告诉我,她们在桃园活动时感受到的疏离、拒斥感没



有像在台北市那样强烈。在台北,印尼移工逛街的地点通常是火车站地下街,少有人走出火车站,过马路到对街五十二层楼高的新光三越百货。有一个夏日午后,我和移工朋友从二二八公园走向火车站的路上,大汗淋漓的我贪图吹冷气,建议大家穿过百货公司。许多人面露迟疑,表示从来不敢走进去,因为“害怕进去,那里的东西一定很贵。”有些胆子比较大、曾经进入该百货公司的移工,感觉自己被销售人员看不起:“他们看到我们都不一样啊。他们会 smile 对你们台湾人,欢迎光临,这样,对我们都不会啊,他们都不一样,觉得印尼人是佣人、poor people……台湾人看我都这样子(鄙视状),干吗,我不是垃圾,不是垃圾桶啦。”

特别要说明的是,台北火车站的二楼之所以会成为移工店家聚集的空间,有着历史的偶然。由于台铁与金华百货自 1993 年来发生租约争议,在争讼期间,金华百货不愿迁出,台铁也无法重新招商、转租。在这段过渡期间,移工商家方得以低廉租金进驻车站二楼。2005 年最高法院判金华百货败诉后,微风集团取得地下一楼至二楼的空间经营权。2007 年 10 月开张的二楼美食街,配合同年 3 月通车的高铁,以明亮奢华的时尚空间,提供中高价的中产阶级消费。台北火车站的空间已被重新改造、细心管理。在保全人员持续巡逻下,一楼大厅不复见到移工休憩的身影,移工的群聚空间已经被排挤到火车站外的露天空间。

劳委会及一些地方政府都曾经提出管理外劳休闲生活的议案,如规划特定场所,迁移外劳到封闭性较高的地方(吴挺锋 1997: 107)。其基本动机在于维持我群与他者的隔离,并局限外劳的公共后台,以维持有效的监控管理。这类全面隔离的计划从未付诸实行,而招募移工已有十多年历史的台湾,已发展出一种“边缘纳入”(marginal incorporation)的空间模式。意即,台湾社会能接受移工的

共存,只要他们处于空间与社会的边缘。印尼移工周日活动的空间便彰显了这样的“边缘纳入”:他们分享了火车站所带来的舒适冷气与交通便利,但群聚的身影集中在大厅的角落或资本遗忘的边陲;他们用平日的劳动与假日的消费力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提供贡献,但他们只能在地下商场翻捡折扣商品,而不敢走进象征中产阶级时尚的摩天楼百货公司。

## 跨越多国的旅程

除了经历工作日、放假日的社会空间作为前台与后台,跨国灰姑娘粉墨登场的另一组前台与后台,是地主国/母国的空间区隔。家务移工在第一组的前台中,面对雇主观众,扮演女佣。置身第二组的前台时,返乡后的移工在亲人、朋友、村民等观众面前,扮演的是凯旋归来的“海外英雄”角色,工作的黑暗面——艰苦、沮丧、疏离的经验——常隐藏在后台,只跟同在异乡的移工们低声倾诉。同样地,她们必须隔离前台与后台,不让前台的观众看到她们在后台的情形,也就是在台湾工作的实际状况。不少家务移工(特别是地位向下流动的菲律宾移工)甚至对故乡的亲朋好友隐瞒或模糊他们在台湾的工作情况。有位受访者说:

我在台北的街上遇到一个菲律宾的邻居。她是老师。她叫我不要告诉其他人在台湾看到她。很多人甚至不告诉她们的家人和朋友在台湾做什么。他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洗碗和洗狗!

Marilou 是一名二十九岁的菲律宾大学毕业生,来台湾帮佣已经五六年。当我初次询问她能否接受访问时,她问我:“你之后会将

它刊登在报纸上吗？上次有些记者来，想拍我的照片。我说，不要、不要。我不想菲律宾的朋友看到我在台湾擦地板。”几周后，Marilou 跟我说，最近多接了几件“有氧运动”（aerobics，菲律宾家务移工以此代称在雇主家以外的兼职清扫工作），因为她要赞助高中母校举办同学会，捐了 100 元美金。我问她既然无法参加同学会，为何还要捐钱。她回道：“他们要整建学校，到处找赞助。OCWS（Overseas Contract Workers 海外契约移工）是最主要的募捐对象，因为我们在国外工作，他们觉得我们赚的钱比较多，应该多捐一点。”

移工除了试着隐藏后台的黑暗面以维持出国工作的光彩，要在前台扮演成功致富的海外英雄，最重要的剧目是透过有形的物质消费，来展现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的改变。改建水泥房子、购买现代家电、让小孩读私立学校、拥有进口玩具，这些象征现代性、全球性的物质实践，突显出移工与其他从未出国的菲律宾乡民的差别。星期天的中华路挤满了前来购物的移工，DVD 放映机是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马尼拉国际机场的行李运送带，总是塞满了跨国移工度假或归国时寄运的大型纸箱，许多台湾的家电行甚至号称他们的产品在菲律宾也可享有一年的保固期。

对于跨国移工而言，度假是脱离繁重工作、返乡探望家人的难得机会，然而，短短的一两个星期的假期，往往花费她们相当的金钱。有些移工甚至害怕这样的“大失血”，而放弃假期。打算回家度假的移工，通常数周前就要开始有计划地准备给亲朋好友的礼物或是现金；由于返乡的消息往往传遍街坊，对于前来凑热闹的邻居，移工也未能免俗失礼地送上台币几十块的小礼物。Madeline 跟我解释这样的送礼行为实在是面临社会压力而身不由己：

你知道，别人想你在国外工作一定很有钱。所以假如你没

有带钱回家,他们会笑你:“这算哪们子出国?”你必须买田、买房子、开店做生意。[无奈地耸耸肩]这是菲律宾人的生活方式。

海外移工的财力展示,经常是面对家乡观众期待的不得已表演。除了返乡度假要送礼,在国外工作时,也要面对来自母国的各式各样募款、借钱的要求,例如亲戚小孩的学费、母校的募款,甚至是邻居的生日宴会。面对这样的请托,移工往往觉得很难全然拒绝,一方面是有丢脸(losing face)的社会压力,如果不能满足这样的财务需求,意味着她们的海外淘金梦的失败。

然而,返乡的移工要在家中维持光鲜亮丽的生活风格并不容易。Judy 是年近三十的单身菲律宾女性,她对我解释为什么她的姐妹经年在海外数个国家工作:“她们买了许多东西,车啊,家庭用品之类的。(然后)他们在菲律宾很久都找不到工作,他们必须卖掉车。他们再次出国工作,然后再次借钱。”Judy 认为这种不断循环的迁移旅程是无可避免的命运,因为:“待在菲律宾,你牺牲。到台湾,至少你赚了钱,而且可以买任何你想要的东西。你可以攒钱回家、做生意。”然而,我问她到底有多少移工开始做生意,她的语调由明亮转为阴霾:“这我就知道了。”

“创业”(starting a business)是移工描述未来蓝图的常见说法,这样一种资本主义逻辑下的文化叙事,相当程度地影响她们对于自身阶级认同时序性的理解——暂时困于险滩的外籍帮佣,将转换为未来衣锦荣乡的小头家。所谓“创业”,通常指的是经营传统的小商品生产生意,例如 Jeepneys(吉普公车)<sup>30</sup>、三轮车及小杂货店。极少数的人投资在较复杂的经济活动,或是运用他们在海外工作所获得的技术训练。

人类学家 Raul Pertierra (1992) 指出两个因素来解释返乡移工 (菲律宾人称呼他们为 balik - bayan), 对小商品生产投资的偏好。第一, 这些投资形式可以象征地体现他们在经济不发达的当地社会中的相对富裕地位。第二, 这些投资可以满足家族成员期望共同分享或管理经济收益的需求。返乡的女性劳工购买的吉普公车和三轮车, 通常是由她的兄弟或丈夫来驾驶。Balik - bayans 在返乡之后通常没有正式的工作, 或至少在刚返乡的前几个月会在家休息, 以此彰显出他们在地方上的相对优越地位。而她们立志创业的抱负经常随着时间而磨损, 因为他们在国外工作存的钱逐渐被出国过程中的负债、亲朋好友的借贷、以及维持家中的生活及消费品消耗殆尽。<sup>31</sup>

2002年2月, 结束田野工作两年半后, 我再次到菲律宾拜访几位先前在台湾工作的移工朋友。她们大部分处于无业或等待出国工作机会的情况, 也有一部分的人已经移居到香港、以色列及加拿大, 继续海外家务劳工的生涯。其中一位从菲律宾写信给我, 希望我能介绍在台湾的工作机会。当我问她为什么放弃在菲律宾安定下来的计划, 她在电子邮件中这样回复:

我知道我原本说不打算回去, 但这是唯一让我赚钱的方法, 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走回老路。假如你是一个在国外工作过的人, 你会很难调整接受菲律宾的生活形态。你不能接受在这里的薪资。你觉得钱太少了不习惯。然后诱惑就进入你的心里——假如海外有机会何不再出国工作?

当海外劳工已习惯在地主国的薪资水平及生活形态后, 他们通常发现很难适应于菲律宾当地的微薄薪水。而且, 回到国内的劳动市场, 他们通常必须从基层开始, 因为其人力资本的价值在长期出



国从事非技术或半技术的工作后已贬值。Marilou 是菲籍移工口中的“ex - Taiwan”或“ex - abroad”，她以假名申请二度来台以规避台湾地区政府的单次入境规定。<sup>32</sup>当她的第二次合约濒临结束时，她对于下一步该往哪里走感到彷徨：

你要做什么？你会再来台湾吗？

不，我在台湾的经验够多了——五年了！我的雇主要我改名[再回来]。我说我已经厌倦改名字。我担心当我回家那时候我会忘记自己的名字[笑]！

所以你会留在菲律宾？

也许吧，我真的不知道。[在菲律宾]我必须从基层干起。我想到薪水就觉得很困难，尤其当我已经习惯这里[台湾]之后。

不想归零回到菲律宾的劳动市场，Marilou 决定前往全球市场，尤其是加拿大与香港，寻找工作机会。<sup>33</sup>许多移工返乡后也常有错置感，觉得与家人及环境格格不入，而倾向寻求下一个海外工作。在不断循环的迁移旅程中，多数人无法跳脱家务服务这个“职业贫民窟”(occupational ghetto) (Glenn 1986)，即便是透过“入住看护计划”(Live - in Caregiver Program)到加拿大工作的移工，虽然在雇主家工作 24 个月后就有权申请长期居留，并从事其他的职业，但由于她们在母国获得的学历与专业技能在加拿大不受认可，再加上种族歧视的因素，许多人在取得公民身份后仍然很难顺利转业，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移工故事在加拿大俯拾皆是。<sup>34</sup>

较常发生的向上流动，是在找寻下一个海外家务工作时，攀爬上较为高阶的地主国。亚洲家务移工的迁移目的地，可依薪资与劳动条件的高低，区分成四种等级。最底层是中东国家，移工在当地所享的人权与福利最差，但中介费用、进入门槛最低。<sup>35</sup>第二层包括

马来西亚、新加坡等薪资略高于中东地区的国家。<sup>36</sup>以上这两层目的地吸引的通常是经济资本与教育程度有限的移工。此外,来自菲律宾民答那峨岛及印尼的穆斯林移工也常因宗教理由,选择前往同为伊斯兰文化的中东及马来西亚工作。第三层是台湾、香港等移工报酬受最低工资保护的地区。<sup>37</sup>到这两个地方工作的移工通常先前已有海外工作的经验。加拿大位于地主国地位阶梯的最顶端,不仅因为家务移工在当地的薪资最高<sup>38</sup>,更重要的是,移工在两年暂时性的工作居留后,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获得申请移民的机会。

移工对不同地主国的偏好主要是受到当地的薪资水平的影响,但他们也考虑该地中介费用的高低,其额度通常与薪资成正比。地主国的阶序于是变成移工向上移动的阶梯。许多在台湾工作的外劳先前在中东、新加坡或马来西亚工作过;基于先前在海外工作经验所累积的资本,她们得以负担来台湾的高额中介费。在台湾工作的同时,她们也一边存着钱,一边寻找到更好的客国工作机会。

第四章提到,为了提供子女更好的教育及物质生活,是许多移工父母出国工作的主要动力。对这些跨国移工而言,阶级流动的定义不一定是本身的流动,而是代间的流动,小孩完成大学学业的那一天,往往是她们迁移旅程的终点。四十岁的 Shiela 是两个孩子的妈,为了筹募两个女儿的大学学费到国外工作。她打开皮夹里的女儿照片,如数家珍地告诉我她们的身高体重、交友生活。她叹了一口气,苦笑着说:“我的女儿明年要毕业了。我非常骄傲。我是个女佣,但我女儿将成为老师!”

另一个移工妈妈 Madeline,同样是四十出头,在菲律宾有两个孩子。与丈夫分居不久后来到台湾,约满前夕她离开雇主的家,变成所谓“逃跑外劳”,为的只是能多留在台湾几年,不用再非法更换名字,以及支付昂贵的中介费。转眼间,她已经离开孩子有六年之

久,访谈之际,她准备向警方“投降”、离开台湾,好在6月回家参加女儿的大学毕业典礼。她骄傲地告诉我:“我付钱让女儿上大学。她是我最大的资产。我能把我的女儿秀给别人看!”然而,当我问到女儿毕业后的计划时,她这样回答:“我喜欢台湾。也许我会带女儿回来这里,[她可以]在工厂工作。”

如前述,跨国移工在亲朋好友前,通常会选择性地呈现出国外工作中较正面的经验,如此一来也影响到她们的子女或兄弟姐妹对于出国工作的文化想象,许多从而跟随父母或兄姐的脚步,前赴海外这个想象中的机会之地。吊诡的结果是, Madeline 这几年在国外工作累积的“最大资产”——她的女儿——可能也即将成为未来的跨国移工。

移工常认为海外工作只是舒缓经济困难的暂时解决之道,期待能够带来她们在未来或是下一代的阶级流动。她们常想象在乏味的海外工作后,可以创业成功,甚至梦想返乡后能“风水轮流转”,有专属的家务帮佣随伺在旁(Parreñas 2001)。但事实上,不是所有灰姑娘的童话故事都有幸福结局,只有少数人能在短期间内顺利脱离迁移的恶性循环,多数人仍滞留在不同地主国间循环流动;而移工的经验对其子女生涯选择也有相当的影响,结果经常在世代间复制了类似的迁移轨迹,为全球经济繁衍了下一代的跨国移工。

## 多层次的前台与后台

家务移工的社会位置与空间经验在许多方面具有矛盾吊诡之处。她们的工作场所理应是家庭生活的温暖空间,却布满控制与监视的冰冷线路。她们来到追求与国际接轨的全球城市,生活空间却往往局限于看不见的阴暗角落。尽管在物质空间里的行动处处受

限,她们利用手机与电子讯息来打造跨国连带与离散社群。虽然她们被雇来维系客国家庭的社会再生产,所居城市却提供极少资源来满足她们的集体消费。

本章的分析扩充高夫曼“前台”、“后台”的理论概念,来连结微观的人际互动与结构层次的权力不平等。前、后台的比喻阐释人们对于多重空间领域的社会认知,而这样的空间认知反映,体现将移工排除或边缘化的社会秩序。在雇主家中,客厅是家人与客人所用的前台,厨房与阳台则被归类为“女佣的空间”或“后台领域”。至于具有阶序高低的不同都市地景,则以不同的方式来因应移工的集体现身。台湾人反对移工聚集在台湾火车站,害怕他们成为台北这座全球城市在前台形象上的污点。然而,桃园的后火车站,可以说是“后台城市的后台区域”,此地遍布的移工商业活动便较少引来台湾大众的批评。

前、后台的概念也可用以描述这些跨国灰姑娘如何在不同空间领域里协商多重的认同表演。在雇主面前,女性移工要“表现得像个女佣”。只有到了周日,她们才能卸下顺从的面具、穿戴上自我宣称的形象。在亲朋好友面前,移工借由展现物质收益与旅游经历,扮演“海外英雄”的角色。她们的受苦与异化是只能在后台向其他移工吐露的秘密。许多移工返乡后为了维持物质水平或社会地位,常感到别无选择,只得再次离家、出国工作。

我也要强调,前/后台界线是可渗透的,空间的意义是权宜性的,可以重新界定,也可以抵抗改造。当看护工被要求与照顾的病人同住时,卧室的私密空间,被雇主转化成没有隐私壁垒的工作场所。当移工在周日与同乡朋友在火车站、公园等地聚会野餐时,她们把公共空间“私人化”,筑起一个没有屏障的暂时家园。手机帮助家务移工在公私不分的工作环境里建立一个隐藏的“手机后台”,但

雇主也可插入一个“手机前台”，遥控介入移工的休假时空，召唤她们回家工作，扩展监视与控制。下一章，我将继续探讨雇主与移工如何在日常互动脚本中部署空间界线，以及他们如何在不同模式中协商彼此的社会距离。





## 第六章

# 屋檐下的全球化





我们常听到雇主描述说,他们对待雇用的帮佣“就像家人一样”。然而,家务雇佣关系的特色,却是地理距离的亲近和社会距离的遥远的吊诡组合。劳雇双方同居一个屋檐下,日常饮食声息相闻,的确近似家庭成员的关系,然而,彼此之间又存有明显的地位差距,以及权力关系的不对称(Glenn 1986)。有人说,全球化促成了更频繁的跨国界、跨族群的人际互动,应该可以逐步消弭社群间的偏见与排斥。但是相反的情形也经常发生:跨界的人际互动,结果反而强化对于“混杂”的焦虑,以及促生彰显差异、划清界线的欲望(Ozyegin 2000)。本章将深入探究雇主和家务移工的日常生活互动,刻画双方如何确认、协商、重构彼此之间看不见的社会差异与公私界线。

既有文献已捕捉到雇主的互动脚本中存有变异:Judith Rollins (1985)在波士顿亲身担任帮佣,观察到白人雇主借由扮演“慈祥的母亲”或“家母长”(matriarch)的角色来确认黑人女佣的卑微、从属地位。在十多年后访问洛杉矶雇主的 Pierrette Hondagneu - Sotelo (2001)则发现雇主的态度有着更多样的类型:富裕的白人女雇主的家母长风格虽仍普遍,但中产阶级双薪家庭的雇主既无时间、也无精力与家务劳工经营情感关系。她们与按时计薪的清洁工保持疏远的距离,或者以“策略性的情感关系”(strategic personalism)与人

住家中的保姆相处,以确保照护工作的品质。

同样地,家务劳工也基于不同考量,以各种方式与雇主协商社会距离。有些偏好生意般关系(*business-like relationship*),借由明定契约内容,来专业化家务与照顾工作。<sup>1</sup>但也有研究发现,许多被清洁公司雇用的家务劳工其实比较喜欢直接被私人家庭雇用,因为她们可以自主地选择雇主,并可以从劳雇的私人关系中得到好处,<sup>2</sup>甚至可以策略性地诱发雇主的阶级罪恶感来取得福利和加薪。<sup>3</sup>此外,虽然有不少家务劳工希望拥有自己的住处,以保障个人隐私空间,但也有些劳工偏好与雇主同住,以降低房租开销,或缓和新移民到异地生活的困难(Anderson 2000)。也有与雇主同住的家务劳工渴望与雇主有个人接触,视情感关系是雇主尊重他们、以人相待的一种表现(Hondagneu-Sotelo 2001)。

上述这些广泛多样的观察说明了,家务劳工或雇主都不是同质的群体。他们依自身既定的特殊社会位置、工作内容与雇用条件,发展出不同的偏好与策略。为了进一步解释雇主和家务劳工在态度和策略上的多样性,我发展了两组类型学的分类来区分他们在划界工作上的不同取向。这样的分析架构植基于劳雇双方对于两类主要社会界线的关切。第一类是社会类属界线(*socio-categorical boundaries*),区分了雇主和劳工之间的阶级区分,以及国籍/族群差异;第二类是社会空间界线(*socio-spatial boundaries*),构筑公/私领域的疆界,对雇主来说,勾画出“家”与“家庭”的范围,对移工来说,则是“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线(参见第五章)。

我在导论一章中已经提到,社会差异与界线是透过日常生活的实作中持续地被再制、强化或修正。家务雇佣关系里的“划界工作”——劳雇双方如何看待与建构彼此之间的差异与区别——特别突显在食物、空间与隐私等三个家庭生活里的微观政治面向。第五

章已初步检视了家庭空间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被布署为一个既排外、又收编外人的场域。本章将进一步讨论食物以及隐私,如何成为标示家庭界线的日常斗争场域。

吃饭是维系家庭连带的重要日常仪式。家庭成员在共同进餐的例行场合分享资讯、协调活动以及传承社会规范与文化价值(McIntosh 1996)。准备家人的餐点,不仅是单纯的买菜或煮饭劳务,也包含对于家庭成员口味和营养需求的了解与关切,因此被社会学家描述为是一种“建构家庭”的情感劳动(DeVault 1991)。食物管理既可以是凝聚家庭情感的媒介,也呈现出家庭成员内部的不平等。家庭中的食物消费经常根据年龄、性别与经济责任来进行分配,显示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阶序(Delphy and Leonard 1992)。在父权传统规范下,女人和小孩常不能与男人一起吃饭,分得的食物较少或质量较差,而且一家之主的喜好决定了食物的口味。

延续上述的理论轴线,许多研究家务帮佣的文献已经指出,雇主借由食物管理来界定家务劳工边缘化的位置。<sup>4</sup>透过对进食方式的安排(谁可以上餐桌、坐在哪个位置、谁先谁后)及家庭食物的分配(谁得到较多、较好及较多样的食物,以及配合谁的口味与需求),不同的雇主以不同的策略,标示出多层次、伸缩浮动的家庭界线(那些人、在何种情境下构成家庭的一分子),以协商与家务移工——住在同一屋檐下的外人与他者——之间又远又近的距离。

隐私代表着一种“社交上的不可接近性”(social inaccessibility)的状态(Zerubavel 1981: 138),建立在对物质空间或是私人资讯的保护上。由于工作与同住的关系,家务劳工可以轻易得知雇主的家庭秘密、雇主夫妻争吵的理由,或甚至性生活的细节。雇主也许厌恶家里有个局外人,但也可能主动对家务劳工曝露个人资讯。有些家务劳工认为,扮演雇主的诉苦对象的角色证明了他们和雇主的私



人关系,但也有些劳工则认为这只是种额外的工作与情感负担。虽然劳雇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隐私,但隐私无疑是一种依照阶级不平等而分配的权利。如 Barry Schwartz (1968) 所指出,组织里的高层人员的隐私,在结构上受到层层中介保障;下层阶级的隐私则易被侵犯,因为他们较无法支配那些可能触探他们隐私的人。换句话说,私领域的日常协商与阶级及种族不平等的斗争,密不可分。

除了强调雇主与家务劳工的划界工作有着异质差异,我也试图以三个主要的结构性因素来解释为什么某些雇主或劳工,会倾向采取某些取向的划界工作:第一,阶级定位——雇主的阶级位置和家务劳工以往背景的相异或相似处;第二,工作指派——工作内容中,照顾工作和家务工作的相对比例<sup>5</sup>;第三,雇用状况的时空安排——雇主有多少额外的时间和空间,以及雇主和家务劳工一起在家的时间有多长。这些结构性因素交织成一张复杂的坐标图,形塑了雇主与家务移工的多重主体位置,以及彼此间的互动样态。

## 雇主的划界工作

我先讨论雇主的划界工作,因为他们有较多的权力来形塑雇佣关系的互动脚本。基本上,雇主关心的是两种主要的界线类型,他们一方面要权衡以何种程度纳入或排斥移工为家中的成员,另一方面,他们要考虑的是要强调或淡化他们与家务劳工之间的阶层差异。根据这两个面向,我将雇主的划界工作区分为四种类型:家母长制、疏离权威、情感关系与生意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些范畴是韦伯式的理念型(ideal types),在实际生活里,这些范畴不是截然互斥的分类,而是连续的构成,个别雇主会随着情境的转换,采用一种或混合多种方式来进行划界工作。我也要强调的是,雇主和家务劳

工的划界工作,未必是有明确策略或意图的行动;人们往往仰赖默会致知(tacit knowledge)来塑造对自己与他人的了解。

表四 雇主划界工作的四种类型

阶级/ 国族差别	家庭界线	纳入	排除
强调		家母长制	疏离权威
淡化		情感关系	生意关系

疏离权威：“你不是我的客人，你在这里工作”

我穿过中山北路恼人的车阵，转进仰德大道，循着地址好不容易找到位于阳明山上的李太太家。那是一个拥有大庭院、三层楼的独栋别墅，环抱鸟瞰台北城景。李先生经营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四十岁出头的李太太在结婚之后，成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我瞄着院子里目露凶光的黑狼狗，略带惊惶地按下电铃，菲佣很快跑来应门，引我进入摆满红木古董家具的客厅。桌上已经陈列了许多精致的小点心，放在充满展示意味的昂贵瓷盘里，等待着我的光临。李太太几分钟后才现身，举止优雅、面露微笑欢迎我。在三小时的访谈期间，她从未向我介绍家里雇用的菲律宾移工，尽管她屡次以高昂的声调和略为夸张的英文口音，唤菲佣进来替我的茶添加热水。

李太太的雇用模式，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疏离权威。高夫曼(1956)和 Rollins(1985)已经指出，家务劳工的一个重要工作内容是表演谦卑，包括语言、姿势、空间或工作内容等层面。在台湾，家务劳工的雇主被尊称为“太太”和“先生”，或者是“Madam”和“Sir”，但雇主多直呼移工的名字(不含姓)。很多时候，当雇主觉得移工的母语名字太难发音时，甚至会自己帮移工取一个发音像中文

的名字。此外,很多佣人的工作内容是种仪式性表演,意在彰显雇主的身位地位。例如雇主自己有钥匙,仍要佣人来开门;有些台湾雇主虽然人在家,仍要求菲佣接听电话,尽管菲佣不太会说中文。这样的谦卑表演特别容易发生在对家庭外成员的展示,如一位受访者描述她同样雇用外佣的亲戚:“我舅舅就说自己‘过着像国王一般的生活’,我们去他家就叫菲佣榨果汁给我们喝。”这些雇主购买的不只是佣人提供的劳务,还有她们的谦卑表演,换言之,雇用帮佣成了一种范伯伦所说的“炫耀式消费”(Veblen 1912/1994)。<sup>6</sup>

食物的消费,是雇佣关系里另一个象征阶级差异的日常实作。许多家务劳工与雇主都向我提出这方面的抱怨,劳工说雇主“小气”,雇主则认为佣人“贪心”。对某些雇主来说,尤其是女性雇主,分配家庭成员食物的权力象征了他们对家务工作范畴的掌控。举例来说,李太太充满自信地向我解释她成功的“食物管理”规则:

我的原则是,你不是我们的客人,你是来这里工作的。我不要你未经我允许擅自拿任何食物。这是我家,你必须遵守我的规则,我才能控制好这里的每一件事。虽然我这方面很严格,但偶尔我也会专程买些零食给他们,放在他们的桌上。但是未经我的允许。即使一小块糖他们也不能拿。

李太太在意的不是食物本身,而是对食物分配的控制。家务雇用关系中的食物管理牵涉到:第一,吃什么,以及替谁准备的。对各式食物的阶序分配彰显了雇主和女佣之间的地位差异——昂贵相对于便宜、肉相对于蔬菜、正餐相对于零食、新鲜食物相对于剩菜,一些雇主甚至在家里以不同的冰箱分别存放家人和女佣的食物。第二,如何吃及在哪吃,也有地位上的区隔。中介公司常建议他们的雇主客户和移工分开进食,用不同的碗盘、不同的桌子,或在不同

的房间吃饭(佣人拿着独立餐盘到厨房吃是最常见的安排),或者在时间上作区隔,要佣人等雇主吃完后再吃。这些建议不仅反映一种认为移工的文明程度及卫生习惯堪忧的种族偏见,分开进食更是一个重要的日常生活仪式,套句受访者的话,彰显了“主从之分”。

访谈后,李太太很得意地带我参观她新装潢的房子,每个房间都摆设了主人精选的古董家具与艺术画作。在我几度请求下,她才不太情愿地带我去看女佣的房间,那是只有一个小窗户的小房间,里面只摆了几件基本家具,墙上贴的则是工作表与工作规则。佣人房的简陋,与屋内其他摆设讲究的宽敞房间形成了强烈对比。上层阶级住所的平面配置图体现了空间的阶层差异。佣人房通常地方小、空调差,隐身于厨房旁、阁楼或地下室等较看不到的角落。家庭空间的安排也有明显的阶层差异,佣人的活动空间多局限于厨房、餐厅、小孩房间、阳台等。

虽然聘雇女佣、购买她们的谦卑表演,是雇主彰显身份地位的一种“炫耀式消费”,但地位取得的过程却未必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布迪厄(1977)主张,阶级“惯习”(habitus)的培养,意指同一阶级的成员经久内化与培养出来的习性,需要一个缓慢、冗长的过程才能体现。<sup>7</sup>在雇主之中,拥有较长的雇用历史的上层阶级,特别是那些毕生享受奢侈家务服务的老一辈的有钱人,体现了较明显的阶级惯习,特别表现于他们对家务劳工高高在上的口语表达以及疏离的肢体语言。<sup>8</sup>

今年二十九岁、刚生下一个小孩的 Emily 和公婆同住,她的公公是位退休的银行家,这个富有的家庭共雇有两名家务移工。访谈后,Emily 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当我们用餐时,女佣们留在客厅照顾大声啼哭的小婴儿。也许是当着我的面,Emily 对于这样的进食安排不太自在,频频招呼客厅里的女佣,她的婆婆相较之下似

乎早就习惯了家务劳工被边缘化、隐形的地位。饭后,Emily带着歉意地以背景养成的差异及阶级属性,解释她跟她婆婆雇主风格上的差异:

家里大部分是我婆婆在管,她是规定一些工作,哪里脏要打扫啊,她不会跟她们聊她们家里的事,我比较闲比较会跟她们聊天。

你比较常跟她们聊天?

对,我会去厨房看她们做什么菜,会聊一聊,关心一下,主要是聊小孩。

你婆婆呢?

[压低声音]我婆婆可能是因为请人的历史比较长,对她们的关心程度就比较少,这也很自然,因为你从小到大都有佣人,就很习惯这样的地位,我就比较不会。

有什么差别?

真的是有差,我们基本上不是有钱人,所以我们对她就比较客气[笑]……我觉得,有钱人比较容易把佣人当下人看……我觉得对她们有钱人来说,家里一直有做不完的事,东西会不干净,像这个沙发[摸有灰尘],就不及格,地板可以每天擦啊,地毯每天吸啊,对不对?他们对环境清洁的标准比较高。

大部分上层阶级的雇主,在过去雇用的是本地的中年家务劳工,也就是所谓的“欧巴桑”,许多人后来改聘雇移工,原因不是为了减少薪资成本,而是因为他们不满意本地家务劳工的态度和表现。四十多岁的朱太太,是一位总经理夫人,雇用家务劳工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她说明自己直到三年前才下定决心改雇外籍的帮佣,背后的原因与转变过程:



以前听到很多菲佣不好的事情,不敢请,所以只好忍耐。我最后请的那个台佣,那时候已经找不到人了,我自己九个月临产,因为要人家帮忙坐月子啊什么的,我婆婆就拜托人家来,听说那个欧巴桑以前在大户人家帮佣很多年,现在五六十岁,在云游四海。喔,那个来了就姿态很高,叫不动,很老油条,她说我只管照顾小孩,其他的我做不动,清洁的我还要另外请钟点的,煮菜她也只会煮几样,我说我来教你,我在厨房喔,她就远远地坐在餐桌那边看,喔,气死我了。有一回我朋友来,她也不应门,就说:“看是谁人来?”,我就去开门,我朋友看到一个老人家翘着腿坐在那边,问我:“这是你搭家[婆婆]是无?”我说:“不是,我家请的。”,我朋友说:“那有派头甲粗!”客人来了,她也没端茶水什么的,每天就把小孩放在婴儿车里,一只脚摇啊摇。我跟自己说:“好,够了,我不能再忍耐了。”

家庭访客把女佣误认为婆婆,这个事件是驱使朱太太放弃本地家务劳工的最后一根稻草。雇用一位肤色五官上有较明显差别的外国人,不仅可以降低误认的风险,并确保了劳雇双方的地位差异。大部分雇主发现,相对于本地的欧巴桑,要求外籍移工表演谦卑是比较容易的。一些拥有多国女佣聘雇经验的雇主也指出,他们比较满意印尼女佣,因为她们的说话方式及身体语言表现得比菲律宾移工更谦卑。

不仅是不同族群的移工与雇主互动的模式有别,雇主本身对待本地女佣和外籍女佣的方式也明显有异。六十岁的谭先生是一位退休的小工厂老板,他认为这样的差异乃是理所当然:“就是身份问题,因为不同国籍,她是外国人,我们台湾请的一样也是我们台湾人,你是台湾人,我也是台湾人,虽然你是帮佣,可是我们也是在这



里长大的,那就比较没有分那么清楚。外籍女佣就不一样。”另一位雇主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因为同样是本国人,你要怎么样把她放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好像也很难,因为你也不希望孩子有一个下人的感觉,所以要孩子叫她阿姨,不会叫她欧巴桑。”

当雇主雇用的是同国同族、属于“我们的一分子”的家务劳工时,即便有阶级分野,仍觉得在某个程度上,必须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他们。然而,家务移工的“异族性”(foreignness),则强化了阶级不平等,让这些雇主认为采取疏离权威的互动态度变得理所当然。本地与外佣之间的差别待遇,最具象征性的就是进食的空间安排。不同于多数外佣是与雇主分开吃饭,我访问的一些雇主表示,过去请台佣欧巴桑帮忙时,就没有“特别去分”而同桌进餐。许多雇主也表示,台佣较“喜欢坐上来一起吃”,“做好要请她来吃”,<sup>9</sup>外籍女佣则“比较客气”、“比较识相”,许多偏好分开吃、自己到厨房吃,这部分的原因我将在后面讨论。

事实上,这些雇主们认为是“自然而然”的差别态度,乃是植基于本地与外籍家务劳工在社会资源与结构位置上的明显差距。首先,是否拥有在劳力市场流动转换的机会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在国家外劳政策的背书下,移工被强置在一个暂时、边缘,且无法转换雇主的“奴工”地位,本地的家务劳工则至少可以“用脚投票”。许多雇主描述先前雇用的欧巴桑的态度:“她跟我说,其实我小孩大了,我也不缺钱,我出来工作只是打发时间,我知道她在暗示我不要要求太多,否则她就不做了。”“台佣会比较敢。反正台佣大不了不做嘛。”“本地人有什么工作条件的要求,她会直接表示,或者干脆不想做了,因为本地的可以寻求另外的 job market,姿态比较高,可是菲佣就只有唯一的一个工作机会。”

其次,本地的家务劳工可借由其社会网络来协商出最有利的工

作条件：他们可以在街头巷尾道“坏”雇主的不是、破坏其名声，或者影响同为帮佣的朋友替他们工作的意愿。相反地，移工在台湾是相对孤立的，缺乏在地的人际网络或是社会资源可以作为“弱者的武器”。

朱太太在辞去本地欧巴桑、改聘外籍家务移工后，感觉到她的家庭隐私和社会名声有了更好的保护屏障：

请菲佣，家庭的私密性比较高，你在家里谈什么事，佣人也听不懂，可是如果第三者是本地的，她语言都通，你在家里批评谁，比方像选举的时候，你家里说什么，或是家人的性格缺点，都可能被她拿出去说，她跟你家里没什么关系，可是她家里状况什么都知道，你要是有头有脸的人，给说得不堪。像我也用过一个台佣，就很爱串门子，放炮，有的还放消息去卖钱，后遗症很大。

和本地的家务劳工相比，外籍家务移工比较不会打扰到雇主的家庭生活，因为他们不熟悉当地语言或人脉。由于家务移工被隔绝于在地的社会关系和文化脉络之外，雇主便能轻松维系一种疏离权威的劳雇关系。此外，雇主雇用女佣的历史愈长久，愈容易习惯对她们的存在“视而不见”。上层阶级的豪宅大户不仅提供了宽敞的物质空间，也在主人与仆役之间隔开了明显可见的社会距离。

家母长制：“我是她在台湾的监护人”

我在飞往印尼做田野调查前，在桃园机场遇见胡太太和她的印尼女佣 Atik，我们先后排在等待划位的队伍中。Atik 的行李很多，航空公司的柜台人员冷冷地说超重要罚钱。胡太太回头看我，低声拜托我同情、协助她的“可怜女佣”。我答应帮忙将装着电子锅的箱

子登记为我的行李后,胡太太表示感激,拍着 Atik 的肩膀交代她说:“这位小姐人很好,她会在飞机上照顾你的。”胡太太的整个家族都陪着 Atik,直到她走进海关。看到她们流泪相拥道别的画面,我深受感动。几周后,我约好跟胡太太进行访问,访谈内容却与我的第一印象大为不同。她与 Atik 之间宛如家人的情感连带之下仍有着严厉的阶级支配关系,只不过被裹上温柔的语调与隐晦的形式。

近五十岁的胡太太在大二时结婚,随后休学,虽然未拿到学位,但她在桃园拥有一家餐厅,并经营一些零售副业。她雇用 Atik 照顾不良于行的婆婆,除此之外,还要打扫餐厅。我在第二章开头引用了她描述第一天遇到 Atik 的心情。她以皮肤、颜色,乃甚至味道等种族化的词汇,来形容她所认知的“外劳”与我族的差异。她对于家中要雇用一个种族他者,心中燃起怀疑与焦虑:“完蛋了、完蛋了,怎么一个外人黑漆漆的,一个黑人要住我们家两三年啊,怎么办、怎么办?”

胡太太逐步克服了自己面对外族人在家近距离相处的恐惧,她如此描述:“那还好,我的个性是很容易化解自己的疑问,送回家以后,我们就好像她的导游一样,帮她介绍环境啊,介绍工作啊,介绍家里的成员啊,然后我们去买东西都买她一份,慢慢就变成我们家里的一员了。”尽管如此,这位“黑皮肤外人”的实际处境,并未如胡太太所宣称或认知的,享有“家人”的地位。Atik 待在台湾的三年里没休过一天假,也不被鼓励与家庭之外的人接触。不论她去哪里,胡太太都会安排一个餐厅员工陪同。这些空间控制规则意在隔离 Atik 与其他移工,因为胡太太认为,移工间的人际网络非常“危险”:

这个 Atik 她的好是,她很纯,她来三年,她没有对外接触过……但是,我会替她介绍人脉。我朋友家有印尼[女佣],我会

带她去她家,让她跟她聊天,他乡遇故知嘛。有时候,我会打电话去我朋友那边,叫她跟印尼人讲话。我说:“Atik,某某人家也是印尼的哦。”然后我会跟对方讲:“我们 Atik 很乖哦、很漂亮哦,改天我带我们 Atik 来跟你认识哦。”然后,她去她们就会聊天,然后就变好朋友,这方面就会让她认识。

但是一定要是你朋友的,你才放心。

外面的,我没有让她出去过,因为,菲律宾为什么后来会给人家形象那么不好,就因为他放假出去,他们都是一票、一票在一起,然后互相会叫对方做坏事,比如说偷拿东西啊,或是怎么偷懒啊。你要做坏事,一个人也做不了,但是你有力量,有对方当家人那样的支撑啊,那个信心又不一样。

为了保护 Atik 不受移工“家人”的“坏”影响,胡太太将她“收养”在自己的台湾家庭里。这位保护型的雇主剥夺 Atik 的休假时,会带着她一起与家人外出和晚餐。胡太太并替她“介绍人脉”,过滤“安全”的移工给她交朋友。在另一个雇主的例子里,Peggy 和她同样雇用菲佣的朋友们,她们每隔两个月就会带移工去看电影。这些雇主开车带她们进电影院、帮她们买票,然后在电影演完后准时来接她们。

犹如 Mary Romero(1992: 110)描述的,采用家母长制(maternalism)风格的雇主认定家务劳工是无助的、未成熟的、没有能力处理自身生活的弱者,相对而言,雇主认为自己是慷慨、体贴、优越的监护者。家母长制不只确认了雇主的阶级地位,也更强化了他们的种族优越感,并且符合女性提供照顾、关爱及满足家人情感需求的角色(Rollins 1985: 179)。对这些雇主而言,独自住在地主国且与雇主同住的家务移工,就如同她们的未成年女儿一般,亟须她们的照

顾与监护。

四十一岁的单亲妈妈赖太太雇了一个菲籍女佣 Julie 来帮忙家务,并照顾她年老的婆婆。Julie 曾逃跑到台北的马尼拉驻台经济文化办事处,抱怨赖太太限制她的行动,并剥夺她休假的权利。赖太太非常生气,辩护自己其实是个“好”雇主。她对我解释为什么她要监护其实只比她小四岁的 Julie:

她上个月要回去菲律宾,我们给她放了十天假,多放的也没给她扣钱,她说要借 8000 块回家,先说要回去跟宜兰的菲佣朋友借,我说不放心,因为我是她在台湾的监护人,如果她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她父母交代?那我又没空跟她去宜兰,中介都说不能借钱,可是我还是借给了她,我还买了 1 万多块的衣服给她和她小孩,那时还没打折喔,我哥哥也是送她好多东西,我们对她这么好,我们也是希望她爸爸妈妈在菲律宾看到这样可以放心……我星期天不敢给她放假,就是怕她去上教堂认识一些坏朋友,那我们也怕她放假无聊,我们出去吃饭出去玩也都会带着她出去啊,我们对她就像一家人一样。

像赖太太和胡太太这样的台湾雇主,都自许为移工在台湾的替代母亲或监护人,因而强调她们有必要介入移工的私生活。这些雇主为移工安排休假旅游,探询她们的社交活动细节,并且以“强迫储蓄”或“强制存款”为名义扣留部分薪水。台湾有不少雇主采取这个政府已经明文禁止的做法,扣除的范围介于台币 3000 到 5000 元之间,相当于一名移工月薪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而这笔钱要等到移工约满离开台湾时才会归还给她。所谓“强迫储蓄”的说法,是用雇主的好意来委婉包装劳动控制的实质目的,也有雇主用种族刻板印象来合理化扣钱的做法:“我好心帮她存钱,因为他们东南亚人



没有储蓄的概念。”在自许为家母长的雇主眼中,移工的母国之所以未能像台湾一样发展出成功的经济奇迹,是因为缺乏资本主义工作伦理和财务管理习惯,也正是因为这些未开发国家的文明落后,才导致东南亚移工今日沦为出国帮佣的命运。

雇主侵犯劳工的隐私的同时,也会偶尔在移工面前刻意曝露私人生活。例如,二十多岁、个性外向的菲籍移工 Jovita 跟我提到她的雇主:

她跟我说很多,也许是因为她不信任朋友,至少我不会跟她的任何朋友说。她常跟我抱怨她先生,她跟我说他们不再上床了!是啊,我们菲律宾人知道所有老板家里的秘密。

所以你们很亲密?

是,也不是。她是个好演员,我也是!也许当她跟其他一样家中有菲佣的朋友聊天时,也会聊到我,但我没关系。我也会跟我的菲律宾朋友聊。我很健谈,这是她喜欢我的原因。在这个家,她只能跟她的菲佣说话。她很寂寞。

这种自愿式的告白最常出现在全职家庭主妇的雇主身上,她们需要她们的“家中姐妹”(home sister)当听众,以抚慰自身的孤立与寂寞。而移工是她们倾吐秘密最安全的对象。和会到处闲言闲语的欧巴桑相比,外籍移工是“值得信任”的密友,因为她们只在台湾社会短暂停留,之后便完全消失在雇主的社会网络之外。

如 Rollins 和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礼物赠予”是慷慨的家母长雇主的最典型表现——雇主把二手或不要的物品,尤其是旧衣服,当做“礼物”送给家务劳工。剩菜剩饭也是移工最常接收的“礼物”之一;有些台湾雇主在餐厅吃完饭后,会将剩菜带回给家务劳工。虽然雇主认为这是出自好意(“我们想她也许会想尝尝看”),



但许多劳工却不作如此想。例如,在菲律宾曾是房地产经纪人的Trinada说:“有些雇主出去吃晚餐,然后带剩菜回家。你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他们说:‘我家里有菲佣。’这样不好,我不吃剩菜的。我觉得这样很丢脸,我们没有钱,但我们不吃剩菜。”

家务劳工以不同方式来响应雇主的礼物赠予。有些劳工心生厌恶,认为这个举动是种羞辱;但也有些劳工视此为一种出自雇主善意的工资补贴,是雇主理应提供的一种恩庇。劳工的感受——是感谢还是厌恶——也取决于雇主欲舍弃的物品的价值而定。不论家务劳工的真实感受为何,在雇主面前,她们都必须表现出感激的态度,而且不能拒绝这些“礼物”。而且,这种礼物的交换是单向的:收受者并不被期望要有所回报。尽管如此,位重权高的雇主却可能要求劳工归还“礼物”。Jovita 如此描绘她的经验:

我所有衣服都是她[女雇主]那边来的。她买了很多东西,都很贵,然后把它们丢进一个袋子。她说我可以试[穿],如果我喜欢,就可以留起来或给别人。有时候她看见我穿着她的衣服,会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丢掉,它看起来还好好好的。”然后我说:“嗯,你可以拿回去。”

她就拿回去了?

有时候。她有次说:“你还留着上次丢掉的那个袋子吗?我可以向你借一次吗?因为它很配我今天晚上的衣服。”我在心里暗笑,嘴巴上说:“当然,反正它们都是你的。”

这个例子进一步说明了家务服务中礼物赠予中的不对等权力关系。收受者(家务劳工)不被允许归还礼物,但礼物赠予者(雇主)却可以要求收受者归还礼物,重申物品的所有权。雇主也可选择性地向劳工透露她的秘密,甚至要求劳工谈论社交细节,但劳工

却不能任意拒绝雇主的自愿式告白,或对劳工私生活的探询。

和疏离权威模式不同,这些雇主与家务劳工发展出亲密关系,但也由家母长的慷慨态度来确认雇主在阶级和国族上的优越性。研究男孩和女孩如何在学校玩耍的 Barrie Thorne(1993: 64)发现,性别界线的创造可透过接触或回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形塑。同样地,雇主也可经由避免或强化与家务劳工的个人接触来标示自身的秀异地位。然而,在家母长制的劳雇关系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劳雇之间的互动距离的缩减,并无法消弭两者间的社会不平等。由雇主所架构出来的慷慨照顾与频繁接触,只彰显了雇主的优越地位,并强化了对劳工的隐私侵犯。

我们只是中产阶级,“我们不会把人家当下人”

上述的两类雇佣风格,各有其典型雇主,富裕人家——有着宽敞居住空间及长期雇用历史——的家务雇用是疏离权威的原型;家母长制则最常出现在中小企业老板和家庭主妇雇主身上。下面两种划界工作类型:情感关系(personalism)与生意关系(business relationship)则较常发生在双薪家庭的中产阶级雇主上。<sup>10</sup>中产阶级的雇主较无兴趣强调自身和家务移工之间的阶级秀异,但也试图借由区分自己与其他雇主的不同——包括“位居其上”(people above)和“位居其下”(people below)的雇主(Lamont 2000a)——来强化自身的中产阶级认同。

曼君是个四十出头、拥有大学学历的旅游中介业者,她雇用了一位家务移工协助家务及照顾她的两个孩子(分别是九岁和三岁)。访谈期间,她不断强调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及对家务移工的尊重态度:

现在也不是威权的时代了,像我们这种小康家庭,是因为可以负担,有这个需要……我们不会把人家当下人,我们会跟小孩说叫她帮忙做什么要说谢谢,这个人权是要做到的,因为人家是环境所逼来帮忙,并不表示我们高人一等。但是像我妈妈那个年代的人,就会说你们家可以请菲佣,你们家有佣人,就比较有那个威权的感觉,是主人。

这些雇主的自我陈述与实际上的劳雇互动情形是否存在落差,是我所难以观察到的,姑且对此不论。重要的是,这些雇主标榜自己对于民主和用人唯才(meritocracy)的信仰,不同于传统的威权主义和贵族制度,来呈现他们现代化的自我形象。台湾的中产阶级被认为是催生80年代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性力量(萧新煌1989)。我在1998-1999年访问的对象,多集中于三十岁到四十五岁的年龄层,这也是官方调查资料中聘雇家务劳工的主要人口来源(劳委会1999),这个世代的人不仅经历或参与了台湾的经济奇迹,也在台湾剧烈变化的政治情势中,走过他们的年轻岁月。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历史脉络中,民主、自由和独立,构成了台湾中产阶级自我认同的核心价值。

Jack和他的妻子都是四十多岁,在不同的跨国公司担任经理,他们雇用了两位外籍监护工来照顾他生病的父亲以及他们的小孩。Jack在访谈中提及他童年时期家里小康的经济(父亲是军人),相比较起来,他不害臊地吹嘘他的经济成就与社会流动。作为第一代的家务雇主,Jack表达自己对于这样的家庭生活,可能有违他所崇尚的自力更生、独立的道德原则:

我不会鼓励[人家请外佣],如果家里有需要才去做,不要随便聘雇外佣,人会变得懒惰,像吗啡一样上瘾,能自己做自己

做,不要依靠别人比较好。其实别人听到我们家请两个菲佣,都羡慕得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好羡慕的,要请人就表示家里的 organization 出了问题,如果家里的 organization 没有问题,谁又愿意请个外人住在家里呢?

这些雇主使用基于需要的中性论述来描述他们的雇佣决定,同时也试着淡化他们跟家务工之间的地位落差。不论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他们借由论述修辞,确认了自己的中产阶级认同,并与其他阶级划清界线。相对于上层阶级家庭透过继承( ascribed)取得的财富与声望,中产阶级雇主强调靠自身的努力所获致( achieved)的社会地位;相对于老有钱人( the old rich)家庭有着聘雇奴仆或佣人的世代传统,他们强调新富雇主( the new rich)的雇佣关系是以平等为基础、建立在需求之上的劳务购买关系。

此外,管理阶层与从事专业工作的雇主也常会区隔他们与教育程度低的雇主的不同。他们指出,高等教育及良好的英文能力,是他们的管理方式或互动风格如此独特的主要原因;有些雇主则认为流利的英文是建立明确权威和有效管理的必要基础。近四十岁的杨经理如此比较自己和住在乡下的叔叔的不同:

像我姨丈在乡下请一个菲佣,他们都不会讲英文,所以也不敢要求她做什么,她就整天带小孩散步就好了,我阿姨反而要煮饭给她吃。帮忙没帮到,反而要伺候人家,说人家来是客人,不好意思要她做什么。看电视还坐我姨丈的大椅子,我姨丈只好自己坐旁边,菲佣会转自己喜欢的电视,我姨丈喜欢看的反而不能看,他说人家客人不好意思讲。所以说乡下人比较适合,因为没有办法沟通,就不能让她们了解她们的身份。

根据杨先生所言,“乡下”的雇主缺乏语言技巧和菲佣沟通,甚

至去“下命令”。由于缺乏合宜的语言能力来建立雇主的权威,女佣脱离从属的劳工位置了,而变成一个“客人”。

专业雇主区分他们自己与低教育程度雇主的另一种方法,是把高等教育与普世的人权论述连结起来。如以下这些受访者的话:“我们受过教育的人也不希望对人是上对下,我们都是平起平坐,吃饭也是坐在一起吃。”“我们知识分子,都是很讲民主的。”“那些报纸上虐待人的案子,我想他们的雇主都是低教育程度的吧。”也有不少受访雇主引用自己在国外留学或居住的经验,来证明自己的英文能力,以及自由开明的态度。他们不仅参照本地的阶级排序来建立他们的中产阶级认同,同时,他们也透过跨国的想象连结来认同自己作为世界都会新贵(cosmopolitan urbanities)中的一分子,加入地球村这个共享类似语言惯行和文化品味的想象共同体。

我无意指高教育程度的雇主必然会以较为和善或公平的态度来对待他们的移工,我强调的是,他们相信或认为他们如此作为。不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他们把劳雇互动的日常关系,连结于中产阶级的自我意象与价值展演。当这些中产阶级雇主使用需求、自力更生、自由民主等道德修辞来描述家里的雇佣关系时,他们所标示的阶级界线不在于划分他们和移工之间的差异——这个界线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明显——而是区分中产阶级雇主有别于“位居其上”的老有钱人和“位居其下”的低教育程度的雇主。以下我将介绍新富雇主利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淡化雇用关系中的阶级和国族界线:他们与移工发展出个人关系,视其为家庭成员;或将家庭视为工作场所而与移工保持如生意般的关系。

情感关系:“我不想活在地位阶层里”

国铭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平面设计师,和同行的妻子共同经营一



家工作室。工作几乎占据了他们所有的生活,有时为了赶工他们必须在办公室过夜,而把两个女儿留给菲佣照顾。国铭描述自己是“一般的中产阶级家庭”,付完房贷及小孩的私立学校学费后,收入所剩无几。国铭虽然很感谢菲佣对家里的帮忙,但考虑三年约满后不再续约,原因是他对这样的疏离权威关系感到很不自在:

她跟我们相处这么久,她还是非常的拘谨客气……比如说我们要她跟我们一起吃饭,其实她很不自在,所以她还是宁可我们吃完了她才吃,我真的不习惯那样子,但是你勉强她一起上桌吃,你看她很不自在,你自己也会觉得很不自在……我很不习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有一个人她竟然要等你吃完她才能吃饭……那这些事情就让我觉得,你知道是有阶级的,那种感觉对我来讲就很不好,我很不习惯有那种阶级的感觉……这种经验跟我们去餐厅吃饭是不一样的,那种 waiter、waitress,那种情景在餐厅你是可以接受的……

为什么有差别? 因为在家里?

对,那是你的家,家庭是很 private 的东西,你知道公共场合有人跟你服务,其实是很习惯的啦,可是在家里头当你感觉很像在餐厅的时候,我想你应该会觉得满紧张的吧?

家务移工的谦卑态度,例如她的沟通方式(从不主动聊天)与进餐偏好(雇主家人吃完后才吃),并未让国铭觉得被尊敬或取悦,反而感到十分困扰。当地位阶层出现在家里,中产阶级雇主自许开明进步的内疚感(liberal guilt)被召唤而出。看在国铭眼中,家这处“甜蜜温暖的巢穴”应该和餐厅、饭店等公共场合区隔开来,后者与阶层不平等的连结似乎较为“自然”、“可接受”。

雯真是另一名有类似感觉的雇主。她是一位近四十岁的大学

教授,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对她来说,她的菲佣在日常互动中的谦卑表演,特别是毕恭毕敬的说话方式和肢体语言,并不是一种地位标记,反而是种心理负担:

我觉得菲佣自己会这样,我自己不会去要求,这样有时候很难相处,因为她会好像要来服侍你,比方说有些事我想要自己做……

像什么?

像把菜从锅子过到盘子,小事啊,可是她就觉得是她应该做的事情,不让她做她很不安的样子。或者是讲话上,她都会说我们家很富裕啊,她们家很穷,所以很羡慕我们啊。

像雯真、国铭这样的雇主,不想在每天的家庭生活中目睹社会不平等的剧目,所以,当甜蜜温暖的家庭转变成正式冰冷的职场时,他们感到浑身不自在。因此,他们试着与家务移工建立个人连带,以缩短彼此的距离,并减轻自身的不舒服与尴尬。许多雇主避免使用“女佣”的贬抑称呼,而改以“保姆”、“看护”、“帮手”等地位中性的字眼,甚至比拟为“姐姐”或“阿姨”等家庭成员身份。这些雇主会邀请家务劳工共桌吃饭,或一起外出用餐,也欢迎他们到客厅偕同看电视(虽然遥控器还是握在雇主手上),并会主动聊天了解他们的个人背景和家庭生活。

虽然这样的劳雇关系可能被裹上家人或亲人的温暖比喻,但阶级不平等仍如铸铁的核心般冷酷存在。四十岁的护士宏英,是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怕孩子养成骄纵的习气,不时耳提面命地告诉儿子:“Lucy[菲籍移工]是为了帮妈咪照顾小弟弟才来我们家工作的,你不能叫她女佣。”她也提到家中发生的一个有趣插曲,透过孩子天真无邪的话语,成人试图淡化的劳雇地位不平等,变得如此明

显而难以掩饰：

老大有一次要买玩具，我就说：“这个玩具你不是已经有类似的吗？这一个要 500 块耶，你知不知道妈妈一天也才给 Lucy 500 块而已？”你知道老大怎么说吗？他说：“那你怎么不多给她一点钱？”

另一个促使雇主与移工发展情感关系的原因，在于雇用的目的涉及照顾工作。三十六岁的经理 Melissa，雇用了菲籍移工 Neda 来照顾她的两个小孩。Neda 在菲律宾也有三个孩子，年纪和 Melissa 的相仿。Melissa 隐约察觉到 Neda 有时会衍生嫉妒或被剥夺的感觉，因为 Neda 在菲律宾的孩子和 Melissa 的家庭所享受的物质生活有着明显的差距。Melissa 告诉我：“有时候我觉得对她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在这里我们的经济情况比较好，不论小孩子想要什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满足他们，但是对她的小孩却不是这样，……有时候我买东西给我孩子时，她脸上会出现一种羡慕的表情。”

昭如是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律师，她以“互相帮忙”的词汇来形容她与菲籍移工之间的关系，然而，彼此之间的明显社会经济条件上的差异，有时候也让她困扰。昭如有一次和家人出国度假十天，离境之前，她给独自留守台湾的菲佣一些零用钱，好采买她这段时间所需的食物和杂货，昭如回忆她从菜市场回来后的情形：

我看她手上只有一点点的菜，其他全都是小孩的鞋子。我说，十天的东西我觉得你这样不够，她说没关系，可以，这样就够了。我问她，那你买小孩的鞋子干吗。她说她觉得这些鞋子很便宜，一双才 100 块，她要寄回家给她的小孩。我听了就觉得很难过啊，所以后来那一年，她向我预支薪水时，我就答应了。那时候我有特别跟她讲，因为我已经听过很多不好的例

子,有些女佣一直借钱一直借钱,然后就跑掉了。我就跟她讲:“你跟我预支我会答应,因为你来这边是要照顾我的小孩,那,我也照顾你的小孩,我们互相照顾对方的小孩。”我觉得我跟她是互相帮忙,两个女人互相需要,互相帮忙,她需要的我能给她,我需要的她能给我,这样子。

昭如透过叙事修辞,以及部分实作,企图将雇用的阶级关系转化成互相帮忙的姐妹情谊。她觉得自己要对移工家庭的分离负部分责任,并对离开孩子的移工母亲有所同情。基于类似昭如的心情,雇主 Melissa 会找时间跟 Neda 聊聊她在这里工作的感觉以及留在菲律宾的家人, Melissa 也试着安慰 Neda 想家的心情,并确定她在家庭分离的状况下能维持情绪的稳定。然而, Melissa 坦承这样的情绪互动主要是一种为了维护她孩子利益的策略性行为:“站在人性上,我会跟她沟通,站在我孩子的立场上,我也会跟她沟通。我希望她能够完完全全明白,我为她所做的一切,其实百分之百都是为了小孩。”

像 Melissa 这类的父母与移工发展情绪互动,主要是为了测知确保他们所雇用的保姆的生活,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如在台湾谈恋爱、先生外遇、过度思乡而导致精神不稳定等)。雇主将移工视为家里一分子,对于她们提供的照顾工作的质量也较有信心。虚拟的家庭关系可以增强劳工对于雇主家庭福祉的认同,也可确保他们的情绪劳动的真诚与“爱的劳动”的实现。

像 Melissa 这样的雇主的实作是一种 Hondagneu - Sotelo(2001)所称的“工具性的情感关系”(instrumental personalism)或“策略性的亲密关系”(strategic intimacy)。她详述了情感关系是如何类似,但又截然不同于先前提到的家母长制:家母长制是一种由雇主慷慨

行为所定义的单向关系,但情感关系是一种承认到劳工尊严的双向关系,尽管劳雇双方仍不对称(207 - 208)。她也指出,雇主将雇佣关系个人化并非为了增强地位的差异,而在确保孩子能受到绝佳的照顾。我的研究更进一步发现,中产阶级雇主采取情感关系的态度,也为了处理家庭生活中明显的阶级不平等:他们想要减轻自己的阶级罪恶感、巩固自身的中产阶级认同,并缓和公、私领域的混淆所导致的不舒服。

基于劳雇关系中内生的结构不平等,情感关系和家母长制之间的差别实是一条微妙的界线。情感关系也许提供了移工解消寂寞的一帖解药,但许多移工宁可与雇主保持一些距离,以避免解药变成毒药,因为前一刻还是贴心朋友的雇主,可能下一秒就变身为动怒的尊贵女主人。

移工并不一定偏好与雇主发展情感关系,台湾的雇主也视这样的情绪互动为额外工作。Melissa说:“我先生就说:‘顾自己的团仔人拢顾未了,勾爱连伊照伙顾!(闽南语)’我先生就会 complain,叫她来是要帮忙,结果忙没帮到,还要增加麻烦。”雇用了一个菲佣来照顾她三岁女儿的母亲美莲,则表示和家务移工的沟通与互动除了花费时间,也带来另一种负担:

有时候我真希望我听不懂英文,那我就没必要听她说话了。知道她在说什么反而让我很难受。

她都说些什么?

比方说,她很想她的女儿啊,他们的房子很破烂,他们需要多少钱来盖新墙和修补屋顶。她就是不停、不停地说……,我知道她离开家心情不好,但我也不能做什么啊,对不对。

对于已经是蜡烛两头烧的双薪家庭来说,与家务移工发展情感



关系是一种必须投注时间的“情感劳动”，更甚者，与移工的个人连带还可能衍生对雇主过多的情绪负担。为了降低时间与情绪上的投资，一些雇主因此将雇佣关系视为生意般的关系，特别是那些为了家务需求而非照顾工作而雇用移工的雇主。

### 生意关系：我需要帮手，而不是朋友

我跟 Jessica 约在东区一家玻璃帷幕大楼里的咖啡厅，这栋大楼是 Jessica 工作的银行所在，三十二岁的她已在几家跨国银行工作过，目前被拔擢到经理的位置。Jessica 身着一套时髦简洁的黑色裤装出现，很直接地告诉我她最多只能待一个小时，随即迅速地点了蔬菜三明治和有机果汁，毫不浪费一点时间地切入主题，侃侃而谈她跟外佣的互动原则。她提到一个嫁给大老板、全职家管的朋友，这个朋友也雇了一位菲籍帮佣，两人经常喝下午茶消磨时光，后来菲佣跟雇主借钱不得，双方因而起了争执，导致菲佣被遣送回家的结局。Jessica 以这个故事来说明她的雇用之道，也许是在跨国银行工作养成的习惯，她的言谈不时夹杂英文单词：

我觉得你 position 要定位清楚，你是要佣人、还是朋友？你搞不清楚你需要的是一个 helper，她不能陪你聊天喝茶，因为两个聊天，一聊一定会有思想的不同、意见的不同，那这时候你又用主子的身份来压奴工的身份，我觉得这是不 fair 的……角色定位要很清楚……我觉得不能做朋友，不是你 over 那个 line，就是她 over 那个 line，到时候她跟你讲话变成，“hey, Jessica, 我今天不煮饭了，我太累了。”那我就翻脸啦。在我们家原则很清楚，十点就是她的下班时间，我跟我儿子说阿姨在房间就不可以再去吵她啦。

Jessica 基于两个原因而偏好把劳雇之间视为生意关系。第一,她认知到雇主和劳工之间的地位差异,所以将彼此的关系定义成是一种基于生意契约而来,因此尊重劳工私人空间和休息时间的生意关系;第二,她减少与劳工的个人互动有助于她辨明劳工的定位(是“帮手”而非“朋友”),以避免个人连带干扰劳工的表现。像 Jessica 这样的雇主,对自己与菲籍劳工的英文沟通能力相当有信心,并倾向于将自己当经理等职场经验,应用在对家务劳工的管理上。<sup>11</sup>

另一位分享类似想法的雇主是四十多岁的佩琪,专科学历的她和先生共同打拼出一家颇具规模的电脑相关企业,工作余暇之余,她仍不断进修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与专业知识。坐在她宽敞的总经理办公室里,她向我解释像她这种雇主和其他雇主的差异:

我们做电脑的人都会讲英文嘛,比较负面的人都是水平比较低层次的,抱怨把你冰箱的菜一次煮光光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

一定是不懂得跟她讲嘛!因为英文不会讲,就没有把制度定起来给人家,像我们一来制度都已经定好了,就怎么可能会出什么鬼?所以是雇主的问题。

佩琪继续说明她如何设定合理的规则来管理家务移工的表现:

我是把她当做一个员工来看待……我在接她的那一刻就会把工作表单都打好了,我先跟她介绍我们家有哪些成员,什么名字,他们的作息时间怎样。那你的工作,这个时间到那个时间要做什么,这个要星期一清理,那个要星期二打扫,daily 的、weekly 的、monthly 的行程是怎样,我都写好了。用这样的方法,菲佣就会对她的工作内容有很清楚的概念,当她做完这个,她可以休息,而且我也知道她今天在家里做了什么。有一

个菲佣问我她可不可以自己决定每天要做什么,她说她做的一定可以比表格上还多。我说:“不需要,你只要把这当做像上班一样,只要你做完了,你就下班了。”

佩琪和 Jessica 都以“上班”和“休息”这样的比喻,将她们的家描绘成一个工作场所,只要雇主设定的制度规则被遵守了,她们对劳工就没有额外的要求,同时也尽量避免打扰劳工的私人生活。虽然工作场所和家的空间是重叠的,这些雇主在公领域和私领域之间划下象征性的界线,这种模式不只保护了劳工的隐私,也确保雇主的家庭生活不受外人打扰。我先前提到,上层阶级雇主偏爱雇用移工而非本土帮佣,是因为种族阶层有助于维系阶级控制、疏离权威,中产阶级雇主也有类似的想法。几位雇主都在访谈中指出,和台湾的欧巴桑相比,和外籍移工维系一种如生意般的关系较为容易。一位雇主这样描述两者的差别:“外籍的劳雇关系很清楚,本地的劳雇关系很隐性,不只是没有定契约,我们一般都把他定位成‘帮忙’,好像一个 favor、人情一样,很多工作的要求你很难去直接说。”

此外。雇主可经由语言和文化的隔阂,轻易地将移工阻隔在家庭生活之外,但却很难防止本地帮佣干预雇主的私人生活。三十二岁的安如是一个证券经纪人和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描述了两者的差异:

像我们对面请一个阿桑,她有时候管起你的生活就好像你妈一样,菲佣是完全不过问你的私生活,她不会问你为什么,她就是去做。那这样很好,她可以做我不想做的事情,我又可以落个清静。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我觉得第一个是[语言上]可以沟通,第二个是中国人都觉得我来你家帮佣是帮你们家全部,菲佣就只是来“工作”……台佣就是这样,你不想找她讲话她还是会找你讲话,你不想让她听到的事她也会听到,那家是一个很重要的隐秘的地方,有时候台佣会把你不想要传出去的事情都传出去。菲佣就比较重视雇主的隐私,比较有职业道德。你如果不去找她聊天,她不会来找你,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们回家都不想再去听一个人呱拉呱拉。

大部分的本地家务劳工都是有丰富的养育小孩经验的中年妇女。像安如这样的年轻雇主,在聘用中年的欧巴桑时经常感到压力,因为欧巴桑可能会仗着自身的经验,而插手指导雇主要如何做家事或照顾小孩。安如甚至将欧巴桑的角色比喻成母亲或婆婆,她因而偏爱雇用一個想要和她一样尊重,且维持单纯生意关系的移工。

大部分偏好生意关系的雇主都来自双薪家庭,他们需要家务帮手的原因,正是用来纾解工作和家庭之间两头烧的窘境。因此,这些雇主希望和移工之间保持最低程度的互动,以在下班后得到最多的自由时间。此外,和可以整天与家务劳工相处的全职家管雇主相比,疏离且中立的关系也比较适合这些家庭时间有限的雇主。

除了时间的限制之外,空间配置也深刻影响了雇主如何安排他们的私人区域。不像居所宽广的上层阶级家庭,大部分住在都市里的台湾中产阶级家庭只能住在一层小公寓中。容积有限的公寓生活无法提供足够地理空间体现劳雇之间的社会距离。面对空间不足的问题,有些雇主会将移工排除在家人活动空间之外,这样做不只是为了强调地位的区隔,也在保护家庭的隐私。

也有雇主则因家里空间有限,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只好将移工纳入家庭空间中。阿苏和先生一起在一家营销公司工作,最近才买了他们在台北的第一间公寓。当我问她如何安排家务劳工的吃饭问题时,她笑着说:“看看我的公寓,那么小,她不跟我们一起吃的话,要在哪里吃?”

这些雇主虽然在生活中跟家务移工共享亲密空间,但也刻画出一条无形的界线来区分家庭生活的私人面向和家务雇用的公共面向。当移工的工作涉及较多家务、较少照顾内容时,容易适用这种生意取向的契约关系,雇主要替煮饭、买菜和打扫等事务性工作制定科层规则时,也比较容易。但当移工的工作内容涉及孩童或老人的照顾时,雇主则较难以一板一眼的工作规则或定型契约来理性化雇佣关系,毕竟,“爱的劳动”很难当做一门“生意”来计算。

## 移工的划界工作

像她们的台湾雇主一样,家务移工也以多重模式来建构与维持社会界线用不同方式认知与回应自身与雇主之间的社会距离:有些移工承认并接受明显的阶级与种族差异;有些则质疑劳雇之间的阶层差别,认为自己和雇主一样都是平等的,阶层地位近似。家务移工也采取不同的策略来架构前台与后台之间的界线(如第五章所述,前、后台的区隔是家务移工生活中的重要空间配置):有些移工偏好区隔出前、后台两个领域,有些则倾向整合。<sup>12</sup>我以阶级/国族界线以及社会/空间界线等两个面向为主轴,发展出家务移工的四种种划界工作类型:寻求恩庇、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掩饰先前背景,以及强调地位近似。



表五 家务劳工的四种划界工作类型

前台后台的界线 阶级/ 国族差别	整合	区隔
接受	寻求恩庇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
质疑	强调地位近似	掩饰先前背景

### 寻求恩庇：礼物的道德经济

Jenny、Maya 和我一同坐在教堂庭院的凳子上，闲聊着她们的雇主。这对三十多岁的表姐妹，一起在菲律宾的工厂工作过，也相偕到新加坡和台湾帮佣。Maya 五年前第一次来台湾，合约到期后，她改名，然后再次到台湾的一个新雇主家帮佣（当时合法来台年限最多是三年）。她很开心地告诉我，当时她哭着求雇主：“请帮帮我，我没钱，我在菲律宾欠一大笔钱。”结果，她成功地躲过了“强迫储蓄”（扣薪水避免逃跑）的劳动控制手段。坐在一旁的 Jenny，笑笑看着她的好姐妹，一言蔽之地描述 Maya 对付她雇主的策略：“可怜的女孩永远会受到老天的眷顾。”

像 Maya 这样的移工，试图和雇主发展一种“策略性的情感关系”（strategic personalism）（Mendez 1998），以从雇主那得到以实质物品、零钱分红和借贷等形式出现的额外福利（fringe benefits）。类似封建社会中领主与奴仆之间的恩庇侍从（patron - client）关系，在雇用移工的台湾家庭之间并不普遍，因为雇佣关系囿于政策而年限短暂，难能发展长期、终身的关系。但是，有些移工——通常是一些教育程度较低或出身乡下的移工——仍可借由强调自身在物质上的贫乏来获取雇主的同情。过去有其他海外工作经验的移工，特别会技巧性地利用情绪的表演，来引发雇主的阶级内咎感。有些移工会对雇主描绘他们在家乡的穷困生活，以增加她们成功加薪或预支

薪水的机会；有些移工则会在雇主为小孩买玩具时，面露嫉妒神情，雇主或出于原罪或怜悯，便会买另一个玩具（通常较便宜）给移工的小孩。

初次赴海外工作的移工是另一群倾向从雇主身上寻求恩庇的团体<sup>13</sup>。大部分移工在第一年都身负债务，而且薪水在扣除中介费之后，寥寥无几。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非常愿意接收雇主的二手物品，认为这是雇主基于好心的薪资补贴。这些移工通常因为没有零用钱及想赚加班费，而选择放弃前几个月的休假，在这种状况下，参加雇主的家庭旅游成为他们免费探索台湾的机会。由于尚未在地主国建立当地连带，他们也必须依赖雇主提供各种信息和资源。

要离开地主国之际，是另一个移工期盼从雇主那得到礼物或其他好处的时刻。就像印尼爪哇当地的家务帮佣终年工作，期盼在开斋节<sup>14</sup>或新年收到雇主给予的礼物和红利（Weix 2000），台湾的家务移工也认为他们约满离开之时，应是雇主透过礼物表达感激的时刻。我先前提过的 Atik 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她是实行家母长制风格的胡太太所雇用的印尼移工。我问胡太太，Atik 带回家的电子锅是谁买的，胡太太说是她买的，令我讶异的是，她这样做是基于 Atik 的主动要求：

电子锅是我给她买的，她也会跟我朋友要啊。

跟你朋友要啊？

对啊，她会跟我朋友说，我要回去了，叫我朋友要送东西给她啊。她很厉害，因为她来三年嘛，我的周遭，社团朋友人很多啊，我姐妹她都认识，大家都认识她。要回去前，她就开始啦，姐姐你要送我什么，我要回去了，她就直接这样会讲，我要你送我电锅，啊你要送我微波炉，啊你要送我手表，她那种欲望就出

来了。我说你要怎样的[手表],[她说]我要跟太太一样,漂漂亮亮的、亮亮的。

她会开口要?

她会开口要,我是送她手环、送她玉、送她项链,整套的我都有送她,我是送她蛮多的,然后我们员工会送给她衣服,她寄走几批我们都不晓得。Atik 要回去的时候就很大胆,你看她敢跟我要钱,16 万多(强迫存款的总数)可以改成跟我要求 25 万。那基于我们的立场想说,来我们家三年了嘛,很可怜嘛,多一点给她,当做救济也好,当做大家这几年的感情也好……因为她付出三年在这边,她的青春三年,她要离开亲情三年,多一点给她,我觉得也不为过啊。

在胡太太口中,Atik 总是安静又乖巧,从不曾抱怨没有休假,也对雇主充满尊敬。当雇主家人吃饭时,她总是等到所有人就座动手后才开始扒饭;当家人在客厅看电视时,她总是坐在角落的地板上。然而,“顺从”的印籍女佣在要离开时变得“大胆”、“厉害”,敢大声要求雇主甚至任何地位较高的雇主朋友们“照顾”、“补偿”她。在贡献三年劳力给这个家庭后,她觉得一些珠宝、现代化电器等额外的补助都是她应得的回报和权益。

一般来说,印尼移工较倾向接受台湾雇主和他们之间有着明显、绝对的地位差距,不像教育程度较高的菲籍移工,倾向认为目前的劳雇地位差距只是相对、偶然的结果。Utami 来自中爪哇的一个贫穷家庭,只有小学毕业的她,第一份工作是十岁时在雅加达帮佣。为了赚更多的钱,Utami 决定出国帮佣,她在新加坡工作四年后,又来台湾工作三年。我在台湾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值二十五岁,虽然受过的正式教育有限,但凭着聪敏与勤奋,她在跨越多国的旅程中

自修学会了基本的英文和中文。

许多移工朋友都认为 Utami 很“倒霉”，遇到不好的台湾雇主：她要负责繁重的体力工作，包括清理一栋五层楼的透天厝和用手洗全家人的衣服（即使家里有洗衣机）。从 Utami 的转述听来，她的雇主符合疏离权威的类型，视 Utami 为低下的仆人。当晚餐的内容是料理全鸡时，Utami 总是只分到鸡头跟鸡脚，而且一个人默默在厨房里吃；当全家吃着苹果、水梨等昂贵水果时，她只能吃香蕉、柳丁等便宜的水果。最糟的是，女雇主下指令时会大声叱责她，并总是抱怨她动作慢吞吞。

事实上，个性活泼直率的 Utami 在印尼朋友间经常扮演着意见领袖的角色，但在面对雇主的粗鲁行为或刁难的要求时，她却保持沉默：“我看啰，我不说话啰，我不敢讲。因为我知道我的老板如果不喜欢我讲的话，她比较骂。”回避与雇主正面冲突，她只能把情绪吞忍下去：“我生气都放里面啦，不晓得这边[指心]都坏掉不坏掉。”或者，自我解嘲：“我都告诉别人说，我老板每天在唱歌。她每天都对我叫，我把它当唱歌，那我就不会难过了。”每天，她向阿拉祈祷她的衰运可以早点结束，希望雇主的态度能有改变的一天：“她对我不好，我没有想她不好，我想我老板什么时候才会好，什么时候才会慢慢说话，慢慢给我讲，我拜拜[祈祷]都是这样。”

一开始，我以为 Utami 不想跟雇主起冲突，是怕雇主会终止合约，把她送回去。但她澄清：“不，我不怕被送回去，如果回家，我高兴！我跟我老板说，我不喜欢这里，我想回家，我可以自己买机票，他们不要。”

Utami 的沉默吞忍，并非因为考虑到被解雇遣返的经济风险，而是因为她承认到自己 and 雇主之间的明显社会距离与地位差别。Utami 屡次告诉我，她父母教她要尊敬别人，尤其是地位比较高的那

些人。爪哇小孩从小被教导要对上层阶级表现尊敬和恐惧(Geertz 1961)。除了阶级高低,她甚至使用了种族化的词汇(黑与白)来标示自己与台湾雇主的差异:

我知道我是谁,他们是谁,佣人在地板,老板在天花板,他们高,我们低,他们是白的,我们是黑的。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所以你告诉他们没有用,他们不会听。

有几次我在周日碰到 Utami,回雇主家前,她都到印尼杂货店采买材料,为了替雇主做印式糯米甜点,我本来以为是雇主要求的,后来发现她是在雇主未要求的情况下自己准备,更让我惊讶的是,她还自掏腰包。她的“好心”让我很困惑。或许基于非母语沟通的限制,或许因为该行为欠缺工具理性的解释,Utami 对于自己为何这样做的原因开始都支吾其词,经过我几次不断询问后,她才隐约透露在糯米甜点中所包裹的无言讯息。

我看你还做糯米饭给他们吃,他们对你这么坏,为什么你对他们这么好?

不晓得,他们像拖鞋都没有买给我。在这边三年他们衣服什么都没有买给我。

对呀,那为什么你还这么好心?

我说不晓得,他们喜欢吃,因为 I want 炒印尼菜,印尼的都没有钱,有钱都没有心……

所以有钱的比较小气,没钱的比较大方?

对啊,我要给他们说,他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没有好多钱,为什么我们还要[对他们]很好,唉,不要告诉他啦,静静[闽南语]。

可是你做了他也没有知道还是改变了?



对呀,奇怪耶,老板奇怪,the heart is 这样子,没有看。他们都没有想到,Utami 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会买给我们吃,她是来这边赚钱……

Utami 手工制作异国风味的零食,怀抱着“以德报怨”的心情,送给她的雇主作为“礼物”,企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契约(来赚钱),以及以财富区分的阶层秩序(台湾人比印尼人有钱),邀请雇主进入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的互惠关系。在这个领域中,雇主理应要对礼物心生感激,并且有义务加以回报。Utami 期待雇主回报怎样的好处?我发现 Utami 并不关心自己被雇主剥夺的休假或权益,她甚至没有持续纪录每月雇主扣了她多少薪水,尽管大部分的扣除都是于法无据的。她想从雇主身上得到的不是经济的回报(有钱),而是情感的回馈(有心),像是一点点感激,以及对她的服务与辛苦工作的肯定。不幸的是,她的雇主大口吞掉了糯米饭,却完全忽略了 Utami 用心包裹其中的无言讯息。

对拥有权力的人而言,礼物的给予展现了他们的慷慨,不求礼物接受者的回报,更突显礼物给予者的优越地位。然而,权力从属者出于卑微的希望——期许一些温暖、感激之情和道德责任的回报——而送礼物给权力优越者,只是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源要求平等的交换,更遑论挑战权力的不平等。

###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没有额外功课

某个星期天,我和菲律宾朋友在教堂附近吃中饭时,有人聊到先前在沙特阿拉伯工作的经验。那里的雇主通常雇用好几位外籍劳工分别担任佣人、厨师、园丁,他们会在厨房旁边的所谓“仆人区域”(servants' quarter)里吃饭。“哦,真不错”,Olivia 点头称是。我

很惊讶她竟然羡慕这样明显的阶级空间区隔, Olivia 解释给我听: “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啦。”的确, 抱持像 Olivia 类似看法的不是少数, 许多移工宁愿和雇主保持距离, 不想有太多私人的连带。在移工社群里, 我经常听到类似下面的对话:

Johna: [啜泣] 我的女雇主昨天对我很坏。

作者: 是怎样?

Johna: 你看她的脸就知道了……

Madeline: 不要看他们的脸, 只要听你自己的心! 他们和我们是不同的 [用两只手掌比出一高一低]。他们就是会那样, 不要理他们。

Sylvia: 对! 因为他们和我们地位不一样, 有时候他们不知道他们让我们伤心。只要你做的事是对的, 而且他们准时付你薪水, 没有额外功课 (no extra curriculum)! [每个人都用力点头, 尤其是 Johna]

“没有额外功课” (no extra curriculum) 是移工常用来维持心理平衡与舒缓情绪压力的一种策略。他们在工作和私人生活之间划下界线, 这种分隔提供了一种缓冲, 来帮助她们面对雇主对她们的个人需求和尊严的不尊重 (Dill 1988)。他们也偏好减少与雇主的互动, 这样才不用增加额外的情绪工作负担。当我问她们是否喜欢和雇主外出吃饭时, 大部分都回答: “不, 我宁愿在家里, 我不想在餐桌上当一个保姆, 我想成为真正的家人。”尽管这种家人的比喻也常被雇主所用, 但大部分移工仍对自己的边缘地位很警觉。移工宁愿和雇主的家庭保持距离, 以避免自己不小心越过家人和非家人之间的界线。

虽然也有一些移工喜欢加入雇主的家庭同桌用餐, 但其他的移

工认为这样的邀请突然增加额外的压力和义务。许多移工宁愿自己在厨房吃,在这个后台里,她们可保有一些隐私和自由。当我问Helen喜不喜欢跟雇主一起吃饭时,她回答:“他们告诉我要一起吃,有时候他们的朋友来,他们也要我跟他们一起吃,但是我不喜欢,所以我假装忙。我做做这个,做做那个,因为我不喜欢跟他们一起吃,累死了,我能跟他们聊什么?”

此外,许多移工不喜欢与雇主同桌吃饭的原因是,她们觉得有义务要接受雇主给的食物。Elvie描述这种情况:“我的雇主想要我吃这个、吃那个,所以我不喜欢在那里[餐桌]吃,他们想要看见你吃,他们想要给你,他们想确定你吃了。”主人从餐桌上夹起菜的一部分,然后放到客人的碗里,这个常见的举动对台湾人来说代表着主人对客人的照顾。然而,在移工眼里,夹菜给客人这个有礼貌的行为却带来压力,类似礼物给予的权力不平等,移工害怕他们拒绝雇主夹来的食物,会造成雇主的难堪甚至生气。

另一个移工难以拒绝的工作要求是作雇主的知己,他们尤其害怕雇主吐诉的秘密涉及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菲律宾移工Lolita便觉得在妻子和丈夫的信任中作夹心饼干是种无谓的负荷:

我的女雇主跟我聊很多,甚至是她私人的事情,像是她的工作,她的家庭,她的婚姻,所有事都说!她跟她的婆婆处不好,她的婚姻也不是很好,她告诉我不要嫁给像她先生那样的老公。你知道什么最好笑吗?她老公也会跟我讲他太太!但是他们都不知道另一个人也跟我说,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大概会[对这个]感到不开心,但是我不想听这些事,我来这里是工作的,不是听这些事的。

若男雇主把她们当做知己,家务移工们还得冒着被女雇主嫉妒

或怀疑的风险。一些移工会发现她们雇主之一的婚外情,譬如洗衣服的时候,发现男雇主口袋里的保险套,或是当男雇主不在时,看到他的妻子的秘密情人。不论移工要不要向另一个雇主报告这些事,她们都无可避免地成为家庭肥皂剧中的配角。有些家务劳工希望借由管理前台与后台区域的分隔,来减轻亲密关系中的风险和负担,并划下界线以减少雇主对自己的私人生活的干涉。

隐藏先前背景:“我不想要他们知道我的过去”

倾向将前台与后台区隔开来的家务移工,不仅只出于谨慎与降低风险的考虑,也有些人把这当做一种主动确保自尊与自我认同的策略。这些移工认为自己和台湾雇主实属于同一阶层,她们的地位下滑,乃是因为个人的不幸遭遇或是母国的经济衰退。当我问 Luisa 她的台湾雇主的经济状况时,她直率地说:“我不觉得他们有钱,他们过着很简单的生活,很少出门,我知道,因为我曾经有钱过。”Luisa 在二十一岁时曾经离开马尼拉到东京的俱乐部当娱乐员(酒店小姐),然后嫁给她的日本老板。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十年,离婚后,她带着两个孩子回到菲律宾,随后又到台湾帮佣。

Luisa 对于她的向下流动仍然难以调适,因此选择在菲律宾的熟人面前掩饰她现在的工作,也对她的台湾雇主掩饰她的过去:

我没告诉在菲律宾的朋友现在我在台湾做什么,他们只知道我工作,他们不知道我是做帮佣。我觉得好丢脸哦,因为我曾经是个雇主,我不想要他们认为我现在走下坡了,但事实上我是走下坡了[苦笑]。我的前夫也不知道,他打电话给我的小孩,他们告诉他,妈妈现在去台湾看亲戚。

你老板知道你的过去吗?

不知道。有一次，我前夫从日本打电话找我，我告诉他们那是我的姐夫，我不想要他们知道。

其他具有白领背景的非籍移工也提到掩饰先前在母国的背景是必要的，将过去“放进括弧”，她们较容易在台湾、在雇主的面前表现得“像个女佣”。如以下两位受访者所说：

既然我们的工作的女佣，我们的举止就必须像个女佣。如果你觉得：“噢，我以前是在银行工作耶。”你就无法把工作做好。你会觉得沮丧，然后就会觉得冲突。

既然你已经来了，就不必再说你在菲律宾有车、有女佣。如果你在菲律宾什么都有了，你还来这里干吗？闭嘴。现在你在这里，你就必须跟着这里的规则，你是个帮佣，你什么事都要做，你不能抱怨你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做，那个要怎么做。

Luisa 选择在雇主面前隐藏她先前的社会位置，为了完美地扮演“女佣”，她小心翼翼地管理她在前台、后台之间的穿越过渡。每周日，Luisa 带着她的首饰、迷你裙以及化妆箱到教堂，然后在弥撒集会前到教堂的厕所换装打扮。除了改变穿着仪表，她走入雇主看不到的“后台”后<sup>15</sup>，也想暂时性的脱离“女佣”的身份认同。一个周日，当我们行经圣多福教堂的后院时，有许多菲律宾帮佣聚在一起聊天，Luisa 皱着眉头说：“她们在这里讨论许多问题，我的老板这样，我老板那样，我知道很好，但是我不喜欢来这里，我不要把我的假日过成这样。周一到周六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听任何跟工作有关的抱怨了，我只想要 happy、happy、Sunday！”

家务劳工可借由巩固前后台之间的屏障，来避免自我表述的休假形象与雇主认为的“女佣”形象两者之间的紧张。Jovita 是个三十多岁的漂亮单身女郎，某个周日，我看到她的手指和脚趾上都涂着



华丽的指甲油,挖苦她:“你在老板家里也涂这样?”她大笑说:“不可能!我的老板,如果我穿少一点,他们会这样看我[模仿睁大眼睛从头到脚来回打量]。所以当我礼拜天出门时,我希望他们都不要看到我,不然他们会怀疑——这是我的佣人吗?”

从后台走到前台时,女性移工也透过穿着打扮,甚至气味,试着体现出一个雇主认为“妥当”的星期天活动的版本。好几次我跟着菲律宾朋友在星期日下午去迪斯科跳舞,要离开之际,她们纷纷拿出事先准备好的T恤,来替换身上的衣服。看到我一脸困惑,她们笑着对我解释:“因为衣服沾了烟味!换了衣服,我的雇主才会以为我去的是教堂,不是迪斯科!”Jovita 告诉我说,有时候她星期日下午待在酒吧里,喝些酒或抽些烟来放松,当回到雇主家时,她说:“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去厕所洗澡,我不想要他们闻到我!”

对这些灰姑娘来说,除了要尽量延长在后台活动的时间,更重要的是要有效地隔离前台与后台,以避免雇主看到她们女佣角色外的活动与形象,也就是高夫曼所说的“前台到后台的信道必须被封闭,或是整个后台都被掩藏起来不被观众看到”(Goffman 1959: 113)。如果无法维持前后台的区隔,隔离雇主于后台之外,可能会为菲籍家务劳工带来工作上的风险。

某个周日,Luisa 的雇主很早就出门了,因此她没有带衣服出来换,直接穿戴她的周日打扮(穿洋装、化妆,还挑染了几撮紫发),大刺刺地走出雇主的公寓。她在电梯里遇到邻居,他惊讶地对 Luisa 上下打量。之后,整栋楼的邻居都在传述这项八卦,他们告诉 Luisa 的雇主:“Luisa 出门时像个电影明星!她身上还擦香水!”女雇主难以置信,还要求大楼警卫把电梯监视器拍摄的录像带找出来。Luisa 描述她看到后的反应:

她非常惊讶！因为我平常不像那样，我想她在那之后觉得没安全感，她告诉我：“我没有太多的漂亮衣服，因为我不需要它们，我都待在家里。”

嗯，她想要跟你说什么？

她是要说，你不需要那些衣服，反正我只是待在家里，我只是浪费我的钱！

Luisa 后台形象的揭露——时髦、漂亮、女性化的形象——象征性地挑战了雇主的阶级优越感，也激起了雇主作为女主人的焦虑。一个菲籍移工如此评论 Luisa 的雇主的反应：“她是怕你变成一个有吸引力的女人，那她就会失去她丈夫了。”Luisa 发现要融合她的前台与后台不仅有困难，也可能对她的工作造成一定的风险，因此，她小心翼翼地管理自己的外表、笑容与行为，细心维护工作与休假截然分开的灰姑娘生涯，以及“女雇主”与“女佣”之间的阶级化的女性特质展演。然而，也有其他的移工采取不同的划界策略，她们宁愿以一致的形象穿梭于工作内外的前后台，并强调他们和雇主地位的近似。

强调地位近似：“我不让他们看轻我”

三十多岁、单身的 Nora 拥有菲律宾护理系的学士学位，她在二十四岁时去新加坡当护士，之后来台湾担任监护工。她照顾的对象是一位生病的阿妈，同住的还有高中毕业、离婚的技工儿子，以及其正值青春期的孙子。当我去 Nora 雇主位于三重的老旧透天厝找她时，Nora 翻出她大学毕业的学士照给我看，这是她行遍各地工作必带的纪念品。老实说，我看到照片吓了一跳，很难将相片中带着灿烂微笑的年轻女孩和眼前历经风霜的 Nora 联想在一起。

Nora 告诉我,一开始,她的台湾雇主怀疑她缺乏现代生活方式的知识,她感到被冒犯。“台湾的雇主都以为菲律宾人没知识,”她说,“他们问我:‘你知道电视要怎么转台吗?你会用电饭锅吗?’”面对雇主对她的智识和自尊的挑战,Nora 以坚定的答案来回应:“我告诉他们:‘对我来说没问题。’”Nora 的雇主慢慢地改变了对她的想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事实上,Nora 的学历比雇主家里任何一个人高。Nora 告诉我:“他们很骄傲,他们跟别人说我上过大学。我老板不会说这是我的女佣,他们会说,这是来照顾我母亲的人。如果他们叫我女佣,我会感到有点不开心,因为人都有自尊,你希望往上,而不是往下。”Nora 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教育所带给她的才智如何帮助她能与雇主讨论事情,而不是像其他的菲籍移工只能抱怨:

很多菲佣都抱怨他们的雇主,他们应该跟雇主谈才对,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不会抱怨,我会跟他们谈。有一次一个月有五个礼拜天,他们只给我四个[加班费],我告诉他们有五个礼拜天,然后他们说:“哦,你是对的。”

在菲律宾有管理工作经验的移工,可能把家务服务定义为一种技术性的工作,并且强调过去与现在的工作经验的相似性。郑淑如(Cheng 2001)访问台湾的菲籍移工 Baby,她有会计和企管硕士学位,并像 Nora 一样,并不避讳告诉雇主她的学历与背景。Baby 藉由强调家务工作的专业面向来维持自己的尊严,她这样描述(Cheng 2001: 202):

这是份工作,而我用专业的态度来面对它……过去[在菲律宾]我替我老板处理所有的事,作笔记,持续追踪每件事。我很敏锐,我会持续追踪每件事。这没什么不同,在这里工作也

一样……我对工作有自己的一套规划,像是什么时候做什么,还有在一天中先开始做什么,我会作计划。

这些例子呈现了菲籍家务移工融合前台与后台的另一种方法:透过非单一国家的阶层化框架(地主国与母国),把她们的地位确认为与雇主相近的中产阶级同侪。有两个结构性因素解释了为何 Nora 可以在这样的雇用关系中具有相对平等的地位:第一,她主要的责任是照顾病人,非处理家务,而如先前提过的,雇主较愿意和负责较多照顾工作的移工建立个人连带;第二, Nora 具备比雇主更高的教育程度以及较多的全球语言资本(英语),她甚至有时候会当雇主的青少年儿子的英文家教。蓝领雇主视雇用一个大学生的菲佣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解释了为何 Nora 的雇主对有她照顾母亲感到“骄傲”。

Trinidad 是另一个采取类似划界工作的菲籍移工。她在菲律宾时曾是个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现在是个四十四岁的寡妇。基于对海外工作经验的好奇,二年前她曾来台湾工作,照顾雇主家里六十五岁生病的阿妈、阿妈的儿子、媳妇,以及两个成年的孙子。我问她关于她的雇主时,她耸耸肩说:

他们还好啦,他们唯一的问题就是不信任你。譬如,如果你回家晚了,他们就想你去做坏事了,他们会说“也许你交了坏朋友”。我就说:“不要这样说,你们又没见过我的朋友,如果你再这样跟我说,那我也可以说,你有时也回家晚了,那我也可以想说你在外面交了坏朋友。”如果你永远都遵从他们的话,你永远都不会自由的,你不能永远同意你的雇主,否则他们就会一直那样对你。我的雇主尊敬我,他们会说她是来照顾我们母亲的,不是帮佣。

Trinada 以平等和互相 (mutuality) 的叙事方式——如果你这样说我,我也可以这样说你——来对抗以种族歧视的透镜评断移工生活的雇主。Trinada 和雇主发展出一种相对平等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从她们彼此的称呼方式看得出来。“他们叫我妹妹——是指较小的女儿,对吗?”她说,“我也叫他们名字,他们对我像是对他们的小妹,而不是女佣。”Trinada 也有意识地让她的雇主了解她过去在菲律宾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去一家昂贵的餐厅时,我告诉他们,我在菲律宾工作时,也去过类似的餐厅,这样他们就不会看不起我,我不会让他们这么对我。”受过较好教育的移工,有时也会故意跟雇主开启话题,以表现自身的文化品味与知识。<sup>16</sup>有些台湾雇主在访谈中提及,当他们回家发现菲佣在看 CNN,或是透过广播收听古典音乐时,他们大为惊讶,但也印象深刻。

英文是 Trinada 用来平衡劳雇关系的权力杠杆时的一项重要施力工具。她告诉我:“如果他们[雇主]说错了,我就会告诉他们那是错的,他们会问我英文:‘我这样说对吗?’我不让他们看轻我,我总是在留意 (check),如果他们说不好的话,我也会纠正他们。”我问她曾否担心雇主会因此生气,甚至中止她的合约,她自信十足地说:“不会!我不怕失去我的工作,我在菲律宾的薪水甚至更高!我就是这样告诉他们的!”

不像 Luisa 一样在雇主面前掩饰先前的背景,Trinada 反而有意识地展现她在菲律宾的中产阶级位置和生活方式。她以挑战雇主的英文以及拒绝他们对移工的负面评价来质疑雇主的权威。她抗拒毕恭毕敬的工作态度,并大声说出自己的意见以提升自己在雇主家里的地位,犹如她所说的,“我不让他们看轻我”。和 Nora 一样,若干劳雇配对的结构因素,让 Trinada 相对于她的雇主拥有较多的协商议价空间,因为她受雇于一个小康家庭,而且她的工作是照顾



他们的母亲。

既然 Luisa 和 Trinada 同样援用非单一国家的阶层化框架,把自己定位成雇主的中产阶级同侪,为什么她们在实作生活中采取截然不同的划界工作方式?主要的差异在于两人所能承担的挑战雇主与失去工作的成本风险不同。Trinada 可以承受公开呛声的后果,因为她“不怕失去工作”。作为三个成年孩子的母亲,她的财务压力较少,而且仍有机会在菲律宾工作。相对的,Luisa 是有三个幼儿的单亲妈妈,身为家里唯一经济来源的她,若失去工作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她宁可借由整合前台与后台来避免被遣送的风险。

上面的比较也揭露了限制移工选择划界方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移工和雇主如何协商社会距离,主要仍以雇主的划界方式而定。如果 Luisa 的雇主是用较平等、纳入、而非支配、竞争的态度对待她的话(就像 Nora 和 Trinada 的雇主那样),她也可能较放心地让工作与私人生活这两个空间相互开放或渗透。在阶级从属的基本框架下,雇主仍是主动形塑雇佣关系动态的权力所有者,框限了相对弱勢的移工协商社会界线与公私领域的可能性。

## 屋檐下的认同政治

本章描绘了家庭生活中看不见的各种社会界线:我检视雇主和劳工如何协商阶级认同与彼此的社会距离,也比较了雇主对待外籍和本地家务劳工的方式差异,以观照国籍/族群界线的运作。这些跨越社会界线的人际互动发生在一个既是私人家户,又是工作场域的空间里;劳雇双方的划界工作,持续地在建构“家”的定义、公领域与私领域的区隔,以及在前台与后台的部署。

我对划界工作的分析试图连接行动者的结构位置与主体倾向

(disposition), 并强调行动者的能动性 with 内部差异。我建立了两种类型学的分析来描绘划界工作的变异, 并且指出三个主要因素来说明为何特定的雇主和劳工倾向采取某种类型的划界工作: 雇主与劳工的阶级位置, 在工作内容上照顾工作与家事服务的相对比例, 以及雇用场景在时间、空间上的组成。

想要展现他们在阶层排序上的优势地位的雇主, 倾向强调他们与移工之间的差别, 而年轻世代的雇主则为了确认自身的中产阶级认同而试着淡化阶层的差序。在上层阶级之中, 花费较少时间在家且家庭空间宽敞的雇主, 较倾向疏离权威的模式; 而花许多时间跟劳工在家中近身相处的家庭主妇, 容易发展出家母长制的风格。在中产阶级之中, 雇用劳工来照顾孩童的雇主, 倾向于采取工具性的情感关系态度, 而只是为了寻求帮忙家事的雇主则倾向偏好一种生意般的关系, 以减低情感互动所需的时间成本。

上述因素也形塑了移工划界工作的变异。自许为雇主的中产阶级同侪的移工, 通常偏好在前台与后台之间保持可穿透的界线。当她们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工作时, 她们比较容易和雇主建立相对平等的关系; 其他的移工, 就算质疑雇主的阶级优势, 仍倾向隐藏自己先前的背景, 以保护自己的隐私, 并降低挑战雇主权力的风险。也有不少移工, 通常是教育程度较低、或出身乡下者, 认知到自己和雇主之间所存在的明显地位差别。其中, 有海外工作经验的移工尤其知道如何为了己身利益来操弄与雇主的感情连带, 没有工作经验的移工则可能希望从雇主身上寻求庇护与恩惠, 以增加自己生存的资源。此外, 有一些劳工选择尽量减少和雇主的互动, 以避免承受额外的情绪负担以及逾越社会界线的风险, 这样的方式在某些雇用场景较容易发生, 如雇主的家户空间宽敞, 或是雇主整天都在外面工作。

这些分类不是互斥的范畴,而是被类型化的理念型(ideal types),代表了现实生活中连续分布的日常实作。在不同的社会情境里,同一名雇主可能从疏离权威的风格,转换为家母长的态度;或者,劳雇关系可能摇摆于营建信任的情感关系与避免麻烦的生意关系之间。同一家庭里的不同成员也可能对移工采取不同的态度,譬如,当丈夫扮演疏离权威的管理者时,妻子则试图跟保姆建立情感关系。

家庭的界线不是既定的,而像一层又一层同心圆。不仅家庭成员内部有地位排序,家务移工作为“虚拟家人”,有时被包含为家庭的一分子,有时被排除在家庭连带之外,她们的暧昧位置正标示了多重层次的家庭界线的运作。雇主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同情境下,面对不同的观众,衍生相应的不同“前台”与“后台”的设定,对于“家庭”的界线也采取不同的界定方式。

以具体的例子来说,吃饭时的座位安排,这项划界工作的重要日常仪式,通常会因不同的情境而改变。在许多台湾家庭里,吃饭的安排会依据家庭成员的出席状况而变化。如果家里只有女性与小孩,移工常被允许在同样的餐桌上吃饭,或是和家人一起看电视;但当男性雇主或家里的长辈在座,移工则会被请下餐桌。用餐的安排也随着人员组成、空间场地的不同而改变。有些移工在平常时被邀请与雇主家人同桌吃饭,但是当有客人在场时,她们便被要求分开吃。如我访问的一位雇主所解释背后的考虑:“在外人面前,就要分得很清楚,这是一个 discipline 的问题。”<sup>17</sup>相反地,有些家庭要求移工在家里分开吃,但在外面吃饭时则邀请她们一起吃,另一位雇主说明考虑的原因:“我们想要人们看到我们尊敬她,她也需要在他人面前有自尊”。<sup>18</sup>

有个雇用外籍帮佣的朋友读过本章之后,略带焦虑地问我:“那

你说,究竟哪种划界工作比较好?”我无法提供确切的答案来帮助他解消对于如何当个“好”雇主的焦虑,因为划界工作本身必然是雇主和劳工双方互动的结果。某些类型配对起来,有较强的亲近性,有些则相反。寻找恩庇型的劳工会感激家母长制的雇主所给予的礼物和恩惠,而其他类型的劳工则会觉得被羞辱或不喜欢礼物;当劳工偏好保持距离时,企图建立情感关系的雇主会被对方的冷淡觉得沮丧,这样的劳工反而比较适合倾向保持生意关系的雇主,甚至是偏好疏离权威的雇主;喜欢获得尊敬的雇主,遇到秀出大学学历或英文技巧的菲律宾移工,可能大感忤逆,而这种类型的劳工,在喜欢同桌进餐、培养情感关系的雇主面前,较有可能表述自己与雇主的地位近似。

也有人读过本章之后,开玩笑地对我说:“所以,这跟夫妻情侣配对差不多啰。”虽然同样是配对,劳雇关系所置身的是权力不对称的制度脉络,因此,双方往往难以进行超越国族与阶级距离的平等沟通。毕竟,雇主比劳工拥有更多的权力来制定彼此互动的脚本,除了阶级上的优势,身为公民的雇主也比仅在地主国短暂停留的移工,拥有许多制度与资源上的优势。基于此,面对可能被雇主遣送回国的命运,多数移工仍倾向采取保持距离、掩饰先前背景这两种风险较低的策略。

甜蜜家庭的雕梁画栋下,实有着壁垒分明的楚河汉界。本章所揭示的种种划界工作,不只是台湾的雇主与移工之间的日常生活角力,也代表在国际迁移脉络下的认同政治与阶级冲突的缩影。套用女性主义的老话,个人的即政治(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这屋檐下的饮水互动正揭露了全球化的微观政治。





## 结 论





博士班的最后半年,我替一对出国度假的美国教授看顾他们的猫和公寓。和我先前位于芝加哥市区的杂乱小窝相比,他们坐落在幽静郊区的宽敞公寓,为我这个坐困论文愁城的穷学生提供了奢华的堡垒。他们的信箱里常收到清洁工的传单,上面印着“负责任的清洁工、弹性安排、合理收费、我们是白人”的字眼。有几次我工作到一半,抬头看见窗外,喷着 Dial - a - Maid 的清洁公司字样的休旅车停在对街,等着接送几位刚做完打扫工作的钟点女佣。我不时在楼梯间碰到两位清理楼下邻居房子的东欧女佣,当我写作分心之际,若是凝神倾听,可以在楼下的吸尘器噪音之余,听见她们用母语在说说笑笑。

教授屋主在他们即将返国前,安排了一位钟点女佣来清理房子。由于是他们买单,我没立场拒绝,况且,老实说,有人可以帮忙打扫这间宽敞公寓,我也感到如释重负。虽然我在田野期间认识了许多家务移工,我个人从未处于雇主的位置,这次,我几乎是个准雇主,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让人期待,也心生焦虑的新奇经验。

那一天到了。我在冰箱里准备了冰水和果汁,也在厨房桌上摆放水果和点心,好让清洁工可以小憩休息。虽然中介公司说那位清洁工有钥匙可以自己进屋,我还是想跟她说声“嗨”,聊一聊,好让她的服务不是一种冷冰冰的劳动。门铃响了,一位四十出头的女性站

在门口,看来像是波兰人,我紧张地简短介绍了自己,然后请问她的名字。她露出困惑的表情,摇摇头,只说了一句话:“No speak English. (不说英文。)”她抛给我一个短暂的微笑,然后迅速走进厨房,开始工作。显然,她已经清理过这间公寓许多次,她比我更清楚各项清洁用品与工具放在哪里。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狼狈的士兵,在一场追求社会平等的战役中落荒而逃,尽管,战场上并没有出现阶级的敌人。我撤退回房,关上门,试着写些东西。然而,当我听到她在清理我十分钟前才坐过的马桶,我勉力维持的若无其事瞬间瓦解。我快速合上笔记本电脑,冲到附近的咖啡店。喝了一杯又一杯的咖啡,我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迟迟不敢离开,直到天色已黑,我放心确定清洁工已经离开了我的“家”。

在全世界的许多城市里,女性移工都是主要的家务服务提供商,她们可能是移居芝加哥的波兰人、洛杉矶的墨西哥人、纽约的牙买加人、巴塞罗那的摩洛哥人、科威特的斯里兰卡人、多伦多的菲律宾人,以及台北的印尼移工。在跨越地理疆界之后,这些跨国灰姑娘们发现她们入住在一个吊诡的处境中:与雇主的物理距离亲密,但社会距离遥远,而她们的照顾工作,既是爱的劳动,也是金钱的交换。移工在家庭中的出现,也引发雇主的双重焦虑:家,这个社会普遍认为是庇护人们远离混乱公领域的甜蜜私人巢穴,现在却成为一处执行纪律与部署监视的职场;劳雇之间的文化藩篱和权利不平等直逼眼前,让人难以视而不见。本书探究台湾雇主和东南亚移工——就如同芝加哥的我与那位波兰裔清洁工——如何在家庭里和世界上,协商彼此之间不可见却鲜明区隔的界线。

## 愈全球,愈分化

客工的长期造访不仅改变了地主国的环境地景,也创造了许多实质与虚拟的跨国空间。台湾的大城市中都已发展出移工聚落,经由资本的流动、资讯及科技的网络促成跨国连带的维系。移工可以利用合法管道或私人快递服务,跨洋传送现金与包裹;他们在台湾买的各式电器用品,现可以在母国得到维修保证。电子媒体与移工大众的结合,已创造出各种不同形式的想象国度或虚拟社群(Appadurai 1996)。移工可以买杂志、上网或收看卫星电视来取得母国最即时的新闻消息及名人八卦,他们也将盗版的好莱坞电影、迪士尼卡通,甚至台湾流行歌手的MV当做礼物,递送给家乡的亲朋好友。网络与手机等日常科技更帮助他们得以跨越地理距离来维系情感、发展浪漫关系。

跨国主义学者驳斥“同化”的传统论点,强调有越来越多的移民维系着连结地主国与母国两地的家庭、经济、社会、宗教与政治连带,过着一种跨国度的生活(Basch et al. 1994)。然而,另有些学者告诫我们不宜过早地庆祝国界的式微,也就是所谓的国家的“去疆界化”(de-territorialization)。虽然现今有许多人频繁地跨越国界,以“世界人”的尺度经营事业与生活,但他们的生命机遇仍受限于民族国家的制度规范,必须在不同国度之间转换成员身份(Zolberg 1991)。同时,“再疆界化”(re-territorialization)的趋势也在各地出现,当地社会往往基于族群差异的文化想象,而衍生对外来者的政治与社会排斥。

本书显示,跨国迁移的蓬勃发展并未减弱国家主权或国家领土的治理。以亚洲而言,不管是输出国还是输入国,都对国际迁移的



外流或移入制定规范。在“有国界的全球市场”中流动的移工,受制于各种奠基于公民身份原则的法律与政治规范,他们的权利与生存因而被边缘化。跨国移民/工也会利用各种国族身份的制度管道,来增加他们在全全球经济中的资源与机会。中上阶级的移民施展“弹性公民身份”的策略(Ong 1999),借由持有多国护照来促进他们的跨国商业连带与社会生活。相反地,另一端的低阶移工则藉在母国申请多本护照来摆脱地主国政府的工作次数限制,以增加他们进入全球劳动市场的机会。

迁移不只是一个身体移动、社会位置变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主体认同重新形塑、展开多重自我版图的过程。人们虽然跨越了地理疆界,却往往跨不过国族及其他社会界线的无形藩篱。移工的主体位置横越不同国度,却也因此常经历冲突的认同形构。虽然他们得到经济所得与母国地位的提升,却在地主国遭受种族歧视、受雇从事社会鄙夷的工作。人们穿越国界的行动,并未导致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消弭或缓和,反而时常更形巩固了沿着阶级、族群及性别界线而来的社会不平等。

我们活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但也越来越分化的世界。本书的论点挑战了一种常识性的观点:认为社会偏见纯然肇因于陌生以及缺乏接触。确实,国际迁移促成了不同国族群体间更频繁密切的互动接触,当代社会或许对外来人群与文化越来越习以为常,但这不表示多元文化地球村的幸福结局便指日可待,或是社会偏见及歧视就此消失无迹。相反地,跨越社会界线而来的接触经常引发了焦虑与不确定感,因而趋动人们想要重申秀异及区隔异己。家务移工与台湾雇主之间的相遇,宛如显微镜下的切片,彰显了地球村中的权力关系与认同政治。原本划归于亲密领域的家庭,成为一处再制全球不平等及社会界线的角力场。

## 界线的模糊与不连续

透过界线的划定,我们得以为周遭环境赋予意义,并定位我们是谁。如 Stuart Hall(1997: 47-48)所言:“认同总是透过暧昧而建构起来,总是透过分隔(splitting)来建构。分隔了谁是自身,而谁属他者。”社会界线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这些心智框架有真实的存在;相反地,正是因为社会意义其实是流动、多面向的,而经验世界其实是由差异的连续分布,而非截然区分所构成。根据 Eviatar Zerubavel(1991),这样的结构上的暧昧模糊,往往让人们感到焦虑,因而衍生了各式与污染有关的禁忌以及各种以排他为原则的分类范畴,它们帮助人们维持了分类秩序在心智层次上的“纯净”,以及社会建构出来的“不连续性”。

家务移工与台湾新富雇主之间的聘雇关系,揭露了以下四种暧昧情境: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外籍劳工的种族化、阶级形构的国族框架,以及家(home)与家庭(family)之间的断裂。为了因应这些暧昧处境,移工与雇主的跨国交会中至少衍生了四种划界实作,包括性别、阶级、族群/国籍、家/家庭等界线的复杂缔连。

这些社会界线不只是我们用来划分人我之间的认知分类,它们更是一种制度分类,社会资源沿此被不均地分配。我强调的划界工作,则是再制或者挑战社会不平等的重要日常实作。人们跨越地理国界与族群界线的行动,搅乱了政治身份与社会分类的既定架构,并干预既有地位阶层的维持。在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中,公民与移民、雇主与帮佣、男人与女人,透过划界的互动实作,持续模塑、强化,或者修正、重构社会差异与区分。

## 女佣或女主人？家务劳动的连续性

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对立，戳破了女性主义者对四海一家姐妹情谊的浪漫想象。为了提供一个新的概念视角来辨别女人之间的同与异，我提出“家务劳动的连续性”（the continuity of domestic labor）的概念，来描述女人如何在家务劳动的父权分工下面对类似的结构压迫，同时，又因为她们的阶级、族群与国家的差异位置，而有不同形态的局限与能动性。

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都在跟父权讨价还价，但要如何在性别、亲族与市场等三个机制间分派、转包再生产劳动，她们采取的策略大不相同。台湾女性将她们为人妻、为人母的部分责任外包给市场，以回避要求丈夫分担家务时所衍生的婚姻冲突。女性移工则利用家务工作女性化的利基，来换取全球劳动市场上较高的薪资，成为跨国家庭中主要的养家者。台湾媳妇善用家务聘雇来抵抗三代同堂的居住传统，并以此逃脱侍奉公婆的孝媳义务。相反地，女性移工在海外担任雇主家庭的虚拟亲人之际，却需要倚靠母国的亲属来照顾留在家乡的小孩，以维系两地分隔的家庭。

家务工作是建构性别界线的一个重要场域：相对于男人要养家的规范形象，家务与母职形塑了妇职的核心内容。即便在现实生活中，多数女人已跳脱了传统二分的性别分工，不论出于自愿或无奈，成为全职的职业妇女。然而，如本书章节所描绘，与家务劳动相关的性别意识形态仍深刻影响着这些女人的生活感受与自我认同，不管她们是亲自从事家务、或监督其他女性代理皆然。

台湾的中产阶级女性幸赖家务帮手的雇用，才得以像男性一样全心投入职场事业。即便家务劳动可以市场外包，家务生活仍深受性别规范约束。女雇主倚赖家务移工的“影子工作”，来完成她们身为妻子、母亲与媳妇的责任，但她们同时也备感焦虑，深怕自己的地

位被另一个女人取代。基于此,女雇主试图在女主持人与女佣之间划分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以确保自身符合特定阶级与族群的妇职形象。她们的日常划界工作,如烹饪及母职的阶层分工,旨在标示出妻子与女佣、母亲与保姆之间的差异。女主人想要女佣维持家里的清洁,而非掌管家庭的秩序;她们邀请移工保姆成为母职的伙伴,但不能威胁她们作为母亲的地位。

位居阶级与族群光谱尾端的另一群女性,则透过实作与叙事,倾向让女佣/女主人的界线变得可流动与穿透。女性移工借由成为养家者,跨越了性别界线。有些人认为自己跟上班的女雇主差不多,同是为了追求改善家庭福祉而出外工作的职业妇女,只是她们离家更远。有些人强调自己离乡工作正是为了克尽母职,她们扩展母职的定义,把赚钱养家视为一种爱护小孩的作为。同时,她们也努力做一个“好”妈妈,无论是超越空间阻隔照顾子女,或是在雇主家扮演好代理母亲的角色。有些移工不只宣称自己跟女雇主的际运有类似之处,她们甚至认为自己是比女雇主更好的母亲。甚者,有些单身女性移工更用实质行动跨越女佣/女主人的界线,透过嫁给她们的海外雇主,实现灰姑娘的“上嫁”之梦,希望如此一来能从赚薪水的帮佣,升格为提供无酬劳动的爱妻。

### 阶层化的他者:移工的种族化

谁是“外劳”?本书提醒读者不要轻易地把外籍劳工视为一个固定的人口群体,而要进一步考察“外劳”作为一个相对于台湾公民、与其他外国人的社会范畴,是如何被建构为一个种族化他者。我视种族化(racialization)为一个将他者阶层化的多层次过程。在台湾的外国人,由于族群与国籍等位置的差异,被连接的文化意象也有阶层差别。要理解外籍移工的种族化,我们必须同时分析与其

他的划界过程的连结,包括国族界线的划分、私密家务生活的捍卫,以及劳动市场的阶层分化等。

移民政策以及公民身份的规范,体现了一个国家对成员身份的特定看法,这样的身份也与阶级、族群等分类息息相关。政府在管制穿越国界的流动人群的同时,也正致力于打造国族的工程。台湾地区政府招募东南亚移工,却对中国移工紧闭门户,是为了确保族群界线的可见性,以及提升它在东南亚国家间的外交影响力。就像其他亚洲地主国一样,台湾地区政府对白领与蓝领外来者并未一视同仁:前者被赋予居留与归化的权利,但后者不仅无法取得永久居留权,还需受到层层监控。契约移工作为欲求的劳动力而得以进入国家的地理疆界,但却被拒绝转化为公民,被排除在国家的象征性界线之外。

族群界线的划分也在私领域的家庭生活中浮现,但雇主的划界工作有着与国家不同的考虑。为了实现私密家庭生活的理想形象,雇主致力于维持家庭秩序和捍卫私人地盘。他们严加规范移工可以进入的家庭空间,以巩固“肮脏”的外人与“纯净”的家人之间的界线。他们也试图控制移工的行踪及人际网络,以隔绝家户外面的“污染”,包括男性移工的诱惑以及移工团体的政治动员。此外,外籍女佣的种族化,也与女雇主的性别焦虑息息相关。为了在家务移工面前捍卫自己身为妻子与母亲的地位,女雇主常挪用刻板印象来放大族群差异,也因此在家庭生活中,特别是在教育孩子时,再制了种族主义与阶级特权。

人力中介业者也在移工身上套用依国籍别而有差异的刻板印象,以建立一个阶层化的移工劳动市场。他们将印尼女人标榜为“传统的他者”(the traditional other),相较于来自菲律宾的“西化的他者”(the Westernized other),前者是更顺从、理想的仆人。他们也



透过招募过程寻找所欲求的移工特质,以及训练改造她们的身体与心理,来将这些论述付诸实现。这些中介业者细心地选择招募地点与来源,以觅得被地方网络监控的乡下“温驯”女孩。在经过一个月的强制职前训练后,他们声称已将野蛮人“道德化”与“文明化”,且让她们已能适应台湾家庭的“现代”生活风格。此外,他们也透过“合宜”的服装、发型与礼仪管理,将女性移工调教为去女性化的、有纪律的女仆,以顺应未来雇主的目光。

劳力中介业者的营销策略,形塑了移工之间的竞争关系,同时也阻碍了不同国籍的移工之间的串联结盟。菲律宾及印尼移工常认为自己比其他移工族群更为优越,因而再制了种族歧视的论述。结果是,他们将刻板印象及规训强加在自己身上,并视自己的身体为国家领土的延伸,受到道德边界的严密保护。这些论述虽然有效地镇压了家务移工,但它们也同时成为激发移工能动性的资源(Pratt 1999)。举例而言,女性移工可能会善加利用她们深受贫穷所苦的形象,来正当化她们向雇主索取礼物与好处的行为。她们也可能发展出对抗论述(counter-discourse),来破坏主流论述的一致性以及权力关系的运作。简而言之,女性移工试图在“阶层化的他者”的论述地图中,协商出自身的主体位置,结果是抵抗、也巩固了附加在自身上的控制形象。

### 跨国划阶级、在地做阶级

当我们讨论阶级时,经常预设了单一国家或社会的架构,但对跨国移工而言,他们的阶级定位跨越了多个社会,不只局限在单一国度内。我以“跨国阶级划界”(transnational class mapping)的概念来描述全球化脉络下复杂的阶级形构。当阶级形构过程发生在横越不同文化的跨国空间时,阶级与国族的缝合、缔连出现在两个主



要的层次。第一个是结构层次上的阶级定位(class positioning)。全球化不仅打开了资本与劳动力的在地市场,也助长工作与婚姻迁移的现象。在这些生产关系与再生产关系中,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与文化资源上的不平等,被转换为迁移主体的经济或文化资本,也决定了他/她的阶级位置的高低。

台湾新富雇主与菲律宾中产阶级移工以不同的方向进行阶级流动,这是两个原生国之间的经济发展落差所造成的结果。借由消费进口商品、海外旅游及外籍劳动力,台湾雇主在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之上建立了个人的都会生活风格。相反地,大学毕业的菲律宾移工却在景气的母国面临薪资贬值及失业威胁,因而远赴海外寻求更高的薪资,但以外籍女佣身份工作的她们,却必须经历职业地位的向下流动。

两者的跨国连结形成了一个阶级理论中的异例:奠基于经济资本所有权的阶级支配不必然符合文化资本的禀赋,在这里指的是教育文凭以及英文的语言资本。跨国空间中的阶级位置与认同是多重决定的。阶级界线不只建立在经济资源的差距与支配上,也有赖文化正当性的象征斗争,其中,语言成为一个关键性的元素。不论是实际参与跨国迁移的菲律宾移工,或是进行跨国界消费的台湾雇主,都试图借由全球化的脉络来促成多重资本的积累与转换,也透过英语这个跨国文化资本来进行在地权力关系的协商与斗争。台湾的新富雇主投注大量金钱在孩子的教育与英语学习上,期待能够帮助他们在国际化的未来取得竞争优势。曾被美国殖民而拥有英文语言资本的菲律宾移工,因此取得全球移工市场上的优势,在面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台湾雇主时,他们也因而拥有某些议价权力,但他们的人力资本仍因原生国之故而不受地主国的认可(“第三国家的野鸡大学”、“不正统的英文”)。

以上讨论带领我们进入“跨国阶级划界”的第二个层次,也就是阶级变成(class becoming)的过程。虽然阶级定位是在全球的层次上运作,然而,“做阶级”的互动实作,仍需透过在地的生活空间与文化资源来进行协商与斗争。台湾的雇主在面对移工雇员时,会借由将国家的不平等转化为种族化差异,来建立自身的阶级优越感。中产阶级的雇主则会试图淡化聘雇关系中的社会不平等,以此彰显自身是拥有自由政治立场的全球公民。有些菲律宾移工会突显自己在母国的背景,借此建立和雇主相仿的地位,但有些移工选择隐藏过往经历,以避免损及雇主权威。有些移工也会把英语当做一种象征性的抵抗工具,但其他移工则忽略雇主的文法错误,以执行谦卑表演。

国际迁移创造出多重的主体位置,让位居其中的个人得以在跨越多重国度的生活里协商阶级界线的持续性与可变性。家务移工宛如跨国灰姑娘般,在地主国过着双重生活:她们在雇主家中是受到层层规范束缚的女仆,但一到假日便摇身一变成追逐时尚的消费者;她们在前台进行谦卑表演,却在后台讪笑台湾雇主的英语。在移工的跨国生活中,还存有另一种前/后台之分:虽然她们在地主国中的地位是向下流动的,但回到母国后,她们可借由表现物质收益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有些海外女佣甚至还是“遥控的女主人”,在家乡雇有当地的女佣。返乡的移工在家人与邻居面前绝口不谈海外经历的黑暗面,只展示她们宛如快乐观光客的相片,并如归国英雄般滔滔说着她们成功的故事。

### 屋檐下的全球化:何以为“家”?

全球化不只出现在加工出口区或国际贸易市场中,全球化也发生在我们的厨房与客厅里。生存在富裕国家里的家庭与个人,其食

衣住行多仰赖各种明显或隐晦的全球劳力外包。来自边陲经济国的廉价劳动力,不仅在当地的田地、农场里种植、处理各式便宜的农产品,也在卫星工厂中制造成衣、加工食物半成品,以及生产轻薄短小的家电用品。这些产品的外销帮助消费者,大幅降低其家务工作的劳力密集程度。更具体的劳动外包,则是利用劳动力的跨国出口,成为薪资低廉的女佣与看护,为富裕国家的雇主接手家务与照顾劳动的重担。

同样置身于屋檐下的全球化,台湾雇主与家务移工面临不同的两难困境,并发展出不同的空间划界模式来建构“家”与“家庭”。当家变成一处跨国接触的场域时,台湾雇主建构出多层次的家庭界线来因应与移工的近距离接触,并且捍卫家的领土。他们既想将移工纳为家庭成员,但又试图根据市场原则来遂行劳动控制。为了确保孩子能受到最好的照顾,他们把移工比拟为家庭成员或代理亲人,但同时也担虑移工的照顾质量与品性道德。他们想与移工建立情感关系,以舒缓自身的阶级罪恶感,但又没时间或不愿意负担这些额外的情绪工作,并且不想让家庭隐私受到侵犯。

全球化也让移工经历了作为亲密圈的“家庭”与作为实际住所的“家”的断裂状况。身为雇主的代理亲人,移工必须与自己的家人分住两地,尽管她们未能在每日的家务生活中具体现身,她们仍可维系跨国的家庭连带。透过商品、资讯、电话与短信的跨国流动,移工母亲以“跨国持家”的实作,扮演遥控主妇与远方母亲的角色。单身的女性移工试图在流离的异乡生活中,透过女性朋友与同志伴侣建立另类的家庭连带,或者,透过笔友俱乐部或网路交友来寻找伴侣,以克服空间限制,建立属于自己的婚姻家庭。她们的海外旅程时常成为一个多国迁移的循环历程,经历不同的地主国、相异的迁移路径(工作或结婚),以及多重形式的跨国家庭。

在地主国充满歧视与排除的公共空间里,移工也努力地通过培力与集结,试图在异乡营造“家”的虚拟社群。尽管多数时间被束缚在雇主家中,移工借由手机建立无远弗届的人际网络。既然在周间工作时无法享有充分的隐私空间,她们便利用周日外出时把“公共”空间转化为私人领域与后台。虽然只身在台湾,她们仰赖同乡的跨国网络与经营店家,取得来自母国的食物与商品,用鸭仔蛋、青木瓜、鱼露和沙嗲,重新营造家乡的生活风格。慢慢地,她们发展出移工网络及公共社群,将漂泊的异乡地转化为短期的避风港。

## 行动方向与政策建议

不论是台湾女雇主,或是来自印尼、菲律宾等世界各地的女人,其实都陷在一个类似的困境中:再生产劳动的私有化。也就是说,家庭成员的福祉照顾,高度仰赖亲人提供的无酬劳动,而其中具有社会优势的家庭,则可利用市场雇用的方式寻求外包。这种私有化(透过家庭或市场的机制)的制度安排,助长了家务劳动的女性化与道德化。“女人的天职”、“爱的劳动”等社会迷思,强化了女性身为人妻、人母的焦虑,并且低估了女人作为劳动者的技术与贡献。

招募家务移工是一项延续、强化照顾私有化的政策。这个政策放任国家与丈夫的缺席,持续将家务与照顾工作定义为女人的天职与家庭的责任,差别仅在于如今是由另一位女性来从事这份工作,而家庭的责任变成了确保购买服务的质量。在台湾及其他东亚国家,家庭被认为是保护家庭成员的经济与社会福祉的首要单位,大部分的政府都未建立完整的公共福利规划。立法者鼓励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歌颂其作为一种提供孩童和老人照顾的传统安排。这种“美满大家庭”的浪漫形象,模糊掩饰了其后的性别与代间的权力

不平等。当照顾的私有化与父系家庭的传统相联结时,更加强化了女性在父权家庭中的附属地位。

与雇主同住的东南亚移工,帮助许多在台湾、香港与新加坡的华人家庭,得以维持与年迈父母同住、提供孩童居家照顾的“理想”安排。借由聘雇移工担任孩子的代理母亲、以及老人的虚拟亲人,雇主得以减轻她们离子外出工作的母职罪恶感,以及避免把公婆送去养老院而引起的不孝污名。全球化与国际迁移提供了一个便宜的解决策略,让雇主得以兼顾在地的家庭伦理与孝道规范。讽刺的是,地主国的“甜蜜大家庭”的悠扬乐章,必须仰赖的伴奏是移工与家人长期分离的低调哀歌。

Bridget Anderson(2000: 190)在欧洲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为了要跟男人一样参与[劳动市场],女人必须有像妻子一样提供弹性的劳工。”幸赖有家务移工提供的弹性劳动力,欧洲的中产阶级女性方能和男性一样,获得进入公领域的平等机会。其中隐含的另一个吊诡之处是:女人必须仰赖被剥夺公民身份与权利的外籍劳工,来帮助她们充分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工作权与经济权)。

亚洲政府也依循相似的逻辑引入家务移工,以私有化的“福利外劳”方案,解决照顾劳动的短缺,并借此将女性公民推入劳动市场,作为促进国家发展的策略之一。国家的外劳政策,特别是“客工”计划,把移工定位为用完就丢的商品以及短暂居留的过客。透过时间上的过渡性、空间上的固着性(不得更换雇主与工作地点)这两条治理轴线,台湾的政治与法令体制将蓝领移工定位成一个“无权利的阶级”(Walzer 1983),不仅缺乏政治权与公民权,也被剥夺在劳动力市场中自由流动的经济权,而成为人身从属于契约雇主的“奴工”。



## 照顾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如何让女人不再为难女人,而是女人相挺?要寻求女佣与女主人之间的合作与结盟,我们必须视再生产劳动是一种公共责任及一份专业工作。

首先,我们要挑战公/私的二元区分,鼓吹照顾的公共化,意即,照顾应被视为是一种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种充分实现公民身份的必要元素(Tronto 1993)。换言之,当公民需要照顾时,应被国家保障管道,取得质量适切的照顾。政府应以小区为基础,提供大众能负担的照护机构,并建立年金、儿童津贴等普遍主义的福利给付制度,同时,进行符合阶级重分配、社会正义的累进税制改革。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中,照顾被视为社会与小区的集体责任和公众参与(civic engagement),而不只是家庭或女人的职责,或被贬值为弱势劳工的低贱工作。

丹麦、爱尔兰、英国等国家有所谓“照顾者津贴”的制度,由国家利用税收重分配及社会安全制度的总体设计,来支付照顾者(不论是家人或是非家人)的薪资。<sup>1</sup>美国加州也有“居家支持服务”(In-home Support Services,简称IHSS)的制度,提供低收入老人时数不一的看护照顾服务。这样的制度,透过国家补助,一方面,确认了照顾工作的劳动价值,避免家庭照顾者的无酬剥削,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雇主变成政府而非被照顾者,照顾工作者因此可以透过集体的方式,向国家争取劳动条件的合理调整。加州地区的监护工,便加入了服务雇员国际工会(SEIU),成功地向地方政府争取到加薪以及健康保险。在这样的政策与行动脉络中,被照顾者与照顾者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直接对立的劳雇关系,而是相互结盟,共同争取照顾者的劳动权益,也同时确保了照顾的质量。

台湾地区政府自1996年以来开始推动的长期照护政策,便具



有照顾公共化的精神。因应人口老化的趋势,长期照顾政策以居家小区照护、长期照护机构等方式,逐步建立老人照护的网络。但在预算有限、法令不足的状况下,台湾的长期照顾政策的推动仍有一段长路要走。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照顾政策的设计中几乎完全没有考量到外籍监护工的角色。我们面对的现实是,由于薪资与工时上的落差,长期照顾计划在可见的未来不可能完全取代外劳。在这样的状况下,与其批评外籍监护工是推动长期照顾计划的障碍,政府更应积极保障移工的劳动条件,让台湾雇主感到外劳不是如此“好用”(薪资低且容易控制),而愿意雇用本劳(王增勇 2007)。

照顾工作要求的不只是体力的负荷,更需要高度的细心与耐心,特别当被照顾者处于瘫痪失能的状况。目前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放让照护失能家庭申请“喘息服务”,一年有若干天可以得到委托机构提供的暂时性照顾服务,以纾解长期照顾者的身心压力。此政策虽然规模有限,但展现了照顾公共化的主旨,可惜的是,这项补助排除了已雇用外籍看护工的家庭。2003年发生刘侠女士被其雇用的印尼监护工推倒致死的不幸意外,突显出外籍监护工所承受的身心压力。移工团体近年来倡议开放使用外劳家庭可以申请政府补助的喘息服务,便是希望借此确保移工的休假喘息,以创造一个受照顾者与照顾者双赢结盟的环境。

## 家务与照顾是正式专业的工作

第二个行动的方向,是促进家务与照顾工作的正式化与专业化。如果雇主不将家务工作视为真正的工作,便倾向将不合理的要求强加在他们的代理人(而非受雇劳工)身上,进而忽略了雇佣关系中以合约规范的权利义务。如果有酬的家务服务不能得到适切的社会认可以及制度性的保障,个人化的雇佣关系(把帮佣比拟为家

人一样)反而会在这些作为虚拟亲人的劳工身上,复制一种压迫性的阶层关系(如婆婆对待媳妇)。有些女性主义者期待全面废除家务服务,这样的想法毕竟有如乌托邦,较可行的策略是,提升家务与照顾工作的劳动条件,并维护劳动者的尊严与人性(Hondagneu - Sotelo 2001)。

家务工作专业化的行动议程,必须以制度法令规范的改变为基础,否则,专业主义的修辞徒然成为中介控制劳工的论述,强化劳动者的自我规训。在台湾和其他亚洲地主国,家务劳动者并不在劳动基准法的保护范围内。相较于正式部门聘用的移工(大部分是男性),劳动法律上的排除,更形强化了女性家务移工的边缘处境。这一点再度反应出家务工作的女性化与私有化的意识形态,在国家的眼中,外籍帮佣与监护工并不是服务国家经济的劳工,只是“家庭的附属品”(Huang and Yeoh 2003: 93)。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等团体所促成的“家事服务法推动联盟”,(Promotion Alliance for the Household Service Act,简称 PAHSA)便是一个重要的立法行动,将有助于家务与照顾工作的理性化与法制化。此外,彭婉如基金会长期以来以民间团体的力量,推动家事管理、老人居家陪伴、居家照顾等服务人员的培训,是一种由下而上推动家务与照顾工作专业化的初步工程。同时,基金会协助劳工与雇主进行工作内容与劳动条件的协议,并成立“小区服务人员职业工会”办理相关保险。该工会的成员目前仅限于参加基金会培训的人员,未来如何在家务与照顾等传统工会忽略的部门进行集结与组织,将是落实法律保护、促进劳工权益的必要梁柱。

## 保障移工的劳动人权

第三个行动方向,是保障移工的劳动人权。对于移工的人权侵

犯,不能单纯归因于个别雇主或中介的不仁不义,而是政策体制导致的结构性压迫。对于移工的人权保障,也不只是透过抽象的修法或口号,而是与台湾公民——特别是中介、雇主与本地劳工等群体——的具体利益与生活经验息息相关。身为台湾社会的一员,我们的袖手旁观无可避免地让我们成为这个系统性地压迫、歧视移工的体制的共犯。

高额中介费是来台移工遭遇剥削的主要来源之一。有些外劳团体倡议全面废除中介制度,以国对国的方式进行直接雇用。虽然在概念上很理想,但执行上的行政成本甚高。我建议透过招募管道多元化来减低中介体制在外劳输入过程中的支配。超过一定人数的招募案件,劳委会应强制以国对国的方式进行雇用;至于小规模、家庭类外劳的雇用,尤其是同一人再雇用的状况下,劳委会则可透过简化申请程序、降低规费、提供中介平台等方式鼓励雇主办理直接雇用。<sup>2</sup>

劳雇之间存在结构上的权力差距,但同时也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如何让彼此之间不是对立,而是相挺,必须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劳动条件上。劳委会的现行政策,把蓝领外劳视为隶属于契约雇主的不自由商品,强化了劳资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同时,要求雇主对于外劳“逃跑”负连带责任,更促使雇主限制或侵犯移工的人身自由。劳委会应全面开放自由转换雇主,使移工可以透过合法市场管道流动,而不需偷偷地不告而别。此外,我也发现雇主对于移工的权益(特别关于中介费收取、直接聘雇管道等),拥有的信息经常是不充分或不正确的。雇主在享受移工的便宜劳动力之际,也肩负保障外劳人权的道德责任,政府可要求雇主在雇用移工前参加相关的资讯讲座。

本地的劳工与工会,长期以来一直把移工视为竞争工作机会的

对象,而非组织结盟的力量。其实,保障移工的劳动人权,不仅从工人团结相挺的角度上来看有其必要,此举也有助于保障本劳的就业机会。因为,唯有确保移工的劳动权益、缩小本劳与外劳在劳动条件上的差距,才能避免资本家基于降低劳动成本的考虑,雇用更多的外劳来替代本劳。

台湾引进外劳已近二十年,长期以来外劳人数维持30万左右,并无显著的降缩,说明了台湾社会对于这群劳动力有着相对稳定的需求。这样的现实状况与政策中一再将外劳定位为“暂时性”、“补充性”的劳动力,大不符合。事实上,没有营建泰劳,我们难能享受便利的捷运与高铁;没有外籍监护工,我们目前的社会安全网无力承担孤老废疾等需要照顾的弱势公民。

移工人权的现状,突显出经济的不平等、种族/族群的歧视,以及国籍/公民身份的排他等三个面向的不公不义。这些议题,不只涉及移工个人的权益,也攸关台湾民主赖以茁壮的公民社会与公民文化的发展。<sup>3</sup>追求自由平等的公民文化是台湾社会历经民主化的艰辛过程中逐步打造累积的宝贵核心价值。我们要落实民主深化、人权立国等原则,必须正视非公民的外国住民——尤其是其中居于阶级与族群弱势的外国人——作为台湾社会的有机组成的一部分。

在未来公民身份、移民政策的辩论中,我们应慎重考虑提供移工永久居留、入籍归化,或是家庭团聚的管道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透过新的政治论述与制度框架,来对非公民的永久居民、合法住民的权益,作扩充性的保障。我们可效法许多欧洲国家,赋予居留超过一定期限的外国人相当程度的实质公民权利。<sup>4</sup>此举强调福利国家的受惠成员的界定不应只根据公民身份,而是建立在居住、工作、生活于同一疆域的基础。蓝领移工应被允许在续约的前提下有权延长居留,在这样的情况下,移工得以“长期居民”的身份进一步

参与台湾的公共生活与公民社会,同时得以有较强的意愿、较充分的资源来加入工会组织与结盟行动。

吴静如(2005)进一步指出,“公民身份”的争取并非移工运动的最高目标,也未必符合在台移工的实际需求,如何建立跨国结盟的移工运动是一个更符合移工权益、更长远而关键的目标。国内的一些移工团体在近年来已经开始倡议所谓“新移工权利运动”,强调透过各种管道,包括诗歌创作、摄影工作坊等文化活动<sup>5</sup>,让移工正视自己的移工身份,以发展流离劳动阶级的文化与意识,作为一种重要的培力过程。

综观历史,台湾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社会的开放系统。我们的汉人祖先是被贫穷所逼、渡海来台的罗汉脚,我们的血液中流动着族群交会通婚的历史。21世纪的今天,婚姻与劳动移民的浪潮带来新一批的台湾居民,正改造着台湾的人口面貌与文化地景。移工与移民怀抱新的文化活水,以各种实质与虚拟的方式进行跨国生活,他们冲击着我们对于国界与社群的固有想象,他们正在改写“我们”的定义与内容。

各式各样的跨越地理国界与族群分野的人际接触,并不必然会导致彼此的距离与偏见的消失。多元共荣的“地球村”只是表象或神话,除非,我们愿意正视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权力关系,并且积极参与促成民主平等的政治行动与制度改革。在这个越来越整合、同时也越来越分化的世界里,我们亟需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和自省性的文化态度,来打破国族中心的地域主义和社会歧视的隐形界线。



附 录

# 研究方法





1998年8月到1999年7月间,我在一处我称之为“圣灵堂”的田野进行参与观察。这是一家隶属于天主教堂的非营利组织,自90年代初就开始服务台北的移工。每逢周日,都有将近60到100位的菲律宾人来此参加英文弥撒。这个教堂坐落在中产阶级住宅区,因此大多数造访的移工都是女性家务移工,弥撒过后,她们大半会留在教堂后方的两层楼办公室,一起聊天、练习合唱、煮菲律宾食物、共食午餐等。到了下午,有些人会留下来参加圣经班、中文课、计算机课等其他活动;其他人则去中山北路一带汇款、邮寄包裹、逛街购物或参加社交聚会。

我是由圣灵堂修女的介绍进入这个社群的,之后我自愿在周日教授中文课,并协助修女处理劳工申诉的个案。这些志工工作减轻了我的罪恶感(不只是以榨取资讯方式“剥削”移工的研究者),也有助于我在田野中建立信任与友谊关系。所有社群的成员都知悉我的研究身份,我也常参与她们在周日的各样活动。在研究期间,我与大部分的受访者都结成了好友,并经常互相联络。田野工作结束后,其中几位仍持续透过信件、长途电话、电子邮件与我保持联系。

我总共访谈了58位菲律宾家务移工,并透过各种管道找寻到这些受访者,以达成样本的多样性。大部分(34位)的受访者是在

圣灵堂中认识的,有四位由雇主引荐,然后她们又将其他社交圈的邻居、朋友、亲人介绍给我,这让我得以接触到不在周日休假或前往不同教堂的家务移工。这些受访者的工作条件相异,所处地理位置也不同,其中,与雇主同住、有合法证件的移工有 49 位,合法工作但未与雇主同住的钟点清洁工有三位,有六位则是无证移工(三名与雇主同住、三名为钟点清洁工)。大多数都在台北县市及周边工作,除了五位菲籍家务看护在中台湾的一个小镇照顾老人。

我对于在移工休假时进行访谈,有时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觉得这剥夺了她们宝贵的周日休闲时光。我偏好在她们的日常活动中搜集“自然发生的描述”(naturally occurring descriptions)(Emerson et al. 1995: 114)。我聆听她们的对话(若她们以菲律宾方言交谈,我会请她们翻译给我听),并提出问题、加入会话。很多对话发生在街头、公车上的聊天,或是在我们清理教堂、一起吃午餐的时候。回到家后,我会马上记下细节。我也在圣灵堂的办公室与大厅,与一半以上的菲籍受访者进行录音访谈,时间在半小时到两小时不等。研究结束之际,我还在圣灵堂举行了两场焦点座谈,讨论她们的迁移动机与出国工作对她们家庭的影响。

我透过个人网络接触台湾雇主,邀请进行开放式的深入访谈,其中有 47 位是女性雇主、四位是男性雇主,包括三对夫妻。所有的雇主都是汉人,访谈时间大约在一小时到三小时之间,全程录音并誊录成逐字稿。我以滚雪球的方式来寻找受访者,但各受访者引介的对象只限于一位,以达成较多元的样本。这些雇主受访者处于不同的生命阶段,聘雇的经历也很不同。在访谈时,雇用家务移工不到三年时间的雇主有 25 位,四到六年时间的有 14 位,超过七年时间的则有六位。平均聘雇时间是四年。

大部分的雇主受访者都住在大台北地区,但地点与阶级背景大

为不同。我曾远赴坐落阳明山上的豪华别墅,也曾走入都市外缘的老旧公寓。我也在中台湾观察数天看护移工如何与其照顾的老人互动。我多半是在雇主家中进行访谈,以同时观察他们与家务移工的互动,但有些雇主会以工作繁忙或不想在家中被打扰为理由,而选择在午餐休息时间或下班后到餐厅或办公室受访。

我试图访谈男性雇主,因为在既有文献中几乎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虽然我循线找到了几名男性雇主,但在访谈过程中遭遇到重重困难。有些男性雇主回我:“我对这些事完全不知道,你应该问我老婆”,粗鲁地拒绝受访。答应受访的男性雇主则多半对移工的工作内容与个人细节一知半解。犹如我在第三章提到的,男性雇主的漠不关心,反映出来的是他们觉得家务劳动是微不足道的“女人家的事”。此外,也有些男性雇主自发性地与家务移工保持距离,以避免妻子误解。

一个合理的猜测是,我很难透过滚雪球的采样方式访谈到对移工遂行严苛控制的雇主。当一些受访者引介其他雇主给我时,他们常自动避开了这些个案,并说:“我不觉得她会想跟你谈这个。”有些雇主回绝了我的访谈请求,原因(或借口)常是“对不起,我很忙”或“我没什么有趣的可以告诉你耶”。同样地,我也很难访谈到那些被雇主禁止休假的家务移工。为了克服这个潜在的样本偏差,我在处理劳工申诉时,会刻意留意那些经历严苛管理控制的移工个案,并前往访视拘留所的无证移工。雇主及移工受访者也会告诉我他们的邻居或朋友如何严加控管家务移工的信息。我并不聚焦在家务雇佣关系较为极端的侵害或虐待个案,因为它们不是我最主要的研究关怀。我访谈的是居于一般处境的雇主与移工,因为我关心的是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微观政治。

所有与菲律宾移工的访谈与对话都以英文进行,因为我并不会



说任何菲律宾方言。很幸运的是,圣灵堂的執行長是个在棉兰老岛长大的华侨修女,会说的马尼拉话也很有限,所以她与移工的交谈以及教堂举办的活动都以英文进行,我因而可以不借翻译之助而进行观察。大部分的移工英文都还不错,但搞错时态与性别代名词等文法错误则很常见,她们的话语在本书引用时,由我翻译成中文。

所有跟雇主的访谈都是以中文进行(国语与闽南语)。所有书中出现的名字都是假名。秉于台湾传统的称谓方式,对于年纪较长的雇主,我以其姓氏(男性)或丈夫姓氏(女性),来取其化名。较年轻的雇主,我用中文化名直呼,惯用英文名字的受访者则冠以英文假名。

我在1999年4月到菲律宾两个礼拜,与返乡的移工及其在马尼拉与丹辘省(Tarlac,位于吕宋岛中部)的家人共处。期间,我访问了三家人力中介公司,观察它们如何面谈移工。我也造访了OWWA、POEA,及五家位于马尼拉的非营利移工组织。2002年春天,我再次到马尼拉与怡朗(Ilo-Ilo)旅行两个礼拜,探访旧识,了解她们的近况与未来计划。

第二阶段的田野工作是从2002年9月到2003年10月。寻找印尼家务移工更为困难,因为她们不像以天主教堂为社群据点的菲律宾移工那样,以清真寺为(女性移工)主要聚集之处。因此,我在印尼移工周日群聚的台北火车站寻觅受访者。在两位研究助理的帮忙之下(一为台湾人,一为马来西亚人),我与逗留车站大厅的印尼移工攀谈,并与她们的朋友聊天。我们通常与初次谋面的印尼移工单纯聊天,之后再择期做正式的访谈。

我们深度访谈了35位印尼家务移工,若访谈可以用国语或闽南话进行,我会亲自进行访谈。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偏好说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n),马来西亚籍的助理会与她们进行访谈,并

将其翻译成中文。大部分的访谈都录了音,但有些移工对录音不太自在,那么我们就只会在访谈过程中做笔记。大约一半的受访者只经过一次访谈,但我们与其余受访者都建立了长期的关系。在周日时,我们会和她们一起去桃园逛街跳舞、在二二八公园举行生日派对,或在车站大厅聚会野餐。在工作天时,我们则透过手机或短信与她们保持联系。

2003年8月,我到东爪哇进行两个礼拜的田野工作,台湾大部分的印尼移工都出自那里。我陪伴一位契约到期启程返乡的移工朋友,与她的家人共同生活了几天,然后造访其他四位住在不同村落的移工朋友。我也访谈了两家分别位于泗水及雅加达的人力中介公司,并观察它们的培训中心如何训练未来的移工,此外,我也拜访了三家位于雅加达的非营利移工组织。

此外,我在台湾访谈了七家人力中介公司与两位政府官员。我也参加了一些由劳委会举办的会议,与组织工作者及中介代表讨论移工议题。我也参与了一些由非营利移工组织发起的倡议运动与教育活动。在助理协助之下,我广泛地搜集了与移工有关的统计及调查资料、新闻、社论与杂志报导等。为了了解家务服务的历史,我在1999年访谈了七位台湾本土的家务工作者,以及一家营运了数十年之久的中介机构。



## 注 释

### 导论

- 1 联合国对国际移民的统计包含四类：永久性迁移、暂时性迁移（分为契约移民与专业移民）、无证迁移（irregular migration）、被迫性迁移。参见 United Nation 2006。
- 2 Battistella 2002; Yamanaka and Piper 2003。
- 3 Mohanty 1991; Ong 1994。
- 4 有些研究聚焦于输出国的政策与社会脉络，例如，大石奈奈（2005）的书比较不同的亚洲输出国与接收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同异、Michele Gamburd（2000）检视国际迁移如何冲击斯里兰卡移工的家庭关系。其他研究则关注家务移工在海外的生活，例如 Christine Chin（1998）在马来西亚的研究，Nicole Constable（1997a）有关香港的菲律宾女佣的探讨。也有不少研究者投入台湾个案的考察，林津如（2000；Lin 1999）探讨女雇主与帮佣之间的剥削与对立关系，也对照外籍与本籍家务劳工的差别待遇；林秀丽（2000）的硕士论文则从公民身份的论点，探讨外籍帮佣的边缘化处境；郑淑如的博士论文则偏重由国族政治的角度切入雇用移工家庭的日常政治（Cheng 2001, 2007）。
- 5 查某嫫意指在八岁或更小时便被卖或买来的女孩。查某嫫被视为主人的财产，而非独立的人。她没有姓、没有薪水，但及长成，主人有义务替其安排婚事（卓意雯 1993；Okamatsu 1902）。
- 6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陈金田译，1990。
- 7 陈昭如（1997）引用日本统治时期的民法学家姊齿松平的说法。也见杨翠（1993：49, 53）。
- 8 台湾总督府官临时国势调查部编，1921, 1934。
- 9 冰箱、洗衣机等现代家务设备在 60 年代仍很罕见，直到 70 年代才快速普及（Thornton and Lin 1994：84）。
- 10 我在 1999 年访问几位当时已经六七十岁的本地家务劳工，都不约而同谈到这出连续剧，有些甚至自承受到此电视剧的启发，于是想来台北帮佣。
- 11 多数日工的工作时间从下午到傍晚，四到五小时不等，有的只在周间工作，有的包含周末，以台北县市来说，日工的月薪则在 2 万到 2.9 万元之间。参见彭婉如基金会网站，家事管理服务收费标准，<http://www.ele->

- phants. org. tw/work\_price. html(2008/9/22)。
- 12 以台北县市来说,在每周或隔周固定清扫的状况下,每次清扫约耗费3-4小时,每次收费1000-1400元,平均时薪约为250至350元台币之间。
  - 13 我在1999年访谈的一位雇主曾每月花4.5万元雇了一位住在本地的家务帮佣,其薪资是移工薪资的三倍。
  - 14 Constable 1997a、Gaw 1991。
  - 15 Chaplin 1978、Coser 1974。
  - 16 若家中有三个三岁以下的孩子,或者跨国公司的外国主管不受此限。
  - 17 本书出现的所有姓名皆为假名。
  - 18 参见 Douglas(1966)、Durkheim and Mauss(1963),以及 Zerubavel(1991)。
  - 19 Christena Nippert - Eng(1996: 7)把“划界工作”(boundary work)定义为“我们用来创造、维持与修正文化分类的策略、原则与实作”。
  - 20 Brubaker 与 Cooper(2000)建议我们改用“认同形构”(identification)这个词汇来避免“认同”(identity)的物化。
  - 21 Judith Gerson 与 Kathy Peiss(1985)扬弃静态的“性别角色”概念,转而引介“性别界线”的概念来强调性别分派的可塑性与渗透性。Jean Potuchek(1997)对性别界线提出了更明确的界定,指的是将“男人”与“女人”划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的标记(marker)。
  - 22 恩格斯(Engels 1942/1972)对“再生产劳动”这个词汇的使用意义比较广泛,同时用以描述维生的生产与人类的代间生产(包括生殖)。家务劳动也主要分为两类:维生的再生产(例如购买家用品、料理三餐、为家人清洗及缝补衣服等),以及社会的再生产(包括教育小孩、为成人提供照顾与情感支持,以及维持亲属与社群连带关系)(Colen 1995; Lorber 1994)。
  - 23 在此我受到 Evelyn Nakano Glenn(1992)的启发,她认为奴隶制度与服务工作具有历史上的连续性,彰显出有薪再生产劳动的种族分工(都是由少数族裔的女性从事)。
  - 24 这是所谓的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或学院种族主义(academic racism),透过语言、论述等文化霸权,扣合对于种视的集体再现与歧视行为(Balibar 1991)。
  - 25 英国学者 Robert Miles(1989)强调对于种族范畴的理解不可脱离阶级分化、生产方式的分析,种族化是一种意识形态过程,协助并掩饰阶级剥削关系。Wallerstein(1991)也认为种族分类的产生是殖民主义、世界体系分工的意识形态效果。然而,这些马派学者的立论,也被批评为把种族主义过度化约为阶级支配。

- 26 当代欧洲学者针对种族主义的内涵在后殖民时期的转变,区分出种族主义的新旧类型(Wieviorka 1994)。Balibar(1991)把这种对移民的歧视,称为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racism without race),新种族主义着重的不是通常联系于“种族”概念的生物体质、外表形征,而是把文化差异本质化与自然化。相关文献回顾详见蓝佩嘉(2005)。
- 27 参见 Hall 1992、Ong 1999、Lamont 1992。
- 28 Jeff Weintraub(1997)提出一个比较性的归纳整理,指出四种概念化公/私领域的方式:一、自由主义经济学:国家/市场;二、共和主义:政治社群、公民社会/国家、家户或市场;三、社会史与戏剧分析途径:社交生活(sociability)/个人生活;四、女性主义:市场、工作/家庭、亲密关系。前两者主要区辨的是政治与非政治领域的界线,后两者则从私领域的建构与区隔出发。
- 29 蔡晏霖(Tsai 2008)关于印尼棉兰华人雇用女佣的研究中,提出了这样的洞见,她批评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在论述家务雇用造成亲密关系的商品化时,预设了以欧洲资产阶级婚姻为理想原型的关于家庭与亲密关系的特定看法。
- 30 我在这里采取的是民族志的建构主义者取径,视家庭是“社会建构的、依情境偶发的意义体”(Holstein and Gubrium 1995: 896)。
- 31 如 Mary Romero(1992: 130)警告,这样的情况经常“模糊了有薪与无酬家务间的区隔,并且削弱了工作者保护契约协议的能力”。
- 32 Constable 1999; Huang, Teo, and Yeoh 2000; Yeoh and Huang 2000。

## 第一章:合法的奴工

- 1 本书引用的所有菲律宾移工的话,原始为英文,由作者翻译为中文。
- 2 Fröbel et al. (1980)提出新国际劳动分工(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labor)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空间上多层次的劳动分工现象。
- 3 见王宏仁、白朗洁(2008)。他们也指出,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国营公司只是挂牌,把经营权租给越南与台湾中介的状况比比皆是。
- 4 此举是因为很多汇款是通过非正式的汇款管道,如移民经营的私人快递服务,政府无法在此过程中抽取关税与规费。菲律宾政府曾经在1982年强制规定菲劳要经由菲律宾银行汇一定比例的薪资回国,香港的菲劳为此而走上街头抗争,成功地取消实施此规定(Constable 1997a)。印尼外劳在台湾的雇用自2006年解冻以来,由劳委会与印尼政府联合签订,要求印劳薪资要透过



特定银行来汇入与扣款,有同样的控制效果。

- 5 美国也有少数的例子是以客工制度来招募外国劳动力,如1942-1964年间美国与墨西哥签订的 Bracero program,目前也仍存在农业契约工的招募管道。
- 6 虽然目前仍然少有国家开放非公民的居留人士参与全国层级的选举,但值得注意的是,早自70年代中以降,就有爱尔兰、瑞典、丹麦、挪威、荷兰等国家,允许居留超过若干年限的非公民,在地方以及区域性的选举中有投票权。
- 7 如 Michael Burawoy(1976)所述,这样的制度是把移工劳动力的日常维持(maintenance),及劳工家庭的代间更新(renewal)这两个再生产过程划归在分隔的地理环境进行,且由不同的机构管理。
- 8 请见职训局网站,<http://www.evta.gov.tw/files/57/720021.pdf>(2008/6/27)。
- 9 根据蔡青龙(Tsay 1999),移工在制造业劳工中比例最高7%,在营造(建筑业)业为2%,家务帮佣则为14%;在制造业中,零售业排行第一(21%),钢铁业第二(14%)。
- 10 家务帮佣的人数,因为一些雇主的小孩长大之后而丧失了申请的资格,而自1996年之后开始上升,相反地,看护工的聘雇则持续地上升,2008年5月的数字(165,517),几乎是1996年的十倍(16,308)。行政院劳委会,<http://www.evta.gov.tw/files/57/722019.pdf>(2008/6/27)。
- 11 在1970年,有19%的女性为制造业工作,到了1987年,这个数字已经跳升到42%;而男性劳工在1970年为制造业工作的只有14%,1987年则为32%(Hsiung 1996:34)。
- 12 劳委会,<http://statdb.cla.gov.tw/html/woman/96womanmenu.htm>(2007/11/1)。
- 13 历时性的人口统计资料发现,核心家庭的增加,主要和数房同住的大家庭(joint household)的下降有关,但是包含了一或两个祖父母的直系家庭的百分比,只有些微的下降。而出生率与死亡率的下降,也同时增加了直系血亲跨代居住的比例,因为祖父母辈有较高的生存率,而已婚儿子的数量减少(Thornton and Lin 1994:332)。
- 14 根据另一项内政部的调查,只有7.5%超过六十五岁以上的台湾人住在赡养之家,28%为独居或与配偶一同居住,而主要的居住方式(61%)仍是与孩子同住(内政部2002)。
- 15 2004年,香港规定要雇家务帮佣的雇主,家庭总收入每个月不得低于港币



- 1.5 万元(美金 1900);在新加坡,所有要雇外佣的申请者,都必须提出一份缴税的证明给政府,每年的最低收入是新加坡币 3 万元(在 1996 年,换算为美金 21429 元)(Huang and Yeoh 1996)。
- 16 见 Brubaker 1992、Soysal 1994 有关欧洲公民身份与移民政策的讨论。
- 17 2004 年 11 月,日本政府和菲律宾签订协约,准备未来聘雇菲籍护士和监护工,稍后又和印尼签订类似的协约,然而,这些外籍监护工是由提供家庭照顾服务的照顾机构所聘雇,而不是由私人家庭聘雇。
- 18 台湾当局对于“大陆配偶”不同于“外籍配偶”的管控与规定,也反映出类似的逻辑。
- 19 在香港也有类似的情形,因为中国内地来的家务帮佣在外表上,难以和香港本地人有所区分,香港当局忧虑难以监控内地人的行动,因此禁止雇用内地中国人来担任家务帮佣(Chiu 2004)。
- 20 菲律宾外交部指称华航违反与该国的协议,使用大型飞机往来马尼拉至香港的航线,并且降低票价,夺走菲律宾航空公司的大部分乘客。台湾否认此项指控,于是菲律宾片面停飞马尼拉至台北始自 1996 年的航段。两方中断航空运输长达一年后,终在 2000 年 9 月 26 日重新签订新航空协定。*Taipei Times*, 2000/12/27。
- 21 《联合报》,1999/7/10。
- 22 劳委会于 2000 年 6 月 1 日开始冻结菲劳引进,观察期为三个月;当时的主委郭吉仁说明冻结原因是因为“菲律宾驻华代表处长久以来无视当地法令,介入劳资争议及收容非法菲劳,并且以违反劳动契约或道德问题对台湾雇主及人力中介公司实施不合理的黑名单制度。”《工商时报》,2000/06/01。2000 年 9 月 27 日台菲航权谈判完成,但冻结持续延长三个月,直至劳委会表示得到菲国政府有关劳资争议、逃跑问题的“善意回应”,于 2000 年 12 月 7 日正式解冻。
- 23 《联合报》,1999/7/10。
- 24 《中国时报》,2002/12/18。
- 25 《中时晚报》,2002/12/18,《立委要求冻结印劳 朝野同仇敌忾》。
- 26 据媒体报导,泰国政府要求所有的台湾旅客在泰国期间要全程佩带医疗用口罩,但泰国政府随后否认有此要求。
- 27 有几个我的受访者,不论是单身或已婚的印尼女性,在冻结期间,都曾被中介鼓励参与假结婚,印尼政府也曾对台湾当局抱怨,禁止移工输入已造成了高升的假结婚数字。《中国时报》,2004/2/19。
- 28 根据第 46 条,包括专门性或技术性之工作、华侨或外国人经政府核准投

- 资或设立事业之主管、外侨学校及外国语文教师、运动教练及运动员、宗教、艺术及演艺工作。
- 29 每六个月检查一次,但根据2004年1月制定的新法规,契约移工在契约期间体检最多不能超过三次(分别是来到台湾后的六个月、十八个月和三十个月后检查)。台湾当局也同时取消移工的大麻、吗啡、安非他命检查。
- 30 卫生署在2004年1月13日实施外籍人士的健康检查新规定,要求所有的外国教师(不包括管理者、技术人员与其他专业工作者)定期每年体检(大多是结核病、梅毒、HIV等检查),才能更新工作证。这项政策引发各大专学院外籍教师的抗议,因此政府随后更改政策,要求只有高中与补习班的外籍教师需要定期体检。
- 31 然而,这项新政策的实际影响仍不明朗,就法律上而言,雇主不能因为移工怀孕而辞退她,而移工也受到劳动基准法保障(只有工厂工人,不含家务帮佣),得享有八周的产假(但小孩不会是台湾的公民),但实际上,怀孕的移工倾向于解约返乡,不论是自愿或受到雇主胁迫。
- 32 劳委会在2005年12月30日后放宽了转换雇主的要件与程序(详见就业服务法第59条,<http://www.evta.gov.tw/lawevta/law60.html>),在劳资双方合意的状况下,提供工作切结书就可以转换,不影响雇主的配额;劳工办理转换的公告次数原为最多三次,现制在无人承接的状况下,可以增加至六次;遭性侵害的劳工,得以跨行业转换。
- 33 2003年2月修订的入出境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条。
- 34 2001年6月修订的国籍法,第三条。
- 35 2003年2月修定的入出境及移民法,第二十三条。
- 36 除了43%的契约移工,其余的37%是永久居留移民,20%是不定期居留者,参见POEA的数据[http://www.poea.gov.ph.docs\(2005/2/17\)](http://www.poea.gov.ph.docs(2005/2/17))。
- 37 资料来源如上。
- 38 Choy 2003; Espiritu 1995。
- 39 Asian Migrant Centre 1992c,引述自 Constable 1997a。
- 40 马可仕政府在1982年制定强制汇款的政策(Executive order 857),要求移工通过菲律宾银行,将收入的50% - 70%(陆地移工)或100%(海员)汇回国家。未遵守此规定的移工不得更新护照,因此将无法再次赴海外工作。这个政策引发世界各地的移工的抗议,迫于压力,这项政策在1985年中止(Constable 1997a: 164 - 165)。
- 41 阿基诺政府在1987年制定新的海关法规(Executive order 206),对所有国外进口的货物征收100%的关税。在此法规实施以前,移工可以免税携

入物品 (Asis 1992)。

- 42 参见 POEA 公布的数据,资料来源同注 36。移工分布国籍比例来自我的计算。
- 43 1980 至 1987 年的资料引述自 Oishi(2005: 64);2002 年的数据则来自菲律宾国家统计局的海外移工调查:<http://www.census.gov.ph/data/sectordada/2002/ofo202.htm>(2004/7/28)。
- 44 <http://www.ncrfw.gov.ph/insidepages/inforesources/inforesource.htm>(2004/7/27)。
- 45 2002 年菲律宾国家统计局的海外移工调查:<http://www.census.gov.ph/data/sectordada/2002/ofo202.htm>(2004/7/28)。
- 46 已婚的数字在问卷与统计上应该有被低估。许多已婚移工申请者为了避免准备繁琐的文书数据而常在申请文件上谎称未婚。此外,许多移工也常蓄意在文件上保留娘家姓,以钻台湾法规的漏洞,因为这样她们下次可以用夫家姓及新护照再次申请来台工作。
- 47 Kathryn Robinson(2000: 250) 引用 Castles and Miller(1993) 所界定的新国际迁移的三个特点。
- 48 印尼的正式聘雇系统是经由取得国家执照的中介公司,称为 PJTKI(perusahaan jasa tenaga kerja Indonesia)。然而大部分到马来西亚工作的移工仍是通过无照中介业者或中间人,俗称为 calo 及 taikongs(Jones 2000; Spaan 1994)。
- 49 新秩序(New Order)这个词是由当时的总统苏哈托所提出,以标示他的执政不同于先年的苏加诺政权(Sukarno),新秩序一词后来被泛指为苏哈托统治印尼的这段时间(1966 年到 1998 年)。
- 50 Robinson 2000; Tirtosudarmo 1999。
- 51 在 1984 到 1989 期间,70% 的印尼移工在海外从事家务服务工作,而在 1989 到 1994 间,数字是 60%(Hugo 2002b)。而从事家务服务工作的印尼移工中,95% 是女性(Nayyar 1997: 11)。
- 52 其中的三分之一左右 4.5 万比索)在出国前付给菲律宾的中介,其余的则从在台工作的薪水中扣除来付给台湾中介,有的人是一月扣 1 万,半年扣除完毕,也有的人遵守劳委会规定,每年按月扣除服务费,加起来的总数也是 6 万。
- 53 第一年的服务费为新台币 1800 元,第二年 1700 元,第三年 1500 元,合计三年内收取总额上限为 75840 元。
- 54 《工商时报》1995/11/9。

- 55 据媒体报导,有些享有限额配额的公司,乐意卖出一些配额以获利(吴挺锋 1997: 29)。一家营建公司便被指控将大量移工转包至其他未有配额的公司。联合报,1994年5月10日。
- 56 外国人在台湾的所得税率,如果该年停留在台湾时间未超过183天,为20%,超过183天/年者降至6%。换言之,只要在每年7月后入境台湾的移工,该年所得税的税率都是20%。
- 57 根据经发会的决议,劳委会在2001年11月7日公告,雇主可从外劳的每月薪资中扣除2500到4000元的膳宿费。2007年7月基本工资从15840元调高到17820元后,劳委会同意将膳宿费的上限提高到5000元,但此举受到菲律宾、泰国等输出国政府的反对。
- 58 也有合法“换名字”的方式,比如说不少移工第一次出国会用自己的原生家庭姓氏申请护照,等到第二次来台时,则用夫家姓氏申请新的护照。
- 59 我访问当时的职训局外劳中心主任吴俊明,1998年10月2日。
- 60 参见注57、64。
- 61 Five - six 是菲律宾人对于地下钱庄高利贷的一种简称。每借贷5000元比索,一个月后归还本金连利息要6000元比索(月利率高达20%)。
- 62 许多外劳虽然有健保,也很少使用,宁可买家乡成药来服用,除了语言障碍造成就医上的困难与疑惧外,有些害怕使用健保后,会让雇主知道他们生病的纪录,以作为解约遣返的理由。
- 63 根据2002年1月修订的就业服务法,非法雇用经查获可处以15万到75万的罚金,五年内再犯者,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120万以下罚金。
- 64 缴纳的费用因雇用范畴而有不同,外籍帮佣须缴纳5000元,外籍监护工只要1500元。这些费用集结为外劳管理辅导基金,此基金运用的目的是贴补政府管理外劳及训练本地劳工的支出,但实际上很有限的比例运用到外劳相关业务。
- 65 此规定在近年来有所放宽,现在雇主只需缴纳到报备逃跑的前一日。
- 66 自2003年4月以来,这个规定已有些微更改。一位雇主若发生过两位或多位移工雇工失踪的情况,其配额才会被取消。
- 67 如 Saskia Sassen (1996) 描述,当代的国际劳动迁移呈现出“经济的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 economics)与“政治的再国家化”(renationalizing politics)的双重过程。

## 第二章:谁是“外劳”?

- 1 《战警急先锋》电视新闻杂志,2003/5/1。
- 2 新、旧族群他者被错认的情形常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有些原住民朋友向我抱怨,他们常在路上被(汉族台湾人)警察盘查,因为被认为是外籍劳工而被要求拿出证件。
- 3 《经济日报》,1993/7/9。
- 4 《经济日报》,1993/7/10。
- 5 《联合晚报》,1999/9/7。
- 6 《自由时报》,1999/9/8。
- 7 《联合晚报》,1997/7/21。
- 8 《联合晚报》,1996/12/6。
- 9 《中国时报》,1998/5/13。
- 10 《战警急先锋》,2003/5/1。
- 11 《联合晚报》,1993/4/12。
- 12 《联合报》,2001/5/30。台中市警察局也同样发布一则怀疑艾滋病与移工有关的新闻,参见《联合报》,2001/12/5。
- 13 《联合报》,1999/7/13。
- 14 《中国时报》,1998/5/14。
- 15 《联合报》,1999/12/7、1999/12/29、2000/6/27、2001/8/20。
- 16 Michèle Lamont(2000b)指出,道德标准对种族化的界线的建构至关重要。优势族群会批评少数族群是“较没有价值的人”,缺乏文化素养与道德水平,而理应被排斥或歧视。
- 17 《联合晚报》,2003/4/12。
- 18 施淑美(Shih 1999: 287)分析“大陆妹”的报导时,提出了这样的观察:“报纸报导意图唤起人们对此问题的重视,结果却让这些报导成为性与金钱的八卦故事。”
- 19 1995年11月9日,菲籍家务移工 Angelina Canlas 谋杀了照顾的病人,之后并试图自杀。她被诊断出有忧郁症,并因谋杀一罪被起诉十二年。2003年2月8日,台湾知名的作家刘侠,被印尼看护攻击致死,该名看护也被诊断出精神失常而被遣送回国。
- 20 《联合报》,2001/10/23。
- 21 《联合报》,2001/12/6。
- 22 隔离与登记这两种控制外国人的方式,和19世纪的欧洲对痲疯病或瘟疫



- 患者的管理很类似。犹如福柯(Foucault 1977: 198)指出的, 痲疯病患会被锁起来, 象征被拒绝与排外, 而得瘟疫者则经由空间规训及组织化的监视来受到控制。
- 23 《联合报》, 2002/3/5, “薪水迟未发 代课老师: 不如外劳”。
- 24 《联合报》, 2001/11/1, “林立青黑得像‘外劳’”。
- 25 <http://www.cla.gov.tw>.
- 26 资料来源为联合国文教处 2000 年的统计, 注意该资料是粗在学率 GER (gross enrollment rate), 而非毕业比率, [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_report/zoom\\_regions\\_pdf/easiapac.pdf](http://www.unesco.org/education/efa_report/zoom_regions_pdf/easiapac.pdf) (2004/12/3)。台湾 2000 年的大学/专在学率为 38.7%, 资料来源: 教育部统计处, <http://140.111.1.192/statistics/> (2004/12/6)。
- 27 由于至今并无任何关于台湾移工教育程度的普查数据, 在此是根据我访问中介的说法。一般而言, 在台湾与香港工作的印尼移工, 至少需要完成初中学业, 或曾经有海外工作的经验, 较低教育程度的移工通常被送到马来西亚。此外, 在我所访问的三十四个印尼移工中(我们的接触管道是周日的台北车站, 因此并非随机采样), 有十七个是高中毕业, 十一个初中毕业, 五个小学毕业, 只有一个读过两年大学。
- 28 “语言场域”(linguistic field)的概念引自布迪厄(1991), 指通过赏罚与审查等方式来生产与再生产语言合法性的系统。Crystal(1997)对英语作为 20 世纪的后殖民时代中全球最强势的语言, 有更仔细的探讨。
- 29 自从菲律宾宪法在 1935 年创立, 后殖民政府已经提出由马尼拉语(Tagalog)来作为国家语言, 马尼拉语是马尼拉的当地语言, 现在已是菲律宾国语。但直到 70 年代, 双语教育政策的重心, 才从英语转向菲律宾国语。
- 30 《中国时报》, 2002/3/31, 《第二官方语 扁提议英语 认国际化趋势不可挡 盼各界严肃讨论》。
- 31 《中国时报》, 2002/4/5, 《政府将聘诺贝尔级科技人才, 经建会拟订办法》。
- 32 雇主将中文字输入掌上型电子字典, 这样移工就可读到屏幕上的英文翻译。
- 33 英文报纸 *China News* 每星期天有一名为 *Kabayan!* (马尼拉语的“同胞”) 的专栏, 刊登菲律宾移工的读者投书, 以及报导与在台菲律宾人的相关新闻, 成为菲劳社群的一个重要公共领域。
- 34 吴挺锋(1997)比较菲劳与泰劳的男性移工, 也有类似的发现。
- 35 然而, 菲籍家务移工基于语言资本所获得的培力是有限的。需要菲籍家务移工身兼英语家教的通常是教育程度较低的雇主。相反地, 教育程度



高的雇主关心的是他们的小孩可能会从菲籍移工那学到“不好的”、“不标准的”、“粗鲁”的英语口语。甚至,英语家教对菲籍移工不仅是额外的工作,更是一种无酬的剥削(蓝佩嘉 2008)。

- 36 林津如(Lin 1999)、郑淑如(Cheng 2001)与 Anne Loveband(2004a)也提出这方面的讨论。Loveband(2004a)称此中介主导的过程为“定位产品”(positioning the product)。
- 37 我感谢罗融协助搜寻网页与制作表格。
- 38 我们同时也浏览了香港 48 个中介公司的网页(经由香港雅虎 <http://hk.yahoo.com> 搜索),在菲籍与印籍家务移工身上发现非常类似的特征化。
- 39 <http://www.beelief.idv.tw>(2002/7/15)。
- 40 <http://www.885manpower.com.tw>(2002/7/15)。
- 41 <http://phr.com.tw>(2003/10/13)。
- 42 <http://kc104.com.tw/main-3c.htm>(2003/10/13)。
- 43 参见 Abigail Bakan 与 Daiva Stasiulis(1995: 309, 317)对加拿大中介运用刻板印象作为进行媒合的策略。
- 44 第一章已指出,印尼移工的中介费大约比菲律宾移工的中介费高了台币 5 万元左右。
- 45 菲劳与印劳在劳动条件上的阶层差异,在香港更为明显。根据香港政府的人力资源与教育部在 2001 年进行的调查,菲籍家务移工的平均月薪为港币 3874 元,印籍家务移工的平均月薪为 3073 元,低于政府规定的 3670 元(Wee and Sim 2005)。
- 46 Manila Economic and Cultural Office, 菲律宾政府的在台办事处,其中设有一个劳工处,为 POEA 的海外办公室,负责处理在台菲劳的相关事宜。
- 47 在放假日上,菲劳平均每月有 3.9 天的休假,外加 11.43 天的年假,印劳则只有 2.6 天的月休,4.65 天的年假(法律规定为 4 天月休,12 天年假),Asia Migrant Centre 新闻稿,2001/11/5, <http://www.asian-migrants.org/news/100496174787013.php>(2005/2/16)。
- 48 劳委会职训局统计, <http://www.evta.gov.tw/stat/9011>(2001/11/20)。
- 49 劳委会职训局统计, <http://dbs1.cla.gov.tw/stat/month/211050.pdf>(2005/3/1)。
- 50 最近,一些台湾中介已经在菲律宾建立起类似的训练中心,但是训练时间(两或三周)仍比印尼的短。
- 51 这种招募方式形成了一种类似李静君(Lee 1998)描述深圳工厂对外省移工的“在地控制”(localistic control)。

- 52 范裕康(2005)观察制造业雇主挑工的过程,发现很不同的情形,曾经有来台工作被视为重要的正面资历,雇主可借此降低训练成本,也可以通过同乡移工的网络进行控制。这样的差别,说明不同产业的移工,其劳动力蕴含的关键性不确定性是不一样的。家庭类外劳的技术门坎低、逃跑率高,因此,雇主对于训练成本的考虑低于逃跑风险带来的不确定。制造业的情形则相反。
- 53 我对印尼移工组织 KOPUMI 的访问,2003 年 8 月。
- 54 在这些例子中,中介通常会安排学员到印尼当地家庭或中介自己的家里工作(付非常少的薪水),视为一种“实习”。
- 55 罗马与洛杉矶的菲律宾家务移工也宣称她们提供的服务,比非洲裔与拉丁裔竞争者来得好(Parreñas 2001: 174 - 179)。
- 56 如 Eviatar Zerubavel(1991)所说的两种不同的划界过程:一是淡化了内部差异的混为一谈(lumping),二是放大不同类属间的差异以强化界线区隔的切割(splitting)。

### 第三章: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 1 详见蓝佩嘉(2004: 54)有关内政部的“台湾地区儿童生活状况调查”的统计整理。
- 2 Hertz 1986、Wrigley 1995。
- 3 唐先梅(2003)的调查发现,台湾的双薪家庭中,位于都会区、组成年龄越低、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对丈夫的家务参与的期待也越高。李美玲等的实证研究(2000),发现夫妻皆具大学以上学历、夫妻皆持平等性别意识,以及妻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越高者,先生的相对家务参与较高。周玟琪(1994)的研究中则进一步发现,当夫妻两人收入相近时,先生参与家务的时间最高,然而,当太太的收入超过先生时,先生的投入不增反减。
- 4 Hochschild 1989、Hondagneu - Sotelo 2001。
- 5 人类学家在不同的父系亲属社会的研究中(Kandiyoti 1991; Wolf 1972),都发现婆媳之间的紧张关系,源自于女人在父系延伸家庭中面对的结构限制。由于儿子是婆婆确保家庭地位与未来福祉的最重要资源,若能压制儿子与媳妇的浪漫爱情,可以帮助确保儿子的忠诚度。
- 6 Cameron Macdonald(1998: 31)向 Ivan Illich(1981)借用“影子工作”这个概念,意指不可见的再生产劳动,其无酬、被贬低与视为女性专属,但却是维系家庭生活与资本主义生产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 7 《中国时报》,1998/10/10。
- 8 见 Cheng(2003: 178)、Constable(1997b)。但如我在第二章强调的,不只是菲籍女佣,媒体再现也将印尼女佣的形象性欲化。
- 9 《中国时报》,1999/6/2。
- 10 Dorothy Roberts(1997)与 Cameron Macdonald(1998)用这样的阶层化的母职分工来描述美国中产阶级的女主人如何将部分的再生产劳动转包给非白人或劳工阶级的帮佣。
- 11 这些工作的本质当然依历史、社会与家庭而有不同,例如,在过去,替主人的小孩哺乳是由奶妈负责。“黑嬷嬷”的体力劳动则不被视为精神性质的母职劳动,因为其亵渎了白人母亲与小孩的神圣连带(Roberts 1997: 56)。然而,在今日,哺乳被认为可以建立母亲与子女的情感关系,雇用保姆的女性雇主认为这项实作可以标示出她们被赋予的母亲地位(Macdonald 1998: 47)。
- 12 台湾的出生率从1962年的5.5%,大幅下降至2004年的1.2%。资料来源:行政院主计处人口统计 <http://www.ris.gov.tw/ch4/statistics/st20-8.xls>(2005/7/19)。
- 13 2003年后延长到六年,2008年后更延长到九年。
- 14 Gallin 观察到台湾婆婆之中的阶级差异。有钱人家的婆婆因仍掌握分配财产的大权,较能够维持传统的权威。相对地,贫穷的婆婆一旦年老体衰,就必须仰赖儿子的经济协助与社会支持。在另一篇研究中(Lan 2002a),我探讨了美国加州地区台湾移民的老人照顾。责难不孝的社会规范在移民脉络中更加式微,部分原因便是因为第一代移民的儿女是家中收入的主要提供者。
- 15 然而,许多外籍监护工也和照顾的老人发展出相互依持的关系,或是与媳妇建立同仇敌忾的姊妹情谊,见 Lan(2002b)。

#### 第四章:跨越国界与性别藩篱

- 1 有关性别与迁移的相关文献回顾,参见 Pessar 1999、蓝佩嘉(2007)。
- 2 菲律宾国家统计局,<http://www.census.gov.ph/index.html>(2004/7/20)。
- 3 国家劳动力调查,Badan Pusat Statistik(印尼 BPS - 统计),<http://www.bps.gov.id//sector/employ/tableI.shtml>(2004/7/27)。
- 4 在2001年,超过60%的菲律宾移工是来自四个邻近的已发展区域(在全国十六个区域中),分别是国家首都区域(马尼拉都会)(19%),南他加禄

- (18%), 吕宋中央区(13%)以及伊洛克斯(10%), 海外菲律宾移工调查, 菲律宾国家统计局, <http://www.census.gov.ph/data/sectordata/2002/fofo-101.htm>(2004/7/23)。
- 5 从西班牙战争结束后到 90 年代后期, 菲律宾境内有几个海外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 这些基地也在殖民与后殖民时期, 为美军招募人力。在菲律宾于 1946 年独立之后, 美国官方在 1947 年通过了一条军事基地协议, 让其海军有权力继续聘雇菲律宾公民 (Espiritu 1995:14 - 15)。
  - 6 以我个人在印尼旅游的经验来说, 乡下地区有陌生人对着我叫 F4 偶像剧中女主角的名字:“杉菜! 杉菜!”; 也有人不请自来地摸我的皮肤, 评论道:“你的皮肤好白呀!”即使我的肤色用台湾女人的标准来说, 其实偏黄偏黑。
  - 7 移工的丈夫如何协商他们的男性认同, 可参见 Gamburd (2000) 和 Pingol (2001)。
  - 8 Arcinas et al. 1986, 引述自 Margold 1995。
  - 9 1988 年的菲律宾家庭法在定义男女通奸罪犯时, 有着双重的性别标准, 根据旧法, 已婚女性和单身男性通奸, 是有罪的, 但是已婚男性可以在无罪的情况下, 与单身女性通奸, 只要单身女性是自愿的与私下的。男性只有在他公开与情妇同居时, 才会犯同居的罪。(Go 1993:57 - 58)
  - 10 Chant and McIlwaine 1995; Eviota 1992; Isreal - Sobritchea 1990。
  - 11 在香港 (Chang and Groves 2000:83) 与罗马 (Parreñas 2001:66) 的菲律宾移工身上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
  - 12 印尼女性的初婚女性年龄, 在 1997 年是 18.6 岁, 相对于 1998 年菲律宾是 23.3 岁, 人品与健康调查, <http://www.measuredhs.com> (2004/9/1)。
  - 13 根据 Gavin W. Jones (2002), 在 70 年代以前, 印尼的离婚率非常高, 但是在过去三十年, 急剧地下滑 (在 1995 年, 有 2.8%), 下降始于 1974 年的婚姻法, 其对离婚的程序松绑。
  - 14 根据菲律宾所作的调查, 60% 的已婚女性移工, 会委托她们的双亲照顾她们的小孩, 5% 会请她们丈夫的双亲或其他的家庭成员, 7% 会请家人以外的人来照顾 (Paz Cruz and Paganoni 1989)。
  - 15 在菲律宾, 家务劳工一般被称为 “helper”, 这个称呼不仅指称助手及支持的关系, 也蕴含拟似封建主义的恩庇侍从 (patron - client), 下属对主人是顺服从属的关系 (Dumont 2000)。
  - 16 见 Hondagneu - Sotelo and Avila (1997) 有关拉丁裔保姆批评美国的白人父母。
  - 17 Diane Wolf 于 80 年代在雅加达对女性工厂工人所作的研究 (1992) 也有类

似的发现,大部分的单身女儿都只汇少量的钱回家,来自双亲的压力有限,远小于台湾与香港的单身女工。Rebecca Elmhurst(2002)在1994年与1998年研究印尼的工厂女性,发现她们的汇款行为渐有变化,在1994年,父母很少要求他们在工厂工作的女儿汇款,但在1998年,双亲对于女儿提供的财务贡献的认知有所提高;但汇款主要用在购买女儿未来结婚要用的东西上,这种投资也对女儿在婚姻市场的位置有加价的效果。

- 18 Giddens 1992; Coontz 2005。
- 19 菲律宾的上嫁传统见 Medina 1991; 跨国婚姻的一般性讨论,可参考 Cooke 1986; Constable 2003a; Suzuki 2000。
- 20 参见 Tyner 1996; Suzuki 2000。
- 21 在劳委会冻结印尼劳工来台期间,有些人为了要来台湾帮佣,经由中介或雇主的安排,以假结婚的方式来台。类似的例子也发生在美国,举例来说, Eldon Doty, 一位白人退休警察,和他的菲律宾妻子 Sally 办了假离婚,然后在1990年8月从菲律宾以未婚妻的签证带回 Helen Bolusan, Helen 以每月仅160美元的薪资在家帮佣,直到1993年她不堪劳动剥削而逃跑。*Seattle Times*, 1, 1999/8/17。

## 第五章:灰姑娘的前后台

- 1 这也就是地理学者所说的“空间性”(spatiality),这个概念传达了社会与空间的交织构成(Gregson and Lowe 1995)。
- 2 如 David Katzman(1978: 149)所说,家务雇佣关系的特殊性在于,是“工作者而非工作本身,持续受到监视。”也可参见 Hondagneu - Sotelo(2001: chapter 6)有关洛杉矶雇主的劳动控制策略的讨论。
- 3 依据2002年修正公布的就业服务法,非法扣留或侵占所聘雇外劳之护照、居留证件或财物,将被处以6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鍰。
- 4 少数的例外是出身工运团体的台湾国际劳工协会(Taiwan International Workers Association, 简称 TIWA)。
- 5 1997年10月13日,台湾南部发生类似事件。一名菲律宾家务移工伙同在工厂工作的菲律宾男友,闯进前雇主的房子偷走现金,并杀害三名家庭成员。
- 6 西式女佣制服是殖民主义与奴隶制度的脉络下常见的象征控制。香港的一些雇主也会要求女佣穿制服(Constable 1997a:95)。
- 7 此外,也有女“同志”移工展现 T-bird(tomboyish)风格,见 Nicole Constable



- (1997b)的讨论。女“同志”家务移工与女主人之间的关系应呈现不同样貌,但我的田野与访问中较欠缺这方面的资料。
- 8 吴挺锋 1997、汪英达 2003,提出类似的论点。
  - 9 不论是实际参与跨国迁移的菲律宾移工,或是进行跨国界消费的台湾雇主,都试图借由全球化来促成多重资本的积累与转换,也通过英语这个跨国文化资本来进行协商与斗争,详见蓝佩嘉(2008)。
  - 10 在 1998 - 1999 年间的田野中,我很少看到移工拥有手机。他们多利用网络电话卡打公共电话或雇主家的电话。但到了 2004 - 2003 年间,大部分的移工都有了手机。
  - 11 参见 2002/6/20 日的《联合报》。但此统计有高估,因为许多台湾人拥有一台以上的手机。
  - 12 警方逮捕的两名台湾人身上拥有两千张以上的“外劳卡”,国际电话卡也超过两百张。这些男性隶属某个犯罪集团,他们常在移工用餐或购物地点出没,宣称会帮移工汇钱回家或申请手机。 *Taipei Times*, 1995/12/2。
  - 13 《联合报》, 2005/2/17。
  - 14 现在所有申请手机号码(包括预付卡)的人都需要亲自到各地手机公司申办处。外国人最多只能申请两个预付卡号码,台湾公民则限十个。《联合报》, 2005/2/19。
  - 15 研究青少年使用手机的 Richard Ling 和 Brigitte Yttri (2002: 165) 也发现,手机在青少年间创造了一个没有父母及其他权威人物监控的沟通网络。短信尤其能让他们在前台(譬如老师在讲课时)进行后台的沟通(在桌下或口袋里传送讯息)。
  - 16 <http://www.seeingisbelieving.ca/cell/manila>, (2004/7/23)。相关主题也参见外劳行动网, Migrant Forum, <http://www.twblog.net/migrants/archives/000557.html> (2004/7/23)。
  - 17 此为 Nokia 于 2002 年估计的数字 (Pertierra et al. 2002)。
  - 18 争取捍卫移工权益及提升其自觉为宗旨的移工草根组织有 KaSaPi (Kapulangan ng Samahang Pilipino, 菲律宾人组织), 以及 TIMWA (Taiwan Indonesian Migrant Workers' Association, 台湾印尼移工协会)。另外, 还有其他以宗教社群及同乡网络为基础的非正式组织。
  - 19 2005 年 1 月 20 日, 112 名菲律宾移工因受雇的 IC 公司破产而必须重新聘雇。在劳委会负责的就业中心里, 新雇主以抽签方式选择移工。很多人都被分配到重机械和劳力密集的工厂工作 (*Taipei Times*, 2005/1/27)。与手机相关的资讯参考自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发布的新闻稿。



- 20 节录自 Emmanuel Lallana 的研究：“短信，生意与菲律宾政府”。<http://www.ecademy.com/node.php?id=26936UTH>(2004/7/23)。
- 21 西门子无线电话策略(Siemens Wireless Phone Offensive) <http://www.3g.co.uk/PR/May2004/7096.htm>, (2004/7/23)。
- 22 Hans Geser(2004: 16)认为,伴随着人们能够从任何地方联系到任何人的自由的增加,人们也面临必须回应所有来电的压力。沟通的便利也强化了社会权力的不对称:一位老板可以以工作为理由在休息时间打电话给下属,父母也更能掌握青少年孩子的行踪。
- 23 此概念原来是被 Patricia Collins(1990)用来描述黑人女性主义者的中介论述位置。
- 24 王志弘(2006)进一步指出,婚姻移民常宣称自己道地的厨艺与坊间以台湾人为消费群、口味改良过的越南、印尼及泰国餐厅不同,并借此涵育及强化族群认同的界线。
- 25 因为地利之便,外劳之间也很时兴在台湾拍摄婚纱照或沙龙照,其中多是未婚情侣,也有不少是女同志伴侣。
- 26 《中国时报》民意论坛,1999/2/8,1999/4/6。
- 27 吴美瑶(2004)在火车站随机访问 209 位移工,他们每周日平均花在火车站大厅的时间是 5.8 个小时。
- 28 *Taiwan News*, 2006/6/11。
- 29 菲律宾的工厂移工周日多半齐聚中坜,因为它离天主教堂及非营利组织“希望职工中心”较近。桃园则成为泰国与印尼移工的集会地。
- 30 当地人把美军留下来的吉普车,改装为大众运输工具,由私人经营,以固定路线载送乘客。
- 31 参见 Barber(2000)与 Paz Cruz and Paganoni(1989)。
- 32 这项规定自 2002 年起略有放宽,台湾当局已允许“无不良纪录”的外劳再度回台湾工作三年,2008 年后更延长到九年。
- 33 对以加拿大为目标的移工而言,香港是颇受欢迎的暂时停靠站(Barber 2000: 404)。
- 34 参见 McKay(2003)与 Pratt(1999)。
- 35 根据人权观察报告(Human Rights Watch 2004),在沙特阿拉伯的家务移工平均月薪是 600 - 750 里亚尔(约 160 - 200 元台币),但积欠薪者非常普遍。许多雇主未能帮助家务移工取得合法居留,她们因此被迫处于极度剥削与隔绝的环境中。
- 36 根据我在 2003 年采访的中介业者,新加坡的家务移工契约初始的平均月

- 薪是 230 - 300 新加坡币(合美金 153 - 200 元),中介费大概 1600 元新加坡币。在马来西亚,印尼女佣的平均月薪是 308 令吉(合美金 150 元);菲律宾女佣则是 500 令吉(合美金 196 元);中介费约 1200 令吉。
- 37 2005 年家务移工的最低工资是 3860 元港币(合美金 496 元),与台湾最低工资相近(台币 15840 元,约美金 495 元)。
- 38 加拿大各省有不同的规范。以 British Columbia 来说,外籍看护工的时薪需达最低工资,超过一周 40 个小时后的加班,可领一倍半的工资。在 2004 年,一位入住看护工的平均月薪含税大约是 900 加币,但提供住宿与飞机票的雇主一个月可扣除 325 元加币(McKay 2005)。

## 第六章:屋檐下的全球化

- 1 Mary Romero(1992)与 Leslie Salzinger(1991)研究在美国的拉丁裔移民,从事的是日工(day workers)或是按时计薪的清洁工。这些家务劳工许多在母国持有中产阶级的职业,为了摆脱“肮脏工作”(dirty work)的标签,她们试图借由非正式契约的建立来理性化劳动过程与工作条件。
- 2 Jennifer Mendez(1998)研究美国加州的一家清洁公司所雇用的清洁工。
- 3 Gul Ozyegin(2000)研究土耳其的女佣与门房。
- 4 Colen 1986; Romero 1992; 林津如 2000。
- 5 Hondagneu - Sotelo(2001: 193)已指出,照顾工作的比例越高,雇佣关系通常越倾向情感关系发展。
- 6 有不少谈话性电视节目,邀请艺人谈自己雇用外佣的经验,也是“炫耀性消费”的例子。许多艺人以澎湃的内容夸耀自家外佣做的种种服务,结果引来劳委会“工作内容违法”的关注。《中国时报》《雇外劳遛狗,艺人“公开”违法》,2007/10/25。
- 7 布迪厄和范伯伦一样重视消费在阶级秀异的再生产中的重要性,但他更强调超越个人意图或意识的过程:“因为文化符码的分类效果,地位信号——透过惯习——的传达常是无意识或非意图的”(Lamont and Lareaur 1988: 164)。
- 8 当然,新富雇主也会随着雇用经验与时间的累积,改变互动的方式,内化阶级的惯习。但由于本研究的资料收集是共时性的,较难探讨时间向度上的变化,有些受访的雇主确实谈到管理现任外佣的方式,比刚开始一、两个的方式严格许多。
- 9 林津如(2000)对本地帮佣的研究已有类似发现,该文也提供了有关本地与

外籍家务劳工在劳动条件上的差异比较。

- 10 林津如(2000: 118)借用 Romero 的概念,把台湾雇主的雇佣关系区分为保持生意关系(business-like relation)和情感控制(emotional control)两类。但她对生意关系的界定(作为沟通有限、去个人化的关系)混淆了我所区分的疏离权威、生意关系等两种不同的雇佣风格。林认为雇主采取生意关系的理由有二,一是全职工作没时间监督,二是对于移工作为阶级与种族他者的不信任与猜忌(Lin 1999: 46-47)。
- 11 郑淑如(Cheng 2006: chapter 4)也有类似的讨论。她把雇主对移工的态度区分为三类:视为佣人、视为家人与视为工人。最后一类的雇主延伸她们在职场中的管理者角色,把自己家庭看待成一个工作场域。
- 12 有关“区隔”(segregating)、“整合”(integrating)的说法,我是受到 Christena Nippert-Eng(1996)研究上班族如何划分工作与家的界线的影响。
- 13 Bridget Anderson(2000: 40)也指出,刚迁移到欧洲不久的新移民倾向于选择与雇主同住,以降低他们在新国家的生活花费和疏离感。
- 14 开斋节(在印尼称为 Hari Lebaran)是穆斯林一年一度庆祝神圣斋月结束的日子,为期三天,重要性如同中国农历新年。在这天,信徒们早起后会吃些食物表示开斋,身上穿着干净的新衣服,参加会礼,之后带着丰富的食物拜访亲戚朋友,有的人会前往扫墓,为逝者祈祷。
- 15 “前台”与“后台”的建构乃是相对的、多重的,如以移工同乡作为观众,周日出外也是 Luisa 的一个前台,扮演的是时髦女郎的角色。
- 16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雇用拉丁裔移工的洛杉矶雇主(Hondagneu-Sotelo 2001: 199)。
- 17 林津如(2000: 122)访问的一名菲籍家务移工萝娜,其台湾雇主便有类似的进食安排。平日在家,萝娜和雇主家一同进餐,但外出到餐厅时,雇主就要求她站在旁边服侍大家。
- 18 谁是“家人”或“主人”的定义都是随着情境与对象而相对变化的。比方说,当我去王先生家访问,并受邀进餐吃饭时,他家的菲籍女佣 Lucy 平常很少上桌吃饭,本来要到旁边去吃,因为我的在场,王先生吆喝她说:“干吗?坐着一起吃啊!”当 Lucy 吃饱了起身去清理厨房时,王先生对她说:“Lucy,你也是主人呢,怎么可以先走,要陪客人坐着吃啊。”

## 结论

- 1 参见 Ungerson(2000)比较不同的福利体制采取支付照顾者津贴的不同

模式。

- 2 劳委会自 2008 年初开始设立的“外劳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具有这样的美意,然而在外包经营的现况下,成效仍有待检验与加强。
- 3 此论点参见陈宜中发言,“全球化劳动力流动与人权保障”座谈会记录,《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16: 251 - 299。
- 4 二次大战后频繁的国际移民逐步挑战了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政治身份,许多欧洲国家采取一种同心圆式的“双重成员制”,内圈的是以国籍为基础的公民身份,外圈是以居留为基础的 *denizenship* (Hammer 1989),享有与公民等同的经济权与社会权,甚至有地方层次的政治投票权。虽然依循共和民主传统的学者质疑这样的制度会造成公民身份贬值的效果,例如移民觉得入籍并无必要、也无兴趣参与公共政治 (Brubaker 1989),但在经济去国家化、政治再国家化的当前,我认为仍是保障非公民的一条务实可行的制度出路。
- 5 如台北市劳工局举办的历届移工诗歌比赛(详见龚尤倩 2002),台湾国际劳工协会也举办了移工摄影坊,成果出版为《凝视驿乡 Voyage 15840——移工摄影集》摄影集(印刻出版,2008)。



## 参考资料

### 中文文献

- 王志弘,2006,移/置认同与空间政治:桃园火车站外围消费族裔地景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61:149 - 203。
- 王宏仁、白朗洁,2007,移工、跨国中介与制度设计:谁从台越国际劳动力流动获利?台湾社会研究 65 - 63:35 - 66。
- 王增勇,2007,回应林万亿对外劳与长期照顾的看法,王增勇个人部落格,http://tywangster.blogspot.com/2007/05/blog-post.html, accessed on 30 July 2008.
- 内政部,2002,老人生活状况调查报告。台北:内政部统计处。
- 主计处,2006,1984年台闽地区人口及住宅普查报告。台北:行政院内政部。
-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陈金田译,1990,“台湾私法”第二卷县民一奴婢。临时台湾习惯调查会第一部调查第三回报告书,南投:台湾省文献委员会。
- 台湾总督官房临时国势调查部编,1921,第一回台湾国势调查(大正九年),东京:台湾总督官房临时国势调查部。
- ,1934,昭和五年国势调查报告,东京:台湾总督官房临时国势调查部。
- 成露茜,2002,跨国移工、台湾建国意识与公民运动。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48:15 - 44。
- 卓意雯,1993,清代台湾妇女的生活。台北:自立晚报。
- 林秀丽,2000,来去台湾洗 BENZ:从台中地区菲籍家务工作者的日常生活实践谈起。台中:私立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林津如,2000,外佣政策与女人之战:女性主义策略再思考。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39:93 - 152。
- 李元贞,1991,开放外籍女佣不是办法! 妇女新知 109:8 - 10。
- 张毓芬,1998,女人与国家:台湾妇女运动史的再思考。台北:台湾政治大学新闻学研究所。
- 陈昭如,1997,离婚的权利史:台湾女性离婚权的建立及其意义。台北: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洪鎌德,2002,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各国语言政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施正锋主编。台北:行政院客家委员会。

- 李易昆,1995,他们为什么不行动?外籍劳工行动策略差别研究,台北:私立辅仁大学应用心理研究所硕士论文。
- 李玉瑛,1999,实现你的明星梦。台湾社会研究 36:147-186。
- 吴比娜,2003,ChungShan—菲律宾外籍劳工社群空间的形成,台北:台大城乡研究所硕士论文。
- 吴美瑶,2004,霸权空间的破绽—以外籍移工假日聚集的台北车站为例,台中:台湾中兴大学营销学系硕士论文。
- 吴挺锋,1997,“外劳”休闲生活的文化斗争。台中:东海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吴静如,2005,在公民权之前:Before/Beyond Citizenship。发表于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第二届“跨界流离”学术研讨会。
- 吴永毅,2007,无 HOME 可归:公私反转与外籍家劳所受之时空排斥的个案研究。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66:1-76。
- 胡幼慧,1995,三代同堂:迷思与陷阱。台北:巨流。
- 唐先梅,2003,双薪家庭夫妻家务分工及家务公平观之研究:都会区与非都会区之比较。台湾乡村研究创刊号:109-140。
- 李美玲、杨亚洁、伊庆春,2000,家务分工:就业现实还是等理念。台湾社会学刊 24:59-88。
- 汪英达,2003,去掉括号,还是再补上一个?:台北地区菲律宾帮佣的生命经验与生活策略。台北: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周玫琪,1994,影响台湾地区家庭家务分工因素之探讨。台北: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范裕康,2005,谁可以成为外劳?移工的招募与筛选。台北:台湾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许伟晋,2003,一个手机、两个世界:以越籍移工的消费实践为例。台中:中兴大学营销学研究所硕士论文。
- 曾淑美,1998,台湾媳妇仔的生活世界。台北:玉山社。
- 谢世忠,1986,认同的污名——台湾原住民的族群变迁。台北:自立晚报社。
- 刘仲冬,1998,女性医疗社会学。台北:女书店。
- 劳委会,1999,1976年台湾地区外籍劳工运用及管理调查报告。台北:行政院劳工委员会。
- 赵守博,1992,劳工政策与劳工问题。台北:中国生产力中心。
- 徐木兰、李俊贤、江宏志,1999,台商在菲、马、印、泰四国投资情形之分析。台湾的东南亚区域研究年度研讨会。台北:中研院。



- 杨翠,1993,日据时期台湾妇女解放运动。台北:时报。
- 游鉴明,1995,日据时期台湾的女子教育。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
- 曾嫵芬,2004,外劳政策的国族政治:台湾客工计划的形成。台湾社会学刊 32: 1 - 58。
- 刘梅君,2000,“廉价外劳”论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38: 59 - 90。
- 蔡明璋、陈嘉慧,1997,国家外劳政策与市场实践:经济社会学的分析,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27: 69 - 98。
- 蔡青龙,1999,国际劳工与经济结构调整:东南亚国家之研究。会议论文:发表于台湾东南亚年度研究会议。台北:中研院。
- 蓝佩嘉,2004,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雇用家务移工的三角关系,台湾社会学 8: 3 - 97。
- ,2006,合法的奴工,法外的自由:外籍劳工的控制与出走。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38: 59 - 90。
- ,2007,性别与跨国迁移,性别向度与台湾社会,黄淑玲、游美惠主编,页 225 - 248,巨流出版。
- ,2008,当大学生菲佣遇见台湾新富雇主:跨国语言资本中介的阶级划界,流转跨界:跨国的台湾、台湾的跨国,王宏仁、郭佩宜编,中研院:东南亚中心。
- 萧新煌编,1989,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台北:巨流。
- 龚尤倩,2002,外劳政策的利益结构与翻转的行政实验初探:以台北市的外劳行政、文化实践为例。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48: 235 - 285。

## 英文文献

- Abella, Manolo. 1992. "Contemporary Labour Migration from Asia: Policies and Perspectives of Sending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s: A Global Approach*, ed. Mary Kritz, Lin Lean Lim, and Hania Zilotnik, 263 - 27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 1993. "Labor Mobility, Trade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e Philippine Experience."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2(3): 167 - 249.
- Accountancy. 2003. "Technology: Mobile Phones—Pump up the Volume." Ac-

- countancy* 131(1316) : 70.
- Aguilar, Jr. Filomeno V. 1999. "Ritual Passag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lfhood in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14(1) : 98 - 128.
- Alegado, Dean Tiburico.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from the Philippines." Ph. D. Diss. , Hawaii University, Manoa.
- Ananta, Aris. 2000.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Free Labour Area: An Indonesia Perspective." In *Labour Migration in Indonesia: Policies and Practices*, ed. Sukamdi, Abdul Haris, and Patrick Brownlee. Yogyakarta: 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 Gadjah Mada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unesco.org/most/apmrlabo.htm>, accessed on 1 March 2005.
- Anderson, Bridget. 2000. *Doing the Dirty Work? The Global Politics of Domestic Labour*. London: Zed Books.
- Appadurai, Arjun. 1996.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Arcinas, Fe R. , Cynthia Banzon - Bautista, and Randolph S. David. 1986. *The Odyssey of the Filipino Migrant Workers to the Gulf Region*.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 Asis, Maruja. 1992. "The Overseas Employment Program Policy." In *Philippine Labor Migration: Impact and Policy*, ed. Graziano Battistella and Anthony Paganoni, 68 - 112. Quezon City: Scalabrinia Migration Center.
- . 2004. "When Men and Women Migrate: Comparing Gendered Migration in Asia." Paper presented to United Nations Divis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Women (DAW) Consultative Meeting on "Migration and Mobility and How this Movement Affects Women," Malmo, Sweden, 2 - 4 December 2003. Available at <http://www.un.org/womenwatch/daw/meetings/consult/CM - Dec03 - EPI.pdf>, accessed on 6 February 2005.
- Athukorala, Premachandra. 1993. "Improving the Contribution of Migrant Remittances to Development: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Labor - Exporting Countries." *Migration Review* 24: 323 - 346.
- Bakan, Abigail, and Daiva Stasiulis. 1995. "Making the Match: Domestic Placement Agencies and the Racialization of Women's Household Work." *Signs* 20(2) : 303 - 335.
- Balibar, Etienne. 1991. "Is There a Neo - Racism?" In *Race, Nation, Class: Am-*

- biguous Identities*, ed.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17 - 28. London: Verso.
- Barber, Pauline Gardiner. 2000. "Agency in Philippine Women's Labour Migration and Provisional Diaspor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3 (4): 399 - 411.
- Basch, Linda, Nina G. Schiller, and Cristina S. Blanc. 1994. *Nations Unbound: Transnational Projects, Postcolonial Predictions, and Deterritorialized Nation - States*. Langhorne, Pa.: Gordon and Breach Science.
- Battistella, Graziano. 200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Asia vis - à - vis Europe: An Introductio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4): 405 - 414.
- Bourdieu, Pierre (布迪厄).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1987. "What Makes a Social Class?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Existence of Groups." *Berkeley Journal of Sociology* 32: 1 - 18.
- . 1991.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esnahan, Mary. 1979. "English in the Philippin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9 (2): 64 - 71.
- Brown, Melissa J. 2004. *Is Taiwan Chinese? The Impact of Culture, Power, and Migration on Changing Ident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Brubaker, Rogers W. 1989. "Membership without Citizenship: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ights of Noncitizens. In *Immigration and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ed. Rogers W. Brubaker, 145 - 162.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 1 - 47.
- Burawoy, Michael. 1976. "The Functions and Reproduction of Migrant Labor: Comparative Material from Southern Afric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1(5): 1050 - 1087.
- Castles, Stephen, and Mark Miller. 1993. *The Age of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Pop-*

- 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Castles, Stephen, and Alastair Davidson. 2000. *Citizenship and Migrati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 London; Routledge.
- Chang, Kimberley A., and Julian McAllister Groves. 2000. "Neither 'Saints' nor 'Prostitutes': Sexual Discourse in the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 Community in Hong - Kong."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3(1): 73 - 87.
- Chant, Sylvia, and Cathy McIlwaine. 1995. *Women of a Lesser Cost; Female Labour, Foreign Exchange, and Philippine Development*. Manila;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Press.
- Chaplin, David. 1978. "Domestic Service and Industrializati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ology* 1: 97 - 127.
- Cheng, Lucie(成露茜). 2003. "Transnational Labor, Citizenship and the Taiwan state." In *East Asian Law: Universal Norms and Local Cultures*, ed. Arthur Rossett, Lucie Cheng, and Margaret Y. K. Woo, 85 - 106. London; Routledge.
- Cheng, Shu - Ju Ada(郑淑如). 1996. "Migrant Women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Taiwa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1): 139 - 152.
- . 2001. "Serving the Household and the Nation: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hood in Taiwan."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 . 2003. "Rethinking the Globalization of Domestic Service: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State Control,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Taiwan." *Gender & Society* 17(2): 166 - 186.
- . 2006. *Serving the Household and the Nation: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Taiwan*.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 Chin, Christine. 1998. *Service and Servitude: Foreign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and Malaysian "Modernity Projec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iu, Stephen W. K(赵永佳). 2004. "Recent Trends in Migration Movements and Policies in Asia: Hong Kong Region Report." Paper presented at panel, Japan Institute of Labour and OECD,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Labour Markets in Asia. Tokyo, Japan.
- Choy, Catherine Ceniza. 2003. *Empire of Care: Nursing and Migration in Filipino American Histor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lifford, James, and George E. Marcus. 1986. *Writing Cultu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Ethn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hen, Rina. 1987. "The Working Conditions of Immigrant Women, Live - in Domestic Workers: Racism, Sexual Abuse and Invisibility." *Resources for Feminist Research* 16(1): 36 - 38.
- . 1991. "Women of Color in White Households: Coping Strategies of Live - In Domestic Worker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4: 197 - 215.
- Colen, Shellee. 1986. "With Respect and Feelings: Voices of West Indian Child Care and Domestic Workers in New York City." In *All American Women: Lines that Divide, Ties that Bind*, ed. Johnnetta B. Cole, 46 - 70. New York: Free Press.
- . 1995. "'Like a Mother to Them': Stratified Reproduction and West Indian Childcare Workers and Employers in New York." In *Conceiving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Global Politics of Reproduction*, ed. Faye Ginsburg and Rayna Rapp, 78 - 10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Collins, Patricia Hill. 1990.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London: Routledge.
- Constable, Nicole. 1997a. *Maid to Order in Hong - Kong: Stories of Filipina Workers*.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 1997b. "Sexuality and Discipline among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Hong Kong." *American Ethnologist* 24(3): 539 - 558.
- . 1999. "At Home but not at Home: Filipina Narratives of Ambivalent Returns." *Cultural Anthropology* 14(2): 203 - 228.
- . 2003a. *Romance on a Global Stage: Pen Pals, Virtual Ethnography, and "Mail Order" Marri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 2003b. "A Transnational Perspective on Divorce and Marriage: Filipina Wives and Workers." *Identities: Global Studies in Culture and Power* 10: 163 - 180.
- Cooke, Fadzilah M. 1986. "Australian - Filipino Marriages in the 1980s: The Myth and the Reality." Working paper in the School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Australian - Asian Relations, Griffith University.
- Coontz, Stephanie. 2005. *Marriage, a History: From Obedience to Intimacy or How Love Conquered Marriage*. New York: Viking.
- Coser, Lewis. 1974. "Servants: The Obsolescence of the Occupational Role." *Social Force* 52: 31 - 40.

- Crystal, David. 1997.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phy, Christine, and Diana Leonard. 1992. *Familiar Exploitation: A New Analysis of Marriage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eti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DeVault, Marjorie. 1991. *Feeding the Family: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aring as Gendered Wor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kotter, Frank.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ill, Bonnie Thornton. 1988. "Making Your Job Good Yourself: Domestic Serv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rsonal Dignity." In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 ed. Ann Bookman and Sandra Morgan, 33 - 52.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Douglas, Mary. 1966.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Purity*. London: Routledge.
- Durkheim, Emile, and Marcel Mauss. 1963. *Primitive Classif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umont, Jean - Paul. 2000. "Always Home, Never Home: Visayan 'Helper' and Identities. In *Home and Hegemony: Domestic Servi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 Kathleen M. Adams and Sara Dickey, 119 - 136.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Elmhirst, Rebecca. 2002. "Daughters and Displacement: Migration Dynamics in an Indonesian Transmigration Area."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8(5): 143 - 166.
- Emerson, Robert M., Rachel I. Fretz, and Linda L. Shaw.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Engels, Friedrich(恩格斯). 1942/1972.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 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 England, Kim, and Bernadette Stiell. 1997. "They Think You're as Stupid as Your English Is: Constructing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in Toronto."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9: 195 - 215.
- England, Paula, and Nancy Folbre. 1999. "The Cost of Caring."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561: 39 - 51.
- Enloe, Cynthia. 1989. *Bananas, Beaches, and Bas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spiritu, Yen Le. 1995. "Filipino Settle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ilipino American Lives*, ed. Yen Le Espiritu, 1 - 36.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 2002. "Filipino Navy Stewards and Filipina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 Immigration, Work and Family Relations."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 (1): 47 - 66.
- Eviota, Elizabeth U. 1992.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d Gender, Women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Philippines*. London: Zed Books.
- Findlay, Allan M., Huw Jones, and Gillian M. Davidson. 1998. "Migration Transition or Migration Transformation in the Asian Dragon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2(4): 643 - 663.
- Fortunati, Leopoldina. 2001. "The Mobil Phone: An Identity on the Move." *Personal and Ubiquitous Computing* 5: 85 - 98
- Foucault, Michel(福柯).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Fröbel, Folker, Jürgen Heinrichs, and Otto Kreye. 1980.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llin, Rita. 1994. "The Intersection of Class and Age: Mother - in - Law/ Daughter - in - Law Relations in Rural Taiwan."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Gerontology* 9: 127 - 140.
- Gamburd, Michele Ruth. 2000. *The Kitchen Spoon's Handle*. Ithaca, N. 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Garey, Anita. 1999. *Weaving Work and Motherhoo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Gaw, Kenneth. 1991. *Superior Servants: The Legendary Cantonese Amahs of the Far East*.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tz, Hildred, 1961. *The Javanese Family: A Study of Kinship and Socialization*. New York: Free Press.
- George, Sheba. 2000. "Dirty Nurses' and 'Men Who Play': Gender and Class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In *Global Ethnography*, ed. Michael Burawoy, 144 - 17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erson, Judith, and Kathy Peiss. 1985. "Boundaries, Negotiation, Consciousness: Conceptualizing Gender Relations." *Social Problems* 32(4): 317 - 331
- Geser, Hans. 2004. *Towards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the Mobile Phone*: University

- of Zurich. Available at [http://socio.ch/mobile/t\\_geser1.htm](http://socio.ch/mobile/t_geser1.htm), accessed on 30 August 2004.
- Giddens, Anthony. 1992.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 Sexuality, Love, and Eroticism in Modern Societie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Glenn, Evelyn Nakano. 1986. *Issei, Nisei, War Bride: Three Generations of Japanese American Women in Domestic Servic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 1992. "From Servitude to Service Work: Historical Continuities in the Racial Division of Paid Reproductive Labor." *Signs* 18(1): 1 - 43.
- . 2002. *Unequal Freedom: How Race and Gender Shaped American Citizenship and Labo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o, tella. 1993. *The Filipino Family in the Eighties*. Manila: Soci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De La Salle University.
- Goffman, Erving(高夫曼) 1956. "The Nature of Deference and Demeanor."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58(3): 472 - 502.
- .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Anchor Books.
- Gregson, Nicky, and Michelle Lowe. 1995. "'Home' - Making: On the Spatiality of Daily Social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Middle - Class Britain."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2): 224 - 235.
- Hall, John. 1992. "The Capital(s) of Cultures: A Nonholistic Approach to Status, Situations, Class,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ies*, ed. Michele Lamont and Marcel Fournier, 257 - 288.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ll, Stuart. 1997. "Old and New Identities: Old and New Ethnicities." In *Culture,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 - System: Contemporary Conditions for the Representation of Culture*, ed. Anthony King, 41 - 6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Hammer, Thomas(霍克希尔德). 1989. "State, Nation, and Dual Citizenship." Pp. 81 - 95 in *Immigr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Citizenship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edited by William Rogers Brubaker.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Hanser, Amy. 2008. *Service Encounters: Class, Gender and the Market for Social Distinction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Hays, Sharon.

1996.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 of Motherhood*. New Haven, Conn. :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rtz, Rozanna. 1986. *More Equal than Others: Women and Men in Dual - Career Marri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chschild, Arlie. 1989. *The Second Shift: 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 New York: Avon Books.
- . 2000. "The Nanny Chain." *The American Prospect* 11: 32 - 36.
- . 2003.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Intimate Life: Notes From Home and Work*.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llnsteiner, Mary R. 1981. "The Wife." In *Being Filipino*, ed. Gilda Cordero - Fernando, 37 - 42.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GCF Books.
- Holstein, James A. , and Jaber F. Gubrium. 1995. "Deprivat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omestic Life."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7: 894 - 908.
- Hondagneu - Sotelo, Pierrette. 2001. *Doméstica: Immigrant Workers Cleaning and Caring in the Shadows of Affluenc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ndagneu - Sotelo, Pierrette, and Ernestine Avila. 1997. "'I am Here, but I am There': The Meanings of Latina Transnational Motherhood." *Gender and Society* 11(5): 548 - 571.
- Hsiung, Ping - Chun(熊秉纯). 1996. *Living Rooms as Factories: Class, Gender, and the Satellite Factory System in Taiw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Hu, Yow - Hwey(胡幼慧). 1995. "Elderly Suicide Risks in the Family Context: A Critique of the Asian Family Care." *Journal of Cross - Cultural Gerontology* 10: 199 - 217.
- Huang, Shirlena, Peggy Teo, and Brenda Yeoh. 2000. "Diasporic Subjects and Identity Negotiations: Women in and from Asia."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3(4): 391 - 398.
- Huang, Shirlena, and Brenda Yeoh. 1996. "Ties that Bind: State Policy and Migrant Female Domestic Helpers in Singapore." *Geoforum* 27: 479 - 493.
- . 2003. "The Difference Gender Makes: State Policy and Contract Migrant Workers in Singapore."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2(1 - 2): 75 - 97.
- Hugo, Graeme. 1995. 2000. *Indonesian Overseas Contract Workers' HIV Knowl-*

- edge: A Gap in Information*. Bangkok;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South East Asia HIV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Available at <http://www.hiv-development.org/publications/Contract%20Workers.htm>, accessed on 23 February 2005.
- . 2002a.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n the Family in Indone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1): 13 - 46.
- . 2002b. "Women's International Labour Migration." In *Women in Indonesia: Gender, Equity and Development*, ed. Kathryn Robinson and Sharon Bessell, 158 - 178.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Human Rights Watch. 2004. "Bad Dreams: Exploitation and Abuse of Migrant Workers in Saudi Arabia." Available at <http://www.hrw.org/reports/2004/saudi.0704>, accessed on 1 August 2005.
- Illich, Ivan. 1981. *Shadow Work*. Boston: M. Boyars.
- Illo, Jean Frances. 1995. "Redefining the Maybahay or Housewife: Reflections on the Nature of Women's Work in the Philippines." In "Male" and "Female" in *Developing Southeast Asia*, ed. Wazir Jahan Kavim, 209 - 225. Oxford: Berg.
- Israel - Sobritchea, Cayolyn. 1990. "The Ideology of Female Domesticity: Its Impact on the Status of Filipino Women." *Review of Women's Studies* 1(1): 26 - 41.
- Ito, Ruri. 2005. "Internationalizing Reproductive Labor in a Super Aged Society?: Japan's New Immigration Policy and Its Implication on Care Work." Presented at Women's World 2005, 19 - 23 June 2005, Seoul, Korea.
- Jones, Galvin. W. 2002. "The Changing Indonesian Households." In *Women in Indonesia: Gender, Equity and Development*, ed. Kathryn Robinson and Sharon Bessell, 219 - 234.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Jones, Sidney. 2000. *Making Money off Migrants—The Indonesian Exodus to Malaysia*. Wollongong, Australia: Center for Asia Pacific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 Kandiyoti, Deniz. 1991. "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 ed. Judith Lorber and Susan A. Farrell, 104 - 118.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Kaplan, Elaine. 1987. "I Don't Do No Windows: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Workers and the Housewife." In *Competition: A Feminist Taboo?*, ed. Vale-

- rie Miner and Helen E. Longino, 92 - 105. New York: Feminist Press.
- Katzman, David. 1978. *Seven Days a Week: Women and Domestic Service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ng, Lydia. 1983. *Factory Women in Taiwa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amont, Michèle. 1992. *Money, Morals and Manners: The Culture and the French and the American Upper - Middle Cl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2000a. *The Dignity of Working Men: Morality and the Boundaries of Race, Class, and Immigr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0b. "The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 - Racism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Rethinking Comparative Cultural Sociology: Repertoires of Evaluation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Michele Lamont and Lauront Thevenot, 25 - 5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amont, Michèle, and Annette Lareaur. 1988. "Cultural Capital: Allusions, Gaps, and Glissandos in Rece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6: 153 - 168.
- Lamont, Michèle, and Marcel Fournier. 1992. Introduction to *Cultivating Differences: Symbolic Boundaries and the Making of Inequalities*, ed. Michele Lamont and Marcel Fournier, 1 - 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n, Pei - Chia (蓝佩嘉). 2002a. "Subcontracting Filial Piety: Elder Care in Ethnic Chinese Immigrant Households in Californi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3 (7): 812 - 835.
- . 2002b. "Among Women: Migrant Domestic and their Taiwanese Employers across Generations." In *Global Woman: Maids, Nannies and Sex Workers*, ed. Barbara Ehrenreich and Arlie Hochschild, 169 - 189. New York: Metropolitan Press.
- Lasch, Christopher. 1977.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sen, Amparo. 2002. *The Social Shaping of Fixed and Mobil Network: A Historical Comparison*, DWRC, University of Surrey. Available at: <http://www.surrey.ac.uk/dwrc/>, accessed on 30 August 2004.
- Law, Lisa. 2001. "Home Cooking: Filipino Women and Geographies of the Senses in Hong Kong." *Ecumene* 8(3): 264 - 283.
- Lee, Anru (李安如). 2002. "Guests from the Tropics: Labor Practice and Foreign Workers in Taiwan." In *Transforming Gender and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 ed. Esther Ngan - ling Chow, 183 - 202. New York: Routledge.
- Lee, Ching Kwan(李靜君). 1998.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Lee, Hey - Kyung. 2005. "Changing Trends in Paid Domestic Work in South Korea." In *Asian Women as Trans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ed. Noorashikin Abdul Rahman, Brenda Yeoh, and Shirlena Huang, 341 - 363.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 Lie, John. 2001. *Multiethnic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in, Jean Chin - Ju(林津如). 1999.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Taiwan: Structural Constraints and Personal Resistance*. Taipei: Taiwan Grassroots Women Workers' Centre.
- Ling, Richard, and Brigitte Yttri. 2002. "Hyper - Coordination via Mobil Phones in Norway." In *Perpetual Contact: Mobil Communication, Private, Public Performance*, ed. James E. Katz and Mark A. Aakhus, 139 - 16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orber, Judith. 1994. *Paradoxes of Gender*. New He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oveband, Anne. 2004a. "Positioning the Product: Indonesian Migrant Women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4 (3): 336 - 349.
- . 2004b. "Nationality Matters: SARS and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Rights in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42(5): 121 - 143
- Macdonald, Cameron. 1998. "Manufacturing Motherhood: The Shadow Work of Nannies and Au Pair." *Qualitative Sociology* 21(1): 25 - 53
- Margold, Jane A. 1995. "Narratives of Masculinity and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Filipino Workers in the Middle East." In *Bewitching Women, Pious Men: Gender and Body Politics in Southeast Asia*, ed. Aihwa Ong and Michael G. Peletz, 274 - 29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artin, David. 1996. "Labor Contractors: A Conceptual Overview." *Asian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2 - 3): 201 - 218.
- Massey, Doreen. 1994.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146 - 156.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Massey, Douglas, G. Hugo, J. Arango, A. Kouaouci, A. Pellegrino, and J. Tay-



- lor. 1998. *Worlds in Motio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McIntosh, William Alexander. 1996. *Sociologies of Food and Nutri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 McKay, Deirdre. 2003. "Filipinas in Canada—De - Skilling as a Push toward Marriage." In *Wife or Worker? Asian Women and Migration*, ed. Nicola Piper and Mina Roces, 23 - 52. Lanham, Md. :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 2004. "Everyday Places; Philippine Place - Making and the Translocal Quotidian." Online Proceedings from Everyday Transformations (the 2004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asia). Available at [http://www.mcc.murdoch.edu.au/cfel/csaa\\_proceedings.htm](http://www.mcc.murdoch.edu.au/cfel/csaa_proceedings.htm), accessed on 6 February 2005.
- . 2005. "Success Stories? Filipina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in Canada." In *Asian Women as Trans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ed. Noorashikin Abdul Rahman, Brenda Yeoh, and Shirlena Huang, 305 - 360.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 Medina, Belinda. 1991. *The Filipino Family: A Text with Selected Readings*.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Philippines Press.
- Mendez, Jennifer. 1998. "Of Mops and Maids: Contradictions and Continuities in Bureaucratized Domestic Work." *Social Problems* 45(1): 114 - 135.
- Miles, Robert. 1989. *Racism*. London: Routledge.
- Mohanty, Chandra. 1991. "Under Western Eyes: Feminist Scholarship and Colonial Discourses." In *Third World Women and the Politics of Feminism*, ed. Chandra T. Mohanty, Ann Russo, and Lourdes Torres, 51 - 80.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Nayyar, Deepak. 1997. "Emigration Pressures and Structural Change: Case Study of Indonesia."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apers 20.
- NCRFW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Roles of Filipino Women). 1993. *Filipino Women Migrants: A Statistical Factbook*. Quezon City: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Roles of Filipino Women.
- Nippert - Eng, Christena. 1996. *Home and Work: Negotiating Boundaries through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Oakley, Ann. 1974. *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 New York: Pantheon.

- Ogaya, Chiho. 2003. "Feminization and Empowerment: Organizational Activities of Filipino Women Workers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Filipino Diaspora: Demography, Social Networks, Empowerment and Culture*, ed. Mamoru Tsuda, 67 - 89. Quezon City: Philippine Social Science Council and UNESCO.
- Oishi, Nana(大石奈奈). 2005. *Women in Motion: Globalization, State Politics, and Labor Migration in Asi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Okamatsu, Santaro. 1902. *Provisional Report on Investigations of Laws and Custom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Kobe: Kobe Herald Office.
- Okunishi, Yoshio. 1996. "Labor Contracting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 Japanese Case and Implications for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5(2 - 3):219 - 240.
- Omi, Machael, and Howard Winant. 1994. *Racial Form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don: Routledge.
- Ong, Aihwa(翁爱华). 1994. "Colonization and Modernity: Feminist Representations of Women in Non - Western Societies." In *Theorizing Feminism: Parallel Trend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 Anna C. Herrmann and Abigail J. Stewart, 372 - 381.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 . 1999. *Flexible Citizenship: The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Ozyegin, Gul. 2000. *Untidy Gender: Domestic Service in Turke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Phyllis. 1989. *Domesticity and Dirt: Housewives and Domestic Serv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 - 1940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Parreñas, Rhacel Salazar. 2001. *Servants of Globalization: Women, Migration and Domestic Work*.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2005. *Children of Global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Families and Gendered Wo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z Cruz, Victoria, and Anthony Paganoni. 1989. *Filipinas in Migration: Big Bills and Small Change*. Quezon City: Scalabrini Migration Center.
- Pertierra, Raul. 1992. *Remittances and Returnees: The Cultural Economy of Migration in Ilocos*. Quezon City: New Day Publishers.
- Pertierra, Raul, Eduardo F. Ugarte, Alicia Pingol, Joel Hernandez and Nikos Lexis Dacanay. 2002. *Tex - ing Selves: Cellphones and Philippine Modernity*. Manila: De La Salle University. Available at <http://www.finlandembassy.ph/>

texting1.htm, accessed on 1 July 2005.

- Pessar, Patricia. R. 1999. "Engendering Migration Studies: The Case of New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Gender and U. S. Immigration: Contemporary Trends*, ed. Pierrette Hondagneu - Sotelo, 20 - 42.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Pingol, Alicia Tadeo. 2001. *Remaking Masculinities: Identity, Power and Gender Dynamics in Families with Migrant Wives and Househusbands*. Quezon City: 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 Potuchek, Jean L. 1997. *Who Supports the Family? Gender and Breadwinning in Dual - Earner Marriages*.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att, Geraldine. 1999. "From Registered Nurse to Registered Nanny: Discursive Geographies of Filipina Domestic Workers in Vancouver, B. C." *Economic Geography* 75(3) : 215 - 236.
- Prothero, Mansell. 1990. "Labor Recruiting Organization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4 : 221 - 228.
- Raharto, Aswatini. 2002. "Indonesian Female Labour Migrants: Experiences Working Overseas (A Case Study among Returned Migrants in West Java)." Presented at IUSSP Regional Population Conference on Southeast Asia's Population in a Changing Asian Context. Bangkok, Thailand.
- Roberts, Dorothy. 1997. "Spiritual and Menial Housework." *Yale Journal of Law and Feminism* 9 : 49 - 80.
- Robinson, Kathryn. 2000. "Gender, Islam, and Nationality—Indonesian Domestic Servants in the Middle East." In *Home and Hegemony: Domestic Servi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 Kathleen M. Adams and Sara Dickey, 249 - 282.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Robison, Richard, and David G. Goodman, eds. 1996. *The New Rich in Asia: Mobile Phone, McDonalds and Middle - Class Revolution*. London: Routledge.
- Rollins, Judith. 1985. *Between Women: Domesticity and their Employer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Romero, Mary. 1992. *Maid in the U. S. A.*, London: Routledge.
- Rothman, Barbara Katz. 1989. *Recreating Motherhood*. New Brunswick, N. J. :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Rudnyckyj, Daromir. 2004. "Technologies of Servitude: Governmentality and Indonesian Trans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77 (3) :

- 407 - 434.
- Salzinger, Leslie. 1991. "A Maid by Any Other Name: The Transformation of 'Dirty Work' by Central American Immigrants." In *Ethnography Unbound: Power and Resistance in Modern Metropolis*, ed. Michael Burawoy, 139 - 16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Sassen, Saskia. 1996. *Losing Control? :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1988.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 1992.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N. 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 1999. *Guests and Aliens*. New York: New Press.
- Schwartz, Barry. 1968.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ivac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3: 741 - 742.
- Seno, Alexandra A. 2003. "The Boys in the Band." *Newsweek*, September 22.
- Shih, Shu - Mei(施淑美). 1999. "Gender and a Geopolitics of Desire: The Seduction of Mainland Women in Taiwan and Hong Kong Media," In *Spaces of Their Own: Women's Public Sphere in Transnational China*, ed. Mayfair Mei - hui Yang, pp. 278 - 30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 Sibayan, Bonifacio. 1991. "The Intellectualization of Filipin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88: 69 - 82.
- Sibley, David. 1995. *Geographies of Exclusion: Society and Difference in the West*. London: Routledge.
- Skeldon, Ronald. 1992.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within and from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Region: A Review Essay."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1): 19 - 63.
- Skolnick, Arlene S. 1992. *The Intimate Environment: Exploring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th ed.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 Soysal, Yasemin Nuhoglu. 1994. *Limits of Citizenship: Migrants and Postnational Membership in Euro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paan, Ernst. 1994. "Taikong's and Calo's: The Role of Middlemen and Brokers in Javanes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7(1): 93 - 113.
- Suzuki, Nobue. 2000. "Between Two Shores: Transnational Projects and Filipina

- Wives in/from Japan."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3(4): 431 - 44.
- Tarcoll, Cecilla. 1996. "Migrating 'For the Sake of the Family?': Gender, Life Course and Intra - Household Relations among Filipino Migrants in Rome." *Philippine Sociological Review* 44(1 - 4): 12 - 32.
- Teng, Emma J. 2004. *Taiwan's Imagined Geography—Chinese Colonial Travel Writing and Pictures, 1683 - 18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 Thorne, Barrie. 1993. *Gender Play: Girls and Boys in School*. New Brunswick, N. 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Thornton, Arland, and Hui - Sheng Lin. 1994. *Social Change and the Family in Taiw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Tirtosudarmo, Riwanto. 1999. "The Indonesian State's Response to Migration." *SOJOUR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14(1): 212 - 227.
- Tolentino, Roland. B. 1996. "Bodies, Letters, Catalogs: Filipinas in Transnational Space." *Social Text* 14(3): 49 - 76.
- Torpey, John. 2000. *The Invention of the Passport: Surveillance, Citizen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onto, Joan C. 1993. *Moral Boundaries: A Political Argument for an Ethic of Care*. New York: Routledge.
- Tsai, Pan - Long, and Ching - Lung Tsay. 2001.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 The Experiences of Japan, Taiwan and Thailand." *Prosea Research Paper* 51: 1 - 36.
- Tsai, Yen - Ling(蔡晏霖). 2008. *Strangers Who are not Foreign: Intimate Exclusion and Racialized Boundaries in Urban Indonesia*. Ph. D. disss, Anthropology, UC Santa Cruz.
- Tsay, Ching - Lung(蔡青龙). 1992. "Clandestine Labor Migration to Taiwan."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4(4): 613 - 620.
- Tung, Charlene. 1999. "The Social Reproductive Labor of Filipina Trans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Caring for Those Who Provide Elderly Care."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Irvine, Irvine.
- Tyner, James. A. 1996. "Construction of Filipina Migrant Entertainers." *Gender, Place and Culture* 3(1): 77 - 93.
- United Nations. 2006.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2006*.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 Ungerson, Clare. 2000. "Cash in Care." *In Care Work: Gender, Labor and the Welfare State*, edited by Madonna Harrington Meyer, pp. 68 - 88. New York: Routledge.
- Uttal, Lynet. 1996. "Custodial Care, Surrogate Care, and Coordinated Care: Employed Mothers and the Meaning of Child Care." *Gender and Society* 10(3): 291 - 311.
- Veblen, Thorstein(范伯伦). 1912/1994.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An 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 New York: B. W. Huebsch.
- Wallerstein, Immanuel. 1991.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hood: Racism, Nationalism, Ethnicity." In *Race, Nation, and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ed. E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71 - 85. London: Verso.
- Walzer, Michael. 1983.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Wee, Vivienne, and Amy Sim. 2005. "Hong Kong as a Destination for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In *Asian Women as Transnational Domestic Workers*, ed. Noorashikin Abdul Rahman, Brenda Yeoh, and Shirlena Huang, 175 - 209.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 Weintraub, Jeff. 1997. "The Theory and Politics of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Public and Private in Thought and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 Grand Dichotomy*. ed. Jeff Weintraub and Krishan Kumar, 1 - 42.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Weix, G. G. 2000. "Inside the Home and Outside the Family: The Domestic Estrangement of Javanese Servants." In *Home and Hegemony: Domestic Service and Identity Politics in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ed. Kathleen M. Adams and Sara Dickey, 137 - 156.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Wieviorka, Michel. 1994. "Racism in Europe: Unity and Diversity," in *Racism, Modernity and Identity*. London: Polity Press.
- Wolf, Diane Lauren. 1992. *Factory Daughters: Gender, Household Dynamics, and Rural Industrialization in Jav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olf, Margery. 1970. "Child Tra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ly." In *Family and Kinship in Chinese Society*, ed. Maurice Freedman, 37 - 6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2. *Women and the Family in Rural Taiwa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 1975. "Women and Suicide in China." In *Women in Chinese Society*, ed. Margery Wolf and Roxane Witke, 111 - 114. Stanford, Calif.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ng, Sau - Ling. 1994. "Diverted Mothering: Representations of Caregivers of Color in the Age of 'Multiculturalism.' " In *Mothering: Ideology, Experience, and Agency*, ed. Evelyn Nakano Glenn, Grace Chang, and Linda Rennie Forcey, 67 - 94. London: Routledge.
- Wrigley, Julia. 1995. *Other People's Children: An Intimate Account of the Dilemmas Facing Middle - Class Parents and the Women They Hire to Raise their Children*. New York: Basic Books.
- Yamanaka, Keiko. 2003. "Feminized Migration, Community Activism and Grassroots Transnationalization in Japan."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2(1 - 2): 155 - 187.
- Yamanaka, Keiko, and Nicola Piper. 2003. "An Introductory Overview." *Asia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12(1 - 2): 1 - 19.
- Yeoh, Brenda, and Shirlena Huang. 1998. "Negotiating Public Space: Strategies and Styles of Migrant Female Domestic Workers in Singapore." *Urban Studies* 35(3): 583 - 602.
- . 2000. "'Home' and 'Away': Foreign Domestic Workers and Negotiations of Diasporic Identity in Singapore."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3(4): 413 - 429.
- Young, James. Philip. 1980. "Migr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an Ilocano Community." Ph. D. diss.,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
- Yuval - Davis, Nira, 1999, "Ethnicity, Gender Relations and Multiculturalism." Pp. 112 - 125 in *Race,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A Reader*, edited by Rodolfo D. Torres, Louis F. Miron, and Jonathan x. Inda. Oxford: Blackwell.
- Zerubavel, Eviatar.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 1991. *The Fine Line: Making Distinctions in Everyday Lif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olberg, Aristide. 1991. "Bounded States in a Global Market: The Uses of International Labor Migrations." In *Social Theory for a Changing Society*, ed. Pierre Bourdieu and James Coleman, 301 - 324. Boulder, Colo. : Westview Press.